

出 版 说 明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杰出领袖，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政治家。铁托的生平事业和革命实践活动已引起当今世界的普遍重视，近年来有关铁托的传记著作不断问世。本书是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的二十世纪政治领袖传记丛书之一种，1970年初版。中译本根据1974年修订的第二版译出。

作者菲莉斯·奥蒂(1910年出生)是英国伦敦大学斯拉夫——东欧学院的南部斯拉夫历史讲师。她从事南斯拉夫问题的研究已三十余年，发表过许多论文和专著，这部《铁托传》是她的重要著作之一。数十年来，奥蒂的工作，一直与铁托在南斯拉夫取得革命成功和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和国防部的工作人员，曾被派往中东和盟军前线指挥部的巴里任职；战争一结束，她立即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身份访问南斯拉夫。此后，几乎年年都到南斯拉夫访问，对战后南斯拉夫的事务也较为熟悉。铁托本人曾两次接见过她，特别是1968年10月8日，在布里俄尼岛附近的万加岛上亲自接见她，并作了长谈，这为她写作铁托传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正如奥蒂在本书序言中所说，这部书的写作目的，是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的铁托传记(如：戴迪耶尔、麦克莱恩、齐利亚克斯等的著作)乃至今后会问世的历史性传记之间的补

白。因此,本书的重点是描述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和政治后果。

本书对铁托生平事业的重大事件,都作了详细叙述和评论。作者在书中充分利用了英、美、德、意和南斯拉夫的档案材料,采集了已出版的铁托传记的新材料和研究成果,并且亲自对铁托及其同事们和在战时、战后年代中与南斯拉夫事务有关联的欧美人士进行了访问。全书论述的问题非常广泛,经纬清晰,引证的资料也较为丰富。对1940年以前南共党内的派别斗争,南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的斗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铁托领导下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游击战争,1948年苏南冲突,全国解放后南斯拉夫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铁托在国际事务中所做出的贡献;对铁托取得革命成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原因与未来的展望,都作了详细的评论和阐述。所有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铁托的生平和南斯拉夫国家,对研究铁托和南斯拉夫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书附录注释及其来源、参考书目、索引,全部译出。原书页码排在切口处。地图四幅也按原图译制。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是冯世则(第一、二章)、于亚伦(第三、四章)、范德一(第五、六、七章)、张蓉燕(第八、九章)、赵辛而(第十、十一章)、张启满(第十二、十三章)、王爵鸾(第十四、十五章)、张允文(第十六章)、赵振远(第十七章)。地图绘制宋捷,封面设计、插图蒋明。

1978年9月



铁托总统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部分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

(5—89)

第 一 章 童年和少年	(7)
第 二 章 从孩子到成人	(32)
第 三 章 转变为革命者	(52)
第 四 章 政治犯	(71)

第二部分 逍遥法外的共产党员

(91—139)

第 五 章 逍遥法外的地下共产党员	(93)
第 六 章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受训	(111)
第 七 章 国际经验	(131)
第 八 章 党的总书记	(152)
第 九 章 备 战	(168)

第三部分 通过战争进行革命

(191—264)

第十章	从党的书记到军队统帅·····	(193)
第十一章	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	(209)
第十二章	孤军奋战·····	(230)
第十三章	同盟国的承认·····	(246)

第四部分 革命成功

(265—344)

第十四章	向和平过渡·····	(267)
第十五章	国际政治家·····	(286)
第十六章	国家元首·····	(308)
第十七章	铁托其人·····	(334)
注释及其来源·····		(345)
参考书目·····		(388)
索引·····		(402)

本书地图:

1. 东南欧 1892年·····	(12)
2. 东南欧 1923年洛桑条约·····	(65)
3. 南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年)边界·····	(252)
4. 南斯拉夫 1945年到现在·····	(286)

序 言

11

为伟人作传，任务之艰巨从来使人望而生畏；而当这位主题人物依然健在，身为国际上的重要人士、国家元首时，就尤其令人胆怯。就约瑟普·布罗兹——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而言，由于他异乎寻常地丰富而又波澜起伏的经历，这就难上加难。他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变的边沿。他一生的事业便始终与这一巨变，也与二十世纪欧洲社会演化过程中的革命发展紧密相联。

他漫长的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所处的某些地点和环境，使传记作者难以（有时殆不可能）详加调查。他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军队里的一个士兵，沙皇俄国的战俘，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观察者。他曾于斯大林时期数次长时期访问苏联，曾在莫斯科受雇于共产国际，并险些儿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作为非法的共产党组织者从事活动，躲避着警察，使用着种种化名，往来于欧洲各地——从南斯拉夫到意大利、奥地利、法国、瑞士或捷克斯洛伐克，掩盖着自己的踪迹。年代已久，这时再要查明这样一种生活的真实情况，远非轻易。传记作者于是只得依靠人们的记忆——而人们的记忆中何舍何留，往往有所选择。铁托本人记忆力极佳，有声有色，对自己种种戏剧性的往事的回忆尤其生动，其中许多一直作为轶事反复流传，已经固定下来，有如一幅幅静景照片。因此，关于他早期生活的某些记述也就象是收藏在家庭相册中的快照。对铁托的早期生活（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记述,很难跳出这种固定的模式。

12 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传记作者又遇到另一难题。这场带来无法描绘的苦难、并终于在全然寡不敌众的条件下带来胜利和成功的战争期间,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南斯拉夫人的全部交往,使他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便已成为神话般的英雄人物。英雄崇拜在当时情况下原系自然,而为了促进团结以赢得战争和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从事战后建设,也得到了提倡。凡人铁托和神话英雄铁托,有时便不易区分。直到最近,有关这场游击战争的种种历史记载,仍为这种英雄观所严重影响,迄今仍无一部持批判态度的、客观的著作。我没有企图作这样一种再评价,这已越出这部传记的范围。我略去了军事史的大量细节,而集中于考察铁托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政治后果。军事史现正在由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学者写作,他们的著述当能供日后为铁托立传的作者们参考。

为尚在世的人撰写传记,便出现了一个问题:需要尊重他的沉默与保留之处;我认为这是一切健在的人的权利,即使他们是举世知名的人物也是如此。后来的历史学者可以不受这种约束。然而我应当立此存照:当铁托总统接见我时,他坦率回答了全部问题,毫不迟疑也无所回避;我的印象是他乐于让自己的经历接受任何检验。

铁托总统的正式传记,现正在由南斯拉夫一个专设机构撰写,有研究人员搜集一切可能找到的关于他生平的材料。这样一部全面的传记远非个人所能承担。我这本书的目的不过是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写作的,特别是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和康尼·齐利亚克斯等人所写的,以及今后定会问世的许多历史性传记之间的补白。我开始构思本书时,曾请教南斯拉夫国内一些有机会接触关于铁托生平材料的人们。他们

说：“我们全都以戴迪耶尔的书为起点”。我发现确实如此。其英译本名为《铁托自叙传》，大部份以铁托向作者讲述的自传性材料为¹³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今后一切以铁托生平为主题的著作的原始源泉，虽然自那时以来已发现大量材料对它修改和补充。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争夺中的防寨》也是一部原始资料，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莱恩与铁托共事并成为朋友以后写的。已故的康尼·齐利亚克斯所写的铁托传记，作为资料来源，也有特殊价值。因为这是在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的困难年代里写的。康尼·齐利亚克斯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懂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当时曾有幸和铁托多次长谈。我这本书并不奢望这种特殊价值，虽然我曾两次受铁托本人的接见，并在我研究南斯拉夫事务的那些年代里采访过许多在铁托生平事业的各个阶段与他有过关系的首脑人物，以及别的一些人士。

我的打算是利用早期出版的传记，增添新材料（铁托生平的某些方面大量的新材料），并以我个人对南斯拉夫事务的知识来写这本传记。我还有一项有利条件，那就是获准查阅南斯拉夫的档案材料，这是新近才对历史学者们开放的，而其中大量迄今尚未发表。我曾得到许多南斯拉夫、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方面人士的慷慨协助，我对他们全体无限感激。书中所作种种判断，他们概无任何责任。在此提到一些人而不提另一些人，似有厚此薄彼之嫌，但我还是要对一些曾抽出时间和我讨论这个主题的种种方面，并帮助我搜集材料的人士表示特别感谢。我要提到的S·W·贝利、斯蒂芬·克利索德、P·达缅诺维奇、W·F·迪金、空军上将威廉·埃利奥特爵士、克利亚科维奇上校、J·马利亚诺维奇、M·米卢蒂诺维奇、W·罗伯茨、D·拉亚诺夫、J·托马塞维奇、V·韦莱比特、V·温特哈特以及W·武锡尼奇。我从贝尔格莱德的工人运动研究所主管档案的当局和法边·特尔戈将军

14 以及战史馆人员获得无可估价的帮助；我从萨格勒布的工人运动研究所以及南斯拉夫各地的博物馆主管当局得到极大帮助。南斯拉夫驻伦敦的几任大使和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南斯拉夫政府部门和机构协助我建立联系、搜集材料，有求必应。我也要向已故的萨格勒布大学鲁道夫·比恰尼奇教授致谢，他无数次毫不吝惜地抽出时间，与我讨论铁托的生平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种种方面。他对这一时期的克罗地亚的广博知识和深刻见解独步一时，他的逝世则留下了一个无可弥补的空白。希拉·基德夫人帮助我整理原稿以便付印，埃德斯·鲁宾逊夫人愉快、机敏而熟练地协助我处理秘书事务，我对她们两位特别感荷。我要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的吉塔·伊奥内斯库的始终不渝的关心，以及使我受益匪浅的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多次讨论。最后，我必须感谢克里斯托弗·希伯特，没有他的鼓励，这本书根本不会动笔，更不用说完成了。

第一部分

一个共产党员 的成长

19
20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21

1928年11月里阴沉沉的一天，铁托向挤满了同情的支持者（留长发的小伙子和“打先锋”的短发姑娘）的法庭，就他何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身材不高，戴着眼镜；为了迫使当局开审他的案件，刚刚作过绝食斗争，因而显得消瘦。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同法官辩论，毫不隐讳，勇敢而真诚。第二天的一篇新闻报道说，这决不只是一种傲慢表现。他原想讲讲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这如何把他引向共产主义。但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说所有这些早都已谈过了。他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铁托解释说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因为他童年时期所经历的贫困和压迫，而这一切在新近成立的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王国社会中依然如故。他承认自己是非法的共产党的一个积极成员，但不承认据此对他起诉的法律有效，因为这种法律，他说，“不是人民通过的”。法庭不顾他的雄辩，判他五年徒刑，把他押了下去；他一路高呼“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几乎可以肯定，这次判处徒刑救了他的性命。〔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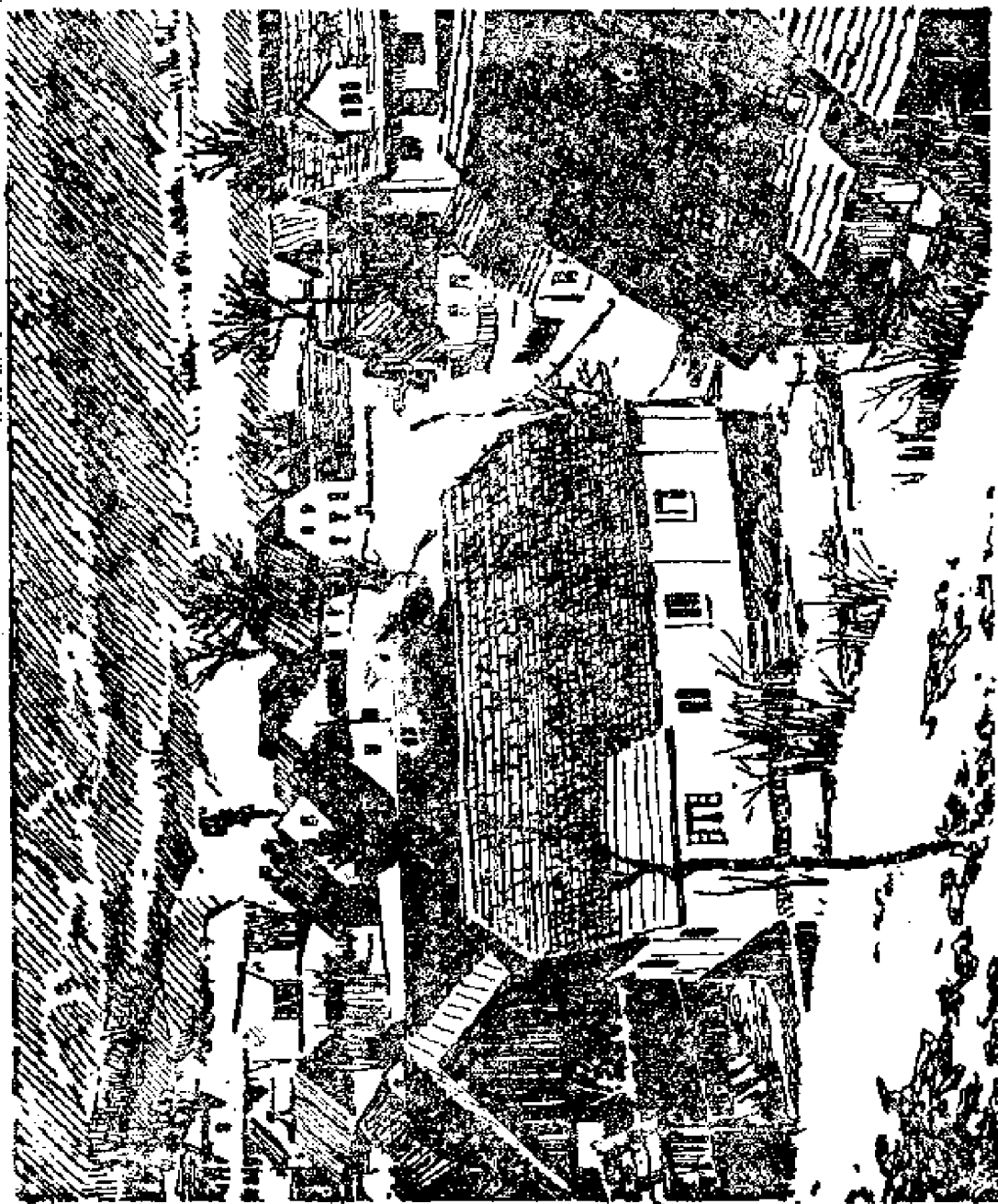
1928年11月14日他开始服刑时，年三十六岁，倔强，目空一切，随时准备向法律和整个国家机构挑战。法官责备他不该这么顽梗不化，断送自己的青春岁月，他却回答：“我准备受罪。”他反复声明不怕法律。五年后他从牢狱里出来时，对共产主义的狂热信仰并未稍减，但却不再那么傻，也不准备那么任性地、公开

而激烈地向强大的国家挑战了。他已经有经验得多，也危险得多了。但即使弄清楚了铁托的出身，关于他想要在法庭上说明的把他引导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种种事实，为什么约瑟普·布罗兹这个克罗地亚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竟然成为少数几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之一，而他家里和他那一代中的其他人却没有，则仍然是个难以捉摸的问题。

约瑟普·布罗兹 1892 年 5 月 7 日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库姆罗维茨村。父亲弗兰约·布罗兹是克罗地亚人，母亲玛丽亚（娘家姓亚韦尔舍克）是斯洛文尼亚人，她的村子距离库姆罗维茨不过十英里，位于克罗地亚境外。约瑟普是父母婚后头十年中的第七个孩子，除他之外只有三个（两男一女）活了下来。他的母亲于 1918 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她总共生了十五个孩子，这个家庭能把其中的七个养大成人，与当时克罗地亚的一般农民家庭相比，就算不错了。在那些年代里，大多数孩子（铁托本人说约达百分之八十）都活不到十五岁。（注 2）

布罗兹家在村子里不算是最穷的。他们有一块大约十英亩的田地，是后来所谓的“中农”——介乎极少数有钱户和许多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的贫户之间。弗兰约·布罗兹还有几匹马、一挂车，拉脚挣些钱贴补口粮。这就意味着资产和花销都要比大多数农家要多。弗兰约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库姆罗维茨村子中最好的房子之一，这是一所坚固的小农舍，经过一番切实的翻修和改善，还不到五十年。他的妻子家里也有土地。

人们有时说，玛丽亚·亚韦尔舍克的婚姻是下嫁，门不当，户不对。但她的丈夫为人精明，偶尔也还勤劳，虽然有时也偷懒和酗酒，而且同那时的许多农民一样，年令愈大，就愈发如此。他至少是接受了这一现实——虽然起初并不情愿，孩子们如果想要过得好一点，就得离开乡下。他是库姆罗维茨头一个允许儿子



库姆罗维茨村，铁托的诞生地

出去当学徒的父亲。人们都说俩夫妇中玛丽亚的性格要坚强些，她是个仔细的当家人；这一家有太多的嘴巴要喂，总是难以收支两抵，有时当真受苦挨饿，几乎总是欠债。铁托后来回忆说：“每当债务负担重到受不了的地步，软弱而善良的弗兰约便自暴自弃，²³借酒浇愁。这时整个家庭的担子就落到我的妈妈身上。”〔注3〕尽管如此，布罗兹家在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仍处于库姆罗维茨的最上层。但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这个二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里没有坐地户贵族，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富裕的农民。

库姆罗维茨位于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以北，属于风景优美但却土地贫瘠的扎果烈地区。这是一片可爱的乡野，有许多峻峭的小山峦，陡坡地上一片片果园和葡萄园。山谷里则是苏特拉河及其支流，有水草地和沼泽地，可作为牧场。可耕地则极少，这个地区既没有象更东边的萨瓦河与德拉河河谷那样肥沃的土壤，也没有萨格勒布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克罗地亚西部的利卡地区那种土少石多的不毛之地。铁托这一代是大批离开农村的头一代人，因为土地已不再能够养活迅速增加的人口。成千的人移居国外，另一些则象铁托那样进城找工作，大都被城市无产阶级所吸收。他们几乎全都和留在乡村里的家庭保持着联系，那儿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原封不动，旧的风俗习惯不易消失。扎果烈生活中许多风俗习惯和当地人的特色一直延续到当代。直到今天，扎果烈的男人仍然以他们的倔强、坚忍、豪饮、丈夫气概和长寿而著称。铁托身上保留着扎果烈的肖子的许多特色。〔注4〕

铁托童年时期，克罗地亚是奥匈帝国所属的匈牙利的一部分，奥匈帝国则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多种族的二元君主国。自1848年起，当朝皇帝是弗兰茨·约瑟夫，1900年时已七十岁，浸透了保守主义，不能理解或控制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和经



(原图译制)

济变迁使他的帝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突出的是两个统治民族奥地利的德国人和匈牙利的马扎儿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少数民族，特别是与斯拉夫人。包括奥地利的捷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及斯洛伐克人的关系。

- 24 1867年，匈牙利除外交和国防事务之外都得以自治。其首都布达佩斯虽不是帝国政府所在地，却和维也纳同样壮丽，也几乎同样重要。皇帝兼是匈牙利的国王，必须用一顶象征性的古老的铁王冠另行加冕。马扎儿人分毫不让地护卫着自己的好不容易争得的自治权，又力图扩大他们在帝国内的特权和势力，但却不肯把他们作为民族权利争来的自治权扩及克罗地亚人。他们以一种粗暴的鄙夷态度对待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而由于害怕对匈牙

利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中间迅速增长的民族主义作出让步，将会削弱他们在和奥地利的日耳曼人的关系中的地位，他们就更变本加厉地这样做。

克罗地亚在匈牙利内部享有一种特殊地位：拥有自己的议会，即沙布尔，设在其古都萨格勒布；有自己的主席，即“巴昂”（虽然他是布达佩斯委任，代表马扎儿利益而不代表克罗地亚利益）；对地方行政事务有一定范围的自治权。在铁托童年时期，这种独立其实无甚价值。克罗地亚农民虽然早在1848年便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但仍贫困不堪，没有政治势力。克罗地亚仍有许多大庄园属于土地贵族，大半是马扎儿人。“沙布尔”的议席是受到控制的，办法是规定土地多、纳税也多的人才享有公民权，以及对选民进行明目张胆的恐吓和收买。居民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几乎全被剥夺了公民权；两百万左右居民之中，有权投票的不过三万。铁托童年时期的库姆罗维茨，二百户人家中有选举权者不过三人。一般认为，选举日上午给一盘土豆烧牛肉和一公升酒，或是投票前给一只新靴子，事后再给另一只，也就足以弄到农民的一票了。〔注5〕

1883年至1903年的克罗地亚“巴昂”是库恩·海代尔沃里伯爵，由于执行冷酷无情的马扎儿化政策，而受到克罗地亚人的憎恨。他不择手段地削弱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极擅长于挑动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相互敌对，那些塞尔维亚人也住在曾是抗击土耳其人的边屯区的克罗地亚的。他担心他们会齐心合力反抗马扎儿的统治。

克罗地亚人这时也对匈牙利在他们土地上所实行的经济歧视心怀不满。这是个铁路交通广泛发展的时代，而克罗地亚却得不到足够的铁路线以促进主要工业的发展，因而也就无法繁荣起来。河流成为主要的贸易渠道，而却全无人照管。克罗地亚人根据历

史上的权利以及商业上的需要而认为属于自己的亚得里亚海上的阜姆港，1873年后也被奥地利人接管。匈牙利政府所执行的赤裸裸的政策，就是保持克罗地亚贫困和马扎儿化，有意限制克罗地亚工业的发展即出于这个目的。

上述种种问题中所引起的多数斗争，是由克罗地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萨格勒布或布达佩斯进行的，与农村则相距遥远。十九世纪末期，报纸在萨格勒布以及各个城镇中已经大量发行，而农村中却仍然罕见。^{〔注6〕}克罗地亚的老一辈乡下人几乎全是文盲，虽然邻近的斯洛文尼亚农民中识字的人要多一些，但无论识字与否，农民是花不起钱买报纸的，他们主要关心自己本地的事务。但他们对马扎儿人的统治却深有体会：马扎儿人是异族统治者，是捐税勒索者，是军官，是恼人的或苛刻的规章的渊藪；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全怪这些人，农村里的贫穷和不幸都应由他们负责。

铁托童年的生动记忆之一，是1903年他十一岁时扎果烈农村里发生的一次反抗增加捐税的暴动。库姆罗维茨附近的农民扯下当地火车站上的匈牙利旗帜，表达了自己的感情。马扎儿警察对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了一人，打伤了十人。这就使局势火上浇油，许多人被捕。作为对这个地区的惩罚，匈牙利部队被派往各个克罗地亚农家驻扎。铁托的父母被迫供养四个兵，达一个月之久；这对他家所余无几的口粮真是一种沉重的额外负担。^{〔注7〕}马扎儿的统治使许多克罗地亚人成为坚定的、有时是狂热的克罗地亚²⁶民族主义者。这时铁托在农村度过的童年时期，可能多少有所熏染，但都不是他成年后性格中的一种特色。

※ ※ ※

铁托的童年还受到其他激进的影响。民间历史故事讲到多少

世纪以来扎果烈农民在封建压迫下的悲惨遭遇，那时多数克罗地亚人身为农奴，按匈牙利法律毫无任何法权可言。铁托童年时期扎果烈农民极少外出旅行，只有自己创造的一点儿消遣。他们把自己经历中的戏剧性往事反复讲述。这些故事（其中的好人全是他们自己的本族人、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统治阶级则都是坏蛋）里的主人公全是些表现了独立精神的人物，他们向权威挑战，通常死得很惨。由于故事大多的历史事件和本地区的人与事为基础，其戏剧性因之尤为浓烈。

有一个事件给他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虽然发生在铁托出世之前三百多年，这就是1573年马季雅·古贝茨所领导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农民起义。^[注8]农民不断暴动，是中世纪后期的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特色。1514年在匈牙利就发生过一次，规模极大，遭到了残酷镇压。而五十九年之后，古贝茨和另外三个领袖又成功地发动了另一场暴动，获得了成千上万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农民的支持。这次起义的远因，就是十六世纪期间自上土耳其在1526年莫哈奇一役打败匈牙利后，这一地区生活状况的迅速恶化；近因则是本地贵族的任意逞凶作恶。起义的领袖之一伊利亚·格雷戈里奇被俘，押到维也纳严刑审讯，他的部份供词中就讲到一个本地贵族弗兰约·塔希的恶行及其对农民的敲榨勒索。他说：

“若不是塔希用一种最违反基督教教义的残暴方式纠缠和强奸他们的女儿和处女，他们原是可以忍受这些虐待的。……塔希死了老婆以后，常骑马到地里看干活的妇女。他看谁顺眼，就命令仆人拖到他的城堡里去，剥得一丝不挂。²⁷他要看中哪一个，就给她洗个澡，然后强奸。……有一次，农奴们让检察官察看的被塔希毒打和奸污的闺女就有十四个。

一个农民的女儿被关在塔希的苏亚埃德城堡里，她的爸爸提出抗议，塔希的儿子就用刀在他的脸上横砍竖划，还挖掉了他的双目。”〔注9〕

激起农民愤怒的暴行，这不过是一部份。

追随古贝茨的人们把雄鸡毛插在帽子上，作为造反的标志。铁托每逢讲起这段故事，总要提到这个细节，说在他童年的游戏中，他们也这样做。1573年1月29日早晨，起义者在格雷戈里奇的率领下出发攻占采萨尔城堡；铁托童年时，城堡的废墟仍然残留在库姆罗维茨附近高耸的陡峰上，扼制着苏特拉河河谷以及通往斯洛文尼亚的大路。他们冲进城堡，放了一把火，把可恨的大管家砍了头，从军火库里夺取了毛瑟枪和别的武器。这就点燃了周围各区以及远达北边的斯洛文尼亚和卡林西亚总起义的信号。贵族们起初措手不及，但随即从起义没有波及的地区征集封建部队，对雇佣兵和任何愿意支持他们的农民许下大笔赏金。最后，克罗地亚尤拉伊·德拉什科维奇率领一支装备较好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在库姆罗维茨附近山谷里的下斯图皮察同起义军决战。起义者抵抗失败，逃到附近乡村，随后几周内所有人被捕获，或就地处死，或受酷刑。据说，单是扎果烈一地便有四千至六千农民被杀；当地每个村庄都有成百具尸体悬挂在树上。

古贝茨胆敢自立为农奴的领袖，这就注定了给他安排一个可怖的下场。德拉什科维奇主教在给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奏章中说：“如蒙陛下恩准，我们就给他加冕——用一顶烧红了的铁王冠，以儆效尤。”当时一位历史学家记述了在萨格勒布旧城圣马可教堂不远处施刑的经过：“首先用烧红的火钳烙他，同时把他²⁸的副手安德里亚·帕萨奈茨在他眼前处死，然后用一顶烧红的铁王冠给他加冕，最后把他象个罪犯似地劈成四块。”一位克罗地亚历史学家记述说，把他处死之前，先押着他游街示众，仿佛赛会

似的，一大群暴徒对他百般嘲弄地高呼：“农民之王万岁”(A verex rustiocrum)。〔注10〕

铁托相信他的祖先（据说是在十六世纪中叶从达尔马提亚迁到扎果烈来的）曾参加这次起义。铁托童年时期，孩子们一直根据这段故事及其与本地相关联的事件和情节来做游戏，加以扮演。他还记得每逢孩子半夜里醒来，母亲吓唬他们不许作声时总说，要不睡着，采萨尔格勒的黑皇后（因起义后所施行的野蛮惩罚而凶名远扬的巴尔巴拉·埃尔多迪男爵夫人）就会来把他们抢走。这段创痛至深的往事的残酷和不公，一直生动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注11〕

还有其他一些发生时间较近，有关农奴制度的不公的故事，也使铁托从小受到教育。这个制度在克罗地亚直到1948年才废除。农奴制度的详情因地而异。废除之前，农奴及其家人世代代靠一块土地为生，而土地属于领主。农奴必须把部份作物、酒和牲畜（在克罗地亚是九分之一）交纳给领主，必须交一笔特殊的房租，每年必须自带工具和车辆服劳役若干天。农奴不是奴隶，但属领主管辖。领主有权以最不足道的理由施行体罚——常常是不分男女。如果领主还有处死权(ius gladii)，则只要有法官在场，便可判处农奴死刑。〔注12〕领主并不都虐待农奴，但很多的确实虐待。滥施淫威的情况尽人皆知，使得哈布斯堡统治者们在十八世纪以来多次企图从法律上限制领主的权力。这些事情在铁托童年时期，人们还在不断谈论。

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于1848年4月28日发布，铁托的祖父母当时住在库姆罗维茨。布罗兹家是1684年作为埃尔多迪家的农奴在这里落户的。他们和其他农奴一样获得解放，并准许向领²⁹主购买自己的房屋和土地。无钱的农民可以借到这笔为数相当大的款子，分二十年陆续偿还。铁托回忆说，“名义上利息是百分之

八，但加上佣金和额外勒索，达到百分之二十四。”〔注13〕农奴制的废除，在农民生活中引起了革命性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土地买卖成为一宗大生意。许多领主把产业卖给了投机商。在此地居住五百多年的埃尔多迪家族也把全部产业悉数变卖，迁出了这个地区，一去不返。一家奥地利银行买下了埃尔多迪家族的庄园，然后又把地价款贷给那些想买这片土地的农民。

直到这时为止，布罗兹家和这个地区的多数其他农民一样，其实多数南部斯拉夫人也都这样，生活在一个称为“扎德鲁加”〔注14〕的扩大的家族集团中。这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组织，起源于人们群居御敌的需要，可以一直追溯到南部斯拉夫人定居巴尔干之初。一个“扎德鲁加”里，所有同宗的人们都住在一所房子或一组建筑中，由一个头头当家。通常是年龄最高的男子，也或者有女的，称为“戈斯波达尔”（族长）或“斯塔雷欣纳”（老太爷）。“扎德鲁加”大小不等，少则两三对夫妇及其子女，多则可成百对住在一起。原则上是儿子把媳妇娶回来，另外增修住屋，直到“扎德鲁加”看起来象一个大蜂房。姑娘结婚，则是嫁到丈夫的“扎德鲁加”去。“戈斯波达尔”之下，每一成员都按社会等级占据一定地位，地位高低主要看年龄，但男性的地位都高于女性。“戈斯波达尔”对所有成员享有族长权威，他的妻则专管妇女们的生活和劳作。她们做大锅饭，大家一起吃。关系到公共财产，田间活计和其他事务的重大问题，都由男子磋商，然后作出决定。

“扎德鲁加”制度倾向于形成一种静止的、保守的社会，很适合经济上几乎全然自给自足、金钱用处很少的封建制度。它一直³⁰受到政府鼓励，因为这利于赋税的征收；而且在男子被召服兵役时，“扎德鲁加”能够分摊劳作，农活可少受损失。但是，它不能适应继农奴制度的废除而来的自由社会和不断变化的经济。许多“扎德鲁加”经过种种安排付清地价之后，无力维持全部成员的生

活，因之开始解体。但在法律上许可它们解散，则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1853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准许“扎德鲁加”分家。这时有些人家，包括铁托的祖父马丁·布罗兹就照章行事，分掉了土地财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扎德鲁加”已所剩无几。但许多今天在世的人（铁托是其中之一）都记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克罗地亚仍存在“扎德鲁加”，而直到今天，南斯拉夫某些地区还留有这种痕迹。

铁托本人虽未经历过这种生活，但却在“扎德鲁加”的家族习俗和密切的家庭关系影响很深的社会中长大的。他的父亲弗兰约·布罗兹虽然“软弱而善良”，却享有一家之主的权威。他的儿子们成年后干什么，他最后说了算，儿子们也都听从。少年时代的约瑟普，看来是一个温顺又听话的孩子。他跨入社会之前，生活中的每一阶段都通过家族中的某一成员（外祖父母、舅舅、堂叔）得到帮助，弟兄之间有时也互相照顾。这种传统的密切的家族关系使约瑟普有了一种强烈的父权和家庭责任感，也成为他的个性中一个重要部份。他一挣工资就给家里寄钱；从他的父亲年迈乃至1936年去世，他一直寄钱给妹妹，让她照料父亲；1945年后他成为国家元首，也总是以委婉的方式对有需要的家族成员加以照顾。

※

※

※

农奴制度废除后的那些年代，对克罗地亚农民来说，是一个社会和经济重新再调整的艰难时期，持续了许多世纪的生活方式瓦解了。这也是一个政治上发生变动的时期。哈布斯堡皇权趋于³¹衰微，在外敌和帝国内部许多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高潮的压力之

下，帝国疆土日蹙。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帮助加里波第和加富尔取得胜利，夺走了奥地利的意大利诸行省，而归于一统的意大利新国家。强大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崛起，破坏了奥地利几百年来在德意志诸国的势力范围。1866年，现代化的普鲁士职业军队致命地击败了奥军，取胜之快，举世震惊。奥地利从此一蹶不振，统一的德意志新国家取代了它的国际影响。

威望、领土和税收均遭损失之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及其顾问们力图加强对剩余的非奥地利各行省的控制。但遭到了所有非日耳曼民族的日益强大的对抗，他们既无力压服，又无力绥靖。1867年，他们通过和匈牙利订立的一项“协定”，把哈布斯堡帝国划分成一个二元帝国，给予匈牙利很大程度的自治，并许可匈牙利实际上控制克罗地亚。结果这一控制只能使克罗地亚人与马扎儿人之间的敌对越来越尖锐，还导致人们更加坚持为帝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不仅是克罗地亚人，而且还有同样居住在奥地利境内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要求自由。这些要求受到邻国塞尔维亚的政治活动家们的鼓励。塞尔维亚1829年从土耳其取得自治，并于1878年后成为独立国家。其政治领袖们怀着扩张主义的目的，向往有一天能把全体南部斯拉夫人揽入怀抱，其中不仅包括奥地利帝国属下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而且包括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南部斯拉夫人，以及门的内哥罗这个小小的但却独立的国家的南部斯拉夫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即随着土耳其在政治上的衰颓和经济上的破产，奥地利和俄国都想承袭土耳其在巴尔干依旧据有的势力和领土。俄国为了强迫土耳其答应自己的要求，于1877—1878年对土作战。但是，通过结束这场战争的柏林条约而获得前土耳其行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管辖³²权的却是奥地利。这是一个纯粹由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和斯拉

夫族伊斯兰教徒居住的斯拉夫省份。奥地利于1908年兼并了它，恶化了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后者根据种族的理由以及历史上的权利要求得到它。此举也激怒了俄国，因为这就挫败了俄国的企图，它打算把巴尔干作为战略基地，进而对扼守着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的君士坦丁堡加以控制。而且奥地利还能够利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一有利地位向前推进，穿过土耳其在马其顿的防守薄弱的领土，直达爱琴海上的萨洛尼卡港口。1914年战争爆发时，这些争端直接导致奥地利与俄罗斯各属一方，互相敌对。它对克罗地亚农民似乎相去甚远，但对于象约瑟普·布罗兹那样在十九世纪末期出生，恰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长大成人的克罗地亚人的一 生，却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

国际事件的反响必然也曾传到扎果烈的农村。铁托的父亲弗兰约·布罗兹诞生于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约签订之年。战争迫近，奥地利在萨多瓦被普鲁士人击败时他才十岁；俾斯麦征服法国时他十四岁；1878年俄国军队在巴尔干对土作战，推进到君士坦丁堡遥遥在望之处时他约二十二岁，未婚。这是一个生活全无保障的时代。物价飞涨，大多数农家仍在偿还因购买土地欠下的 借款本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支付奥匈帝国的军费而增加的赋税，使农民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1870—1890年间，克罗地亚和欧洲多数地区一样，遭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欠收。奥匈帝国便从农业正在兴旺发达的美洲进口粮食，供应国内市场。及至当地重又获得丰收，农民却发现自己的产品不得不削价出售，因为还在继续进口更廉价的外国粮食。好的年成时农民无法以善价 卖出自己的收获物；坏的年成时则过了元月份便几乎颗粒无存，只得告贷以求渡过春耕，直到夏收。

马丁·布罗兹爷爷娶的一位农家姑娘，名叫安娜·布拉日契³³科。她家不是农奴，而是已有二百年的自由民，她以此而自豪。

马丁爷爷在“扎德鲁加”分家时得到一份财产，加上用马车拉脚，来回往返于距离库姆罗维茨不太远的萨格勒布、卡尔洛瓦茨、锡萨克等城市之间，勉强度日。他的主要心思就是挣得足够的钱来养活老婆和七个孩子，避免卖地还债，维持一家众口渡过种种难关——荒年、疾病、生育以及丧葬，这是家家户户都得应付的。1853年时，奥地利的法律禁止长子单独继承财产，规定遗产必须由所有的孩子均分。这就给农民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因为产业被割得零零星星，支离破碎，哪一份也不足以养家活口。

布罗兹家受到这条法律的严重影响。1878年冬天，马丁爷爷拉了重重的一车盐，松脱了一只轮子，翻车受伤致死。他的独子弗兰约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但必须赎买六个姊妹的继承权，因此只得借债，最后还是不得不卖地还账。他结婚时，剩下十五英亩土地；到了约瑟普童年时，又减少到十英亩。〔注 15〕

※ ※ ※

弗兰约·布罗兹于1881年1月结婚，当时二十四岁。新娘玛丽亚·亚韦尔舍克是十六岁，她是她家的十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弗兰约渡过苏特拉河到对岸的斯洛文尼亚山林打柴时认识了这一人家。木柴是农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必需品，烤面包、烹调、以及住房角落里冬天取暖的平顶瓷砖炉子等等，都靠它做燃料。1848年之前，到领主的林地或公地打柴曾经是农民们在若干世纪的农奴制度下少有的几项权利之一。当他们获得自由时，领主把森林和公地全作为私产留下，不花钱的燃料从此断绝。库姆罗维茨的³⁴农民剩下不丁点儿林地，常常只得花钱买柴。弗兰约的部份生计，就靠去斯洛文尼亚打柴运到村里出卖。他多半曾和亚韦尔舍克家作过某种安排，这一人家在距库姆罗维茨十英里的波斯雷达

村旁的高坡上有六十五英亩耕地和树林。〔注16〕

元月里的一个雪天，亚韦尔舍克家出嫁长女，大办婚宴。五辆大雪橇从库姆罗维茨接来了新郎和他的亲友。婚礼在村教堂举行，然后在他们的斯洛文尼亚村子里的家中，举行跳舞宴会庆贺，一连好几天。新郎新娘，珠联璧合——弗兰约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鹰鼻，一头黑色卷发，恰如铁托后来所描写的那样，属于“真正的迪纳拉型”。玛丽亚身材窈窕，金发碧眼，容貌动人，穿着一身传统的斯洛文尼亚农家衣裳。他们动身返回弗兰约在库姆罗维茨的住房时，玛丽亚带去了农家通常的嫁妆：衣服、卧具、地毯、家庭用品。其中还有宗教画片——圣乔治、龙、亚当和夏娃、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直到今天，库姆罗维茨那座房子里还能见到这些画。玛利亚的图画尤为珍贵，因为它是画在一只能奏出一段赞美诗的八音盒上。玛丽亚与相离不过半天路程的娘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等到她自己有了孩子，上外公外婆家去便成为他们的乐事。约瑟普是外公最疼爱的外孙，他回忆起去外公家里长时间串门的情景，至今还觉得是他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日子。

弗兰约和玛丽亚在库姆罗维茨的那座房子，是按照克罗地亚扎果烈农家住宅的传统风格修盖的。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全部婚后生活，生男育女——包括他们的第七个孩子约瑟普。1860年，即布罗兹“扎德鲁加”解散后不久，又曾把房子结结实实地翻修了一遍；这就表明这一家人那时仍还兴旺。瓦屋顶代替了原来的苫草盖，抹得挺好的墙壁代替了粗糙的灰泥板条，而且改修得可以供两家人分别居住。还铺上了结实的木质地板，而不是较次的房子那种泥地面。在约瑟普的童年时期，它是全村最好的住宅之一。这房子如今成了一所纪念馆，具有此类全国性文物那种焕³⁵然一新而毫无个性可言的外表和气氛，与约瑟普童年的故居相比，已面目全非了。

但内部的布置变化不大。根据旧照片和一些原来的以及复制的室内器物，今天还能大致复现铁托所述自己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生活的背景。有一间穿堂，用来存放户外穿的靴子，以及在田间干活，大量时光在户外度过的一大家人的各种用具。穿堂两边是两间起居室，右边一间是约瑟普家，左边一间是他的堂兄弟家。这种起居室兼卧室（大约长十八英尺，宽十二英尺）叫做“希沙”，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两室各有一只平顶炉修在屋角，铁托家的那一只还装饰着带有神圣的十字架的凹花纹。靠墙放着一张大单人床。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双人床，虽然有时也用一条长凳（叫“斯蒂布利卡”）把它拼宽一点。屋小人多，事事难以回避。婴儿用的木摇篮也放在这里，至今还能看到。孩子长大了摇篮放不下时，便放到炉顶上去睡。大孩子们睡在房顶下阁楼地板上。与主屋分开的还有一个小间（长十二英尺，宽九英尺）叫做小内间或“科乌里察”。这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可以用做客房，偶尔也用来回避人。

穿堂另一头还有个出口，通向一间相当大的公用厨房，两家用，一家占一边。屋顶由横梁支撑得很结实，上面安装着钩子，钩上可挂肉，用两堆柴火烟熏；另外还有挂锅用的钩子。火堆后边是大面包炉，各家有一个，这也许是任何农家最重要的设备。

面包是主食，餐餐都吃，质量从小麦面包到发酸的黑裸麦和玉米面包，随年成好坏而异。肉不是天天都吃的，脂肪算好菜，糖是奢侈品；水果蔬菜则随季节食用。农民没有加工食品的设备，³⁶没钱买糖渍制食品，因而多余的水果蔬菜常常浪费，随后便又没有吃的。

铁托回忆起他在库姆罗维茨的童年时，缺少食物是个老话题——上了锁的食品室；孩子们如何当着亲戚的面向妈妈要面包，因为知道好强的妈妈不会拒绝，虽然过后可能打他们一顿，一位

常给小约瑟普一片面包的教师；有一次他怎样偷了外祖父一块特别好的糖，却把它掉进河里去了；还有一次，父母不在家，约瑟普领着弟弟妹妹把妈妈留着过年吃的一个猪头煮了吃，他们吃得太多了，都恶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铁托的回忆录中常常描写童年时期缺少食物的情景，只有一次讲到丰年、收获季、婚嫁和传统节日的种种宴会，虽然他必定曾参加过多次。

生产食物是全家大小的根本任务。孩子们从小就得干一些有用的活。小孩子可以照看拴着腿在田野吃草的牛和山谷里牧放的鹅。他们上井边汲水，还得推动沉重的石磨磨玉米面。这套工具是一快大圆石头，边上一个洞孔里安装着一根长杆。铁托记得曾一连几个钟头推着它转。这石磨至今陈列在厨房里。妈妈用的纺车也还在那里，这是用来纺麻和羊毛给一大家众口织布织衣的。织布的手织机在外边的棚子里，这棚子如今已和牛棚以及别的下屋一起拆掉了。

实际上，约瑟普幼年时期很大一部份时光不是在库姆罗维茨家中，而是在斯洛文尼亚的波斯雷达村外祖父家度过的。马丁外公最疼爱约瑟普，约瑟普父母便送他去那儿，以减轻自己家里的负担。在斯洛文尼亚的这一段久居，给他的童年提供了一个有人疼爱的、有保障的、快乐的环境。外公是个矮小健壮的人，铁托长得很可能象他。他把这个小家伙叫“约塞克”——小约伊。在铁托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愉快、诙谐而和善的人，喜欢开玩笑；铁托说自己的这种爱好就是从他继承而来的。（注17）

约瑟普喜欢这里的户外生活，吃得饱；院里院外总有活干：³⁷汲水、放牛、学骑马、跟着烧炭的外公到山林里去。他在这里学会了一整套乡村生活知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领导着一支游击大军穿山过林时，这成了无价之宝。他在这时也养成了对打猎、钓鱼和各种农活的爱好，终身不移。

在外公跟前度过的这段发育时期里，他学会了斯洛文尼亚语，这种语言同他的克罗地亚家乡话不一样。它虽然也是斯拉夫语，语言结构和重音都与扎果烈的克罗地亚语有区别。约瑟普回家后，讲话就带斯洛文尼亚口音。直到今天，专家们还能从铁托的克罗地亚语中察觉到斯洛文尼亚语影响的痕迹，他讲话有点儿南腔北调。发现他语言风格有些异常的人们，常说他的口音带俄语腔调。虽然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刚从俄国回来时可能如此，但对他的口音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斯洛文尼亚语。

这几年生活，也许还有他气质中的斯洛文尼亚成份，使他了解斯洛文尼亚人民以及他们对西方的向往。在三十年代，当他从监牢里出来，成为一个出名的共产党员，过着一种非法的被迫捕的生活，从南斯拉夫越境去意大利和奥地利时，他寻找安全的藏身之所，不是去他的克罗地亚故乡，而是去自幼熟悉的斯洛文尼亚村庄。

约瑟普在 1900 年将八岁时回到家里。回顾起来，他总觉得自己童年最欢乐的时期是和十九世纪一起告终的。他与别的农家男孩一样，八岁就被认为已经长大，可以顶一个劳力用了，于是被打发到地里锄玉米，给菜园除草，赶牲口。铁托后来所讲的少年时代的故事，是当时扎果烈一般的农家少年的共同经验——同村里的男孩子们游戏；与边界对面的斯洛文尼亚孩子打架，这时约瑟普就得否认他和斯洛文尼亚人有关系，坚决表示拥护克罗地亚的库姆罗维茨；从邻家的树上偷苹果、偷核桃；上小溪钓鱼；把姐姐结婚的花冠藏起来进行开玩笑。但他很少说起较为亲密的家庭生活——妈妈一年一度的妊娠，这段时期他和兄弟姊妹以及爸爸的关系，都很少提到。关于他所受教育中的宗教方面也讲得很少。

克罗地亚农民全是天主教徒，教会在他们生活中起着重大作

用。铁托的母亲是虔诚的，他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一起上教堂，接受教义问答和天主教的基本教育，领了第一次圣餐。而他后来留下的记忆却全是反教会的：克拉涅茨的修士如何偏偏在农民最拿不出粮食的元月份前来强索捐献的粮食；他如何不肯再给神父当眼斑（但未讲他是怎样被逃去的），因为他在一次弥撒后给神父脱祭袍时笨手笨脚，神父打了他一耳光；他如何把妈妈给的让他送交教领受圣餐的神父的钱偷着留下了一点，虽然他的朋友们告诉他，犯有这宗罪孽上帝将会把他殛死。教会对农村中的贫困无所作为，反而横加勒索，并教导人们把现状作为上帝的律法来接受。较高级的神职人员与统治阶级沆瀣一气，教会还拥有庄园和世俗产业。以上这些，就是铁托成为共产党员，并把天主教会斥之为与压迫剥削相联的资本主义机构之后，在他记忆中留下的东西。〔注18〕

1899年，库姆罗维茨破天荒第一次开办了一所初级小学。校舍最初是在一间小屋里，1902年换修了一座新房，正对着布罗兹家。克罗地亚从1890年起实行强迫教育，但不受农民欢迎，他们认为它耽误孩子们干正经活。铁托后来回忆说：“我家是农民，对这件事是典型的农民观点，即受教育不过是装样子，不如干地里的活重要。常常叫我在家里干活，那就等于让我扔下学习。因此我有时就从家里溜出去上学。”〔注19〕但在1902—1904年的档案里表明约瑟普·布罗兹仍然时常缺席。这不单是由于家里的劳动，³⁹还在于他十岁时患了白喉，这是乡村里的常见病，经常引起死亡。库姆罗维茨周围的村子里没有医生，但有许多土药方和本乡本土的“民间”行医者，直到今天还有。真正的治疗其实是靠本身的体力；尽管铁托后来说自己是个“单薄的孩子”，从根本上说他还是健壮的。

库姆罗维茨约有二百户人家，但这所学校也接受四外小村庄

的孩子。铁托回忆说，他上学时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只有一位老师。第一位老师尤拉伊·马尔科维奇成了布罗兹家的房客，睡在阁楼上。他患有肺结核，常把血咯在唯一的手帕里，小约瑟普便把手帕拿到小河里去洗，然后拿回来在学校的火炉上烤干。肺结核夺去了那么多克罗地亚农民的生命，而约瑟普很可能就是这样获得了对它的免疫力。马尔科维奇的母亲在他去世前不久，把他接走了，当走时他挥着这条手帕告别，孩子们都哭了。接着一位女教师教他们一个短时期，她很严格，人们因此还记得她。她结婚去了，后来的一位性情温和的人，叫斯捷潘·文普尔舍克，“总是对学生体贴关怀，尽管他自己有一大家人，家累很重。”他在一封关于布罗兹的信中说：“约瑟普的父亲在兄弟辈中最聪明，想让孩子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他问过我，约瑟普长大了该干哪一行。我看约瑟普颇有实干才能，就建议他当一个机师。”〔注 20〕

约瑟普上学时，看来没有招惹过什么是非；而且他从几位老师那里得到的只是谈写的技能，对书籍的渴望，以及要他跨入社会去的忠告，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导致他成为一个政治革命家的影响。铁托自己说过，他学习上有困难，考虑到他上学的环境，这不足为怪。但在 1904 年，即他毕业的那年的成绩报告单上却各科都很好：品行——超；阅读（包括理解和朗诵）——优；教义问答、宗教训育、数学和劳作也是优；唱圣诗和一般歌曲以及体育⁴⁰的成绩是良好。因为他没有机会上中学，马上就被打发去干活，养活自己，帮助维持一家的生活。这样一来，他一开始是很少有机会运用自己的知识。

他给母亲的兄弟马丁·亚韦尔舍克舅舅干了几个月活；除了供他食宿，答应到年底给他一双新皮靴。约瑟普觉得在这件事上他是受骗了，因为后来得到的靴子还不如他自己那双旧的。他和舅舅吵了一架，回家了。不久，就受到一个休假期间来他家探望

的亲戚朱里察·布罗兹的影响。朱里察是一名老兵，奥匈帝国军队里的一位军曹长，他向铁托大讲外面的花花世界，以及如何离开农村，去找一条发迹的路子。朱里察在他驻扎的附近一个城市里有一些社会关系。他说能给自己的亲戚在那儿找到一个职业，但首先必须使布罗兹相信这是个机会，不可错过。朱里察劝他当跑堂，能吃得饱，穿得好，能接触体面的人物，还不用干多少累活。

他的父亲对这个主意并不那么热心。约瑟普在地里是个有用的劳动力，眼看着就能挣钱。父亲却宁愿送他上美国。在那些年代，克罗地亚许多农家都正设法帮助自己的子弟移居国外。这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家庭投资方式，如果他们能在每天工资略多于一个福林的当时凑足二百福林路费的话。布罗兹家可凑不足这笔钱。〔注 21〕

弗兰约·布罗兹出于无奈，终于同意让约瑟普踏着他的哥哥马丁的脚印（他大约十年前就已离家），离开村子到城里去找工作。年轻的一代农民流入城市，是封建家族社会解体过程的一部份，这是在他的父亲那一辈人时开始的。到了约瑟普小学毕业时，农村中的经济困难正迫使这一变化加速步伐。十九世纪后期的年代中，克罗地亚人口剧增——单是 1881—1890 年，自然增长即达百分之十五，嘴巴多了，就迫使农民必须生产更多食物。在扎果烈，库姆罗维茨周围土地贫瘠，不提高技术和经济投资，便不可能提⁴¹高生产，而这两样都是农民所没有的。

克罗地亚农村中，这时出现了一股新的、激进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安顿·拉迪奇和斯捷潘·拉迪奇兄弟发动的农民运动。他们在 1905 年建立了一个克罗地亚农民党。这是旨在动员消极的、但却不满现实的农民，使他们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般力量的头一个政党。它含有十九世纪活跃于俄国的民粹主义的成份。它的目

标是要使农民认识自己的需要和权利。斯捷潘·拉迪奇是农民出身，一身农民装束，走东村串西村，用人民懂得的语言和术语同他们交谈，与一般政治领袖那种装腔作势的城里人派头截然不同。他们在扎果烈举行过多次集会，库姆罗维茨的农民必定会听说过，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们对布罗兹家发生过什么直接的影响。他们的缓慢增长的影响是这一时代的象征，是农村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演变的象征。

1907年，约瑟普·布罗兹十五岁时，与堂兄朱里察军曹长一起离开库姆罗维茨，到萨格勒布东南约五十英里处的守备部队驻防城市锡萨克寻找职业。他的农民生活从此结束，虽然他后来曾多次回家（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因为他仍然和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没有什么证据能使人联想到约瑟普离家时已有了革命的苗头。传说他少年时代曾在阁楼上暗自挑灯夜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种说法乃是无稽之谈。他离开家庭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最大的抱负很可能不过是挣足够的钱，吃得好，穿得漂漂亮亮，一身城里人的新服装，而不是破破烂烂的农民衣裳，让家里和村里人瞧瞧；他在城里混得不错。

他童年发育时期所承袭的种种影响，当时自己并未觉察。他出生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下层，出生在一个社会动荡、政局紧张日见其甚的时代。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间历史使他对社会上的不公怀着一种强烈的激愤，为日后撒在他心田里的政治⁴²种子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他经受过贫困，但生活中的真正的艰辛却只曾浅尝；因为他的童年，经济上虽然无保障，感情上却是幸福的。他习惯于指望并得到密切结合的家族，包括广泛的远亲的帮助。他建立了许多温暖的个人关系，这些影响在他身上终生不灭。他的父亲软弱无能，母亲刚强而慈爱，这一事实可能对他有很深的影响。总的说来，他是一个体魄强壮、身材匀称的农家少年，

就对自然界的知识来说是成熟的，世故却很不成熟。他从来没有进过城，从未乘过火车。他兴奋，好奇，渴望学习，急于自立。但同时他也有庄稼人所特有的朴素的机敏与谨慎的性格。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很快地将为他提供各色各样的机会。但在这个阶段，很难说他将沿着哪条道路发展下去。

第二章

43

从孩子到成人

与约瑟普所离开的村子相比，小小的城市锡萨克简直是个大都会。它有一支守备部队驻扎，有几家店铺，一座用作监狱的中世纪的土耳其古堡，几处饭馆和小工厂。城市位于三条河——奥得河、库帕河和浩荡的萨瓦河汇合之处。三条河上有小船和驳船从事商业运输；加之新建成的一条与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干线相接的铁路支线，给这个小小的市场城市带来了旅客和买卖。这就足以使小约瑟普大开眼界了。他在堂兄的一个朋友开设的一家饭馆里找到了工作。饭馆有一个吉卜赛乐队，栗树荫下有一片花园，兼作柱球场，受到驻军团队的军官和士官的光顾。本来干跑堂、二等待者，再加之打杂，活儿是十分辛苦的。总是有事，不是洗盘洗碟，便是在餐桌或九柱球场侍候人，直到最后一个顾客离去之时才算完事。小费是约瑟普第一次得到的属于自己的钱，但等他稍有经验，懂得它所值几何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以冷静的态度接受了这种境遇；这也就是他一生中对待机会的典型态度：尽量利用现有的一切，静待时机向更好的环境过渡。

时机不久就来到了。他很快结识了一伙和自己年岁相仿正在一位锁匠那里学艺的青年们。他听信了他们的夸口话：受过训练的锁匠就是万能机师，机师就是工程师，工程师会造船、造铁路、造桥梁。他们是工业化的新世界的权势人物。这些想法正和他的小学老师讲的话合了拍：未来是属于机师的。有一天，那时他还只

有十五岁，鼓起勇气去见那伙学徒的雇主卡拉斯师傅，一个本城的既有钱又有影响的捷克人。这是他给自己作出的头一个重要决定。于是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涯，从而把自己置于种种政治影响⁴⁴之下，如果他当了侍者或裁缝，踏上那条那时看来可能发迹的道路的话，这是完全有可能错过或拒不接受的。

铁托和卡拉斯的这次会见，后来一直生动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他常常讲起它。“好啊！小伙子，你找我干吗？”当他这个身材矮小，衣衫破旧，很有几分倔强神情的小伙子被领到师傅面前，师傅这样问他。“我要您收我当学徒。我要当个工匠。我家代代都有人当工匠……”铁托反复叙述这段往事。措词或许略有出入，但要点基本一致。他向师傅解释，他不喜欢侍者的生活，想要学成一个匠人，他觉得根据自己的家庭传统，这还是很有理由的。卡拉斯说，如果他的父亲愿意来签订学徒合同，就答应收下。当晚，他给爸爸写了封信。父亲来了，首先为他，然后为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斯捷潘和这同一位师傅各签订了一份合同。这样，两个孩子就共同度过学徒生活，大部份时间都在一起。按照学徒契约，三年内卡拉斯管教手艺，供给食宿，衣着则由父亲供应。由于父亲没有钱给他买学徒工们当制服穿的锅炉工人装，约瑟普就自己用由小费攒起来的少许积蓄买了一套。〔注1〕

此后三年，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约瑟普在锡萨克的卡拉斯工场干活。劳动从晨六点至晚六点，徒工必须每周两次在傍晚五点至七点到本城的技术学校上课。卡拉斯工场的成员共有四、五个学徒，三、四个满了师的流动工匠——当时还那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给每个雇主干上短短一段时间，随即另换一个地方工作，以便取得经验。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个家长制的、几乎是中世纪式的集体，卡拉斯行使权威，每个人在这个等级组织中各自排定了一定的地位。徒工们睡觉干活都不离工场——这就是这座房

子的地下室，冬天睡在靠铁匠炉的一张桌子上，夏天睡在院里顶楼的干草堆上。吃的虽不精美，至少还算丰富，是由卡拉斯家的厨房做的；至于娱乐，那就全靠孩子们自己去找了。他们喂养小⁴⁵动物玩，拿到礼拜天的交换场所和集市去同别的行业和别的工场的学徒们交换。他们谈天说地，唱歌，挨流动工匠的巴掌，互相斗殴，白天里（因为没有煤气灯，也没有电灯，蜡烛又限量）互相念惊险小说听，形成了一个密切的男性集体。

这就使约瑟普在青年时期过上了有一种有保障的、快活而相当劳累的生活。这些年代里他对姑娘们和性问题所开始感到的兴趣和可能有过的经验，他从未提到过。出去参加舞会，则是后来的事情。看来他和所有同事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相处得不错；他很会干活，即使不算出色的话。时光流逝，事事如意，只是在他参加合格测验之前不久出了一件事。他快十八岁时，有一天，卡拉斯不在。他本应看管一台新钻，却在读一本翻译书《福尔摩斯侦探案》，别的学徒听着。卡拉斯回来了，大家没有注意到，正好把他当场抓住。不凑巧，新钻头在这时断了。卡拉斯勃然大怒，打了他一耳光。约瑟普自知理亏，又羞又怒，逃跑了，躲在附近的一家砖厂里。卡拉斯报告了警察，毫不费劲就把出逃的学徒逮住，送进了那座堡垒监狱，他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铁窗风味。如果卡拉斯有心起诉的话，约瑟普的学徒生活就完全断送了。但这个老头子有一副仁慈心肠，他给坐牢的徒弟送吃的，还设法使他获释，得以继续学完自己的手艺。1910年9月，他满师了。

※ ※ ※

约瑟普在锡萨克度过的1907—1910年，是南部斯拉夫人历史上一段戏剧性的紧张时期。奥匈帝国内部，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

族主义不断高涨；巴尔干半岛上，奥匈之间和奥俄之间的对立日益升级。就克罗地亚人来说，这是他们对自己在匈牙利内部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日益不满的年代，也是他们讨论能够采取什么措施迫使马扎儿人实行变革以改善这一状况的年代。许多政治上觉悟了的克罗地亚人，开始认为他们赢得自治的唯一希望，在于奥匈帝国内部建立某种形式的南斯拉夫（南部斯拉夫）联盟——由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合施加压力。少数克罗地亚人，特别是一个叫做“弗兰科夫齐”的政党的成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在匈牙利内部增进克罗地亚的宪法权利的主张。另一些人则设想以所谓的“三国联邦”来解决奥匈帝国内部的三个主要民族，即日耳曼、马扎儿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关系。约瑟普青年时期对这种种政治讨论所引起的反响必有所闻，但哪一种也没有激发他的想象或赢得他的信仰。他早在学徒期满之前便已投身产业工人行列，这引导他离弃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

他在这个可塑性很强的年龄接触了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它于二十世纪早期便已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影响，有了献身于国际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理想。这将对他的早期政治发展产生了极重要的作用，是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没有使他可能成为任何一类狭隘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锡萨克与萨格勒布和奥西耶克不同，不是工人政治运动的强有力的中心。那里任何工会也没有，虽然在1907年，当工会在奥匈君主国其他地方都已合法化多年之后，克罗地亚的工会也已取得了合法地位。卡拉斯雇佣的流动工匠中只有一、两个是政治积极分子，其中一位在1909年的五一节组织徒工们用绿枝和花朵装饰工场，另一位则常参加当地的啤酒店里举行的工人集会，他曾说服约瑟普阅读社会主义报纸《自由言论》和为报纸募捐。约瑟普

学徒期满时，对于工人组织的重要性，以及若要有发展必须加入工会等等已有了一些认识。作为学徒满师的“毕业产品”，他给锡萨克的地方法院制造了几排铁栏杆，之后，立即到萨格勒布，⁴⁷ 通过一位原在卡拉斯工场呆过的流动工匠找到了职业。1910年10月，这时他十九岁，加入了五金工人工会，从而使他在二十岁时自动成为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党员。

他把领到工会会员证和证章描述为自己一生中最感光荣的时刻之一。后来他讲，这使他觉得更加有了保障。他回忆说，在萨格勒布谋得第一个职业后的头两个月期间，第一次参加了工人游行示威。^{〔注2〕}但政治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他主要的心愿，还是回库姆罗维茨看看家，让故乡人瞧瞧，约瑟普在广大的世界上已出了头。在这方面他失望了：当他用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给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买后不及几个小时，就在住房被人偷走了，不得不另外买一身低价的旧衣服穿着回家，就不能那么神气了。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他住在家中。后来积蓄花完了，便第一次不靠亲友的资助，孑然一身，投入社会。

他刚开始时的遭遇，真是令人失望：当时奥匈帝国内劳动者的现实状况，使他当个熟练机师便能成功的梦想成为泡影。作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公民，他可以去君主国内任何地方（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捷克各地、的里雅斯特、维也纳以及奥地利全境）寻找工作，但在1910年，整个这片地区的失业率都高。全部中欧，特别是离他最近的西部通用的是德语，而这时他对德语还仅一知半解。

他于1911年1月离开了家，搭父亲的马车到最近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去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他没有什么钱，没有社会关系，尽管他这时已准备干任何工作，只要能挣钱糊口，却仍然找不到职业。他决定到的里雅斯特去试一试，这是一个拥有



1912年在卡姆尼克。约瑟普·布罗兹和弟弟斯捷潘

造船厂的繁荣港口。他翻山越岭，冰天雪地随遇而宿，徒步六十英里，走了三天才到达海岸。这件事表明了他拼死谋生的决心，但在那里他依然碰了壁。后来他说：“的里雅斯特的港湾和那些横⁴⁸渡大西洋的巨轮使我目瞪口呆。”但是，他至少还能到自己工会的分会办事处领取发给会员的失业救济金。这使他免于挨饿，也加强了他对加入工会的重要性的信念。他决心回家，先搭乘一个农民的大车，下余路程步行。2月末，他又回到库姆罗维茨。

“我不能也不愿在家久呆着，”后来他告诉自己传记的作者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我只休息了几天，因为家中穷困，我想还是尽早离开的好。”3月初，他到萨格勒布，在一家修理自行车、汽车和其他机器的小工场找到了工作，干了四个月。这虽然不比他学艺的那个工场好多少，但至少能给他一笔固定的工资，每天二克朗六十赫莱尔。他认真地交齐了失业期间的工会会费。他的钱虽然很紧，还是很快给自己添置了一套新衣服。^{〔注3〕}农民若是在社会上混得不错，就会这么来一下。况且在他前一阵的失意——第一套新衣服被偷窃，以及这一年头几个月失业丢了面子之后，他决心要挽回自己的声誉。在许多方面，他仍旧是个典型的在城市里寻求发迹的农村孩子。

不久，他离开萨格勒布到维也纳去碰运气——想见识世面，学习德语，也想摆脱父亲纠缠，对他的收入提出愈来愈多的要求。他是愿承担家庭的义务的，有时也寄钱给家——但只寄给母亲，免得父亲拿去喝了酒。离家远些，就较自由些，也能多攒一点钱。这一次他为投入社会所作的准备就比较谨慎了。虽然他购好到维也纳去的火车票，因害怕在的里雅斯特的经历可能重演，在卢布尔雅那就下了火车。这毕竟是他旧游之地，免得独自一人一头扎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他在卡姆尼克一家相当大的五金厂（一百五⁴⁹十名工人）找到了工作，干了将近一年，直到1912年5月。他对

自己在卡姆尼克的生活情况的简短叙述表明，当时他仍然是个很普通的青年，还不太有政治头脑。他对自己参加的体育组织所作的反哈布斯堡宣传，还不如对体育组织的制服和带羽毛的制帽（用他低微的工资分期付款买的），以及跟随军乐队跨步前进和每周三次的体育活动更感兴趣。后来他离开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到了：这家工厂破了产，被解雇的工人额外发给一个月工资，到波希米亚一家更大的工厂去，那里正需要劳动力。^{〔注4〕}这样，他就踏上了这段途经维也纳的旅程，口袋里揣着钱，还有五十来个工人愉快地作伴。

这些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到达波希米亚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被当作罢工破坏者招募而来的；这家工厂的捷克工人正在罢工，不让他们上工。等到工厂方面屈服，同意提高工资，之后，这些新来的工人也就以改善的工资受雇了。约瑟普终于在中欧一个发展较快的地区站稳了脚跟。这时他已有了足够的自信来独立行动。两个月后，他再次出发去见识中欧一些大型的工厂。他有工会会员证，在奥匈境内即使找不到工作，也保证不至陷于困境。他已学会了一点德语，在种种金属加工过程方面增长了经验；他已经不再那么呆头呆脑，也不再是乡下孩子进城，总想自我表现一番了。他没有同家庭联系，通知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从而摆脱了父亲对钱的要求。

1912年下余时间，他从一个工业中心到另一个工业中心，找个工作干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流动。他见识了比尔森的斯科达军火厂，在慕尼黑小住，访问了曼海姆和鲁尔。最后，1912年10月，在维也纳落脚。他终于给母亲写信，母亲回信把比他大八岁的长兄马丁住址告诉了他。约瑟普还在上学时马丁便离开了家，此时正在维也纳城附近的新城车站当铁路工人。^{〔注5〕}哥哥已
50 结婚，有一个婴儿。约瑟普和他们住在一起，在舒适的家庭气氛

中安心度日。他也在附近的代姆莱尔工厂找到了工作。他曾幻想自己所受的训练将会给他带来一种富于魅力的生活，在这儿也终于尝到一点滋味。他对那些“马力强大、带有笨重的黄铜铸件、橡皮球喇叭和外煞车的大汽车”着了迷，“甚至成为试车司机”。但看来他很可能还不是厂里的正式工人。因为他讲起这段往事时曾说自己没有那么些钱进维也纳的咖啡馆。但他还是熟悉了那个他日后在全然不同的条件下多次访问的城市。他又参加了另一个体育协会，每周去训练几次。他开始练习击剑，进了一个舞蹈班学习时髦的交际舞——这是一种将使他和家乡那些跳科洛舞的农民大不相同的上流社会的玩艺儿。他正在沿着社会阶梯一点一点地上进。他仍然是个遵从现状的人，竭力在现社会中谋求改善自己的地位。1913年，他年满二十一岁。这时，他必须回家乡服两年兵役。〔注6〕

※ ※ ※

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的经验，使约瑟普·布罗兹从一个现状的遵从者变成了一个潜在的叛逆，一个为社会所排斥的人。这一变化，看起来在许多方面都和他迄今为止所表现的性格特征不相一致；但他在此后四年间所身受目睹的种种事件却是远远不止戏剧性的。布罗兹在俄国革命中看到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看见同他一样的、原居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人们突然一步登天，掌握大权。这是一种使人沉醉的经历。他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位政治上的叛逆，并非偶然的，这种变化若一旦完成，便终生不变。它深深扎根于他的个性之中，而且和他童年的经历紧密相连。它的原因是复杂的，雄心壮志、个人的失意、理想主义以及对人类的献身都起了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军队中服役已一年多。恼人的军风纪，艰苦的条件，他所属部队一个暴君似的伍长的古怪作风，⁶¹ 这些他全不在意；他在军队中处得很好，顺利而又快乐。他已经学会照管自己。大部份新兵都是一些直接从乡间来的农家子弟，许多人一字不识，比起他们来他就机灵、世故多了。由于他的职业和参加过体育俱乐部，因之体格健壮。1913年末至1914年初的那个冬天，他接受了滑雪兵的训练。在维也纳学会的击剑术大有用处，他获得全团击剑冠军。他显然是个可提拔的人才，于是被送到布达佩斯接受士官训练，他在全军击剑比赛中又名列亚军。二十一岁时他被提拔，成为第二十五莫多兰团中最年轻的士官。他已具备了一个合格的军人的条件。

1914年6月28日，一个年青的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使用塞尔维亚秘密的民族主义团体“黑手党”成员提供的武器，在奥地利1908年兼并的行省波斯尼亚的省会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连锁反应引起一系列事件，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地利的军队领导人认定，既然塞尔维亚与这一凶杀阴谋有牵连，这就提供了一个不容错过的良机，给这个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的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一个教训——这个教训也是对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的警告，叫他们收敛起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要求。

奥地利陆军部长孔拉德伯爵早已准备进攻塞尔维亚的军事计划“巴（尔干）行动”，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原计划是打一场短期的局部战争。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一项苛刻的最后通牒，虽然其中的要点都被接受，仍于7月28日对塞宣战。这时奥地利自己的动员完成不过一半。塞尔维亚的同盟国俄国担心在自己还未着手准备时就被卷入战争，也于7月30日下令部份动员。德国由于与奥地利结盟而被卷入。如果战争发展为普遍性的大战，奥地利

必须就采取哪一种军事计划入侵法国一事作出关键性的抉择。奥地利于8月1日对俄宣战，两天后，对法宣战，同日入侵比利时。⁵²英国于8月4日对德宣战，大战于是开始。

这样一来，奥地利就面临着一种与自己原先的谋划大相径庭的局面。奥派部队入侵塞尔维亚的同时，不得不应付俄军对奥军喀尔巴阡山东线的进攻。孔拉德原打算用他的第五军和第六军横扫塞尔维亚，把其余各军用作预备部队。约瑟普·布罗兹所在的团属于第二军，这个军已作为一部份后备部队转入贝尔格莱德以北的阵地，这时只得抽回用于俄国战线。1914年9月，当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闪击战”出乎意外地节节败退之际，第二十五多莫布兰团正开往加利西亚抵挡俄国人的入侵。

克罗地亚士兵对战争毫无热情。铁托后来回忆说：“我们都盼望〔奥地利〕再吃一场大败仗，就象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遭到的那样，我们祈求这个可恨的帝国早日瓦解。”他还有一次说：“我从一开始就憎恨这场战争。”这种破坏性的言论在团内普遍存在，一个“忠于皇上”的同僚却把他的话向上司汇报了，他被指控为发表反战言论，关进了彼得罗瓦拉丁堡。^{〔注7〕}由于他的案件不属军事法庭审理，他获释了，被送往加利西亚前线。

团队在喀尔巴阡山前线进入阵地后，局面便大不相同了。当兵打仗，事关生死存亡，就必须尽力有效地完成任务。秋天转入严冬，堑壕战陷于僵持。克罗地亚部队装备很差，被服质量低劣。他们的对手俄国兵就更加困难。铁托回忆说：“冻坏了腿倒下的人比子弹打倒的还要多。”他想尽一切办法照料手下的士兵。他后来讲的关于这一时期的轶事表明，那时他仍然具有设法利用现有一切条件，利用那年整个冬季的严酷条件的本领，甚至率领侦察部队深入敌后，使之获得某种满足。^{〔注8〕}他逐渐发现自己具有领导者的天赋才能。

1915年3月25日，复活节礼拜日，他的军人生涯中的这一阶段突然中止。凌晨四时，俄国将军布鲁西洛夫在奥克诺附近发起攻势。铁托回忆说：“我们自己处于一种极端愚蠢的地位。若是司令官懂得指挥，决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的部队被赶进一个角落，敌人居高临下进行攻打，用火炮轰击，突破了我军的左翼，把我们包围了。起初我们竭力抵挡……”。后来，奥军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塞尔卡西骑兵冲了进来，跳下马背，在壕沟里展开肉搏战。约瑟普被一支两码长的矛枪猛刺进左肋，险些儿伤了心脏。他晕了过去。幸好，野蛮程度略差的俄国步兵来到，他才倖免于在塞尔卡西人刀下送命。^[注9]

当了俘虏之后，他被送进斯维亚希斯克的一所修道院改建的医院，这个地方远在俄国内地的喀山城附近的伏尔加河上。他在那里停留了十三个月，初期情况严重，伤口恢复很慢，他又得了并发症，包括肺炎和反复发作的斑疹伤寒。医院既肮脏又拥挤不堪，病人垫着干草就地躺卧，虱子滋生，伤寒就是这样传染上的。病情最严重时，人们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给他系上一条红带作为记号，应移到太平间去。但他的强壮的体质占了上风。他幸运地又得到一定的照料和护理，最后在1916年夏天，根据他恢复的情况被送到今天的古比雪夫省的阿达托夫附近一个小战俘营，那里伙食很坏，条件艰苦。因此，当有些农民来为他们的磨坊找个机师时，布罗兹就自告奋勇到营外去干活。“在磨坊活儿不多，我有充分的时间看书。……我也认识了几个反对沙皇的俄国人。”但这种舒服日子（包括洗蒸气浴，还有一个农民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他）只过了几个月。1916年年终之前，他被送到更东边的另一所战俘营，在乌拉尔山麓彼尔姆城附近的孔古尔。布罗兹是士官，又处于恢复期，可以不干重活。他被指派管理来自奥匈帝国各地⁵⁴的战俘——主要是罗马尼亚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因为这时他

已经和大多数克罗地亚人以及别的南斯拉夫人分开了。

1916年末至1917年初的那个冬天，战俘们干的是修理圣彼得堡——西伯利亚铁路。吃的全靠他们微薄的工资购买，数量不足，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布罗兹作为士官，负责安排干活。战俘们出乎意外地接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红十字会的一位瑞典籍官员甚至还前来看过他们。约瑟普·布罗兹曾给他写信，控告一个俄国铁路职员经常偷窃战俘们的包裹。这个俄国人不久就找到了机会进行报复。布罗兹为了照顾战俘，曾改动过出勤记录。他被关进了一间地窖，还派了三个哥萨克押着进去揍他。铁托回忆说：“他们抽出鞭子朝我背上打来，我挨这三十鞭子，一辈子也难以忘记。”但就在当晚，另一个俄国人帮助了他，给他喝茶，还带来了一条毯子。之后不久，1917年3月初，传来了沙皇退位的消息。随着一片“打倒沙皇”的高呼声，战俘们全被释放。在随后的混乱中，铁托在附近的一位波兰籍工程师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这是铁托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初次密切接触。

1917年头几个月里孔古尔小战俘营的局面，反映出当时俄国的混乱状况。圣彼得堡的临时政府正疲于应付中央权威在国内和军队中的崩溃所引起的问题，苏维埃作为“人民议会”在全国城乡建立起来。弄不清谁说了算数，也弄不清国家是否还处于交战状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执政，而且因为是否应从临时政府取得支持一事发生了深刻的分裂。流亡瑞士的列宁于4月3日乘坐的那列著名的密封火车穿越德国回到圣彼得堡。直到列宁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对圣彼得堡继续混乱状态的反应的《四月提纲》发表之后，布尔什维克所鼓动的革命运动才开始在俄⁵⁵国首都获得支持。全俄境内许多战俘营里的战俘，对首都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当地由谁掌权，甚至也弄不清他们仍旧是战俘呢，还是已经自由。

“我已经同战俘们谈论过，我们预料会出乱子。那位工程师也告诉我即将发生革命。但有人把我的行动汇报了，我被送进监牢，禁闭三天，然后送回原处。”布罗兹不久又遭逮捕，4月间在狱中过了十四天，直到他那位波兰籍的布尔什维克朋友设法把他营救出来，转送到彼尔姆铁路线上工作。工人不断被捕和失踪，生活毫无保障。4月末，布罗兹决心逃跑。他的朋友把儿子的地址给了他，这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是圣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他在集市上卖掉了自己的挺好的军装，买了一套破旧的便服。上衣太大，他就自己修改了。然后，在这位工程师的帮助下，他逃向彼得堡。在离彼尔姆不远的地方，他爬上一辆火车，藏身在一袋袋小麦中间，直达俄国首都。他于6月末到达，设法和这个年轻的波兰人取得了联系，被带到寓所。^[注 10]

这时，布尔什维克已控制圣彼得堡的工人区，正赢得士兵和工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大街上反临时政府的游行示威越来越多，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已经出现，虽然列宁本人认为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为时尚早。由于反革命势力（君主主义者、军官、退役军人以及士官生的支持者们）开始武装和组织起来，形势更为紧张。^[注 11]7月3日，矛盾终于爆发，工人和士兵上街游行示威，高唱马赛曲，要求解散临时政府，权力归苏维埃。⁵⁶在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的情况下，示威游行持续了好几天。喀琅施塔得水兵打响了起义的第一炮，占领了彼得—保罗城堡，这是个沙皇制度的野蛮专制的象征。但临时政府仍能调集足够的支持者和军队对付游行示威的群众。约瑟普·布罗兹在这些日子里上了街。这是他和俄国革命的中心事件所发生的唯一密切的接触。他躲过了从铁路建筑物房顶上扫射的机枪子弹，幸而没有被打死。当临时政府占了上风，开始搜捕煽动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时，他的朋友波兰籍工人被捕了。布罗兹东躲西藏，在涅瓦河的

桥梁附近躲藏了几天之后，决定逃往芬兰。他不知道的是在略早一些时候，列宁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布罗兹是孑然一身，又什么联系也没有，难以取得成功。他希望凭着自己的“白卡片”，即受伤尚未复原的证明书，能获准进入芬兰。这个地方当时还属于俄国。他在乌连堡以布尔什维克的嫌疑而被捕，送回圣彼得堡。8月，被囚于涅瓦河一个小岛上的彼得—保罗城堡（布尔什维克这时已由此撤出）中一个老鼠纵横的地牢。

〔他回忆说：〕 我在这座城堡里呆了一段时间，好几次问我是干啥的。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担任什么职务。我回答说，我在那里没干什么，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几次三番告诉他们，我有一张白卡片，是从维亚茨卡—古贝尔尼亚到彼得格勒来找工作的。这样听起来象真的，因为我讲一口纯粹的维亚茨卡方言。我就这样在那个地牢里关了三周。这时我受够了。你晓得，涅瓦河就从城堡旁边即在铁窗底下流过。那个地方雾气腾腾、潮湿、冷得要命。我心里想，这把骨头就得扔在那儿了。

有一天，他们又来盘问我。刚进监牢时，我不敢说自己是战俘，我想那就更不妙了，尤其我还是逃跑的。这一次提审我时，我说我是战俘。他们问：“从哪里逃来的？”我回答：“从彼尔姆斯卡—古贝尔尼亚的厄尔加奇。”他们说：“傻瓜，你干吗不早讲呢？在这里关了三周，其实你早就可以出去了。”

他被遣返原战俘营，由卫兵押解乘上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列⁵⁷车，火车逢站必停。一次停车靠站时，他借口取水煮茶，从卫兵手中溜掉了。”接着，他时而步行，时而乘火车，慢慢取路先到叶

卡特林堡。他在那里被战俘营的一个看守认出，只得赶紧避开。后来到了鄂木斯克。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夺取政权（著名的十月革命），次日黄昏，他到达鄂木斯克时被巡逻队拦住。他们喝问：“什么人？”布罗兹回答：“战俘。”“不，同志！你自由了。这里是革命。”他们告诉他赶快到当地的集市场去，那里正在组织赤卫队。“我没有多少迟疑就去了。”他和营里别的一些战俘一起参加了国际赤卫队的一个支队。1917年末至1918年初那个冬天的几个月，他在鄂木斯克附近的铁路线上给布尔什维克值岗。^{〔注12〕}

这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关键性的几个月。1918年3月3日，托洛茨基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退出战争。俄国西部大片领土割让给德国。结果使在俄国的奥地利战俘造成了一种十分混乱的局面。许多斯拉夫人一直不愿参加对俄作战（成千上万的人投降了），而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这时迫切希望到西方去对德国及其盟国作战。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战俘却无此同感，他们更关切自己家乡的局势，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参加。他们不愿编入塞尔维亚部队。塞尔维亚政府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着眼于将来成立某种南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不赞成他们组织一支南斯拉夫部队。

由于布尔什维克和西方协约国关系恶化，这种混乱局面愈见其甚。协约国军队开始对布尔什维克作战。英国军队占领了俄国北部的阿尔汉格尔（1918年8月3日）和南部的巴库。美国军队在西伯利亚登陆。早些时候，在夏天，布尔什维克曾同意让捷克⁵⁸军队全副武装并以军队建制经由西伯利亚撤出，这一行动已经开始。但由于协约国的干涉升级，布尔什维克担心捷克部队被协约国利用来反对自己，于是企图解除捷克人的武装。由此引起了斗争，捷军起来反抗（1918年5月），并开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势力

联合作战，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夺取对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1918年6月7日，捷克—白俄部队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夺占了鄂木斯克。有一段时间，鄂木斯克成了社会主义（反布尔什维克的）西伯利亚政府的中心。11月，这里由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手下的白俄军队接管，进而于1919年春季对布尔什维克发动了攻势，但以失败告终。鄂木斯克于这一年11月11日至14日之间被布尔什维克收复。〔注13〕

铁托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活动的叙述是不够准确的。回顾三十年甚至三十几年前的往事，哪个时期他在哪个地点，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捷克兵搜查参加过赤卫队的战俘时，他被迫逃离鄂木斯克区；一个俄国姑娘佩拉吉娅·贝露索娃（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把他藏了一段时间。接着，他更加远离铁路线，进入大草原。这段期间有一个日期是个谜：按照正式发表的材料，他是1919年1月19日在鄂木斯克党组织登记为党员的，但这时候鄂木斯克却在高尔察克手里。

有一阶段，他在离鄂木斯克约四十英里的草原地区的吉尔吉斯牧民中间躲了好几个月。讲起这段往事时，他既提到冬天也提到夏天发生的事情，看来这段奇妙的异国情调的经历很可能占去了1919年的大半部时间。后来，当鄂木斯克地区于这一年11月被布尔什维克收复时，他又回去了。

当一伙又一伙白军部队在大草原上驰骋，搜捕布尔什维克时，把他保护起来，帮助他藏身的那位吉尔吉斯酋长名叫哈季·伊赛·贾克森巴叶夫。他那个骑马游牧的部落，财产用马匹计算，酋长本人就有二、三千匹。他们在辽阔的草原上漫游，夏季住帐篷，冬天住地窖子。布罗兹赢得了伊赛的好感，因为他会修理这⁵⁹个部落的磨面的机磨，也由于他有一身马上功夫。他善于适应环境，幽默而又刚强，牧民们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成了伊赛喜欢

的近待之一。他在草原上驰骋，驯马，围猎灰狼，夜间则听故事或讲故事——游牧人爱好的那些捉弄人的情节曲折的故事。他和吉尔吉斯人一样装束，还学会了一点他们的语言，但一直没有同化到能接受他们全部风俗习惯的地步。

伊赛是伊斯兰教徒。有一次，他讲起基督教徒吃猪肉的肮脏习俗，布罗兹就拿酋长的女人们令人恶心的习惯来回敬，说她们侍候男人吃饭，蹲在一边等待新的差遣时，竟从衣裳底下摸出大个儿虱子来，放进嘴里用牙咬，弄得唇上血迹斑斑。他说：“常常使我恶心——吃不下饭。”酋长要把一个女儿许配给他，给他在部落后永久留下去的机会，布罗兹拒绝了。但他确实曾帮助部落里的一个人和邻近部落的一个女人私奔。^{〔注 14〕}

1919年接近年终时，布罗兹得知这个地区的白军已经肃清，布尔什维克重新掌了权，就回到鄂木斯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及留在那里的战俘们恢复联系。一段时期后，他才又找到那个俄国姑娘佩拉吉娅，她当初也是逃走了。有一天，布罗兹在一个村子里的街上，偶然遇见了她。1920年1月，他俩在鄂木斯克附近的博哥柳博伊斯克正教礼拜堂结了婚。^{〔注 15〕}

我们不清楚布罗兹有否加入当时在俄国活动的某一个南斯拉夫人的政治团体。如果加入过的话，即在这一段时期。1918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过一次前战俘会议，与会的南斯拉夫人都加入了一个附属於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同盟。11月12日，同情共产党的南斯拉夫人也在莫斯科开过一次会议，其中多数人于
60 这个月末回国。^{〔注 16〕}一些人留下来在即将归国的士兵中进行政治工作。布罗兹离莫斯科太远，不可能参与这些活动；但可以判定，他离开之前曾与一些在俄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见过面。虽然他很明显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但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他此时已是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而作为一个前赤卫队队员，他的

名字一定被记了下来，一旦在南斯拉夫组建共产党，他便是潜在的支持者。

布罗兹决心归国，不在俄国呆下去。婚后不久，便与妻子动身去圣彼得堡。他奉命率领一队前战俘返回克罗地亚。他们先到纳尔瓦，然后从那里乘船到什切青。3月，他们开始了这次乘火车穿过欧洲归国的漫长而缓慢的旅行。1920年9月20日，他们到达版图已大为缩小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时，一个也是从俄国归来但却是积极的共产党员的马扎儿人贝拉·库恩，企图在如今已成为独立国的匈牙利发动革命而未成功。一个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也于1918年成立，它包括了布罗兹的家乡克罗地亚，以及主要由南方斯拉夫人聚居的原奥匈帝国的其他领土。它后来改称为南斯拉夫。^(注 17)它的政府已在采取措施，防止从俄国回来的战俘的影响，他们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布罗兹取下了皮帽子上的红星——原赤卫队员的标志，但他的朋友们都指出，帽子上还是留着一个泄漏天机的痕迹。他说：“我不想表现自己”。但这其实是出于谨慎。

他和妻子直奔故乡，在10月初到达库姆罗维茨，却发现母亲已在1918年去世了，父亲也已经移居到附近一个小村子。如果说他的经历还没有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话，至少他也由于所获得的进取而与那些留在本乡的人迥然不同了。

第三章

61

转变为革命者

布罗兹在国外期间，他的家乡已经由于革命而风云激变。克罗地亚已摆脱奥匈帝国，加入了新建立的南斯拉夫国家，奥匈帝国此时已不复存在。早在1914年铁托离开家乡随奥地利军队去与帝俄作战时，不少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已和某些塞尔维亚人一样，主张成立南斯拉夫联邦，只不过没有人预料到哈布斯堡帝国会在这一场战争中覆亡，因而当时也不曾有过建立一个新的南部斯拉夫国家的想法。只是在战争期间，1915年5月在罗马组织了一个代表奥匈帝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以及在与塞尔维亚人签订了科孚公约后，这种想法方才得势。

南部斯拉夫人应当怎样脱离君主国，成为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特别是在1917年开始与塞尔维亚流亡政府的外交大臣尼古拉·帕西奇谈判之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所设想的是某种形式的南部斯拉夫联邦，他们可以与塞尔维亚人平起平坐，而帕西奇和其他许多塞尔维亚领导人想的却是一个扩大的塞尔维亚国家，把其他南部斯拉夫土地囊括进去。他反对成立南斯拉夫联邦这种主张，反对南斯拉夫委员会的许多宗旨，并且不许在俄国的南部斯拉夫战俘建立南斯拉夫军团。他说过，“塞尔维亚的一贯理想就是要把他们（南斯拉夫人）从奥地利桎梏下解放出来，”并声明只有他（帕西奇）才有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政策。塞尔维亚官员对他必须唯命是从，要不就滚蛋。他这番话是对伦敦泰晤士

报编辑威克海姆·斯提德说的。斯提德回答道：“阁下谈话俨若苏丹，可我必须警告你，盟国人民并不欣赏苏丹。”〔注1〕然而帕西奇终于如愿以偿。1917年5月30日，斯洛文尼亚领导人柯罗塞克神父在奥地利议会宣读了一项宣言，要求帝国内所有的南部斯拉夫土地合而为一。到1918年9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奥匈帝国政府无权代表他们说话，皇帝在10月19日⁶²许诺承认民族权力的公告已为时过晚。1918年10月29日，在萨格勒布召开的一次有克罗地亚各地区代表出席的克罗地亚议会宣布解除与匈牙利的联盟，推翻了哈布斯堡王朝。

一个月之后，作出了与塞尔维亚统一的决定，事出仓促，连统一的条件都未经正式取得一致同意，因为正面临意大利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大片土地提出要求的压力。这是西方盟国为求收买意大利参加协约国一方而于1915年伦敦条约的秘密条款中许给意大利的。他们当时也没有预见到奥地利帝国的垮台，没有预料到会建立起一个决不会甘心割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土地的南部斯拉夫王国。克罗地亚人担心，如果南部斯拉夫人在国家形式上争执不休从而延迟了国家的建立，意大利讨价还价的地位便会加强，只得屈服于摄政王亚历山大的要求，接受塞尔维亚卡拉乔治王朝，并同意统一的南部斯拉夫国家成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新国家包括塞尔维亚、原奥匈君主国的所有南部斯拉夫土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战前的门的内哥罗王国以及迄1914年留在土耳其手中的马其顿几个地区。其边界将在和会上商谈决定。1918年12月1日，新国家的摄政王，即后来成为国王的塞尔维亚人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逐个接见了克罗地亚代表团成员，视作臣属，而不是以平等身份相待。克罗地亚在新王国中的地位尚未明确规定，塞尔维亚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

1920年秋，参加巴黎和会的南斯拉夫代表们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他们还在苦苦争论谁的边界要求应予优先满足，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和法国敦促南斯拉夫对意大利的要求让步，而伍德罗·威尔逊虽然对1915年的伦敦条约深感不满，并始终支持一
63项有利于斯拉夫人的种族解决方案，此时却已在美国国内遭到挫败，因而无能为力。1920年11月10日，南斯拉夫代表团对意大利屈服，两天后与意大利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南斯拉夫不得不放弃它对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的要求，失去了达尔马提亚沿海的扎达尔和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些岛屿；此外，还有阜姆“自由邦”，它实际上早已落入意大利之手。通过1919年签订的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以及1920年签订的纳伊条约，与南斯拉夫的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也达成协议。没有哪一项条约充分满足了南斯拉夫人的要求，而它的民族统一主义的邻国也仍然不满。作为这些条约的后果，有七十二万南斯拉夫人被划在新国界之外，其中四十八万人，亦即半数以上，是在意大利。^{〔注2〕}

布罗兹于1920年回到克罗地亚时，克罗地亚人与被塞尔维亚人控制的政府之间的裂纹已经加深。克罗地亚人由于自治的希望遭到破灭，深感恼怒，而塞尔维亚领导人则对克罗地亚人疑窦丛生，害怕他们不满，有心尽可能把他们排斥于权力之外。各族人民还没有选出他们的首届议会，还没有通过一部宪法，这个新国家就已经离心离德了。

上层政治谈判的细节，克罗地亚乡村的农民很可能毫无所知，但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他们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所遭到的失败。对多数老百姓来说，更重要的是战争的结束所带来的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机会。克罗地亚战时食物匮乏，农民得以在自由市场上获利。物价高涨，奥地利又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日益陷入灾难之中，当局从而削弱，这就使农民胆大起来。乡村驻军中成千的士兵开

了小差。1918年的萨格勒布军事法庭所处理的逃兵案之多，为数竟达十万件。四至五万农民亡命逃入山林，号称“绿林军”，以逃避征兵或劳役。农民开始拒绝向地主交租。他们袭击大庄园（其中五分之四属于外国人、主要是马扎儿人和德国人），攫取土地或财物，狂欢喧嚣，表现出他们数世纪来对土地的渴望和对于外国地主贵族统治的仇恨。扎果烈地区原为埃尔多迪家族旧产的班亚堡⁶⁴为一群矿工和农民攻占，被洗劫一空，全部炸毁。1918年，萨格勒布的临时政府为求维持权威，在与塞尔维亚谈判期间于11月14日向农民发布公告，许诺进行土地改革，瓜分大庄园。这在新国家其他许多地区也是一个迫切问题。所以，新政府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在1919年2月25日发布了一项临时土地改革法令。因此，在布罗兹回来之前，克罗地亚的封建制度已告结束，许多农民已获得土地。但这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农村仍处于极端混乱之中。

混乱不仅限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罢工此起彼伏；门的内哥罗则不断出现严重骚乱：那里的许多高地部族虽属塞尔维亚血统，却狂热地忠于门的内哥罗，他们对于自己的独立的世袭政府的消失和随着并入新国家而来的自治地位和民族特性的丧失均极为反对。马其顿情况更糟，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的保加利亚特务在那里大搞恐怖活动，以图阻止这一地区并入南斯拉夫。^{〔注3〕}全国这些反对活动均为塞尔维亚部队所平息，他们当时还是萨洛尼卡战线的同盟国军队的一部份，由法国将军弗朗歇·戴斯珀利统率，此人直到和约签订后才离职。

对新政府权威最严重的威胁是1919年7月爆发的一次总罢工，恰恰和一连串的兵变相呼应，而这些兵变又是由与匈牙利的共产党起义分子有联系的、从俄国回来的前战俘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决心不让这种共产主义的或革命性质的运动在本国得

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给外国干涉造成借口，因为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当时都正在对南斯拉夫的边境地区提出领土要求。

新国家资源贫乏，难以承担为解决各族人民的食、住、就业而必须的改组，以及把国家建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完整经济体系⁶⁵这一艰巨任务。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一直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而较之南部斯拉夫其他地区，工业上还是比较发达的。但其资源与贸易以及全部主要交通设施，都属于哈布斯堡君主。银行、工厂则主要为德国人或马扎儿人所有，他们的资助已不可得。在这一转变时期，情况十分混乱，大批人员失业。铁托在1948年的一篇演说描述这一时期的情况时曾说：“工人几乎十分之九流落街头，无以为生，一个钱也没有。”他进而提到即使有工作的人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份濒于饿毙的工资——非熟练工人每天只能挣两个半到三个第纳尔，技术工人每天能挣五到六个第纳尔，而这时作为主食的面包，两磅半一个的要一个半第纳尔。^{〔注4〕}没有大规模的外国救济。政府用了很长时间商借外债，但大部用于防务。通货膨胀和战后流感不谋而合地折磨着这个国家。

※

※

※

这就是约瑟普·布罗兹和他妻子回国后遇见的状况。他迫切需要谋得工作，自尊心不容许他再度向亲属乞讨，接受家庭接济而忍受冷言冷语。关于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没有什么资料。他后来谈到这一时期时，说起当时的艰苦情形，提到曾参加过一次成功的侍者罢工（这表明他似乎曾当过一个时期的饭馆跑堂）还说起曾于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在萨格勒布工会大厦做过一次演说，用

这样一句话作结束语：“工人们只有凭藉武器才能取得胜利。”这是那个时期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中的极端分子的主张。但我们很难肯定他这句话是号召拿起武器呢，还是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陈述。〔注 5〕

有人断定他是作为苏联情报员回到南斯拉夫来的。这没有任何根据。如果他当时真是现行的共产党情报员，他后来很可能就会这样说并引以自豪。他也会在经济上得到支持，因为苏联情报人员都有一份小小的月薪，而且众所周知，某些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当时已经通过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接受俄国的金钱。那时，返回的战俘只有很少几个在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而约瑟普·布罗兹不在其中。现有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当时很穷，正在谋求职业，政治上充其量不过是个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还没有把社会生活置于私生活之上。他那时还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熟练的机械师，政治活动应在工会中进行，并只限于一个旨在改善劳动条件的社会民主党人积极进行的正常活动。他还没有完全献身于新的共产党，还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

在布罗兹回到南斯拉夫之前，发生了两件对他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事，虽然他本人当时与它们无关联。一件是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第三国际；另一件是在新近建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成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三国际后来称为共产国际，有了它，就有了一个向外国共产党提供指导意见和金钱援助的组织。但是那时还没有发展为十四年后约瑟普·布罗兹初次与它发生关系时那样一个对外国共产党具有集中控制和绝对权威的机构。

以南斯拉夫王国各地区的不同社会民主党派和左翼团体为基础而建立一个统一工人党的决定，最初是1919年4月20日至23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一次谋求统一的代表大会上作出的。新党称

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1920年6月武科伐尔会议后改称南斯拉夫共产党。〔注6〕

67 南斯拉夫各地区左翼运动中政治上活跃的人们，对新成立的共产党远非一致支持。对于是否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主张和战术，以及在改善社会状况方面是否采取比较合法的方式，争论十分尖锐。甚至共产党内部意见分歧也很大，特别是在全国所面临的问题上，争论尤为激烈；这就是新国家究竟应该在塞尔维亚领导下实行中央集权呢，还是应当保留某种形式的联邦组织？在战术上，党内也分为革命派和费边派两大派别。那些支持较为温和的路线的人逐渐为革命左翼所取代。

经济状况也加强了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距匈牙利只有数英里的伏伊伏丁那，情况尤其如此；此时匈牙利人贝拉·库恩的共产党起义看来颇有成功的可能。左翼的激进政策在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意大利特务在达尔马提亚四处活动，企图煽起不满，破坏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在塞尔维亚，日夫科·托帕洛维奇和西马·马科维奇两人推动共产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第三国际，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前者后来脱离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约瑟普·布罗兹的对头；后者原是一个数学教员，后来由于对共产主义持独立见解而被开除出党，最终在俄国丧命。〔注7〕

从俄国回来的战俘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讲述了沙皇被推翻的故事，这些故事富于戏剧性，而且往往被赋以浪漫色彩，有助于推动群众支持共产党。所有这些影响也在1920年的市政选举和普选中发生了作用。

3月和8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共产党在国内许多地方获胜。在萨格勒布市，他们获得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在贝尔格莱德得

到百分之三十四，从而取得对国内仅有的两个大城市的控制。⁶⁸ 1920年11月28日的普选中，所有的党派除共产党外都立足于地区性的支持。唯共产党尽管内部存在分歧，其支持者却遍于全国各个地区。他们出版十种报纸和数百种传单，散发全国。他们获得选票的百分比在民主党（19.9%）、激进党（17.7%）和克罗地亚农民党（14.3%）之后位居第四（12.4%）；在席次分配上，他们在1920年12月召开的立宪议会中成为第三大党。这次成功有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现象，这就是对共产党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并不来自比较工业化的、先进的省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而是来自落后的农业省份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那里的党组织正处于最薄弱时期。然而各地农民的情绪却都是很激进和很革命的。〔注8〕

即使党的某些领导人接受俄国金钱来进行竞选宣传，也只能产生次要作用。共产党在1920年大选中的成功，反映出那个时期全国各地农民、工人和地区民族主义者中间存在的革命、激进和愤懑的情绪。这不能归功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或俄国的黄金。

共产党人胜利踏进新议会不到一个月，就被当头一棒打昏过去，从此丧失了在新国家中组织政治力量和取得政权的全部手段。1920年12月29日至30日之间的那个晚上，民主党—激进党联合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一般称为“诏书”）命令在宪法通过前，解散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包括工会；禁止一切宣扬专政、革命或任何暴力的宣传。共产党人正陶醉于胜利之中，这一举全然出乎意料。他们对于权力之争的现实毫无准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始终未能恢复自己的合法地位。

政府决定采取这一独裁的，甚至连非共产党议员也认为是非法的步骤，原因是多方面的。看来主要的一个是塞尔维亚的政客们为了使他们的集权主义宪法得以在议会通过，决心无所不用其

极。在这个时候拿共产党来吓唬人，便会突出表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必要，并使共产党代表即使留在国会内也将陷于孤立。共产党在市政选举和普选中的胜利也使塞尔维亚人吓破了胆，他们看清了共产党有可能大大利用地区感情和遍及全国的经济上的不满。这个党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者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联系也使这些人胆战心惊。

共产党的语言和所公开宣告的政策丝毫没有减轻这种恐惧心理。在议会开幕会议上，“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与“国王万岁”的呼声针锋相对。即使较为温和的共产党竞选传单所主张建立的国家，也与摄政王、帕西奇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决心建立的国家截然不同。共产党传单告诉选民们，他们只能选择

或一个有钱人的国家，或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一边是君主主义分子和共和资本家，另一边则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共产党。给富人的党派投上一票就是给资本家、银行家和发战争财的人们投了一票，也就是为他们的国家和专政投了一票，也就是为现行体制投了一票。给共产党投一票就是为结束资本主义、为消灭地主、商人和有錢的统治者投了一票，也就是为废除对工人和农民的奴役、为他们的解放投了一票。（注 9）

政府成员不难看出，所谓统治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就指他们自己，而实际上这并不冤枉他们。

整个 1920 年南斯拉夫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早在“诏书”发布前，政府即已加紧采取警察措施，以暴力对付示威者的情况日见其甚。一方使用暴力，另一方势必以暴力回敬，直到搞得因果⁷⁰难辨。3 月份萨格勒布市选举后，警察曾将当选的共产党市长

杰里奇揪出市政厅以阻止他登台就职。〔注10〕1919年7月的波斯尼亚罢工引起一片惊慌。还动用了塞尔维亚部队镇压非塞尔维亚省份的罢工，甚至连共产党人以外的许多人士都认为是合法的会议也不许召开。1920年12月共产党人摆出了再次举行总罢工的架式，情形俨如俄国革命的前夕。

回顾起来，很难对发布“诏书”时南斯拉夫的真正形势作出估计。在那时之后的种种有关说法掩盖了真情实况：支持“诏书”的人们力图夸大共产党的活动来为这一法令提供根据，而共产党人也对当时的混乱和他们所起的作用大肆渲染，以求表明共产党当时是何等强大，何等活跃。

南斯拉夫的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对“诏书”也是反对的，因为它消灭了新国家的政治自由，并开了一种危险的先例，可以转而对一切反对集权政府的政治集团实行镇压——后来确实如此。议会批准了这一法令，并动用国家的全部权力强行实施，从而把暴力的因素引进了政治生活，使之达到空前恶劣的地步。

被剥夺了自己的政党的共产党代表继续留在议会里，直到1921年6月11日，他们才为抗议对共产党人的全国性大逮捕和虐待而退出议会。通常称为维多夫丹宪法的这一集权主义宪法于6月28日通过时，他们全体缺席。这部宪法否定了区域自治或任何形式的地区自治政府，而给塞尔维亚人以领导地位，使最狂热的塞尔维亚集权主义分子如愿以偿。它以二百二十三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一百六十五票弃权而通过。后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没有那项“诏书”，如果所有反对派都留下来投票，维多夫丹宪法是不能通过的。结果“诏书”和维多夫丹宪法却都事与愿违，自讨苦吃：对新政府的强烈反对却不仅限于共产党人。维多夫丹宪法所造成的形势使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中，政府根本无法稳定。

71 共产党存在不足一年即遭查禁。它既没有健全的组织，又没有统一有效的领导，无力约束激怒的党员在其后几个月中的报复活动。他们的强烈反应引起了更多的警察暴行。6月29日摄政王离开议会时，有人向他投掷炸弹。他幸免于难，但颁发“诏书”的前内务大臣米洛腊德·德拉斯科维奇却于1921年7月21日被一个共产党人刺杀。刺客后来被判处决。这次暗杀导致更严酷的立法。1921年8月2日发布一项国家保护法，取消了共产党代表在议会和地方政府中的一切职位。对散布共产主义学说规定了种种严刑——包括处死。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运动破灭了，许多党员被捕，领导人被迫逃亡国外或转入地下。他们成为“非法分子”，在随后的年月里，许多人由于继续致力于这一运动而惨遭监禁、拷打与死刑。

到1921年，战后经济和政治上最混乱的时期结束了。国内情况日趋稳定，经济生活有所好转。其后数年中，目睹过1918—1920年期间的混乱与灾难的许多共产党人，包括约瑟普·布罗兹在内，都认为当时错过了一次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机会，而之所以坐失良机，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未能利用俄国革命、匈牙利共产党人起义、奥匈帝国解体和南部斯拉夫战俘从俄国遣返等事件，以及克罗地亚的农民暴动和新王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掀起暴乱所造成的形势；这些领导人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共产党当时已拥有六万党员，工会已拥有三十万会员，完全可以动员起来。铁托在1948年说过，“这种种条件当时在我国造成了一种革命形势，但领导上却未加以利用”。〔注11〕

但这种估计并没有把表明革命时机并不成熟的一些因素列进去。尽管工会和共产党吸收了众多的成员，新王国的产业工人却寥寥无几，而其中许多人，象约瑟普·布罗兹本人一样，对有组织

72 组织的政治生活实际上毫无经验，也缺乏保证起义成功的本领。几

乎没有人真正献身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理想，多数人只求在现行社会制度下吃得好些，工作条件好些。并不明确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农民们要求土地，但一旦获得，便不再那么激进。在克罗地亚，他们支持斯捷潘·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胜于支持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农民们反对政府、反对城里人，而且对土地、物价和税收的态度是激进的，另一方面却仍极端保守，对社会改革颇有抵触，1921—1942年期间，共产主义宣传对他们一般是格格不入。

这个时期的示威游行和罢工运动貌似强大，但反对起义的力量却更强大得多。政府有强有力的领导，一心要贯彻塞尔维亚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并拥有一支庞大的、久经沙场的塞尔维亚军队，用来对付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的示威者，它绝不会与他们串通一气。而且，如果共产党人闹革命，南斯拉夫政府几乎肯定可以指望得到俄国革命时发生的那种反革命干涉。共产主义在这个战后成立的国家里没有取得政权，原因在于力量的悬殊。然而，硬说丧失了大好时机这种神话却在整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里继续左右着共产党人的思想，某些领导人之所以继续号召起义，既愈发脱离现实，也愈发浪费人力物力，这也是根源之一。

举行普选和共产党被禁之时，约瑟普·布罗兹回到南斯拉夫还不过数周。他于1920年10月，即社会民主党并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数月之后，在社会民主党的萨格勒布支部恢复党籍，也就自然成了共产党员。他在普选运动中多次出席集会和示威游行，但并没有参加领导党的活动。他说过，“我是在萨格勒布参加这一运动的。”“诏书”发布后警方大肆搜捕共产党领导人之时，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成为受到注意的人物，他毫无人身危险。很久以后编写的有关他的警局档案，说明他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从俄国回来的战

俘（事情本身虽然招嫌疑，却并不构成犯罪），除此之外，他们对他在1920年的情况所知甚少，且无记载。〔注12〕

他重新操起旧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这短短几年是他一生中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唯一一个时期。他并不急于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一段时期内与党没有进一步的联系，“诏书”发布后，党当时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他在萨格勒布当过一个短时期的锁匠，那地方物价高昂、工资菲薄，不久他又被解雇。他曾说过，“萨格勒布的工会已被解散，工人继续成批被捕，留在那里已没有什么意思。”他应广告招聘谋得一个职业——这是他第三度从事这种职业了，而且也许他还认为在这战乱动荡的年头，这种职业大有好处，这就是为大特洛伊斯特沃“一个好心肠而家口多的犹太人”老板照看磨坊。大特洛伊斯特沃是别洛瓦尔小镇附近一个较大的村庄（有三百三十户人家），在萨格勒布以东约六十英里。他的工作并不劳累，与在俄国时干的那个职务一样：看管蒸汽机。只要机器运转正常，他就自由自在。他的农民出身使他易于随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与带了谷物到磨坊来磨粉的农民打成一片。他身为机师，又有文化，还是从大动荡时期的俄国回来的老兵，会讲许多离奇的故事，自然便会在这里的居民中占据特殊地位。他说他的雇主和当地人都喜欢他。后来不得不分手时，他们还设宴为他送行。〔注13〕

他的妻子波尔卡三年内生过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在他们回国后不久生下来就死了。一个男孩出生八天即患痢疾死去；一个女儿兹拉蒂察只活了几天；另一个女儿赫林卡两岁时染白喉夭折；但1924年出生的一个儿子，叫扎尔科，活了下来。这是当时克罗地亚农民生活的正常模式，但俩夫妇失去孩子的悲痛并未因此稍⁷⁴减。他们按基督教仪式葬了孩子，布罗兹还亲自为两个女儿刻了一块墓碑。他夫妇俩只住一间屋子，日子不比他的父母更宽裕。



(照原图译制)

但两代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约瑟普有着他父亲从未有过的雄图宏愿。他曾目睹过一场社会革命，从此深信不疑它可以重演。他在风平浪静犹如一潭死水的大特洛伊斯特沃度过了四年半时光（1921—1925年）。

※ ※ ※

1923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整个的一生：另一个前战俘，共产党员斯提沃·萨比奇来磨坊与布罗兹取得联系。萨比奇当时很可能已经是一个领取共产国际薪俸的组织者，他与布罗兹的会见，很可能是有意与前布尔什维克同情者和失散的党员们取得联系的政策的一部份。他与布罗兹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在喀尔

巴阡山前线作战过，都在1915年被俘，都同情布尔什维克革命。萨比奇是个使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在奥匈帝国军队里当过军官，还在红军里担任军职，坚信共产主义。他后来是共产国际下设的一个组织“红色援助会”的官员，也是布罗兹日后长期坐牢时的主要监外联系人。“起初，我们与附近城镇别洛瓦尔和克里泽沃齐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地下支部没有联系”，铁托后来讲起这一时期时这样说过。但1923年选举后，萨比奇和布罗兹遇到了一些曾因企图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而在别洛瓦尔被捕的共产党人，并与他们一起建立了党组织。^{〔注14〕}他们让布罗兹散发传单，他从此成为一个党的积极分子。

这是共产党接受新党员所沿用的经典方式。布罗兹经历了各个阶段例行的“考验”。有一个时期他的政治活动是在独立工会联合会⁷⁵任职，这是国家许可的一个合法组织，共产党利用它作为掩护。工会不准过问政治——虽然这并不能严格执行，但有关劳动条件、工资和社会状况的一些活动还是允许的。布罗兹把合法和非法二者结合了起来，很快成为他所属各个小组中的出色人物。1924年初他被选入共产党克里泽沃齐地方委员会。雄心壮志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人员，而经历和性格又使他较之许多其他从未离开乡土的工作人员更为勇敢。他在智力与文化程度上也超过一般工人。正象在军队时一样，他既有领导的才能，又有领导的志趣。

不久，他被选为一个地方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并以这个身份在为一个委员举行的天主教仪式的葬礼上发表了一篇讲演。同志们出于对死者父母的尊重，没有按习惯在灵堂致悼词，布罗兹却在墓场作了一个简短而措辞谨慎的演说。“同志们”，他站在棺材旁说，“我们发誓要为你所献身的思想而奋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接着他们把红旗展开，覆盖在这位同志的坟墓上。牧师和许

多旁观者对此议论纷纷。

由于这次公开宣告同情共产主义，他和其他几个工人被捕了。他们被送往别洛瓦尔监禁八天，但在案件审理后即获释放。这一经历标志着约瑟普·布罗兹政治生涯中另一阶段的开始。当独立工会的工作于1924年被禁止之后，他越来越多地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常常到萨格勒布去与工会和共产党的省委员会成员进行联系。克罗地亚的极端分子还在考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共产党人和当时还没有接受中央政府权威的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党员之间还存在着联系。他们已经在收集武器，密藏一处。布罗兹建议说，可以把这些武器派上用场时，比较谨慎的克罗地亚共产党党委书记大吃一惊。^{〔注15〕}1925年磨坊主人去世，由他侄子接手，这时布罗兹已遭警察监视。他后来说，每个星期六警察都要来参观他的房间，翻一翻他的家底。

其后两年中，他选择职业完全取决于是否能提供在产业工人中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而不考虑个人的或经济上的原因。1925年9月21日，他去亚得里亚海岸的克拉列维察的一家造船厂，在那里干了一年，修理奥地利海军向南斯拉夫政府移交前就被破坏了的鱼雷艇，还为政客斯托亚季诺维奇建造了一艘豪华的游艇。他的妻子波尔卡带着当时还是个婴儿的男孩扎尔科来到这里，全家住在一间房子里。他所属的党支部一共约十二个人，常在私人住宅里组织秘密政治集会。他的工作此时已由党领导，是在工人中组织罢工。

他自己说，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协助筹办体育和音乐活动——好几年来那地方一直没有有组织的工会活动。他到萨格勒布去买了吉他，鼓励工人们到他家作客借书——杰克伦敦的作品、高尔基的《母亲》以及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这个时期见过布罗兹的另一个共产党员，是个医生，名叫巴维尔·

格里戈里奇，也去过俄国，他说布罗兹当时还年青，五官端正，浅头发，蓝眼睛，举止庄重，仪表严峻，习惯于用简练的语言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他被选为车间工会代表后，由于厂方拖欠工资已达七周之久，他毫不困难地把工人鼓动起来。他给贝尔格莱德五金业工会和海军部写信，支持工人的要求。罢工持续到第十天时，厂方屈服了。不几天，1926年10月3日，布罗兹被宣布为冗员。〔注16〕

党给他的下一个任务是离开他的故乡克罗地亚，去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梅德雷沃帕兰卡一家雇用七百名工人的车辆配件铸造厂工作。这里的条件要坏得多，厂方更难对付，更有办法。这一次他就不那么成功了。他仍旧是个小支部的成员，任务是建立一⁷⁷个工会支部，作为吸收新党员的基地，扰乱工业的武器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杠杆。布罗兹仍与贝尔格莱德的独立工会总部保持着联系，经常去总部的工人图书馆。他就是在那里初次会见了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其中有朱腊伊·萨拉伊，还有久罗·贾科维奇，这人曾在俄国受训，不久后被共产国际提名为党的书记。布罗兹当时还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党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那时在贝尔格莱德露过什么锋芒。

他在工厂的工会活动中既无法取得进展，便为一家地方工会报纸《有组织的工人》写了他的第一篇报纸文章（1927年3月27日）。在这篇文章里，他抨击了厂方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以便任意解雇不中意的人，他还攻击它付的工资过低，却强制推行十六小时工作日，肆意罚款，恫吓工人，以致三百工人中只有九十四人敢于投票选举车间工会代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他写道，“除依靠我们本身力量外别无出路。没有人关心我们，一切社会立法不过是空话和废纸。同志们，我们必须一齐参加战斗的工会组织，为反对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而积

极斗争。”文章发表十天后的，他再次被解雇。〔注17〕

他在萨格勒布还干过另外一个职业，但为时很短，接着就成了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和萨格勒布共产党委员会委员。从此时起，他再未重操过机械师这一旧业，在其后的生涯中一直是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先后担任过许多不同职务。布罗兹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决定性的转折点，虽然早在两年前已经迈出第一步，可对他来说，造成破釜沉舟之势的关键很可能还在此刻。不久后他再次被捕。当他质问警察他的罪名是什么时，警察答道，“布罗兹，许多乱子都有你的份，你的罪名能有一打。我们可以随时凭任何一条逮捕你。”警方决定按知名共产党人发落他，这次逮捕就是根据所收到的关于他一年前在克拉列维察造船厂散发共产党宣传品的情报行事的。他在萨格勒布被捕，押往克拉列维察附近的巴卡尔，⁷⁸在那里同其他六名被捕的造船厂工人关到一起。拘留九天后，犯人们被转到设在奥古林一座古堡里的县监狱去。他们被用铁链锁成一串，穿过巴卡尔的街市押向火车站，最后一名是一个瘸腿的同志；他一跌跤，其他人全被拽倒。铁托回忆道，“那种情景，实为屈辱，直到被塞进去奥古林的火车，我们才松了口气。”在这期间，萨格勒布警局搜查了布罗兹的房间，查获一些书籍，如《工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失业》、《道义与阶级规范》——这些书书店里都公开出售，但警局却认为对工人来说都是可疑的读物。

布罗兹是在6月份被警局抓走的，8月14日才在奥古林被登记为犯人，而且到10月中旬还没有开审的迹象，于是他实行绝食。他说，“我要抗议现行的监狱制度。我被他们在最苦的情况下，从一个监狱投入另一个监狱。吃的根本不是饭，而是不折不扣的猪食。最重要的是法庭不审讯我，……我要通过绝食表明我们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正在进行什么样的斗争。”

他拒食五天，日渐虚弱，但他小心地保持安静以保存体力。

他后来说，“绝食的难关在第二天，你会感到饿得受不住，但如果你能熬过这个紧要关头，你就会陷入一种轻微的恍惚状态，不再感觉饿得那么厉害。”第五天一个地方法官来看他时，他还能说话。这是一个开明的克罗地亚人，叫斯捷潘·巴卡里奇，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成了囚犯的终生良友。法官答应开审他的案件，从自家厨房给虚弱不堪的犯人送来了汤，并感于他的智慧与意志，在审讯后将他领到家里给他看自己所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竭力劝说布罗兹只从事合法活动，但这一点毫无成效。

案件于1927年10月28日审理，布罗兹被判处七个月徒刑，⁷⁹在向萨格勒布高级法院上诉期间暂时释放。后来刑期减为五个月，但那时犯人已无影无踪。布罗兹离开奥古林时已是一个比以前更加激愤而又更加自信的共产党人。他初次以身试法而竟这样轻易脱身，使他对他所挑战的当局产生了一种不符合他本人习性的满不在乎、目空一切。他重新担起工会组织工作，干劲倍增，决心益坚，一心要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注18〕

第四章

政治犯

80

1928年是南斯拉夫国家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也是约瑟普·布罗兹个人生活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斯捷潘·拉迪奇遇刺身亡（这是在南斯拉夫议会辩论中由另一个代表干的），这就使国王亚历山大想使其集权主义宪法生效的种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1920年强行通过维多夫丹宪法后，亚历山大国王接连费了数年工夫竭力在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客之间策动一种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联合以期稳定政府，但均属徒然。南斯拉夫国际关系的缓慢改善帮了他的忙。小协约国于1921年成立，这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结成以对付匈牙利民族统一主义的保护性联盟。意大利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和邻国，在二十年代里陷于孤立；法国则勉强地表示愿意站出来充当南斯拉夫的保护国，在1927年与它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由于政府设法把贸易和工业搞了起来，特别是在北部前奥匈帝国地区，这就使经济状况也慢慢地得到改善。

但对全国穷人来说，生活条件依然非常困难。失业率高，工资低，国家保护法的实施限制了工会的活动和一切政治活动，使原已很糟的工作条件每况愈下。在工业界进行鼓动虽大有余地，但警察戒备森严，使之成为危途。

共产党是这个时期遭到禁止的唯一政党，但却并不唯独他们才在政治上反对亲塞尔维亚的国王及其集权主义政府。国王与各

反对党和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善。在众望所归的领袖斯捷潘·拉迪奇领导下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UESS),对这一政权一直深恶痛绝,但对怎样进行有效的反对却感到茫然。拉迪奇不断⁸¹变换战术,力图削弱这一集权国家,而均告失败。〔注1〕1924年以前,克罗地亚农民党抵制议会,也抵制与极端反政府的种种集团进行毫无作用的联系,其中包括被禁止的共产党,主张暴力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分子,号称“弗兰科夫齐”的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也包括一些比较温和的王权反对派。〔注2〕

1924年,拉迪奇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到莫斯科去,签订了一项参加共产主义农民国际的协议,指望为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自治宗旨谋得国际支持。他虽然公开说,“我们要与俄国并肩前进,”私下却表示失望。他对他的朋友马切克〔注3〕说过,“共产党人不要盟友,只要奴仆。”

1928年6月20日拉迪奇被刺杀时,他的亲布尔什维克政策已在消失。这种政策在克罗地亚不得人心,俄国援助又是迟迟不来。他已停止抵制政府,转而采取在议会中进行反对的战术,并与前奥匈领土的塞尔维亚人结成联盟。他的被杀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反对政府的人们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8月8日,共农党议员退出议会,并在新领袖弗拉吉米尔·马切克领导下对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克罗地亚全境爆发了示威游行,抗议这次暗杀,其中多次以暴力冲突告终。人们把这次暗杀归罪于政府,指责它任凭凶手逍遥法外。凶手于当日晚些时候自首,才被逮捕,但一年多没有审讯。后来判处二十年徒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使总的形势愈形严重。这正是当时世界性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全欧总危机的一部分。南斯拉夫政府在这种严重状况下仍旧全然不愿对克罗地亚人或民主反对派作任何政治让步,而又无力消除或完全控制住普遍的不满。

这就是约瑟普·布罗兹开始在克罗地亚积极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时的形势。到了1928年，非法的共产党（他就是从这里接受命令⁸²的）党员分别编在各地支部之中，已经建立起初步的地下组织网。党员的身份是危险的，这反映为党员人数的大幅度下降——从1920年的六万五千人下降到1924年的大约一千人。1925年又回升到二千三百人。^{〔注4〕}这些党员决不能说都是积极分子，他们主要分布在国内有限的工业发展所在地贝尔莱格德，萨格勒布周围地区，以及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一些地区的少数产业工人中。

共产党利用两个前沿组织作为进行活动的掩护。一个是独立工人党，这是个短命组织，1923年成立，1924年即被解散，因为它把共产党员都吸引了过去，另一个是政府允许存在的独立工会。这个工会还得与其他工会，主要是与社会主义的工会竞争。这些工会的政策与共产党的政策不同，而且由于继承了“诏书”发布前的工会运动的基金，因而比较有实力。约瑟普·布罗兹的立场是支持共产党主持的工会。

这个时期，非法的共产党的经费来自共产国际。布罗兹后来发现，^{〔注5〕}依赖外国津贴过活是种种困难与意见分歧的根源。除工作人员薪金（既包括驻在国外的“高薪”人员，也包括国内的专职工作人员）之外，还得提供经费出版传单和报纸；在警察迫害最严酷的时期，其中许多不得不在国外出版，通常是在维也纳。这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政治工作，而且在非法条件下这种办法比开会较为容易向秘密党员传送党的消息。布罗兹散发党的材料，非常积极；传说他有一次甚至去过库姆罗维茨，从一辆轿车上散发传单。后来他使用许多笔名极其热心地为党的报纸写稿。

最著名的非法报纸之一《共产主义者》，创刊于1925年1月，只出版了三期，其编辑、富有才华的贝尔格莱德记者莫沙·皮雅

83 杰便被捕并被野蛮地判刑二十年，以儆效尤。他只坐牢十四年。但这种威慑并未奏效，《锤子与镰刀》在维也纳印刷出版，《青年共产党人》于1929年创刊，其他全国性或地方性报刊在不同时期相继大量出现，其中以《工人战斗》，后来简称《战斗报》（由Radnička Borba简化为Borba）为最著名。它和《共产主义者》一样，如今又接着出版。〔注6〕

在缺乏经验、形形色色而又互不相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中组织地下工作是极其困难的。警察瞪大眼睛，四处活动，致使全国的交通联系经常由于人员被捕而暴露和被切断。很难找到可靠的通讯联络员。口信不够准确，书信又充满危险，这就不断带来问题。党既软弱，只得日益依赖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这时恰恰正在一心致力于集中控制俄国以外的各个共产党，取得对它们的绝对权威。南斯拉夫党是最难控制的党之一（这倒决不是因为其领导人已在奉行一种难以驾驭的独立政策，当时的领导人并不包括约瑟普·布罗兹），这就使它在共产国际俄国官员心目中最不受欢迎。

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统一，可是，那时的哪一个共产党是统一的呢？考虑一下党的起源——各式各样的领土并入南斯拉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汇集在一起，它在“诏书”以前的短暂的合法地位，以及非法存在之艰难，南斯拉夫党的缺乏统一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俄国共产党员拉德克关于南斯拉夫党说过这样一句话，

“较之能够合法活动的党，非法的党产生分歧容易千百倍，而解决分歧则困难千百倍”。〔注7〕党的领导人甚至在党的政策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上都丝毫无法取得一致。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苦苦争论：党在“诏书”发布后垮了台，责任在谁？党当时究应如何作出

84 反应？特别是对民族问题，对组成南斯拉夫的各地区和各民族集团（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其他族

人)这个根本性的南斯拉夫所独有的问题,党的路线究竟是什么?在所有这些争论中,都有两个主要的对立集团,于是造成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中一个共产党分为两大派的格局。

要对这个时期中复杂而混乱的争论作出令人满意的简要解释,殆近于不可能。大部分说法,几乎都来自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而且几乎全怀有某种私心打算,势必将争论不休的领导人分为右派和“左”派。早期的右派由一个叫西马·马科维奇的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领导。他们支持南斯拉夫国家由一个中央政府领导的主张,认为之所以有民族问题,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治理不善;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政府,这些问题即会消失;或可以通过一部令人满意的允许某种形式的自治的宪法加以解决。右派们对地下工作持较慎重态度,对武装暴动的后果表示怀疑,而热衷于循着一条将导致取消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立法的途径干下去。

“左”派分子则较极端。他们接受了地区分离及非法活动需要采用暴力等主张。双方在各地区都有支持者。争论发展为个人仇怨,并被带进了党的会议和各种活动之中。他们向共产国际互相告状,而当共产国际出面干预时又拒绝接受它的裁决。约瑟普·布罗兹丝毫没有卷进这些早期的争论,算他吉星高照。那时,卷进去的人们,得以幸存或在其后的年代里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几乎绝无仅有。当时推行一条由俄国定调的共产党法律:党必须是铁板一块,意见一致,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都不仅是对本国党的背叛,而且是对整个工人运动和这一运动的首领俄罗斯的大逆不道。根据这条法律,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干掉了。当时从未有人对这种专横武断的说法提出过疑问,它一直支配着共产党人的思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党的会议、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人们继续就这⁸⁵

些问题进行辩论,常常情绪激动、心怀恶意。1928年以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共召开过三次主要的代表会议;第一次于1922年7月3日至17日在维也纳召开(有代表二十二名,但意味深长的是竟没有一名马其顿、门的内哥罗、达尔马提亚或伏伊伏丁那的代表);第二次于1923年5月9日至12日,也是在维也纳召开(共有代表三十四人,包括以前没有代表的地区的代表);第三次于1924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有代表三十五人,来自全国各地)。^[注8]三次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人员出席,他们看到了两个对立集团间争夺权力的情况。西马·马科维奇控制了第一次会议,设法使大会接受了他的“右派”观点。左派退出会场。同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争论双方都派出代表团前往。在这里右派又威胁要退出会场,其领导人对允许左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提出了抗议。对此,共产国际的代表无视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的先例而评论说,“这种宣告说明我们的同志与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的精神实质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代表声言如果会议作出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决议,他便要退席。”

在南斯拉夫党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会议上,权力逐渐转入左翼之手。1922年,左翼领导人之一塞尔维亚人特里察·卡茨莱罗维奇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并于1922年成为执行委员会书记。从此时起马科维奇开始失势,但他并未轻易认输,更谈不上由此缄口。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在独立工会的官员中享有可观的支持。他在以共产党罪名短期入狱期间写了一本书,叫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民族问题》。在这本书里,他把斯大林的话作为一般性的理论加以引用,同时阐述了自己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观点。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在俄国取得后来那种穷凶极恶的权力并横加滥用,可是西马·马科维奇敢于在1925年3月30日的一场公开辩论中,当着共产国际派来调查南斯拉夫党的分裂状

况的委员会的面发言反对斯大林，这倒表现了一种很大的魄力。

斯大林已经是一位重要的俄国领导人，而马科维奇不过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个候补委员。不用说，斯大林的观点被接受了。那就是必须许可各民族有权或退出或行使自治的权利而自愿留在南斯拉夫。这个南斯拉夫，斯大林断言，将是一个已经经历过一场“苏维埃”革命，而其后的问题是多数人口属于农民的南斯拉夫。“马科维奇的主张”，斯大林未卜先知地说，“意味着对于一些潜在力量的低估。譬如说，克罗地亚民族解放运动。”〔注9〕

在南斯拉夫党内，争论却不那么容易解决。马科维奇一直未被说服，不相信自己错了，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他终于被开除出党，回到了数学教员的本行，在俄国侨居一个时期，甚至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但却在斯大林的清洗中失踪。他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得以恢复身后名誉的南斯拉夫人之一。

南斯拉夫党的机器既被主要支持左翼的人物所夺取，而他们多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科维奇又已失败，党的主要活动便转到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这里距贝尔格莱德的中央政府较远，较易于组织非法活动。这里也更靠近国内的工业区，仍然被认为是共产党吸收新党员最好的地方。这就使约瑟普·布罗兹接近党的工作的中心，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争论，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以及共产主义工会工作者对待罢工的策略的一些争论之中。

作为经济衰退的结果，工人们成了多余的人，物价高涨，工资冻结或降低，引起许多工业部门中一系列自发的和有组织罢工，其中包括五金和皮革工业，布罗兹就是它的工会组织人。他相信这是共产党人对工人的“战斗激情”加以领导的机会。这是共产国际的观点，但党内有人反对，理由是警察力量正强，这样做会削弱党。布罗兹则认为党内双方互相斗争，纯属浪费时间和精力，大家早就应该同心协力组织罢工，充分利用“这些对工作，对

加强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最有利的条件了。”〔注 10〕

1928 年 2 月 25 日晚九时至 26 日早晨五时这一夜，在萨格勒布郊区一幢小私宅里召开的萨格勒布党代表会议上，矛盾终于爆发。会议有三十二人参加，此外，还有一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会前积极与人们进行联系的布罗兹是五金和皮革工会的代表。当党的书记作了一个温和的报告，对党内分歧和党的失败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时，布罗兹（当时叫作乔治耶维奇）代表一部份人发言，强烈要求撤销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说的不是事实真相。”他说，并进而对“派别活动”，无所作为，追求地位和阻碍党内其他人的工作的现象展开批评。他要求萨格勒布党组织“立场坚定”，要求致书共产国际谴责“左”的和右的派别活动。〔注 11〕他在这个阶段为什么要向共产国际申诉，动机是耐人寻味的：完全是出于大公无私呢，还是希望引起莫斯科对他个人的注意？他是否已经有心要象许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到莫斯科去受教训？对于胸怀抱负的人们来说，这是当时平步青云的唯一捷径。

他的演说和在代表中间的广泛接触起了作用。书记的报告被撤销，他参加起草的一封信被发往共产国际要求干预。约瑟普·布罗兹当选为萨格勒布共产党书记。现在他成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官员，他的名字，即使仅仅作为一个积极分子而别无其他，已经在莫斯科挂了号。4 月份，共产国际发来一封严厉的“公开信”，责令各支部进行讨论、斥责了南斯拉夫党的“分裂主义”，表扬了布罗兹的富于战斗性的小组的行动。它还解散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建议任命一个新的核心组，由当时正在莫斯科列宁主义学校受训的波斯尼亚籍克罗地亚人久罗·贾科维奇担任组长。

布罗兹小组的作法符合共产国际当时正向各国共产党下达的新政策。新政策主张激进行动，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

新阶段，它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认为敌对国家随时都可能重新对苏联发起进攻，因此敦促各国党尽一切可能削弱本国政府。

这时在克罗地亚散发的传单反映出党接到的新指示：转而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和专制独裁实行“公开战斗”。传单号召创建一个“工农苏维埃国家”，号召展开反对“杀害一切进步的革命人民的政权”的斗争。它们力图争取农民的支持，向对现状不满而又不是共产党人的克罗地亚农民提醒他们千年来在外国统治下的苦难，提起马季雅·古贝茨的命运，提起他们在1920年所失去的争得自由的机会，和他们当前在“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手中、在“血腥的、罪恶的、非人道的政权”下所经历的命运。〔注12〕

※

※

※

布罗兹作为当地党组织的书记，必须寻找新的可靠的人手，分担加紧进行的工作。“我们委员会在培养新干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说，“这是一种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你需要极大耐心，深刻了解一个人，帮助他，多看他的长处，而不是看他的短处，鼓励他的积极方面，帮助他克服缺点。要谅解他的背景和教育上的缺欠及他的私生活，不应一味苛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干部来”。〔注13〕

布罗兹在传统的工人节日“五·一”，组织了示威游行，意图是显示工人运动的力量。他本人出席了在阿波罗影院举行的大会，大会以与警察发生一场混战而告终。据警方报告说，这原是一次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由于布罗兹不断喊叫，打乱会议进程，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一个当时在场的共产党员则说布罗兹是在企图帮助一个同志摆脱警察时遭到逮捕⁸⁹

的。^[注14]布罗兹被判处两周监禁。这次的警局记录对他是这样描述的：深褐色头发，不蓄小胡，蓝眼睛，直眉毛，脸型卵圆而瘦削，肤色黝黑；手长而窄，左手中指有伤痕，鼻宽而直，无特征；口型无特征，数齿失落；胸围八十四厘米——就他当时的年龄来说这不算很宽，足以说明他在这段生涯中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记录还说他能讲克罗地亚语、德语、俄语，并附有他的笔迹：“我是在阿波罗电影院被警察逮捕的。”他在两周后获释，这可真是走运，因为他还没有服在奥古林被判处的徒刑。此后，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避免再次被捕。他戴上了黑眼镜，蓄起了小胡子，随时改换装束，从不在一个地方连过几夜。他后来说过，“我经常揣着一支左轮。”他的家庭生活自此告终。

那年夏天，萨格勒布的气氛非常紧张，不但对于布罗兹，对其他入也是如此。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抑已久的不满，构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形势，看来除共产党人之外，许多别的人也都处于采取暴力行动的边缘。拉迪奇在6月28日被刺的消息传来，立即象一根导火线一样诱发了形势的爆炸，萨格勒布开始发生暴乱。

警察动手加紧搜捕共产党人和知名的煽动分子。布罗兹有两次险些被捕。一次是在工会总部。一个警察闯进来问道：“约瑟普·布罗兹在这里吗？”布罗兹回答：“你没有看见他不在？”于是警察敬礼离去。另一次，他从办公室窗户上了屋顶，跳到庭院里的一张桌子上，当时一楼的饭馆老板正在桌上切肉，肉块横飞，布罗兹却得以脱逃。第三次他就不那么走运了。1928年8月4日将近午夜，一个认识他的警局密探在街上同他打招呼，说有些同志在他临时过夜的屋子里等他。岂知等在那里的是警察，这一次牢牢实实地抓住了他。

⁹⁰ 布罗兹设法从监狱里传出一张纸条来，向党报告发生的一切，上面写道：

“8月4日星期六半夜十二点，我正要上床睡觉，就被捕了。警察挥舞着手枪，从后面来抓住我，使我无法动弹。星期六中午，他们已经在这所房子里抓走了一个人，搜出二十六本书（《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萨格勒布共产党公报》；九本《列宁主义》）四颗手榴弹，一支军用左轮和若干弹药。他们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在狱中受到拷打，还不允许医生给我看病。我从8月4日起实行绝食，十分虚弱。其他人也惨遭毒打，没有人敢从外边给我们带饭来。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一些纸条。威胁要处死我，还说要把我送到贝尔格莱德的格拉沃尼亚察（骇人听闻的刑事监狱——编者）。我宁死也不……望另设他法。M.说他将尽力而为。再见吧，同志们！我虚弱已极，即将力不能支……”〔注15〕

这个文件终于被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经一个南斯拉夫官员朱兰·高尔吉奇审核批准，略作改动后刊登在《国际新闻通讯》上，标题是《地狱般的南斯拉夫监狱里传出的呼声》。

若干年后，布罗兹曾说他在萨格勒布监狱里并未受酷刑，但却被置于强光之下，不许睡觉，逼迫招供。他拒绝开口，头部、胸部、臂膀不时挨揍。他有一次说过，“在那之后我有很长一个时期吐血。”另一次他又补充说，“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谈不上什么拷打”。

布罗兹作为萨格勒布共产党的书记，始终按共产国际敦促共产党人采取武装行动反对本国当局的指示精神行事。虽然他当时否认在他屋子里搜出的手榴弹是他的（当然，严格根据法律来说，它们属于党），他后来还是承认，“它们确实就是我的。”〔注16〕

警察仔细地准备了起诉材料，他们深信眼下所对付的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人。那些记录至今还在：在布罗兹住所查获的物品

91 清单所开除书籍外，还有工会图章、付款单、小额款项收据，都是付书款和各种人物报销旅差费的单据，其中一张是一个被捕者的妻子的收条（二百第纳尔），还有一张条子是用密码写的，布罗兹拒绝说明。另有一个笔记本，里头有布罗兹一次政治讲演的亲笔提纲。小标题都编了号，说明他所要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既包括国内问题又包括国际事务。〔注17〕

在关于铁托生平的正正式记述中，约瑟普·布罗兹被捕后的审讯过程写得很有几分象一部公式化的英雄传。这一案件没有轰动一时，也没有成为国际新闻，但其戏剧性却足够地方报纸大登特登。这在共产党人中造成了深刻印象，并引起了共产国际高级当权人物对布罗兹的注意。这无疑正合他的本意。

根据国家保护法提起诉讼的犯人共有六名。他们于 1928 年 11 月 6 日被带到萨格勒布地方法院，由五名法官审讯。约瑟普·布罗兹案在审讯的第二天午前十一时开庭。一家地方报纸《消息报》报道，法庭上人山人海。

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讯格外关心，他们挤进法庭，搞得水泄不通，都是些留着弯弯曲曲长头发的小伙子和头发剪得短短的年青姑娘，可能是新福音的善男信女，也可能是被告的相识。……这一伙古怪的听众聚精会神，耐心地听着，一字不漏；被告每说一句俏皮话，他们就哄堂大笑……

《消息报》记者写道：“被告约瑟普·布罗兹无疑是这次审讯中最引人注意的人物；他的面孔使人联想到钢铁”，还附了一幅犯人在法庭上的素描作为插图。

他眼镜片后边的两只淡灰色眼睛冷冷地瞪着，机警而沉

着。就他来说，他在法庭上的态度可能并不只是故作姿态，因为他在这以前已因政治信仰而被起诉过并曾数次服刑。在场的许多人无疑都感于他维护自己观点时顽强态度，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的反问，鸦雀无声。〔注18〕

两年以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有一项决议，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曾利用审讯所提供的机会宣传党的主张，看来约瑟普·布罗兹牢牢记住了这一教训，充分利用了这次公开审讯进行宣传。这是他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登上讲台，他抓住时机，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辩才，这种才能在他后期的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项政治声明。当问他服不服罪时，他答道：

“虽然我承认检察官起诉书中所控告的罪名，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我并不承认这个资产阶级法庭的权力。我认为我只对自己的党负责。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我承认我传播过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过共产主义，承认我在公开的会议上和在私人交谈时都阐述过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公不义。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些会议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自从1921年党被禁止，成为非法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干的。”

他进而抨击了警察对他个人和其他被告的野蛮行径并极力为其他被告开脱。他说他对臭名昭著的国家保护法不感兴趣，虽然他明明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与它相违背的。“这只是一项暂时的法律”，他坚定地说，“这是一个阶级用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扫除的法律。”检察官指控他无中生有诬告警察以便把自

已打扮成为殉道者，从而“从莫斯科捞一笔钱。”对此布罗兹回答道，他个人并不因为害怕而不敢讲话，因为他知道，说与不说都将被判处长期徒刑；其他被告不敢说出真情，是希望由此获得宽大处理。

9月9日进入最后辩论发言，布罗兹谢绝了辩护顾问的代劳，自己开口讲话。他从自己的身世讲起，说明他怎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法官不许他讲下去，演说没有作成，也一直没有记录下来，但其要旨必然收集在他对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和其他人所写的他早期生活的记载之中。当法官打断他的演说时，布罗兹转向审判庭，高声喊道，“这就确切地表明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共产国际万岁！苏维埃革命万岁！”11月14日对被告进行宣判：两名获释，两名判两年徒刑，一名三年，约瑟普·布罗兹被判五年。他戴着手铐被带走时，仍不断高呼共产主义的口号。

很明显，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加重了他的判决，但他为什么那样蛮干，那样挑衅呢？这倒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答案是复杂的，包含着有意识的和下意识的动机，也含有本能的反应，很难说有多少成份是出于野心。他刚刚在党内获得要职，长期坐牢后能否再回到举足轻重的职位上来就难以逆料了。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还很天真，对于国家如何行使权力没有经验，可能还具有自我表现和浪漫主义心理，接受了共产主义宣传，相信世界上非白即黑，非善即恶。象两年前对巴卡里奇法官那样，他又在法庭上对法官讲，“我准备受罪，还有人得准备牺牲性命。”很可能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全部动机；他在其后的年月里对这段故事所作的相当英勇的解释只是事情的一面——可能是真实的一面。“我们应向党表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足以自豪的和光荣的，党无愧于党员对它的忠诚和献身，为它坐牢是值得的。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献媚

或假装尊重警察和法庭以求轻易解脱。”他后期关于自己在这时期的态度，还讲过另一番话，看来也同样真实——这段话说明他已受到一种强烈的雄心的驱使。“我是以一种纯属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整个这一问题的。我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他们抓到我就要把我关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要处在他们的地位，⁹¹也会这样干。说真的，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时，也真有心这样干。”〔注19〕

布罗兹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长期徒刑将产生什么后果，但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徒刑救了他的性命，使他免遭1929—1932年期间南斯拉夫国内对共产党所采取的野蛮的，某些情况下是致命的措施之苦，也逃脱了三十年代斯大林对在俄国的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员所施行的更加狠毒的灭顶之祸。

他的五年监禁是在两个监狱里度过的——先是1929年1月至1931年6月在故乡扎果烈边境的莱波格拉瓦监狱；其后直到1933年11月是在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监狱。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受教育的时期，从“教育”这个词的每一层意义上来讲都恰如其份。“监狱对许多我们的人来说，真是一所大学，……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坐牢的时间，……正是在这里我获益最深。”〔注20〕“这真如同上大学一样”，他后来在谈到他在这两所监狱里所参加的共产主义学习班时这样说过，这种说法也可能略有一点想入非非。但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有足够的闲暇进行阅读的最长一段时间，而且，尽管有种种限制，他还是能够弄到许多要看的书。

从在莱波格拉瓦拍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来，他的同狱犯人是一个大杂烩，但他是政治犯，大部份时间与刑事犯分开，所以在两所监狱里都能找到在政治方面既有爱好又受过教育的人们，扩大他那迄今一直处于饥饿中的知识生活。但他那时正与各种类型的人物相处，失去人性的监狱生活（时而略强、时而更差，随条

件而异),使最变幻多端的人类性格与情绪更加尖锐复杂地互相作用。在这方面,这对他后期的生活是一种较之任何学术性大学更有价值的教育。这也是一种政治教育,因为狱中的犯人之间仍继续存在仇恨,虽然他日后关于狱中生活的浪漫记述中不常提到这些事。他有两个时期条件很艰苦,那就是在这两处囚牢里的最初几周:伙食之差令人作呕,面包粗劣,萝卜甜菜汤又稀又酸,豆⁹⁵汤里“根本没有豆粒”,一周两次牛肉,一次一小片;几乎没有体育活动,二十四小时中倒有二十三小时蹲在一间小房子里。他在莱波格拉瓦的第一件烦人的强迫劳动就是洗鹅毛;而在马里博尔单独监狱的头几周中连这点消遣也没有。人在这种时期需要极度的自我克制才能避免心灵上和精神上的堕落。布罗兹十分坚强,得以平安渡过。他在两所监狱里都因为有机械师的技术而被安排负责监狱里的电气系统,得以摆脱这种苦难的折磨。

党内杰出的知识分子莫沙·皮雅杰在布罗兹之后一年转到了莱波格拉瓦监狱。他自1926年起一直被囚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米特罗维察政治犯监狱,二十年徒刑已服满五年。他和布罗兹一见如故,成了终生知己。两人在许多方面互不相同,但对共产主义的献身却同样狂热;他们互相差异,取长补短,关系更加牢固。皮雅杰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曾在巴黎和维也纳受过教育。他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布罗兹对此很羡慕,并感到在一个分划为阶级的社会里,自己由于出身低微,而无缘问津是不公正的。布罗兹则具有对皮雅杰来说是高不可攀的工农出身。在党内,知识分子是不吃香的,虽然为党的最高层提供了许多人才。理论上,工人阶级是精华,但在南斯拉夫,他们之中却没有多少人能吸收。1928年11月于德累斯顿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当时名为埃尔柯里)曾警告说,“知识分子易于接受他们所出身的资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关键时刻总是犹疑不定。他们必须有自知之明。他们必须自我改造，适应工人阶级，必须顺从工人阶级。他们不得领导工人阶级而把其他阶级的影响带进它的行列。”皮雅杰确有自知之明，他变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幕后参议”。“我能遇见一个多少年来难望得见的第一流的工人革命家，感到很兴奋，”他日后谈到初次与布罗兹相识时这样说⁹⁸过，并补充说布罗兹“很乐于有人和他交换交换意见。”〔注21〕

皮雅杰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布罗兹永远比不上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两个人都有强烈的幽默感（偶尔也说些粗话），皮雅杰同样头脑敏锐，言辞锋利。他仰慕布罗兹的实际工作和广泛结交的本领，这都是在狱中和在党内进行领导不可缺少的才能。皮雅杰比布罗兹大两岁，俩友人站在一起，皮雅杰身高五英尺，而布罗兹比他高出八英寸。真是很不相称的一对。莫沙·皮雅杰很可能是对布罗兹的政治生涯影响最大的人物，虽然他在其后的岁月里从未说起他在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性格的形成上起过这种作用。而布罗兹本人，谈起一切密切的私人交情时惯常沉默寡言，对此只说过这是一种深厚的亲密的关系，仅此而已。

布罗兹选择了皮雅杰当管理监狱电站的助手。这时，政治犯已通过绝食和威胁要绝食从当局争得相当大的让步。在监狱旧有那部份（原是保罗教修道院）犯人相对来说自由一些。他们住一间大宿舍，有一个委员会处理自己的全部事务，布罗兹和皮雅杰都是它的积极成员。布罗兹负责管理供电，可以在监狱里到处走来走去，有时甚至可到狱外去。他后来说过如果他有心要逃，完全可以逃掉。他没有这样做（也许是有意识的）是很明智的，因为在那些年代，就多数共产党员来说，在外边要比在黑头糟糕得多。

委员会为监狱里的许多年青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及时建立

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既学习共产主义的理论、实践和历史，也学习读和写。这些学习班都利用下午和傍晚犯人们的空闲时间。参加的人员要求遵守纪律，他们每周都有教课，学习和注意其他犯人的任务，并要向委员会报告。他们与狱外的党组织和朋友们⁹⁷建立了联系，以便取得图书和其他必需品。布罗兹作出安排，在监狱外一家饭馆楼上与联系人接头。他以前认识的那位医生巴维尔·格里戈里奇就是联系人之一。这位医生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去会见布罗兹，在楼上等了一个小时。接着，通过窗户，他看到布罗兹由四个看守跟随着跨过大街走了过来。布罗兹锁上房门办理事务，看守就等在楼下。〔注 22〕用这种方式同布罗兹接头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当交通员的年轻的女校长。

有个犯人逃跑被抓了回来，告发了共产党人的活动，这种舒舒服服的安排突然告终。布罗兹和其他四个犯人在 1931 年 6 月被解往严酷得多的马里博尔监狱。后来，皮雅杰又被送回斯雷姆—米特罗维察，在那里继续组织政治活动，直到 1939 年获释之时。

在马里博尔监狱里，布罗兹遇到了另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名叫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他服徒刑是因为参加了一个恐怖组织，1921 年前内务大臣德拉斯科维奇被暗杀，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干的。头几周情况很艰难，但这之后他们还是把这里的政治犯组织了起来，尽管生活条件仍旧很困难——伙食糟糕，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灯，臭虫捉不胜捉。乔拉科维奇讲起这个时期的布罗兹时，说他形容消瘦，面无血色，一身囚衣。活象个苦行僧。还说他很少笑出声来，但不笑则已，一笑纵情。〔注 23〕有一张布罗兹在马里博尔拍的非正式囚照，没有戴早先那些照片上戴的那副破旧的钢边眼镜，而是戴着夹鼻眼镜，表现出他的苦行与超脱。看来他还是十全十美地扮演着命运在他自己选择的领域内

为他注定的角色。但他势必间或也弛而不张。乔拉科维奇记述了一些欢乐的夜晚：他们围坐在一只想方设法弄到的旧铁火炉四周，四个人合抽一支香烟，自称“资产阶级”；还有些礼拜天，布罗兹大谈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犯人们得意的话题。再有些夜晚他们组织音乐会，先唱国际歌，接着唱革命歌曲，最后就唱起小调来，开始还较柔和，后来就放开嗓子合唱，直到警察赶来喝⁹⁸止他们。

他们在这里也继续办政治学习班。犯人的劳作是做纸袋。他们实行流水作业，省下了时间和材料（纸、胶等）用来裱糊、伪装和装订马克思、希法亭、恩格斯、罗莎·卢森堡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具有象征性重要意义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此外，布罗兹还有他个人的阅读书目，包括哲学、心理学和历史书籍，继续他的自学。

1933年11月他刑期满时得到通知，他还得补服1927年被判徒刑的剩余部分。狱外联系人——他的老朋友大特洛伊斯特沃人斯提沃·萨比奇这时在一个专门援救在押共产党员的组织“红色援助会”工作，供应了他一笔钱。他离开马里博尔前定做了一套衣服，买了一双好靴子，被带往奥古林去坐最后的三个半月牢。

第二部份

逍遥法外的 共产党员

90
100

逍遥法外的地下共产党员

101

1934年3月12日，约瑟普于四十二岁生日前不久出狱。他更成熟，更富有经验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比以往更坚强了。他后来说，他的信念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甚至使他无法抗拒。他现在远不象1928年时那么鲁莽，对他所反抗的国家权力已经更加了解。他不再相信革命即将来临，然而却准备为实现革命贡献毕生精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离开阴森的、有圆顶塔楼的奥古林城堡监狱时，仍然不是一个自由人。有一个看守跟着他到当地警察所报到。警察所告诉他，不得在萨格勒布或任何其他城镇居住，必须回故乡去，并且每天要向警察当局报到。关于获释后如何行动，他已事先做了安排。他通过用暗语写便条的方法和奥古林监狱中同情共产主义的其他囚犯保持着接触，曾把他在萨格勒布的姨母的住址告诉其中一个名叫尼古拉·齐卡拉的人，以便日后联系。^{〔注1〕}他没有家眷，党已在1929年把他的妻儿送往莫斯科。但他盼望看看自己的老家，于是前往库姆罗维茨。

他在莱波格拉瓦制备了一套新装——衣服、鞋子，相配的领带围巾，这使他在村里出现时颇为体面。这次回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因为哥哥德腊古廷新近去世，嫂子正在服丧。村里的朋友们见到他虽然很高兴，而且对他胆敢反抗官府颇为佩服，但却不愿和一个政治反叛者发生牵连。他向乡主席报了到，这是

一位他在学生时代的老朋友，比起附近镇上的警官来当然好对付了。铁托后来讲的情况，与这位名叫约瑟普·朱拉克的主席所讲的¹⁰²虽然不尽一致，但两人都说到，把门关起来后，朱拉克便对他受审时的漂亮表现表示祝贺，同时向他表明（铁托回忆说，“用眨眨眼睛的办法”。）用不着天天去报到。〔注2〕

他在库姆罗维茨只停留了几天——这段时间已足够使他习惯于自由、新鲜的空气、正常的食物和正常的社交往来，可也使他听够了村里牧师的斥责：“反基督分子”。他到苏特拉河对岸的斯洛文尼亚探望了亲戚，童年时期他曾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一段时光。他在监狱里时曾非法私藏一箱书刊，3月底前，他把它运到萨格勒布的姨母家，在天花板上藏了起来。这些书刊里有若干本1933年的《文化》，1932年的《文学》，几期《信号报》和《作家》，以及若干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些东西全在次年被警察当局根据一个再度被捕的囚犯的口供发现了。4月份他去萨莫博尔探望了妹妹，然后前往萨格勒布。〔注3〕

他从村里消失后，警方立刻发出了逮捕状。但这时约瑟普·布罗兹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决心转入“地下”，为了改变自己的面貌，他已蓄须染发，戴上一副金边眼镜。用眼镜来化装，对他来说并不是个新主意。除了1928年警察当局给他拍的一张照片外，在所有现存的约瑟普·布罗兹作为囚犯受审时拍下的照片（包括一幅在法庭受审时的速写）以及他服刑时在狱里拍下的几张快照上，他都戴着各式各样的制作粗劣的眼镜。有一张照片上他戴着一副通常只有中产阶级人士才戴的夹鼻眼镜，这完全改变了他的外貌。对这个正受警方查缉的人来说，戴眼镜是否有某种心理作用呢？他视力极好，而且不戴眼镜他的外貌也伪装得不错，这从他那些伪造的护照上的某些照片可以看出。但眼镜对他是有实际用处的，尽管不是在提高视力方面；因为有了眼镜，他就可以

避免直盯盯地看人——对于怕被人认出的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此外，他还把胡须刮得溜光，穿上比较讲究的衣服，改变了头发的颜色，同时由于饮食改善，他那苍白的脸上逐渐显出了血色，这一切都使得他的整个外貌变化更大了。

※ ※ ※

如果说，1934年铁托与萨格勒布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时已是¹⁰³一个变化了的人，那么，他周围的世界，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已大不相同了。1929年1月6日起，国王亚历山大对国家实行个人独裁，不仅在全国各地禁止有组织的反抗活动，而且取缔了一切政党、独立工会，以及许多期刊和会社。国家安全法赋予警察部门广泛的法律权力逮捕政治嫌疑犯，并允许他们自由行动消灭有反对国王政策嫌疑的人。拉迪奇死后担任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的马切克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都蹲过监狱，（塞尔维亚）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亦然。反对国王的塞尔维亚著名政治家斯维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和其他一些民主主义者则被迫流亡。〔注4〕

警方对共产党采取的手段特别凶残。共产党不同于克罗地亚农民党，并非一个民众运动所享有的那种群众性支持。但它仍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那样，是在国内各地都有人拥护的唯一政党。它不仅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有党员，在塞尔维亚也有党员。

亚历山大实行独裁统治的时期正值全世界经济萧条。南斯拉夫本来已几乎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这次经济萧条对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注5〕当布罗兹蹲在监狱里，每天至少肯定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免费食物的时候，南斯拉夫人民正经历着一次最严重

的经济困难。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十七，工资却下降了。有百分之三十三至百分之四十的工人失业，其中只有大约半数能拿到失业保险金。失业大军的存在和罢工就是搞政治颠覆的说法，使工业部门的雇佣条件更加恶化。农村里，农民向国内市场出售食物获价极低，而又不能出售谷物以供出口。他们不得不以不近情理的高价¹⁰⁴购买所需的任何工业品——农具、肥料、家用器皿、食盐和燃油。借款是困难的，而且利息太高。在最糟的几年里，在那些土地贫瘠、生活艰难的地区，如克罗地亚利卡的不毛之地的水蚀石灰岩地区，以及门的内哥罗光秃秃的山区，据说农民所拖欠的利息竟达其每年收入的四倍。情况无可忍受，然而却必须忍受；城镇遍地乞丐，大小村庄里住着的老幼妇孺，骨瘦如柴，疾病缠身，饿得半死。由于政治经济局势太坏，从1929—1932年人们意志消沉，无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注6〕

这几年里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也趋于恶化。除国内困难外，国王亚历山大还必须面对敌对邻国难解难消的仇恨。南斯拉夫国家成立时曾被迫割地的国家仍想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墨索里尼这时已在意大利站稳脚跟，并在欧洲得到承认；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也已在德国掌权。墨索里尼的扩张政策，以及希特勒修改凡尔赛条约的企图使得南斯拉夫的地位较之二十年代更加岌岌可危。如果意大利在达尔马提亚的领土要求，奥地利在卡林西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领土要求，匈牙利在克罗地亚的领土要求，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梅托希亚的领土要求，以及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领土要求全都得到满足，南斯拉夫国家就将不复存在了。

亚历山大企图制订一项既能使他获得强有力的朋友和盟国，又能防止敌国联合的政策。但到1930年时已难以在列强中找到这样的盟国。经济危机已迫使英国象美国那样退而采取不插手欧洲的政策。南部斯拉夫人的传统支持者俄国。如今已成为苏联，成

为一个反对亚历山大的统治、而且绝对得不到他的承认的国家，因为他仍然热烈拥护沙皇制度。国际联盟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有足够力量保护弱小国家的国际机构。只有二十年代选定的盟国法国是唯一可能有用的强国。从1930年到1934年，亚历山大国王企图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但这点很难办到，因为法国需要一个反对德国的盟国，为此正在拉拢意大利；而南斯拉夫却是需要一¹⁰⁵个首先反对意大利的盟国。这两种立场是不相容的，因此到1934年，亚历山大国王只和法国订了一个友好亲善条约——不是军事同盟；又和同样受到主张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匈牙利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及罗马尼亚结成了小协约国（1933年）。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29—1934年间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布罗兹入狱以前共产国际所要求执行的武装起义政策（这正是害得他蹲监狱的行动的^{部分}原因）还继续了一段时期。这种政策使共产党在与警方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损失了一些党员，并使人们不敢加入共产党，虽然这时总的形势本来可能使人们寄希望于共产主义。

1928年11月初，在德累斯顿举行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二名南共党员。共产国际一直希望结束南共党内的意见分歧，这次派来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西马·马科维奇（他起初号称“第一号同志”，后来成了“第十号同志”）再次顽强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如今共产国际的大队人马都反对他了。他受到大部份代表的谴责，特别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团中的意大利共产党人陶里亚蒂在一篇长篇发言中的谴责。马科维奇象征性地表示服从，但并未改变他的观点，因而次年被开除出党。在共产国际官员们施加强大压力后，选出了一个新的组织书记，这就是新近曾在莫斯科一个训练班学习的久罗·贾科维

奇。

仅在几个月后，由于警察活动开始加强，贾科维奇于1929年4月在克罗地亚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共产国际红色援助会的一个官员（N·赫西莫维奇）。他们两人都被警察杀害，据说是因为企图逃跑。〔注7〕接着还逮捕了另一些人。据铁托说，“有一千多名党员被警方逮捕，其中有数十名遭到杀害。”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潜逃出国，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与流亡国外的中央委员会汇合。¹⁰⁶ 党已经支离破碎了。只有少数小组和个人还设法互相保持着联系。有些传单仍在继续流传，其中大部份字体漂亮，纸张高级，显然是在国外印刷的。但它们的主旨和以前一样不现实，仍然主张武装起义和极端政策，仍然反南斯拉夫，号召拆散这个国家。有一张传单写道：

“不要纳税，不要还债；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的、斯洛文尼亚的、马其顿的和门的内哥罗的工农独立自主共和国万岁；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邦万岁；苏维埃巴尔干各国万岁；打倒好战的法西斯专政；打倒血腥的君主制度；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共产国际万岁。”

许多年后，铁托谴责了这些领导人。他们在这一时期“做出不负责任的愚蠢决定，使得为数已经很少的党员和青年团员遭到大屠杀。他们英勇就义、昂首入狱，为了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荣誉称号，亦即为了服从党的纪律而抛头颅、洒热血。”（注8）

到1932年，警察当局的恐怖行为有所减轻，已经可以做出努力重新开展党的活动，不过流亡国外的领导人仍不敢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1932年任命了新的南共总书记。这就是米兰·高尔吉奇，铁托后来的政治领导人。他的真名是约瑟普·齐任斯

基，出生于以前属奥地利帝国波兰部份的一个乌克兰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父亲在波斯尼亚任奥地利政府官员，他就在这里长大。还在学生时代，他就是激进政治组织“姆拉达波斯纳”中的积极分子。战后他成为共产党员，1923年出席了一次在维也纳召开的青年代表大会，在这里他的才能受到共产国际官员的赏识。他被邀请到莫斯科，在共产青年国际组织中工作。他会说塞尔维亚语和德语，后来又学会了俄语、法语和英语。他和一个名¹⁰⁷叫贝蒂·格兰的俄国姑娘结了婚，她是莫斯科文化休息公园主任。

他在共产国际中升迁很快，逐渐被视为南斯拉夫事务专家。1924—1926年间的某一时期他曾被任命为英国共产党顾问。他被派到南威尔士，在失业工人中开展党的活动；旅途中他用一张假护照，又穿着华贵的衣服作伪装。他被安顿在一个矿工家中；看到这家极穷，他一直不敢打开包裹取出丝质睡衣。1927年他回到莫斯科，被任命为南共中央委员。次年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政治局。四年后他成为总书记时，还只有大约二十八岁。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对他印象很好，其中马努伊尔斯基和布哈林两人是他的朋友。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却从不喜欢他，部份的原因是他不是真正的南斯拉夫人，部份的原因是他很少去南斯拉夫，因而给人一种印象：他对南斯拉夫局势毫不了解。一个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他是个大胖子，已经开始发福，长着一头漂亮的淡茶色头发，眼睛淡黄，脸上有雀斑。他穿着花呢料服，棕色靴子，看起来象个有钱的商人，也就是中欧人眼中的“典型英国绅士”。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讨人喜欢、通情达理、易于共事的人，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党在许多问题上出了毛病，以致他的同事们终于对他不信任。人们认为他不过表面聪明，并不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有玩弄花招和搞阴谋诡计的本领，

这就使他能在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中青云直上。〔注9〕

然而在1932年，他却满怀成功的希望。他得到大量经费，共产国际又给他指示，要求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政策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重新站立起来。当时获知，一些分散的党小组已在南斯拉夫某些地区开始恢复政治活动。高尔吉奇必须设法与这些小组取得联系，把它们组织成一个党。他被要求在各地建立党委会，召开党¹⁰⁸代表会议。虽然这时还没有取消武装起义政策（直到1934年某些传单仍在这样宣传），但新的计划是通过合法组织以及这时允许合法存在的团体开展工作，前者如没有象独立工会那样受到取缔的民主工会，后者如体育、戏剧和音乐俱乐部。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人民阵线的政策的发端。

国内党员为数仍然很少——克罗地亚有四百人，斯洛文尼亚有三百人，门的内哥罗有一百五十人。塞尔维亚党员数目不详，因为那里仍有西马·马科维奇的支持者，正进行反对新的组织体系的活动。1932年，上述党员数目再次减少，因这时南斯拉夫警察当局弄到了足够的情报，又逮捕了許多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但后来由于一些早先被捕的较为杰出的共产党员服刑期满出狱后重新工作，情况就好转了。〔注10〕

这就是1934年初约瑟普·布罗兹出狱时的局面。通过一个供应共产党人非法书刊的小书商斯提凡·加罗加扎，他和党的干部重新建立起联系。关于他刚出狱时的政治地位说法不一，但没有根本性的差别。铁托曾对戴迪耶尔说：“当我到萨格勒布开始工作时，同志们选我当克罗地亚党的领导机构省委员会的委员。”另一种说法是，这只是一种重新任命，因为他在1928年被捕时就已经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铁托和他的早期传记作者谈论他出狱初期的活动时说话极少，但从1935年被捕的一个共产党员给警察当局

的长篇供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和布罗兹开始进行工作的方式。此人名叫弗朗约·克拉里，他叙述了布罗兹如何于1934年7月与他联系，要求他为党工作，给他报酬。虽然他当时失业，全家正在挨饿，但由于有危险，他仍然拒绝了。八天后布罗兹再次与他见面，答应每月给他六百第纳尔的津贴。克拉里于是同意了，开始和布罗兹以及另一个名叫勃列佐维奇的共产党员一起工作。他们的职责各不相同，勃列佐维奇与各地方党委会联络，克拉里和各工会团体一起工作，而布罗兹则是书记兼“技术部”的联络员。“技术部”是党组织联络站的名称，为非法活动提供金钱、护照和官方证件。克拉里说，从1934年7月至10月他曾和布罗兹见过几次面，后来给他换了一个联系人。这是一个妇女，其姓名他不知道，“约二十八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白皙皮肤，金发碧眼，非常漂亮。”她继续给他钱，11月份额外给他四百第纳尔，作为一笔专门开销。1935年2月，在把克拉里介绍给下一个不知姓名的联系人后，她也消失了。这是一个男人，“个子很高，长长的苍白的脸，外表象个知识分子。”这个人给了他一个密码写的地址，用它可以和他在卡尔洛瓦茨接头，但克拉里说他遗失了密码索引。他于这年12月被捕，不过布罗兹主持的是一个只有三人的小组，这就意味着他能给警方提供的情况有限。〔注11〕

现有一些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说明布罗兹出狱后不久就成了一个积极的党的组织工作者，并获得了开展工作的款项，克拉里的供词证实了这点。各种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1934年萨格勒布党组织境况不佳，很难和维也纳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因为“警察抓住了中央委员会派来的每一个人，……甚至有人建议切断与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满怀信心、渴望工作的布罗兹必然被当作从天而降的救星。萨格勒布党组织决定派他去维也纳，“看一看形势如何，有没有可能和中央委员会一起开展工作。”行前他给萨格

勒布大学的一个党小组写了一篇论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又在斯洛文尼亚度过一段短暂的时间。6月初他在卢布尔雅那稍事逗留，住在一个青年共产党员鲍利斯·齐赫尔利的公寓房间里。现在人们提到这时的布罗兹，都称他为党所委派的“指导员”。这期间大家都叫他“鲁迪同志”。他行动十分谨慎，但偶尔也和当地的共产党员会面，其中一次他会见的那个人就是后来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重要人物的谢尔盖·克赖格尔。布罗兹在这次会见中衣着讲究，戴着金边眼镜。他一面进行新的接触，一面等待维也纳的指示。他收到的指示是用密码书写的，必须借助于几份党报——《无产者》报来进行翻译。〔注12〕

他决定伪装成斯洛文尼亚登山运动协会会员越过南奥边境，他们获准登阿尔卑斯山探险，并可进入奥地利一小段距离。由于他会说斯洛文尼亚语，这个办法似乎比用过去时常被警察认出来的假证件安全。布罗兹虽然体力甚好，但不熟悉山路，不知从哪里进入奥地利才能躲过边防人员，因而不得不雇当地一个靠偷带人员货物过境为生的人当向导。这次行程用了一整夜，事实证明不但艰苦，而且危险，因为向导喝醉了酒，根本不可靠。他不仅硬索走比原定的三百第纳尔（这个数目已经不少）多一倍的钱，而且未到达边界就把布罗兹丢下走了。他只好独自寻路。当他跌跌撞撞地走完最后一段石坡时，裤子也撕破了。侥幸的是，他一下来就到了边界上奥地利一侧的一个小村，村里住的是斯洛文尼亚人。

即使如此，他于1934年7月25日到达时也不是没有出事。他躲在一所干草棚里睡了一觉，然后向村里走去，打算坐火车去维也纳，却被身佩卍字徽章的亲纳粹的奥地利乡防军武装青年拦住了。这一天，陶尔斐斯^①在维也纳遭到暗杀。但是布罗兹那一

^①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年）1932年起任奥地利首相，1934年7月被暗杀。——译者

身度假游客的装扮（登山靴和帆布背包一应俱全）产生了效果。结果他走掉了，在克拉根福坐上火车去维也纳。〔注13〕

和他在维也纳接头的党的联络员是一个芭蕾舞学员，是萨格勒布一位医生的女儿。她给他找了个房间，又帮他和中央委员会联系。中央委员们见到他很高兴，因为他们渴望了解南斯拉夫局势，以便向莫斯科报告。他们“象蜜蜂见到蜜一样”（恰如布罗兹本人借一句俗语所说）向他扑将过来。他能言善辩，熟悉情况，努力工作，足智多谋，驯顺、勇敢，出身工农，又受过牢狱锻炼，¹¹¹看来正是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理想人物。这一时期在维也纳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表明，他参加了8月10日、11日、13日、16日和18日的会议，记录上他的名字是假名铁托。他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字和化名，包括鲁迪、斯皮里顿·梅卡斯、约翰·亚历山大·卡尔逊、奥托、维克托、提莫、格奥尔盖维奇·吉里切克、斯拉沃科·巴比奇、托马涅克和伊凡·柯斯塔因谢克；他去莫斯科时用的名字是瓦尔特，他和共产国际的全部通信都用这个名字，斯大林也总是这样称呼他。铁托是他在南斯拉夫用的名字，这个名字终于闻名于全世界。他本人说过，铁托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在他的故乡扎果烈这个名字与文学有关罢了。〔注14〕

他在中央委员会机关见到了米兰·高尔吉奇和一些南共领导人，这些人和他一样在南斯拉夫坐过牢，然后到了维也纳。他们叫他先写几份关于南共在国内的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就是高尔吉奇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基础。当时决定要在斯洛文尼亚举行一次党代表会议，铁托奉命指导准备工作。他给萨格勒布自己所属的党委会写了封信，把在维也纳见到的情况告诉委员们，并说他已被增选入中央委员会，这就使他自然而然地在克罗地亚党组织内获得了一种权威性的地位。他在这封信上签的就是他的新名字。

8月下旬，铁托用与来时相同的方法回到南斯拉夫。8月30日

他从萨格勒布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个报告。9月上半月，他大部份时间都在斯洛文尼亚为代表会议进行安排。9月13日他又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个报告，说他未能参加在萨格勒布举行的一次会议，因为当地情况太危险，他不敢停留三天以上。他又说他已经给斯洛文尼亚党的领导机构任命了几个新成员：三个工人和两个知识分子。9月中他重新回到萨格勒布，写报告说，在见过的大约五¹¹²十个人中，他认为只有一个人适合任当地党委委员。高尔吉奇和他的同事们显然认为这未免过于挑剔了。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工人们是否绝对正直，是否非常忠实和有经验。根据目前党员情况，党组织不能对拥护自己的人们要求过高。”〔注15〕从警察当局保存的共产党员供词记录来看，铁托物色对象持谨慎态度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极少数狂热分子被捕后能拒绝招供。

除了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考虑外，铁托还接受了一种正统观念，认为作为党员材料，“工人”比“知识分子”要好，因此党必须以工人为基础建立领导机构。正如铁托本人发现的，在南斯拉夫实行这个主张极其困难。南斯拉夫工业不发达，与其他社会集团相比，工人数目甚少。他自己后来也从那些被拐弯抹角地说成并非“知识分子”的人中挑选了很大一部分领导人。农民这一最大的社会集团中并没有产生多少领导人，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也没有产生多少共产党员。

铁托筹备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党代表会议于9月15日至17日举行。这次会议约有三十名代表参加，是旨在表明党又开始活跃的一系列地方性党代会中的第一个，在组织上也是最隆重最大胆的一个。这次会议有个不寻常之处，它是在卢布尔雅那西边约七英里处天主教主教罗兹曼的一所乡间别墅里举行的。之所以能在这里开会，是由于主教的异母兄弟是个共产党员。兄弟俩吵了架，罗兹曼把他弟弟赶到乡村。铁托写道：“大约三十名代表，包括我

自己，出席了会议。会议开了两天两夜。所有代表都在这所邸宅里食宿。主教的弟弟在宽敞的餐厅里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桌布雪白，玻璃杯晶亮，盘上印有主教的纹章。他亲自在桌旁照料，一面不断骂他那个主教兄长。”〔注16〕

这次代表会议的目的是使党在斯洛文尼亚重新活跃起来。爱德华·卡德尔，博里斯·基德里奇和后来成为南斯拉夫驻英大使¹¹³的青年共产党员约瑟普·布里莱伊在发言中论述了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分析了过去的错误，探讨了将来的组织工作。铁托本人发表了一篇关于总的思想理论问题的演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单独取胜，而必须同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由于采取人民阵线政策而得以加强。选举斯洛文尼亚党委委员时，卡德尔和基德里奇都因太为警察当局所熟悉而未入选。实际上他们已得到去莫斯科受训的命令。

在这次会议上，铁托第一次同爱德华·卡德尔认识。克赖格尔几天前曾向卡德尔简单介绍了铁托的情况。〔注17〕卡德尔几乎比铁托小二十岁，但两人十分相投。此后三十年内，两人在党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在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战后在国内国际事务中）都将联系在一起。铁托此时正在物色他能够信任和与之共事的人。头几次会面后，铁托便断定这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好学而沉静的卡德尔是一个“忠实的革命者”，“没有受到宗派主义的腐蚀”——这就是说，他能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铁托一样，卡德尔也蹲过监狱，在狱中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很有几分教师的气质，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捕时，正在师资班受训。多年之后，他将成为南斯拉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解释的发言人，从而使他对教学和哲学的爱好得到满足。但在1934年时，比他受过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大家知道他被捕后虽曾备受虐待，却没有向警方招供。

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铁托回到维也纳，出席了9月23日、25日、10月1日和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然后又回到南斯拉夫。这次在维也纳停留的短时间里他写了一些报告，论述共产党员在监狱服刑期间的义务，以及党报必须刊登哪些种类的材料。

114 他和高尔吉奇一起就特尔博夫列煤矿罢工行动问题起草了一封给斯洛文尼亚党委会的信件；他还被要求写文章论述在共产党员中开展反对军国主义化的工作以及在工会中开展工作的问题。^{〔注18〕}除了写报告的才能外，铁托还成了“秘密活动”（在非法状态下工作和往来旅行的技巧）的专家。这种生活提出的挑战和包含的危险似乎使他意气风发。责任和权威已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而顶着掩护非法政治活动的种种化名，假装发迹的工程师和商人以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对他似乎是一种乐趣。

他的新生活给了他相当大的个人自由，服从上级只不过是为此付出的小小代价。从他这一时期写的东西来看，他已掌握了共产党行文的老套子。他已学会了写任何党内文件和党内通讯所必需的那种公式化语言。写这些东西必须使用苏联当时习用的某些词语，其中许多直到今天仍为共产党人所沿用。由于不断重复，这些词语成了陈词滥调，对于局外人几乎毫无意义。但共产党内部的人却知道它们的确切意思。它们具有宗教仪式般的力量，形同教义。这就使写作容易得多了。社会是划分为“资产阶级压迫者”和“劳动群众”的。南斯拉夫政府是“好战的法西斯专政”。^{〔注19〕}苏联是“世界和平和弱小民族的保卫者”，有时被称为米尔诺耶·麦斯托——和平之乡^①。驯服而积极的党员是“党的最好干部”，党外支持者是“进步分子”。党内工作包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亦即党内那些闹独立的、好争

^①这是俄语мирное место，意为和平的地方的音译——译者。

论的、不顺从的人，这种人南斯拉夫很多，形容他们的表现也有许多词语，他们是“宗派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异端分子”、“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碍事分子”。然而，尽管这种语言夸张做作，表达的意义却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现实情况：政府从任何标准来说都是压迫性的、反民主的和腐败的，共产党员一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斗争，知道如果没有¹¹⁵外援，斗争目标便无法达到，而外援似乎只能来自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他们连生存都不可能。

※ ※ ※

1934年10月4日，铁托于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立即从维也纳回到南斯拉夫。他在萨格勒布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于10月9日回到卢布尔雅那。这天晚上，他给中央委员会起草一份关于最近举行的党代会成果的报告，特别谈了特尔博夫列矿工中的情况。他还谈到非法越过斯洛文尼亚—奥地利边界的门路和方法，这方面他现在已有相当丰富的亲身经验。报告起草未毕（发出的报告上的日期是10月11日）便有人给他带来消息：亚历山大国王于当天，即1934年10月9日，在马赛被暗杀。^[注20]南斯拉夫警察随即在全部边界上采取特别保安措施，并大肆搜捕政治嫌疑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尽管很快就证实：暗杀者是一个马其顿籍的职业刺客，原属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这次则是受雇于一个叫做乌斯塔沙的克罗地亚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得到墨索里尼和匈牙利政府的允许，分别在这两个国家设有恐怖分子训练营。

中央委员会意识到铁托留在南斯拉夫太危险，命令他返回维也纳。他于10月末到达。他这次旅行用的假护照和假签证上写着一个捷克工程师的名字。他举止阔绰，衣冠楚楚，看起来颇象这

么个人物。但证件本身制备仓促，他担心经不起仔细检查。这一次全靠幸运和他的自保本能救了他。在边界上检查护照的关键时刻，他把同车厢一个妇女的婴儿抱来放在膝上。孩子偏在这时撒尿，弄湿了他的新裤子。他的狼狈相引起一阵大笑，分散了检查
116 员的注意力，结果没有仔细检查就在护照上盖了章〔注21〕铁托安全到达维也纳，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到1935年12月中。这期间他于1934年11月19日参加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由于维也纳警方加紧对付共产党而只得在捷克布尔诺举行。他去捷克时用了一张伪造的奥地利护照，上面填的名字是理发师吉里切克。

年青的国王彼得二世尚未成年，保罗亲王作为摄政代为接管政权，严酷的独裁制度有所放松。共产党人开始在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举行小型秘密会议。铁托也着手筹备一次全国性党代表大会。当时认为萨格勒布情况过于危险，因此安排这次会议于1934年12月在卢布尔雅那举行。

铁托早就得知，他将象和他在维也纳一起工作的大部份南共党员那样，被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的共产主义训练。这既是对过去工作的酬劳，也是今后升迁的吉兆。最初是提出把他派往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工会组织(PROFINTERN)，但这将限定他这一生只从事工会工作，而他本人或高尔吉奇对他的前程都不是这样设想。后来取得俄国人同意，改为让他到共产国际巴尔干部，南共中央委员会1935年1月18日会议也决定予以批准。在等待去莫斯科的通知期间，铁托继续为卢布尔雅那会议作准备。这次会议于1934年12月24日和25日举行，地点是齐赫尔利的母亲的公寓住所，亦即铁托早先躲藏过的地方。由于存在着被警方发现的危险，只有十一名代表参加，其中有卡米罗·霍尔凡丁（哈根）、布拉哥耶·帕罗维奇（斯密特）、卡洛·赫多梅尔（奥斯卡尔）、阿道夫·穆克（策纳）和博里斯·基德里奇（这时叫科斯，有时

则叫多布里奇和罗米奇)；卡德尔已去莫斯科，没有出席。铁托和高尔吉奇只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注22〕

这次会议的主要特点是快速和秘密。与会代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指定的，没有时间或机会进行一般性辩论，决定都是一致通过。最近的六年是党的历史上最糟糕的六年，有两年（1930—1932年）党几乎被消灭了。这本来可以归罪于亚历山大国王独裁制度的严酷压迫，但如不进行一番公式化的自我批评，那就不是共产党的做法了。铁托于十四年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领导必须承认一系列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在工会选举中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在地方选举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和不坚定的立场——这就是说，他们抵制了选举。此外，还有乡村和军队工作薄弱，忽略了建立反法西斯反战阵线的工作。”〔注23〕

代表们还听取了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性的若干发言以及一个对外政策总报告。其中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各国可能发动反苏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至于党在南斯拉夫国内的政策，则指示继续全力推翻“大塞尔维亚”专政。会议以一串鼓动性口号结束，但怕警察发觉，不能高声呼喊。口号如下：

“争取面包和工作，土地和自由；反对大塞尔维亚帝国主义，争取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军事犯；争取无条件与苏联建立关系，争取与苏联结成联盟；反对君主政体，争取在南斯拉夫各个部份建立工农苏维埃国家；共产党万岁；打倒好战的法西斯专政，打倒君主政体。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斯洛文尼亚的、塞尔维亚的、门的内哥罗的、波斯尼亚的和伏伊伏丁那的工农国家万岁。”

然后代表们分散走出，踏上积雪的街道，各自提防在回家的路上被捕。

铁托在维也纳参加了中央委员会 12 月 29 日和 1935 年 1 月 10 日的会议。分配给他和基德里奇的任务是在青年中开展党的组织工作，这项工作直到目前为止一直比较薄弱。离开维也纳之前他还经历了一件使他感到狼狈的事：他的女房东的女儿偷了雇主的¹¹⁸钱被发觉，打开煤气想自杀。警察到来时铁托说明他不过是个房客，然后就收拾起文件和东西赶紧溜掉了。几天后，他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出狱后十一个月来的成绩不无得意之感的心情，于 1935 年 2 月中出发去莫斯科。〔注 24〕

第六章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受训

119

在铁托的生涯中，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是一个大跃进。与上次他去俄国相似，这件事对他的性格和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他心中播下了幻灭的种子，这倒不是对共产主义本身，而是对苏联领导的许多做法和政策感到幻灭，正象在他以前到来的许多政治流亡者那样。

铁托到达莫斯科时，正值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开始。大清洗的目的，首先是消灭苏联共产党人中斯大林的政治上反对者和潜在反对派，后来扩大到清除与反对派有任何关系的所有外国共产党人。对铁托来说，幸运的是在这以前他未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政治斗争发生关系。这次清洗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在1934年12月1日谋杀谢尔盖·基洛夫（现在我们知道是如此，虽然当时只有有关人员知道）之后开始的。1935年初铁托到达俄国时，许多重要的苏联共产党人已经被捕；但这些事件的含意仍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将会影响到共产国际。（注1）

他离开俄国已十五年了，那时的俄国还处于建立革命化国家的令人兴奋而捉摸不定的时期。1935年2月他到达俄国边界，这是个心潮澎湃的时刻。他既怀念过去，又为到达了现存的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对未来的一切希望的总源泉）而兴奋。他对苏联、俄国共产党和斯大林还抱着一种深信不疑的理想主义的态度。

他乘火车穿过波兰，在边境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到达涅戈列洛伊车站。站上一片积雪，气象森严，木拱门上的红字对从外部世界进来的不多几个旅客宣告：“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他¹²⁰有一种自由自在亲如一家的感情。看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他心情振奋；关于乌拉尔的工业大发展和幻想化的乌克兰集体农庄的一派乐观的宣传画使他欢欣鼓舞。^{〔注2〕}这正是他努力的目标，他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国家见到的情景。

莫斯科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新地方。他以前曾到过这个国家的许多其他地区，但却从未到过它的新都。他在高尔基大街卢克斯旅馆五楼得到一个小房间。这是外国共产党人和某些共产国际官员的住处。但如果铁托曾盼望与他那漂亮的妻子波尔卡重聚，那就不免要失望了。虽然有些外国共产党人是和妻子一起住在莫斯科，但家庭生活并不是共产国际下面那一大帮非俄罗斯学生和工作人员的社会的特点。铁托发现，波尔卡在1929年他回国后已跟苏联的新统治阶级中另外的人结合。她不再认为自己是铁托的妻子，任凭他们的儿子无人管教，后来为另一个妇女所收养；但直到大战前夕他们才解除婚姻关系。不过这一时期的文献仍说铁托有个妻子。铁托虽然始终不时去看看儿子，若干年中他一直没有家累，因而有更多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党的工作。^{〔注3〕}

他到靠近克里姆林宫和红场的马合大街共产国际机关报到，听候分配工作。他在这里被分配给一间办公室和一个秘书，然后就在叫做巴尔干地区书记处的部门开始工作起来。这个部门的领导人是德国共产党人威廉·皮克，他的前任是自从1919年匈牙利起义失败后一直住在莫斯科的匈共党员贝拉·库恩。^{〔注4〕}

铁托利用他不多的业余时间参观了莫斯科的名胜——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宣扬共产党成就的许多展览馆，以及文化休息公园；后来又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和集体农庄。他在莫斯科停留的

长时间中只看过两次芭蕾舞——这不是一个严肃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娱乐。他后来说，他在莫斯科时花了大量时间在自己房间和图书馆里读书，监狱里长期的孤独生活已使他习惯于索居独处。〔注5〕¹²¹ 但当他需要和人交往时，尽可以在卢克斯旅馆的住客和在莫斯科的同胞中找到丰富的社交生活。通常有大约三十个南斯拉夫人在共产国际工作，此外则是列宁主义学校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KUNMZ)的住校生，大约七十人或稍多一点，另外还有些人不断来来去去。莫斯科还有若干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侨居在这里的南斯拉夫人总共有几百人。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自己的共产党组织，经常开会。铁托到达后不久在一次集会上作了关于南斯拉夫局势的报告。介绍他时只说是“国内来的同志”。〔注6〕

这一时期侨居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南共的著名人物。除铁托外，还有爱德华·卡德尔、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朱罗·萨拉伊、沃拉依科·贝戈维奇（在共产青年国际工作）和后来成为铁托的参谋长的伊凡·哥什尼亚克。卡德尔正在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学习，同时在给外国学员办的马列主义学校(MLS)讲共产国际史。该校设在沃罗夫斯科加大街二十五号，在这里学习的还有乔拉科维奇、哥什尼亚克和其他一些人。这个学校的学生（约有七百人，属于许多不同的国籍）领八十至一百一十卢布的生活津贴，他们得从这里边拿出一部份交学校住宿费。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和俄国学生通常的生活标准相同，食物粗劣，质量很差，这引起了学校里的英国学生和有些南斯拉夫学生的怨言。

为共产国际从事某些政治工作的人还有弗拉吉米尔·乔皮奇、斯提凡·兹维吉奇和德尤卡·兹维吉奇兄弟、菲力普·腓力波维奇、伊凡·里舍特、格尔加·武若维奇和拉多米尔·武若维奇兄弟、波吉达尔·马斯拉里奇、科斯塔·诺瓦科维奇、布拉哥

耶·帕罗维奇、西马·马科维奇以及不时出现的神秘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慕斯塔法·哥鲁比奇，他后来受雇于俄国人，在贝尔格莱德¹²²的情报机关工作，纳粹侵入后不久被盖世太保逮捕，由于不肯招供，受酷刑而死。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女共产党员有安卡·布托莱茨、卡娜·巴波维奇、安卡·格尔泽提奇、若万卡·霍瓦丁和兹顿卡·基德里奇。所有将给共产国际做国际性工作的外国共产党人，一到达莫斯科就只用假名。铁托总是被称为瓦尔特。据认为，这可以使他们受到秘密工作的训练，并有助于消除他们还保有的任何牢固的民族特性。但在这方面看不出对南斯拉夫人有多大效果。

铁托在共产国际机关或卢克斯旅馆认识的一些著名的有国际地位的共产党人也用假名。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人们给他叫“老爷子”，意思是爷爷。他于一年前在臭名远扬的国会纵火案审判中被纳粹诬陷，但他大无畏地为自己辩护，终于被释放，因而闻名于全世界。德国人除了铁托那个部门的领导人威廉·皮克外，还有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沃尔特·乌布利希，芬兰人有奥托·库恩西宁，有贝拉·库恩，法国人有莫里斯·多列士，意大利人有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西班牙人有何塞·迪亚士，希腊人有扎哈里阿迪斯，保加利亚人有特雷科·科斯托夫和瓦西尔·科拉罗夫，有一段时间里还有英国同志亨利·波立特和帕姆—杜德，美国人埃爾·白劳德和达西。在共产国际任职的俄国要人占据关键职位，但他们高高在上，不可能和来自比较不重要的国家的一般工作人员熟悉。共产国际中与南斯拉夫人关系最密切的俄国人是乌克兰人季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人们指责他一直给斯大林当特务，但他喜欢南斯拉夫人——也许超过他喜欢共产国际中其他国籍的人。他有时的确还曾设法保护某些南斯拉夫人。1935年共产国际

中另外两个俄国要人是格·克诺林和奥西普·皮阿特尼茨基，他俩都是苏共中央委员，后者掌管组织部，这是个关键部门，负责管理外国籍情报人员和外国共产党，并向他们提供金钱〔注7〕

维也纳南共中央决定派铁托到巴尔干书记处工作后，高尔吉¹²³奇给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南斯拉夫人中的一个高级人物乔皮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们也同意由铁托接过这项工作，我们请你做最后决定。如果有事找铁托商量，希望注意让大家对他抱友好态度。请告诉瓦里亚（即菲力普·腓力波维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的南斯拉夫委员——编者），他是一个工人，曾在监狱里度过六年。开始时他也许（在处理日常工作方面——编者）不如有些有经验的知识分子那么熟练。但他了解我们党，他是我们工人积极分子中最优秀部份的代表人物。过一段时间（六至八个月）之后，我们将调他回来在中央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他当作无足轻重的官员；相反，应把他看作不久就要成为党的优秀的（我们希望如此）实际领导人之一的党员。”〔注8〕

高尔吉奇必须事先打这么个招呼，这一事实多少说明了当时共产国际中南斯拉夫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南斯拉夫，铁托已经开始成为小塘里的大鱼了。在莫斯科，主要的问题倒不是这里是否是一个大塘，而是这个地方正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一个人的前程乃至生命在这里都危若累卵。但铁托是善于照料自己的。他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去适应严酷的现实。与此同时，在蜕掉了“富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非法身份之后，他能毫无困难地在个性和外表上都成为一个沉

静而勤勉的党的工作人员；而且，根据他的自述，他显然是极其小心谨慎地开始他的新生涯的。而无论以上述两种身份中的哪一种出现，他都能自然地把自己溶入周围的环境——在独裁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这诚然重要，在此时的苏联也同样重要。

卢克斯旅馆是一个有五百房间的五层楼建筑，为住客备有基本的但是有限的设备。进门凭特殊的通行证，否则不管与守门人多么熟，也不管事情有多么紧急，一概不得入内。上楼有个旧电梯，每层楼都有一条长走廊，走廊两侧是房间。许多房间是相通¹²⁴的，这样，诸如马努伊尔斯基这样的重要住客就可以分配到几间屋子，构成一套房间。而铁托这样的普通住客则只有一个狭长房间，宽度恰好够放一个杂物柜和一个盥洗盆，盆上有冷水龙头，它们都在入门处。除此之外，室内还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

其他盥洗设备就不太够这么多住客使用了。淋浴室（男女分开）热水供应不经常，次数有限。为了好好洗个澡，就得几个人紧紧挤在一个莲蓬头底下。铁托同美国共产党员埃尔·白劳德就是在莲蓬头下认识的。一楼有个餐厅，但住客可以自己做饭，每层楼都有个宽大的厨房，里面有大约二十个炉灶。每当做饭的时候，这批语言与国籍各不相同的欧洲共产党人的英粹就可以在这里闲聊。

生活条件并不特别舒适，但总比铁托住过的监狱要好，而且种种设备也比三十年代许多俄国人能在莫斯科得到的好些。最糟糕的是隔墙总有耳，旅馆工作人员，包括经理古列维奇在内，都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人人害怕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说话必须时刻留神，这在后来愈来愈是生死攸关。铁托与某些南斯拉夫人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同，他的自卫本能使他说话十分谨慎。

由于斯大林的清洗愈来愈猛烈，而且胡乱冲击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在俄国生活自有其特殊的危险。对铁托来说幸运的是，他这回首次前来正值从1935年7月至1936年8月的清洗暂停时期，因此他就可以在坐了几年监牢和在非法状态下生活几个月（这期间他不断来往于南斯拉夫和维也纳之间）之后，享受到一点改变生活方式的乐趣。现在他得到了松弛一下的机会，这甚至对一个钢心铁胆的特工人员（铁托肯定是这种人）也是必要的。在最初的六个月中他总是坚决相信，在苏联，任何一个具有坚强信念¹²⁵的共产党人凭着自己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肯定不会受到不公正的逮捕或判处。这种信心鼓舞着他，但后来证明他错了。

※ ※ ※

在铁托以后七年的生涯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第三国际（一般称为共产国际）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第一国际是早在1864年9月28日于威斯敏斯特^①圣马丁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卡尔·马克思和一些英国的、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开幕词中所说，“是为了建立一个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联络和合作的中心。”^②1889年7月14日（巴士底日^③）成立的第二国际代替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建立了一个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指导和帮助全世界的社会主义

①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伦敦市中央的一个区。——译者

② 以上引文见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原文是：“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译者

③ 巴士底日(Bastille Day)，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后为法国国庆日。——译者

运动。第二国际的拥护者们观点非常不同，只不过大体上都持社会主义观点。其中有一个右派，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主要代表；一个中派，代言人是著名的卡尔·考茨基；一个左派，后来逐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每个会员党表明自己是拥护还是反对战争，这就加速了一直暗中存在着的无可挽回的分裂。1917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左派有机会另搞一个自己的运动。

列宁由于要竭力控制俄国国内事态的发展，直到1918年1月才有可能召开一次国际性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俄国革命形势正处于危险而混乱的阶段召开的，可见列宁对它何等重视。会议在彼得格勒举行，有来自美国、英国、巴尔干各国（代表中包括战俘）、波兰和瑞典的代表团出席，控制会议的则是列宁和俄国代表团中的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议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由外国党小组组成的联盟，附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投票通过成立共产国际，尽管德国代表埃伯莱因反对。这就是第三国际，也是第一个由清一色的共产党人组成的国际，后来通称共产国际。〔注9〕

第三国际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臂膀。它一直存在到1943年5月中，然后为斯大林正式撤销。它在莫斯科设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对除俄国外的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行使大权。这个机构甚至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正式撤销之后仍然保留下来，只是不再有外国人担任要职。1937年和1941年它的内部机构曾两度改组；由于斯大林的清洗，它损失了很大一部份外国工作人员。但它直到最后仍保持着原来的管理机构和部份原班人马。虽然作为共产国际是被取消了，但这同一管理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重新出现在马合大街上，这时它实际上是苏联外事部门的一部份。很可能这个机构就是为共产党人战后接管东欧各国做好准备，并建

立和指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那个机构的基础。

铁托在 1934 年成为领薪金的共产国际官员。虽然他从 1937 年起不再领薪金，但直到 1942 年为止始终是共产国际一个驯服的工作人员，只不过在最后阶段愈来愈表现出独立性。他彻底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是 1948 年他与斯大林彻底决裂之后。铁托原是共产国际培养出的看来最顺从最有成就的人员之一，后来竟独立发展，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突出的、最使人惊异的特色。

塑造并支配着那么多欧洲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在二十年代费了很大力气（特别是由布哈林）才规定下来的。这些宗旨最后写进了一个章程和纲领，并为出席 1928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四百名代表所接受。纲领列出了任务，共有六个标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可避免的衰亡；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 127 革命的第一阶段；共产国际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接下来有三节论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革命胜利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这个纲领的说法，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威胁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敌对集团。因此，共产国际就是俄国对付长期危险的防御体系的组成部份，也是它帮助基本上具备革命条件的任何其他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1926 年的南斯拉夫被认为已经具备了这种“客观条件”，这就是当时号召武装起义的理由，而铁托和一些南共党员则曾根据这一号召努力采取行动。

铁托于 1935 年到达俄国时，已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形势。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已在意大利取得成功；更直接威胁的是，纳粹分子已在德国获胜，德共已被摧毁。这一切促使俄国领导人重新估计他们利用外国共产党的方法。1935 年头几个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结果采取了人民阵线方针作为苏联对外关系的新策

略。而一当苏联领袖们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方针，共产国际就立刻接受，并通过它的大量工作人员和工作部门付诸实施。

共产国际的基本组织结构很简单，但在它下面分设的许多部门却极其复杂。根据1928年的章程，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世界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本应两年举行一次，但实际上自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只在1935年举行过一次。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掌握最高权力的是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经选举产生，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作出决定的权力归主席团和一个权力更大的政治书记处。主席团每两周举行一次会议，1935年有十九名成员，另有十二名候补；同一时期政治书记处有七名书记和三名候补书记。实际上真正的权力是掌握在苏联领导人手中，通过上述三个组织中的俄国成员行使。

128 直接对政治书记处负责的是七个低一级的书记处，它们叫地区书记处。把世界划为七个地区，各由一个书记处负责。各书记处均由一个主席团成员主持。铁托在第二书记处，即巴尔干书记处工作，该书记处负责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和罗马尼亚。1928年前，外国共产党和党员虽然都接受共产国际属下相应的部门提供的物资和金钱，但还剩下一点管理本党事务的自治权以及就政策问题发表意见的某种独立性。1928年后这种情况就完全不存在了，共产国际变得高度集中，愈来愈为斯大林的专横恐怖的权威所统治。

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和南共党员，根据各会员党加入共产国际时必须接受的二十一条件中的某一条款，铁托曾保证全盘接受这套制度。这二十一项条件十分确切地规定了所有会员党的义务：接受共产国际的基本主张，服从其指示。有一条说，任何会员党的纲领都可以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但必须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并须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实际上就是得到组成共产国际中

央委员会^①的那些人批准，而斯大林在铁托为共产国际工作的整个期间都是该委员会委员。最后，各国共产党必须将任何不服从共产国际和藐视这些规定的党员开除出党。

1935年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已因党员中存在着一种倾向而名声不佳，这就是无视这些义务，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公开信”闹独立性，争论不休。共产国际已给在高尔吉奇前任党的书记马丁诺维奇和马里奇这两个党员，以及他们的一个前任西马·马科维奇暂停党籍的处分。这种处分以及南共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党的高级官员薪俸较高等事实，使得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南斯拉夫人互相搞阴谋诡计和争强斗胜的情况愈演愈烈。俄国人则利用属于不同民族的南斯拉夫人互相捣鬼和竞争的情况为自己的策略服务。南斯拉夫共产党出了问题时，是不可能责怪共产国际的（按照定理，它永远正确），于是就得找个替罪羊。1935年铁托刚到莫斯科，南斯拉夫国内的共产党员又遭到一次大逮捕。高尔吉奇作为总书记受到了批评，被认为应对此负责。但他有俄国人大力支持；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新阶段这时早已开始。铁托必须运用他的全部智慧来精通这种复杂的阴谋诡计；搞这种阴谋诡计的中心地点是莫斯科，但流毒之广，不仅害及维也纳或南共中央曾驻留过的任何其他地点，而且影响了南斯拉夫国内的党组织。

铁托已有足够的经验，知道在这种政治暗斗中人的生命旦夕可危，因而他愈来愈警觉了。他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中资历甚浅，又是新来乍到，生活中他就总是按这个身份行事。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满怀热忱，从不多言，而且工作努力。他在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列宁主义学校讲课，内容是工会工作问题和干部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性。讲一次课得二十卢布，这在当时是相

^①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译者

当高的报酬。有人建议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门课程的学习，但他决定还是按照个人的阅读计划学习，说是自学所得更多。不和共产国际的机构发生超过需要的关系，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后来他说，他阅读经济学和哲学书籍，还读军事著作，特别是包括伏龙芝和克劳斯维茨在内的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军事著作。与某些新来莫斯科的人不同，他没有语言困难。例如陶里亚蒂就不得不跟共产国际提供的一个女教师长期学习俄语。铁托本来就会俄语，并且很快就重新熟练了这门语言。他还能说流利的德语。总的说来，与在共产国际接触到的各种国籍的欧洲人和多种语言的文件打交道的能力他是充分具备了。〔注10〕

※ ※ ※

130 铁托在莫斯科的最初几个月中，共产国际的很大一部份工作集中于筹备第七次（结果是最后一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有来自全世界的六十五个代表团出席。这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了使代表们获得这种印象，从组织工作上作了最大的努力。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们利用这次会议宣布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方针，即人民阵线方针。和过去的做法相反，共产党员们被要求与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类似的资产阶级党派团体一起工作，以便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在实行过去的一切策略时，共产党人总是被告诫说，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跟其他左派政党联合；所有这些政党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同样危险的敌人。现在共产党人被允许去和资产阶级政党领袖达成协议，结成强大的反对派，反对法西斯和反动政府。夺取政权的长远目标并未放弃，但是承认在推翻法西斯政府之前共产党人

在斗争的过渡时期需要同盟者。另外，在提出人民阵线方针时还承认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美国是非侵略性的。1934年这一方针开始形成时利特维诺夫曾说：“并不是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切时期都有同样的发动战争的愿望，”必须把这些国家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几个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区别开来，后者才是对世界和平和苏联安全的威胁。

这种策略上的转变与俄国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形势及其对苏联的威胁的重新估计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对俄国的主要威胁来自纳粹德国，因而于1934年改变对外政策，企图将德国的侵略从苏联引开。在采取人民阵线方针的同时，苏联还企图以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和一系列双边联盟来抵销德国的力量。1934年5月俄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军事联盟条约，同年9月加入国际联盟。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策略上的转变反映着斯大林关于俄国弱于德¹³¹国的估计，反映着他需要推迟与纳粹的任何军事冲突，直到俄国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十月革命后工业发展虽已迈出巨大步伐，但三十年代的生产相对来说仍然落后，而野蛮的农业集体化又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这座建筑物原是沙皇贵族的俱乐部。在大厅里就座的约有四百名代表，铁托是其中之一。大厅里装饰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巨幅画像、旗帜和与这次大会及新的人民阵线方针相适应的标语。此外，还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这表明他的个人权力有了增长。1928年举行上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他还没有这种地位。他在第一次会议上唱国际歌和威廉·皮克致开幕词时出现，这时会场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主席台上，他和国际上重要的共产党人（包括波立特和拉·帕申纳拉）坐在一起，一言不发，表情冷漠。他身边坐着他这时的刽子手，大清洗中他的最受憎恨

的工具，“残忍好杀的矮子”耶兹霍夫。斯大林一贯相当轻视共产国际，说它是个“杂货铺”。他在会上没有发表演说，一当会议正常进行时就离开了。会议的正式记录说，每逢提到他的名字时就爆发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掌声和乌拉的呼声”，这是只对他一个人使用的有组织的致敬方式。^[注 11]这是铁托在莫斯科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斯大林。他第一次与斯大林单独见面是 1944 年红军开进南斯拉夫的前夕，当时他以胜利的南斯拉夫游击部队总司令的身份来到了莫斯科。

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是铁托第一次有机会参加的国际性共产党会议，对他来说这是十分难忘的。如果我们说，他这时是¹³²处于最易接受影响的时期（四十六岁，仍是一个地位较低的代表），他从季米特洛夫和陶里亚蒂的演讲中听到的人民阵线方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一直影响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这种说法也许不能说是出于想象。

如果说，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受到了最热烈的欢呼和奉承（马努伊尔斯基对代表们说：“斯大林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季米特洛夫则是这次会议的英雄。国会纵火案的审判才过去一年，在这次审判中他向法庭、向全世界宣告：“对于我，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国际的纲领就是最高法律。”一家德国报纸评论：“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纲领的化身”，他回答道：“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对我的描述了。”^[注 12]因此，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他安排一个特殊位置（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做法就既是适当的，也说明斯大林对他感到满意。他担任这个职位直到 1943 年共产国际正式结束之时，其后继续干类似的工作，直到 1947 年他被从俄国派回保加利亚，去接管苏联保护的共产党政府。

出席这次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相当庞大。在莫斯科的南共党员，凡当时或曾经在党内担任正式职务的，大部分都以这种或那种身份包括在代表团之内。提出的名字都是人所共知的假名，中央委员会代表高尔吉奇（索莫尔）和帕罗维奇（斯密特）向大会作了关于上次大会以来南斯拉夫形势的报告。国内党组织选出的代表是：达尔马提亚人伊沃·马里奇（他后来和铁托争夺领导权）和萨格勒布印刷工人德拉戈·彼得罗维奇（米林科维奇）。斯洛文尼亚代表是罗沃洛·库哈尔（瓦里奇），塞尔维亚代表是五金工人米兰·拉多瓦诺维奇（西蒙诺维奇）。弗拉吉米尔·乔皮奇（申科）和约瑟普·布罗兹（瓦尔特）是当然代表。此外，菲力普·腓力波维奇（波斯科维奇）是特别代表，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老成员，曾出席1924年和1928年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斯捷潘·茨维吉奇（安德烈依）和他的兄弟德尤卡都是代表，卡德¹³³尔（贝尔克）、拉德·武若维奇（里赫特）和波吉达尔·马斯拉里奇（安德烈耶夫）也以某种身份出席了大会；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罗尊科）和鲁道夫·赫西贡亚（米罗诺夫）负责代表团秘书处的工作，由奥古斯特·塞萨列茨（曼）和伊凡·里金特（马提奥）充当助手。〔注13〕除铁托、里金特、乔拉科维奇、彼得罗维奇、卡德尔（他后来设法离开了莫斯科）和帕罗维奇（他在西班牙战死）外，上述大部分人都在其后两三年中被斯大林处死。

在南共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高尔吉奇当选为团长，铁托由于会说流利的俄语，被选为代表团秘书。这一身份使他得以出席大会各次会议和各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从而既熟悉了代表们，也熟悉了会议的工作。他似乎工作得不错，因为当选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南斯拉夫委员时，曾一度提出他的名字，而没有提出高尔吉奇。进行这一提名的会议于1935年8月13日和14日召开，候选人有三个：共产国际提出的高尔吉奇，加上卡米罗·霍瓦丁

和弗拉吉米尔·乔皮奇。三人势均力敌，南共代表团似乎难以确定。于是作为一种折衷办法，铁托的名字就通过了。共产国际的头头们否决了瓦尔特的名字，回来说服自己代表团的讨厌差事就落到乔皮奇头上。高尔吉奇的朋友和保护人马努伊尔斯基告诉铁托：“既然你们不选高尔吉奇（共产国际只信任他，却不信任你）我们将不给你们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而只给一个候补委员，这个候补委员就是高尔吉奇。这是给你们的处分。”^[注 14]高尔吉奇的候补委员资格得到大会通过。作为一个候补委员，他可以参加执委会会议，但没有充分的选举权。这一切是南共的又一污点。

大会结束后，南共政治局趁机于委员们分散前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会议。在8月21日的会议上铁托再次被增选入政治局，并决定政治局委员、富有才干的塞尔维亚人帕罗维奇返回南斯拉夫¹³⁴，继续在国内工作。铁托被命令随同南共代表团部分成员和别的大会代表一起，到苏联各地作为期三周的参观旅行。

旅行者中除铁托外只有三个南斯拉夫人：彼得罗维奇·拉多瓦诺维奇和塞萨列茨。他们于8月的最后一周离开莫斯科，于9月中返回。他们参观了铁托早在当战俘期间就已熟悉的伏尔加河东岸地区和西伯利亚西部。他们看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重工业工厂，看到了煤矿和金矿，以及古比雪夫的机械工厂。他们还参观了拖拉机站，访问了一些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组织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给外国共产党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铁托干得不错，他对各种不同的听众作解释和发表演讲，告诉他们刚举行过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能用俄国工人和农民懂得的语言和他们交谈。如果他对看到的東西有什么保留——用残忍手段强迫实行的集体化刚过去不久，肯定仍然存在着恐惧和忿恨，他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里。很久以后他说：“我和集体农庄庄员交谈时，发现

每逢他们中有人想说什么，别人就用臂肘碰他。”

铁托回到莫斯科时赶上了9月15日和17日的南共代表团最后几次会议，他回来也是为了参加党中央委员会在委员们分散前举行的一次会议。本来决定要他在年末回到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但在12月前从南斯拉夫传来了两件令人不安的消息：一是在如何执行新方针的问题上意见始终未能取得一致，一是警察正大批逮捕共产党人。铁托得到在莫斯科再呆一段时间的指示，因此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比预定的长了一倍。〔注15〕

※ ※ ※

亚历山大国王被暗杀，保罗亲王摄政后，南斯拉夫于1935年5月举行普选。反对摄政王继续实行个人独裁的各政党组成反对党集团，获得了多数选票，然而却未能改变政府的性质。仍处于¹³⁵非法状态的共产党不能在竞选运动中公开活动，而且在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严重分裂。高尔吉奇最初发出指示，共产党应通过它的合法的门面组织劳动人民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选举前不久，他收回了这项命令，要求南共党员与反对党集团候选人一起活动，并且投他们的票。这可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这时已采取人民阵线方针，即将在代表大会上宣布。结果，马切克领导的各反对党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合作，因为它提出一些办不到的要求。共产党的许多拥护者投了反对党集团的票，而党既没有得到好处，也未能提高声望。反对党集团本身也没有从选举胜利中得到好处，因为保罗亲王任命亲纳粹的右派政客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出任新首相。但是许多南共党员感到多少是失去了一个机会，必须在事后找出原因，而谴责的矛头则是指向高尔吉奇。此外，选举后南共几乎又被王室警察全部消灭了，人们认为他也应

对此负责。

逮捕是在锡萨克的一次工人集会后开始的，集会失去了控制，共产党人举行亲苏示威，提出与共产国际的新方针背道而驰的要求——建立苏维埃克罗地亚。此后不久，带着党内文件的当地党组织书记吉奥吉耶·米特洛维奇被捕。警方很快就有了全国各地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名单，终于得以逮捕南斯拉夫各地共约三千名党员中的九百五十名。通过审讯，他们得到了有关党的各个领导人的大量情报，包括关于铁托的新情报。处于非法状态的党几乎再一次被摧毁了，只剩下很少人继续进行党的工作，其中有一些是贝尔格莱德的学生，包括新近出狱的青年共产党员密洛凡·德热拉斯。^[注 16]

有关这种局势的消息是慢慢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负责南斯拉夫事务的办公桌上的，因为通过交通员传信很危¹³⁶险，而且也不经常。维也纳的高尔吉奇领导班子现在无论在南斯拉夫，在莫斯科，还是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内部都受到普遍批评。1936年4月高尔吉奇远在莫斯科时，乔皮奇召集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一些中央委员开了一次会，事先既没有向高尔吉奇，也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这当然被发现了，于是共产国际决定再次对南共党内缺乏纪律和不团结的现象采取断然措施。^[注 17]

它按惯常用的那种独裁专断方式行事。南共中央委员会全部解散，1936年9月9日“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国际挑选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核心集团然后再次选出（无疑也是根据指示）高尔吉奇当总书记，铁托当组织书记。根据铁托后来的叙述，显然这时他本人至少私下是反对高尔吉奇的，他正在公开鼓吹党需要书记在国内，而不是在维也纳工作。他说他曾找季米特洛夫本人提出过这个建议。“对我的建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说，“高尔吉奇特别反对。最后决定将中央委员会分成两个部份。

一部份回国工作，由我领导；高尔吉奇则作为政治书记留在国外。他有权否决在南斯拉夫作出的任何政治决定和决议，……我同意了这个决定。”他接着说：“此外，我还想就接受共产国际津贴的问题规定一个原则，我认为这一津贴大大妨碍了党。”另一次他评论说：“这是一个软弱的决定。但尽管如此，它还是使我能在国内独立工作。”〔注 18〕

铁托现已积极参与南共党内争夺权力的全部明争暗斗，他似乎得到季米特洛夫的坚决支持。铁托后来回忆说：“我和季米特洛夫的个人关系确实非常好。我们互相十分信赖和信任。”另一次他评论说：“他态度十分友好，对在当时情况下进行党的非法工作的困难有详细了解。”共产国际中主要的苏联代表马努伊尔斯基则是高尔吉奇的朋友和支持者，因此铁托必须小心行事。他后来说：“至于马努伊尔斯基，他有时站在我们一边，有时站在另一边。起初他支持另一边，但最后他得出结论，应得到他的支持的是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时正在进行整顿，这种整顿是在莫斯科的恐怖气氛愈益严重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刚一闭幕，斯大林的清洗的暂停阶段就结束了。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现已遭到失败的那些人包括在首批被捕的南斯拉夫人之内，大多数都被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处决了。但高尔吉奇本人暂时还是自由的。他已打败了他的批评者，中央委员会中他的主要对手已被清除出去，其中包括乔皮奇、赫多梅尔、霍瓦丁和斯捷潘·茨维吉奇，这些人不久全都消失了。〔注 19〕¹³⁷

1936年10月中，铁托终于离开莫斯科，回到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他得到的命令是协助高尔吉奇整党，不久即可允许他回南斯拉夫工作。他的任务是执行纪律，强迫接受共产国际的方针，将持异议的党员开除出党。这本身就是一桩难办的差使，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能把南共严密地组织起来。此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

是招募志愿兵协同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军作战，并且作出安排把他们安全地从南斯拉夫送往西班牙。这两项任务都极端困难而危险，很可能共产国际里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会成功，更不用说是活下来了。而最不相信这点的便是高尔吉奇，他这时肯定已把铁托当做竞争对手了。

第七章

国际经验

138

1936年夏铁托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的大清洗所造成的恐怖已经开始影响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另一些将在今年夏季的十六人审判中定罪的人，从1934年12月以来就已被投入监狱，另外还有许多俄国人被捕。〔注1〕与他们或与任何自由主义思想有关的外国共产党人已受到怀疑。这时离开莫斯科正是好时候。

已经再次在南共掌权的高尔吉奇召铁托回维也纳，并给他准备了旅途中用的伪造证件，旅行路线是经南斯拉夫到维也纳。但铁托早已知道，共产国际和南共内部的宗派集团曾采取发给伪造得不好的证件或给边境警察泄露消息的办法来消灭自己的对手。他怀疑有些南共官员就是这样丧命的。他不信任将和他一起旅行的那个拉脱维亚女医生。他后来说：“我弄了另一张护照，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因为通过高尔吉奇得到护照的同志都在南斯拉夫边境被捕了。”他从莫斯科到布拉格，于1936年10月中到达维也纳。〔注2〕

他的一项特殊任务是招募志愿兵，把他们送到西班牙帮助西班牙共和军镇压佛朗哥将军的反叛。到达维也纳后，他发现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有了变化，因为奥地利警方根据许士尼格首相的新命令加强了对付共产党人的保安措施。博里斯·基德里奇和一些其他的南斯拉夫人已于1936年6月在维也纳被捕，奥地利警方并

已掌握大量南共档案。〔注3〕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分散隐蔽，并于1936年最后几个月里将总部迁往巴黎。巴黎的情况对共产党人方便得多，因为利奥·布卢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已从1935年起执政。它的正式态度虽然是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但由于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正在给佛朗哥送去军援，它允许各种各样的援助西班牙的国际委员会存在。〔注4〕

因此，铁托就是在巴黎的办事处开始与仍在南斯拉夫积极活动的党员建立秘密联系，同时建立“地下铁路”网，将志愿人员从南斯拉夫经奥地利和瑞士运到法国，然后再转运到西班牙。开展这项工作确实远没有维也纳危险，但为了建立一个组织，他需要经常去南斯拉夫。这是他执行的第一件真正巨大的国际范围的任务，这使他有机会充分发挥他的搞秘密活动和组织工作的才干。

南斯拉夫不乏志愿去西班牙帮助共和军作战的人。他们来自各个阶级和国家的各个部份；来自共产党人、左派同情者、理想主义者，来自对南斯拉夫缺乏自由深恶痛绝，对在国内历来落后的地区就业始终困难极端不满的那些人——当然也来自那些把西班牙内战看成是反对欧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最后一场决战的人。

首先，铁托必须与在国内办理招募工作的人员建立联系；他还必须安排好安全妥善的地点，使志愿人员在转入各段旅程之前都有藏身之所。必须在南斯拉夫、奥地利和瑞士找到一连串联络员，还必须制定通过法国和非法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计划。这项行动需要耗费大量金钱，但金钱有共产国际提供，还有全世界给共和西班牙的大量自愿捐款。交通员穿梭往来不停，有男人也有女人，其中不少是青年学生。他们传递口信或书信，书信有的是用简单的暗语写的，有的是用隐显墨水写在表面看来没有问题的

信函上的。之所以必须小心谨慎，不只是因为警方正在搜捕共产党员，还因为南斯拉夫内务部已禁止援助西班牙共和国，认为所有志愿兵都是共产党人。¹⁴⁰

铁托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一个小旅馆（贝尔纳丁大街贝尔纳丁旅馆）里，常在郊外工人住宅区的联络员中和拉丁区的学生中活动，这样，他就得到了许多左派国际联络员，并熟悉了西方生活。他不得不学法语，因而天天钻研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他的总办事处设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艾绍迪大街一个名叫“地平线”的小书店里，但他却是在街上和咖啡馆里与许多联络员接头。〔注5〕有一段时间在巴黎干这种工作是容易的，不过到西班牙内战后期，由于人民阵线垮台后右翼政客在法国执政，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到了国际局势趋于恶化，拉瓦尔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谈判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便确信，法国的第二局已在和南斯拉夫警方密切配合起来对付他们了。

对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来说，旅程中的南斯拉夫一段是最危险的。有个南共党员在西班牙度过两年后回国，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中被捕。警方读到了他给妻子的每一封信，然后就把他的住宅监视起来。在受警方审讯时他叙述的情况是具有典型性的。他装扮成一个旅游者，首先从奥西耶克出发，坐火车到萨格勒布。然后他坐另一辆火车到萨莫博尔，从这里步行到斯洛文尼亚，在普图伊一个供度假者住宿的旅馆里住了几天。从这里出发，他在阿尔卑斯山步行了很长途程，然后非法越过南奥边境，到克拉根福。不久后，他从当地联络员得到一张假证件，坐火车去瑞士巴塞尔，几天后继续坐火车前往巴黎。在巴黎他住在第二十区的现代旅社，这时有人为他去西班牙进行安排。然后他前往卡尔卡松，从这里坐公共汽车到西班牙国境，这里有向导等着带领志愿人员越过比利牛斯山。整个行程用了大约三周。在出国途中他是幸运的，一

141 路平安无事。另一些出国的人却被捕了，特别是在南奥边境线上。但也有不少人或单独行动，或结伙而行，得以非法通过。有的装扮起“胜家”牌缝纫机推销员，三、四个人一伙，自称“胜家伙计”。这种人当时在巴尔干各国和欧洲其他部份经常可以见到。〔注6〕

当然，也有另一些志愿人员，警方还不知道他们就是受通辑的共产党员。这些人就合法地离开南斯拉夫，用自己的护照旅行。象科察·波波维奇这样的出身于富有的上等阶级家庭的人到法国去就不会引起怀疑。1937年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曾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西班牙。1938年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也有帮助，因为可以安排成伙的人作为普通游览团体前往。〔注7〕

然而雄心最大的一项计划却落了空。这项计划大胆而又简单，就是将大约五百名志愿兵从海路直接由南斯拉夫运到西班牙。1937年3月初花七十万法国法朗雇了法国海船“科西嘉”号，让它从马赛出发，开到门的内哥罗的亚得里亚海岸布德瓦附近载人。按照铁托的说法，这项行动由高尔吉奇负责，他又让铅管工出身的中央委员阿道夫·穆克去进行安排。结果这项计划执行得一塌糊涂。当时那种行动规模无论如何是难以瞒过南斯拉夫警方的，因为有几百人从门的内哥罗和达尔马提亚各地集中到离摄政王在米洛策尔的夏宫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来。这天许多小船集中到一起，只等和海岸后方山上的一个了望哨一交换灯光信号，就把这些人渡到法国海船上去。夜幕降临了，强劲的季节风激起了海浪，这时那艘法国海船设法向海岸靠拢。但3月2日这天没有可能登船。第二天晚上，对正在进行的一切已经清楚了解的警方调来增援人员，把这个地区完全封锁起来。几乎所有有关的人都被捕了；阿道夫·穆克也在其中。当一只南斯拉夫巡逻艇靠上海船时他正在船上，扮成一个法国水手。共产国际派来的一名“指导员”从船上

142 跳海逃脱。在受警方审讯中穆克供出了整个党的组织，接着在全

国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逮捕。〔注8〕

这一灾难性事件使巴黎的中央委员会陷入困境；共产国际要求它作出说明。铁托虽然也牵涉在内——他曾去布列斯特安排租船，并参与了一些别的事情。但他能证实这一行动是由高尔吉奇负责，从而为自己开脱。这段时间他正在南斯拉夫，出事的第二天晚上他就亲自写信报告了这一“轰动消息”。约十天后，高尔吉奇也给共产国际写信报告这件事，这时他还不知道穆克已经被捕。他说这次彻底失败的唯一原因是“布拉”，即大风，同时向共产国际请示，是否在一个月后重新试行这项计划。铁托也写信给巴维尔·格里戈里奇医生，询问再次设法从海路运送志愿兵是否可行。格里戈里奇回信说，由于整个海岸的有关当局都已处于警戒之中，这样做已不可能。因此，尽管陆路愈来愈危险，仍不得不继续走陆路。〔注9〕

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南斯拉夫志愿人员（其中约有五百六十名是共产党员）到达西班牙，参加了共和军。他们主要在第一二九国际旅的几个营中作战，这些营都有适当的名称——如久罗·贾科维奇营、季米特洛夫营和马萨利克营。他们半数以上（约七百人）或是战死，或是在战后不久死于集中营，另有三百多人受伤。有很大一部份南斯拉夫人成了共和军军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包括两名中校，八名少校，三十五名上尉，一百零五名中尉和八十五名士官。还有三十九名政治委员，其中七名属营级。曾在共产国际受训的前中央委员、在莫斯科失宠的布拉哥耶、帕罗维奇是旅政委，他在战斗中牺牲。〔注10〕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来说，这一切的意义不仅在于当时扮演了光荣角色而已，今后还将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回到南斯拉夫的三百人中，几乎全都在大战期间参加了铁托的游击队。他们的战斗经验，他们在国际旅中受到的政治教育，他们的游击战经验，在铁托建立部队与德国人和¹⁴³

意大利人作战的工作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人们把他们叫“西班牙人”，其中四人是在战争结束阶段的几个主要战役中追击败退的德军的铁托四个主要集团军的领导人。铁托本人曾说，他本来也想去当志愿兵，但共产国际坚决不允许他去西班牙。他没有去倒是幸事，因为去西班牙的人中有许多后来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害了。

这期间铁托的另一部份工作，就是开始执行以下任务：使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复活，将那些搞宗派的、不顺从的人从国内外领导层中清除出去。这是一项令人胆怯的任务。几年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每次刚把党重新组织好，马上就来一次大逮捕。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弄得除了最大胆或最莽撞的人之外，谁都吓得不敢进行任何活动了。南斯拉夫警方弄到维也纳的党内文件后进行了一场场逮捕，了解到许多情况。他们的方针一贯是打进共产党的组织，随着弄到的情报愈来愈多，他们能把这种事干得非常成功，有时打进了最高层，可能还打进了共产国际的南斯拉夫人中去。过去这些年的情况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表现最好的时候也是争论不休和缺乏纪律的；他们对领导党的方式公开表示不满，并且不与中央委员会合作，因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发号施令，却不冒危险。互不信任引起了争吵，党员们互相怀疑对方是警方密探。

铁托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即使考虑到后来对他这一时期工作的一切记述，由于英雄崇拜而有溢美之嫌，我们也得承认他似乎确实是全力以赴、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工作。1937年头七个月的大部份时间他都在南斯拉夫，只是偶尔为了处理志愿兵去西班牙的问题和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而去巴黎稍事勾留。他还必须对使用金钱（这时的金钱是由莫斯科提供）、印刷传单和提供宣传材料作出安排。从铁托的报告和高尔吉奇给共产国际

的信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铁托这几个月的工作的许多情况。他到过南斯拉夫的大部份地区，或者是去同知名的共产党员联系，或者是去亲自会见推荐给他的共产党的可能的同情者。他的有些约¹⁴⁴会与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方针有关，他联络的人中还有其他政党，包括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党员以及若干合法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的代表。〔注11〕

工作很危险，越过国境去巴黎尤其危险。他有各种各样的化名，并不时改变外貌和衣着。但一般情况下他编造的总是这样一种与其外表一致的谎话：他是一个富裕的、有成就的工程师，由于业务上的需要，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他把这个角色扮得十全十美，但决没有深深陷入这个角色，以致不能恢复他认为自己的真正身份（一个熟练工人）而同样使人信服。1937年头几个月他在斯普利特、萨格勒布、斯洛文尼亚和门的内哥罗。从现今知道的他做过的一些联络工作来看，他显然是在设法建立由新人，主要是青年人组成的全新的党组织，这些人可以在合法活动中使用，而不需要过地下生活。大多数在警察当局挂了号的共产党员暂时是不能使用了，尽管他也破例使用了几个；老党员中有许多人独立性极强，而且同本地有牢固的联系，许多党小组又被怀疑已有警方的人打入。铁托在斯洛文尼亚保留下来的人中有鲍利斯·齐赫尔利和谢尔盖·克赖格尔。1937年4月17日成立了单独的斯洛文尼亚党组织，然后就把进一步开展工作的任务交给这个常委会和也是新由莫斯科去职归来的爱德华·卡德尔。他在克罗地亚联络的两个人是利奥·梅提斯和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后者是几年前曾在奥古林亲切对待铁托的那个法官的儿子。

由于警方监视严密，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有困难，于是他决定通过大学生开始他的活动。被派到克罗地亚去与铁托商量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中进行政治鼓动问题的联络员是密洛凡·德热

拉斯。他到萨格勒布去是坐火车，后来他回忆说：“一路上提防着是否有警方特务跟踪。”这次见面中铁托告诉德热拉斯，党中央委员会将不设在海外，而要重新设在南斯拉夫。他还告诉他，将要成立青年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请他推荐协助领导这一组织的人选。德热拉斯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与自己的党小组的党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商量。两人决定将伊沃·洛拉·李巴尔推荐给铁托。〔注 12〕由卡德尔、兰科维奇、德热拉斯和洛拉·李巴尔组成的这个小组在 1938 年已成为铁托开展党的工作的主要副手，许多年都和铁托在一起。麦科·马林克、弗兰克·莱斯科塞克和伊凡·米鲁丁诺维奇等另几个政治局委员也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是南共负责决策的核心人物，既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又很快锻炼成长，因而在其后四年中，也就是直到南斯拉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当铁托有时在国外长期逗留，他们都能把党的领导工作承担起来，而在战争期间他们更成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核心人物。

克罗地亚的问题有所不同，但铁托既是克罗地亚人，又是萨格勒布党组织成员，对这个问题是熟悉的。克罗地亚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以及究竟是支持克罗地亚自治的主张，还是支持联合成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张；前者是共产国际从前所坚持的，后者则自从转而采取人民阵线策略以来已成为共产党的方针。并不是所有克罗地亚共产党人都已接受联合成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张，这个问题直到大战爆发仍未解决。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里铁托在克罗地亚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强迫那些闹独立性的小集团和自以为比他资格老的党员就范。在他们眼中，铁托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许多本地党员对共产国际本身从内心感到厌恶。为了迁就这种独立性，铁托在克罗地亚建立一个单独的党组织，这是共产国际早在 1934 年就已决定了的。1937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的夜半时分，十九名代表在萨莫博尔郊外（当时认为萨格勒布

太危险) 一个树林里开成立大会，会上选出十二人组成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注 13〕然而这并未使铁托在克罗地亚的困难得到消除，在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依靠很少几个他信得过的人，处处谨慎¹⁴⁶从事。

这些朋友中有一个是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同他在一起时，铁托也能无拘无束，自自然然，既不用扮假相，也不用慎言谈，对他来说这样的人只有很少几个。他俩已相交多年，并有许多共同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俩呆在同一个兵营，只不过克尔莱扎未因当兵打仗而象铁托那样被俘到俄国。战后铁托回到克罗地亚，他俩在政治集会上相遇，一起讨论“做什么和怎么做”这种“陈腐的政治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克尔莱扎就已发现铁托“总是表现出一种对事物完全相信和肯定的态度，而他又固执得出奇——甚至可说他总是固执的”。铁托后来在蹲监狱的几年中，在干地下工作的岁月里和在共产国际受训期间，由于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给自己蒙上保护层，这使他那开朗的性格变得冷酷而含蓄了，但他却在早年让善于观察的克尔莱扎窥见了他性格中埋藏最深的东西。这成了终身联系他俩的纽带，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克尔莱扎经常坚持一些党的领导者们不喜欢的观点。

1937年初，铁托有一次去萨格勒布时去看克尔莱扎。他事先没有通知，而他俩已有九年没有联系了。克尔莱扎起初以为站在门口的是个陌生人，但当他听到那“清晰、热情而亲切的声音和爽朗的笑声时，他就知道来人是谁了。克尔莱扎说：“乍一看，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变化；但他是大大地变了，完全、彻底地变了。他安详、自信而质朴，正象那种已经消除了思想中的一切怀疑、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人。”他俩谈了一整夜。当时克尔莱扎刚从意大利回国，他给铁托谈了他在那里见到的法西斯主义的情况。铁托告诉克尔莱扎，他在一天晚上到达克罗地亚时，是如何为一种

不可抗拒的怀乡之情所驱使，回到他生长的库姆罗维茨村，尽管他的家已经不在那里，尽管在这一地区被人看见对他来说极其危险。

147 黑暗中他站在旧居附近的几棵栗树下，听着狗吠和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嗅着村子里发出的熟悉的气味，包括隔壁那家的粪堆和马厩的气味。他觉得一切都没有变——甚至溪中的死猫和一扇破门的嘎吱声也没有变。〔注 14〕一面是对旧家园的浪漫的怀念，一面他又认为他应该想到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现革命变革的需要，这两种感情显然曾在他心灵中交战。在铁托的生活中，与一个年龄相仿、品格出众、才智过人的朋友这样开怀畅谈的情况已经相当难得了，今后还将更加难得，因为如今他正站在另一次转变的门槛上，这一转变将把他与同时代人进一步分离开来。

铁托这时只不过是南斯拉夫国内的组织书记。他仍然对高尔吉奇负责，后者是设在巴黎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并且对共产国际最后负责。1937 年的头七个月中他曾两次去法国汇报工作。他于 3 月 25 日在巴黎出席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5 月中又去呆了一小段时间。然而到夏季过去一半时消息开始传到巴黎，说是斯大林的清洗已认真指向共产国际的外国成员。高尔吉奇于 7 月初被召到莫斯科，从此音讯杳茫。这是个不祥之兆；此外，共产国际还已停止付款给南斯拉夫人。中央委员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和斯雷滕·茹约维奇（他俩和铁托同时被任命，但在巴黎工作）写信给铁托，叫他最好尽快去巴黎。他于 8 月 17 日到达。〔注 15〕人们告诉他，高尔吉奇去莫斯科时并不特别惊慌，他说他认为此去不过是受一顿申诉——用俄国话来说就是“洗头”。〔注 16〕

从高尔吉奇前几个月中给共产国际的信函来看，他的确没有预感到大祸已经临头。这些信函几乎直率到了天真的程度，竟批评共产国际的俄国领导。从这些信函中，看不出他已明显地觉察到，他所抱怨的愈来愈大的行政事务工作方面的困难，可能正预

示着政策上的变化，而这对他本人和他的同事都包藏着危机。在他给共产国际南斯拉夫部门的联系人“弗雷斯契尔”（伊凡·格尔¹⁴⁸泽提奇）的信中充满着对他自己的工作和国内党的整顿工作的乐观叙述。他一再诉说，由于共产国际不予合作，他如何受到了妨碍。言外之意显然就是，这是由于缺乏效率或有人出于敌意而在暗中捣鬼。他说他的信没有受到答理；他曾要十份非法的身份证，但只收到六份；他对要求他不断呈送详细的财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感到厌烦：“我已经给你们写了五六次信谈我们的财政情况，现在你们又要我谈，……你们说我们只能得到5月份必需的钱，但今天已是5月22日了，我们还没有得到。”他抱怨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象波兰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待遇都要好些，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却没有受到照顾；他曾要求允许卡德尔的妻子到丈夫那里去，立即把铁托的妻子送来，但都没有反应。他写道，铁托已经两次去那边——指南斯拉夫，又两次来巴黎等待他的妻子，但没有任何结果，只得又动身走了。他还曾这样写着：“当你们读到这些话时，请不要责骂我们，也不要把这些话记下来，今后向我们的人算账。如果情况使你们自己不得不出家人，请不要强迫别人也披上一身袈裟，也受到你们不得不受的那种诱惑。”然而在其他信中他却暗示他已知道莫斯科并非万事顺遂。他写道：“戴别尔克的妻子认为那里仍有‘什么东西在同我们作对’，因为她得不到允许回家。”他这样写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一些人的妻子是被当作人质留在莫斯科，目的在于要她们的丈夫好好表现。与此同时，他正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关于清洗中被卷入的俄国人受审情况的材料，他安排印刷了与此有关的传单，但这些传单却没有使他自己警觉。^{〔注17〕} 尽管高尔吉奇对共产国际的官僚作风和勾心斗角曾有亲身经历，但他显然是太自信或太窝囊了，以致既未能预见到，也未能应付好1937年夏莫斯科出现

149 的局势。他怀着乐观的心情前往莫斯科，丝毫没有猜想到死亡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他的消失正是铁托的机会。

无论当时或以后，铁托都认为高尔吉奇应对许多南斯拉夫人的死亡和入狱负责，这或者是他有意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他严重无能。他还认为高尔吉奇存心不让许多有才能的、可能和他争夺领导权的党员担任负责的职务。直至 1948 年，铁托对高尔吉奇的评论还是十分严厉的。但二十年后，他经过更加仔细的考虑作出了如下的评判：

“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官僚，终身替共产国际工作，因此在我国人民中没有名望。但是他没有把组织工作做好。不过他并不傻，也不是间谍。他给我们党造成了很大损害，但这不能成为消灭他的理由。他可以算是一个小独裁者。我不能说我们党内出的那些毛病是他故意弄出来的。有时我觉得是他存心弄出来的，有时又觉得不是这样。但他确实不具备为保护我们的干部所必需的关于国内情况的知识。”〔注 18〕

※ ※ ※

高尔吉奇和共产国际中其他一些南斯拉夫人已经被捕的消息，在南共党内各小集团之间引起了一场夺权斗争。作为共产国际任命的组织书记，铁托有权要求由他来继续执行总书记的职责，直到任命了高尔吉奇的接替人为止。但是另外还有些人也曾从共产国际得到某种特殊的委任，一个是弗拉吉米尔·乔皮奇，另一个是杨科·约瓦诺维奇，后者原是沙巴茨的一个教师，曾长期在莫斯科和西班牙为共产国际工作。铁托后来说：“高尔吉奇入狱后，宗派主义斗争更加扩大，因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谁将

成为党的头头?’带头搞这一斗争的人不希望我得到这一任命，他们成帮结伙地反对我，给我造成不少困难。”〔注 19〕

铁托指出巴黎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两个人是他的死对头，这就是拉布德·库索瓦茨和伊沃·马里奇。库索瓦茨曾干过安排志愿兵去西班牙的工作，他就是从这些人以及巴黎的学生中寻找支持¹⁵⁰者。铁托必须依靠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对抗。他后来说：“曾给我极大帮助的人，在巴黎是博里斯·基德里奇，在曾为西班牙而战的战士中是马斯拉里奇。”基德里奇当时在巴黎当新闻记者，直到1953年去世，他一直是铁托的忠实支持者和亲密的同事。库索瓦茨和马里奇一面出席铁托在巴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一面却和铁托最危险的对手（说最危险是因为其人在南斯拉夫有追随者，在共产国际也有人支持）一个名叫彼得科·米莱蒂奇的年青的门的内哥罗人秘密联系，此人当时正作为一个政治犯被关在南斯拉夫的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里。〔注 20〕

铁托如今下定决心要争当高尔吉奇的继承人。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南共还有任何前途，那是在南斯拉夫国内，不是在巴黎，尤其不是在莫斯科。他也知道，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高级官员的支持。8月28日，他到达巴黎不久，就给巴尔干部负责人威廉·皮克写了一封信，有条有理地、详细地汇报了他离开莫斯科后在南斯拉夫的工作。他着重指出他一直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行事，并已着手建立由“有合法身份的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这封信及另外几封信和其后几个月里发给皮克的若干电报一样，没有得到答复，但关于莫斯科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消息却慢慢传到了巴黎。在莫斯科，斯大林的清洗终于狠狠地冲击到了共产国际的外国成员。卢克斯旅馆“每逢内务人民委员会来人抓走牺牲者时，就象受到盗匪夜袭的乡村一样。”〔注 21〕铁托本人也在1937年10月中得到去莫斯科接受有关南共局势的讯问的命令。他没有去；这

是他这一生中做出的生死攸关的决定之一。最后这项命令取消了，何人批准的我们不知道，但铁托后来说，曾给他很大帮助的两个共产国际官员是威廉·皮克（可能他自己与这一案件有关）和季米特洛夫。〔注 22〕

151 铁托其后几月中夺取权力和打击对手的方法，与他在战争初期使用的方法非常类似。他以超人的精力全力以赴地展开政治活动。他在巴黎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给所有在南斯拉夫各地区为他工作的人们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举行会议，筹集款项，与合法的工会合作，与日夫科·托帕洛维奇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团体共同开展工作。他把斯雷滕·茹约维奇和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派到塞尔维亚去做这些人民阵线工作，这就使他们得以不按已经接到的命令到莫斯科去送死。他在党报上发表许多文章解释他的人民阵线方针，因为他知道共产国际一贯极其重视印刷出来的文字。他写了大量书信，包括一封给尼古拉·科瓦索维奇和斯尔迪安·普里察这两个党员的信；前者曾被派到加拿大和美国筹款，因为莫斯科已停止提供款项。为了同一目的，他还在南斯拉夫国内和人拉关系。除了 1938 年 1 月初他为了和共产国际的“技术部”联系曾到维也纳和布拉格去了十二天外，整个冬天他都在巴黎等待共产国际的命令。〔注 23〕

1937—1938 年冬，由于彼得科·米莱蒂奇在南斯拉夫的活动，铁托遭到了最顽固的，对他个人最危险的反对。米莱蒂奇是门的内哥罗人，比铁托年青，已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几年，在那里他和几个保加利亚人交上了朋友。他一心想被接受为党的领导人，首先得到狱中的人接受，然后得到南斯拉夫其他党内集团接受，最后通过他在莫斯科的关系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监狱中铁托的拥护者是由他过去在狱中结交的朋友莫沙·皮雅杰领导。米莱蒂奇拿起内务人民委员会经常用来对付它的牺牲品的最难抵挡的武

器：指控皮雅杰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企图将他开除出狱中的党组织。皮雅杰把下面这封密码电报发到了巴黎的铁托手里：

“这场斗争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两个半月。只是在莫沙(皮雅杰)同志得到中委(即中央委员会——编者)委任之后，才得以将米莱蒂奇和他那一小撮拥护者在党组织里孤立起来，……莫沙肩负起了主要担子。他好几个个月没有脱衣服。白天要进行讨论和辩论，晚上他又要用暗语给中委写报告。”〔注24〕 152

甚至在铁托和皮雅杰赢得了米特罗维察的这场斗争之后，米莱蒂奇仍没有完蛋。他决心把总书记职务弄到手，一出狱便在莫斯科继续搞反对铁托的阴谋活动。

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奥地利，两天后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并吞。这一事件对整个欧洲都是不祥之兆，对南斯拉夫尤其如此，因为这使纳粹分子到达了南斯拉夫边界，而且这显然不过是德国进一步扩张的一个阶段。铁托立即写了一个宣言，谴责纳粹德国并吞奥地利，并印了一些传单送回南斯拉夫秘密散发。他如今得出结论，不能再留在巴黎等待共产国际的命令了。他必须返回南斯拉夫，留下来整顿南斯拉夫局势，树立自己的权威，委派一些人负责各国地区的党组织；这些人要能在他一旦被召赴莫斯科时继续开展工作，并肯定能写报告来向他请示。他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由这种人物组成的核心。

1938年3月12日，萨格勒布警察当局得到密探报告，说南共中央委员约瑟普·布罗兹即将回萨格勒布执行整顿萨格勒布共产党组织的任务。他在旅途中将用一张伪造的捷克护照，上面的名字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1893年3月15日生于克拉托维。情报来源没有透露，但看来极其可能就属于那种情况，铁托

的敌人给警方提供情报使他被捕的。在克罗地亚与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的边境线上，在斯普利特港和杜布罗夫尼克港，南斯拉夫边境警察在一切可能进人的地点都加强了警戒。〔注 25〕可是 3 月底前，铁托已经用另一个名字，带着一头染得非常不地道的红头发（一个熟人说：“同志，你的头发染得不好，精明的警察一眼就能把你认出来”）安抵贝尔格莱德了。〔注 26〕原来他用了另一张护
153 照，走了不同的路线。他在一家旅馆住了两宿，其间受到一个便衣警察丁梢，但他假装是一个游客，甩掉了这个人。他随随便便、若无其事地走进一家商店，买了一套土耳其制的咖啡用具——显然是一个富商旅游归去送给妻子的礼物。但他觉得最好还是改变住处。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这时还只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不是党员，经他的党员朋友德热拉斯和洛拉·李巴尔的劝说，让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他家的阁楼上睡觉。铁托在戴迪耶尔家住了两夜，只是在晚上他拖着疲倦的身体直接上床睡觉时才露一次面。但正如戴迪耶尔的母亲指出的，他是个危险的客人；他的牙膏是法国货，他的肥皂是在捷克买的。

两天后，铁托离开贝尔格莱德，而警察为了抓他，这时还在与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的边境线上警戒着。他到萨格勒布是坐飞机，飞机票是洛拉·李巴尔从一个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亲戚那里弄来的。“他穿着一套雅致的服装，看上去象个商人，而不象个‘非法分子’。”〔注 27〕铁托从 1938 年 3 月中至 6 月中在南斯拉夫呆了三个月。他仍只是南共代理总书记，但他觉得共产国际多少是支持他的，因为 2 月 26 日他终于收到了对他发给威廉·皮克的许多信件和电报的答复。在收到季米特洛夫叫他准备去莫斯科的指示后，他回到了巴黎。7 月中他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

“我现在已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

叫我来见你。虽然我来这里后已立即报‘上’（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编者）一切必要的情况，以便能得到我这趟旅行所需要的一切，但我仍然在等待入境签证。我们家中（指南斯拉夫共产党——编者）的情况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求你尽力使我的入境签证能够发出。

为了我们家庭，目前我有必要留在那边斗争现场，因为有一系非常重要的措施亟待贯彻执行，这些措施不仅与国内一般政治局势有关，也与我们家庭目前的局势有关。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斗争现场工作，工作范围涉及一切较为重要¹⁵⁴的活动领域。但我不得不按你的要求突然离开，因而不能完全实现最重要的目标。”

接着他列举了他做过的工作，包括建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处理紧急工作。”他在信中继续写道：

“季米特洛夫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在严重的动荡中成功地保护了党，而且还获得了良好成果。我们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斗争现场有忠于党和共产国际的健康成份。但让目前局势继续下去是危险的。”

接下来他谴责了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阴谋，说他已撤去他们的党内职务。他接着说，马里奇一直在南斯拉夫夸口，说他得到共产国际信任；铁托怀疑是某些共产国际官员唆使他这样干，他们曾背着他与马里奇举行过一次会议。铁托很生气：

“既然当时我还在这里，他为什么不请我参加他们的讨论呢？如果局面确是无可挽救，至少不应造成混乱……”

季米特洛夫同志，你愿意亲自设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如果并不需要我到你那里去与你见面，你愿意允许我回国，以便我能尽可能多地发挥一些作用吗？如果对我不信任，那就必须任命另一个人，并给予他道义上的支持。但决不能任命流亡国外的腐败集团中的任何人。我感到我对国内的党负有巨大的责任，我再不能象现在这样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呆下去了。就这点来说，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并须将国内的领导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致以同志的敬礼。

瓦尔特。”〔注28〕

1938年8月底前不久，铁托终于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他乘飞机经斯德哥尔摩前往，于24日到达。他发现那里充满着恐怖的紧张气氛；在前几个月的恐怖中暂得倖免的人们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很快就会轮到自已，晚上睡觉时总是把一包衣服放在身边，准备内务人民委员会清晨三点前来敲155 门。卢克斯旅馆的住客已大量被害。共产国际被斥为“间谍窝”，在波兰部和匈牙利部这两个部里一共只剩下一个人，其余的人全都被捕了。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已经解散，列宁主义学校已部份关闭，共产国际机关已在1937年11月从马合大街迁到郊外列宁山的一座建筑物里。〔注29〕铁托得到的指示是到外文出版社帮助另外两个南斯拉夫人——乔皮奇和约瓦诺维奇（扬科维奇），他俩已开始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译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尽管在搞清洗，一些行政规定依然有效，因此他的工作得到优厚的报酬，而他就把钱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铁托必然也是心怀畏惧的。但他到莫斯科来，就是来为自己的地位，以及自己的生命战斗。他不打算轻易认输。他感到对自己的忠诚问心无愧，他又对自己的工作怀着一种炽烈的天职感。

他已把他的整个生命奉献出来，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他可以把它牺牲掉。他的态度是理想、勇气和敏锐的常理判断力的综合。他过着宁静、谦退的生活，“白天黑夜地”搞翻译，同时准备为自己进行强有力的剖白。他也曾被叫去讯问已被逮捕的一些南斯拉夫人的情况，要他把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些人的情况写下来。据他自述，他说他做不到，因为除霍尔瓦丁外，他对共产国际的任何人都所知极少。他说他客观地写下了霍尔瓦丁的情况，说他在理论上很有修养，聪明，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出身；又说他有某些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很得众望。第二天问他，霍尔瓦丁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他回答说，不知道。他说，自那以后，他总是十分小心，说自己对其他南斯拉夫人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没有和他们一起工作过。我们不知道是否曾问过他有关高尔吉奇的情况，但无论如何，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这之前就已被处决了。〔注30〕

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有一百多个南斯拉夫人被捕，其中许多是在1938年11月。有些人受到长期监禁，但有六十个或者更多¹⁵⁶一些的人被杀害了，其中许多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这些人中除了卡米罗·霍尔瓦丁和高尔吉奇外，还有菲力普·腓力波维奇、格尔加·武若维奇、沃亚·武若维奇和拉多米尔·武若维奇兄弟、科斯塔·诺瓦科维奇、维列姆·霍瓦特、阿吉夫·塞列梅特、斯捷潘·茨维吉奇和德尤卡·兹维吉奇兄弟以及卡洛·赫多梅尔。弗拉吉米尔·乔皮奇、安顿·马沃拉克和姆拉顿·乔尼奇也被消灭了。这些人差不多全是曾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共产党员，而几乎没有象铁托这样新到共产国际的人。这段恐怖历史中与南斯拉夫有关的全部事实可能永远不会真相大白了，因为大多数目击者已经死去，而那些现在还能谈谈的人又只了解整个情况的只鳞片爪。现在我们知道，除了1937年至1938年被捕的人外，

还有另一些人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回到莫斯科时遭到同样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少数人被释放出来参加红军作战，还有一些人象现在还活着的高尔吉奇的妻子贝蒂·格兰那样，熬过了狱中的漫长岁月，最后得到释放，回去过着默默无闻的老百姓生活。德热拉斯（他本人没有这次清洗的亲身经历）曾在他写的东西中说保加利亚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季米特洛夫保护。但我们现在知道季米特洛夫还有若干次出面帮助南斯拉夫人，铁托本人就曾多次对季米特洛夫在这一危险时期给他的帮助表示感激。^[注31]

这一时期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中只有很少的人活下来，铁托是其中之一。他何以能和怎么样活下来的，是一个推测起来没完没了的问题。他的敌人认为他是靠出卖朋友和同事才救了自己，又说他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根据，也与我们所了解的铁托的整个人品不符，况且如果俄国人存心除掉他，他干这些事也救不了自己的命。共产国际一贯的做法是要求成员们互相告发，我们同样可以肯定，也有不少人告发过铁托。但这次清洗的性质是，斯大林要消灭的是那些工作多年的人。另一些同铁托一样在清洗刚开始时到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以及那些在¹⁵⁷南斯拉夫工作的人，都没有受到多大影响。铁托这次得以幸免还有某些幸运和偶然性的因素。他幸运在他是参加共产国际工作不久的人，幸运在高尔吉奇存心让他在南斯拉夫国内危险的斗争现场工作；还幸运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他参加领导之前已经到达危急关头，因此，1935年前党内出现的问题就不能由他承担责任。他俄语、德语都很好，这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也许最幸运的是，他崭露头角之时，正值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这就使共产党能在南斯拉夫得到更多人的拥护，从而有助于他在党的组织工作中取得良好成绩。

与此同时，铁托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对他的幸免也起了重要作

用。他沉着、坚毅；在莫斯科期间总是小心翼翼，做到老实听话，努力工作。他没有加入任何特殊的派系，也没有与俄国人交朋友，不过他却尽最大努力去赢得象季米特洛夫和威廉·皮克这样的关键人物的嘉许。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决不在“装有窃听器”的地方谈论政治。一次他的儿子扎尔科冲进他在卢克斯旅馆的房间，告诉他有关逮人的最新消息，铁托只好把他领到公园去，告诉他千万不能多嘴。

铁托本人认为，他在那次清洗中能幸免于难，他自己的努力比幸运的因素更为重要。确实，1937年他不去莫斯科的决定是他自己做出的，而在那时，无论是他自己的本领还是季米特洛夫和皮克的保护都可能救不了他。多年后，他回顾这些往事时说道：“这是我自己的功劳。我看清了一切是怎么回事，小心只过问南斯拉夫事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我抓进去的把柄。这的确不是侥幸。”〔注32〕

第八章

158

党的总书记

直到1939年初铁托才被正式任命为南共总书记，较之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晚一年多。^{〔注1〕}甚至在1938年夏铁托到达莫斯科之后，控制共产国际的俄国人究竟是打算批准铁托的领导地位，还是打算彻底解散南共，仍不清楚。既然是季米特洛夫把铁托召来莫斯科，可以认为他希望铁托就任总书记职务；但他还得劝说马努伊尔斯基和另外一些俄国人相信，这一任命符合他们的利益，而这就需要时间。甚至在铁托受任之后，马努伊尔斯基仍然说南斯拉夫党已被内奸和间谍搞垮。1945年季米特洛夫对密洛凡·德热拉斯说：“你知道，当指派南斯拉夫党书记问题提出来时，人们很有几分犹豫不决；可是我赞成瓦尔特，他是个工人，我觉得他既稳健又严肃。值得很高兴的是我那时没有看错。”^{〔注2〕}铁托回忆说：“至于马努伊尔斯基，他有时站在我们一边，有时站在另一边。起初他支持另一边，但最后他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得到他的支持。”^{〔注3〕}

铁托也还记得当清洗尚未完全结束时，外国共产党人如何怕同南斯拉夫人打交道。有一天，铁托和刚从西班牙回来的新任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国际科书记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在卢克斯旅社餐厅吃饭，弗拉霍维奇指出，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同桌。铁托满怀信心地说：“没关系，总有一天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注4〕}这的确是豪言壮语，因为那时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

人仍然正遭搜捕。甚至当时正和铁托一起翻译斯大林的《党史》的两位同事不久也告失踪，虽然他们总该可以算得上是不致遭到拘捕的人了。乔皮奇曾经是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委员。〔注5〕

俄国人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要不要让南斯拉夫党存在下去。如¹⁵⁹果他们想让南共重新活动起来，剩下的南斯拉夫人中除铁托外，已别无其他合适的、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选。他已证明自己忠诚、坚韧、勤勉，尤其重要的是他乐于听从命令，接受党的现行方针。另外，他是工人而不是受人鄙夷的知识分子了。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是他保全了党，尽管这时的南共几乎完全为共产国际所忽略。不过，如果俄国人当时认为解散南斯拉夫党符合自己的利益，这一切也就都会弃置不顾了。但在1938年底，俄国人必定已经看出欧洲战争在所难免，他们能在南斯拉夫有一个服服贴贴的领导人指挥下的活跃的共产党，可能比完全没有这个党多少要好些。

铁托到莫斯科已近两个月，虽然曾和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起与马努伊尔斯基会晤过一次，却仍未受到季米特洛夫的接见。1938年10月17日，他又写信迫切促请“就我们的问题”作出决定。他请求准许返回南斯拉夫，负责当地预定于12月初举行的大选中的党的工作。他询问是否可以会见季米特洛夫，并写道：“我长期以来确信，我这次会见你不仅对于我个人，而且对于我们党的发展都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注6〕三天以后，季米特洛夫接见了铁托。上次会见时，季米特洛夫曾对他说：“告诉我，瓦尔特，你们在南斯拉夫有党的组织吗？”这一次由于1937年和1938年他所做的那么多工作，他可以详尽而乐观地汇报关于他以南斯拉夫本国的财力，在没有共产国际援助的条件下亲自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的情况了。这次谈话没有留下完整的记录，虽然后来铁托曾几次讲起这次谈话的要点。很明显，季米特洛夫的典型的共产国际的方式就南斯拉夫党过去的不端行为，把铁托申斥了一顿，威胁说除

非铁托能取得国际所要求的成果，否则南斯拉夫共产党便可能被解散，正象在波兰已经发生过的那样。但他最后确认俄国当局已同意任命铁托为总书记。“我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并且说：‘我们将洗掉污点’”〔注7〕铁托回忆道，并在另一场合补充说：“我没有接管党的领导权的野心，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的确希望党的领导是强大的、坚定的、革命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成为领袖，但是我确实希望领袖是一个能够工作的人。我觉得重要的是集体应该坚强，领导应该坚强；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集体。”〔注8〕这大概是打折扣的说法，因为铁托肯定曾大力争取领导权。

铁托已被委任为党的领导人，但仍必须由共产国际认可这一委任，他才能离开莫斯科。正式的批准大概是在1939年1月5日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在这之前，铁托不得不对付彼特科·米莱蒂奇暗中破坏他的地位的最后尝试，此人自高尔吉奇在1937年消失后就与铁托争夺党的领导地位。将近1938年底，米莱蒂奇在南斯拉夫狱中服刑期满，到科斯梅特的家乡小住，随后便不见踪影。他在共产国际的保加利亚人员中有朋友，包括卡尔·卢卡诺夫、斯特拉·布拉哥耶娃和势力雄厚的巴尔干书记处人事科书记达米扬诺夫等人。铁托不知道米莱蒂奇已途经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抵达莫斯科，并在共产国际弄到一份工作。有一天，他在莫斯科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个面熟的人，后来认出是米莱蒂奇。竟无人告知他关于米莱蒂奇到达的消息，铁托感到不安和恼火；他去见达米扬诺夫，而达米扬诺夫宣称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是铁托意识到米莱蒂奇已决计尽力毁掉他。他得知米莱蒂奇已递交一份报告，指控他奉行托洛茨基主义；而正是这类指控使许许多多别的南斯拉夫人送了命。

铁托被传唤到负责清洗外国共产党人的机构共产国际调查委员会。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把托洛茨基思想塞进《党史》翻译的控告，

而铁托称之为是“荒谬绝伦的”。此外，还说他是南斯拉夫的德国少数民族成员，与德国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他从未详细叙述过¹⁶¹这次对他审查的情况，但说他终于证明这些指控纯属捏造，说他在此事中得到共产国际管制委员会主席德国共产党人弗洛林的帮助。常有人谈起，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会搜捕铁托，季米特洛夫曾把他藏在自己的寓所里，很可能这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铁托一经宣布无罪，显然也就赢得了反对米莱蒂奇的斗争，米莱蒂奇离开了莫斯科。他的朋友们帮助他逃往克里米亚的一处度假者之家，此后便告消失。人们猜测他已被监禁或处决。但无人确知他的最终命运，虽然谣传1945年有人在莫斯科见到他，并说他后来与共产党情报局在1948年搞的极为猛烈的推翻铁托的运动有关系。与米莱蒂奇的斗争是一场殊死的权力之争，其间铁托始终面临杀身之祸。无怪三十年后他谈及此事，仍然流露出他当年的怨恨。〔注9〕

铁托终于在1939年3月初离开莫斯科。他持用一张瑞典护照，化名约翰·亚历山大·卡尔松，1897年12月23日生于斯德哥尔摩。他取道海路从列宁格勒到勒阿弗尔，然后乘火车经瑞士到南斯拉夫。他在威尼斯偷偷溜下火车，上了一艘轮船，驶往里耶卡附近的小港苏沙克，他认为这地方警察控制得不及意南边界那么严格。〔注10〕这已是1939年3月末，欧洲的局势正在径直走向战争。3月15日纳粹开进布拉格；次日，捷克斯洛伐克并入第三帝国。3月28日佛朗哥攻占马德里，西班牙内战实际上已告结束。4月7日墨索里尼的军队侵入阿尔巴尼亚。环绕南斯拉夫的包围圈已在收拢，铁托知道，要赶在战争爆发之前建立起一个有战斗力的党组织，时间已所余无几。他也知道他非常可能奉召前往莫斯科，一是为了汇报工作；二是因为他尚未完成那项枯燥的任务，使他的《党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译本出版问世，而俄国

人对它是如此象征性地重视。在铁托临时代理南共总书记期间，¹⁶² 党员人数已从 1937 年秋的一千五百人增为 1939 年 5 月的三千人，足足增加一倍。在其后三年中党员人数再次激增：到 1940 年总数为六千四百五十五人，到了 1941 年春德国人终于入侵南斯拉夫时，党员已达八千。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共青联盟）的成员数也有类似的增长：1935 年为二千至三千，1938 年增至九千，到 1939 年 9 月则为一万七千八百人（包括积极的支持者在内）。〔注 11〕显然这是根据各地区党的书记提交的报告得出来的约略数字。这些数字可能过于乐观，但却既没有理由怀疑数字所显示的成员增加的趋势，也没有理由怀疑数字反映了铁托的强而有力的、著有成效的领导。这些数字也反映了以日益恶化的政治状况为背景，在由于预感战争而变得紧张的气氛中推行的人民阵线政策，大大促进了吸收新成员的工作。虽然共产党组织的模式是共产国际为所有共产党统一制定的，但在南斯拉夫贯彻执行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协作精神却取决于铁托本人。政策由俄国制定，原则由俄国下达，但是对它的解释和实施方式则由党的政治局决定，而政治局的全部成员都是南斯拉夫人。无论铁托在南斯拉夫还是在莫斯科，他都最后说了算。出于形势需要，他不得不把许多工作委派给别人去做，但他自己设法对所发生的一切保持消息灵通，把控制权掌握在他选择的一个班子手里。

南斯拉夫共产党早年的全部重要领导成员，在莫斯科的清洗中无不或被消灭，或被搞臭，这一事实无疑大大地加强了铁托的领导地位。铁托选择的领导人都很年轻，除卡德尔和铁托本人外，几乎都不曾在莫斯科受训。一些莫斯科培养出来的干部，包括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在内，此时都担任较低的职务，只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才又再度担任要职。这一政策是有意集中使用青
¹⁶³ 年，因为他们与昔日的派系斗争没有瓜葛，没有由于在大清洗中

失去同事和朋友而心怀惊恐；他们生气勃勃，与当代的政治斗争血肉相连。这一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铁托于1937年至1940年通过亲自选择而集合在他周围的这些青年，在战争时期成为游击队中的军官阶层，而且，虽然损失惨重，后来又为共产党政府的最高级领导层提供了人选。他们大部份是由铁托选定和审查的，每个人他都认识。其中一些成了他的朋友。几乎他们之中所有的人都对铁托怀有一种神秘的依恋之情，持续多年。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共产党仍为非法组织，在当时紧张的环境以及秘密团体中，形成极其浓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铁托的为人富于魅力，他有领导才能，以及善于赢得人们，特别是比他年轻的人的忠诚和爱戴。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唯当人们同患难生死时才能激发出的男子之间的友情的成份。这里还有男人占有特殊地位，掌握特殊权力的父权制社会的成份。铁托就是在这种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而担任新领导的那些南部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波斯尼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的民族传统很容易地便转化成为铁托为自己的党建立的那种极权主义的，然而在某些方面又是民主的制度。英雄的领袖这一概念在南部斯拉夫人中由来已久。这有助于解释何以铁托在他的追随者心目中几乎完全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他的许多亲密伙伴都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惨重伤亡而成为孤儿的年轻人，这难道纯属巧合？一些亲近的追随者都称他为“斯塔里”^①，他既是父亲般的人物，又是村中长老、保护人和传奇般的英雄；把亲昵、超然和权威结合为一以体现这一角色，他已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

^① 斯塔里，原文为 Stari，“老年人”、“年长者”之意，为南游击队及党内对铁托的尊称，相当于中文里的“某老”之意。——译者

他这时期的同事们强词说，虽然铁托独裁专断，但他总是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意见，尽力和他们共同作出决定。

164 青年被审慎地吸收参加革命，但是起初并不强迫他们入党。使人觉得入党并非易事，而常常是对那些历经考验的人的酬答。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的情况可以作为例证：他为党工作了一年多，这才成为党员。他担任过交通员，把文件夹在乐谱里由巴黎带回，还到索非亚去领取共产国际的文件。他经常安排外地的共产党人在他的贝尔格莱德的家中留宿。铁托第一次住在他家，睡在他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时，他们曾两度一般性地谈到共产主义的概念。一次谈话是在深夜，铁托醒着躺在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另一次是在托普契德公园特地安排的一次会见中。铁托并没有劝他入党，戴迪耶尔这时在党外和在党内一样有用。1939年战争爆发后他曾在狱中度过一天，全靠他的岳父是一位前王室大臣，他才被释放，在这之后才吸收他加入党组织。德热拉斯在邀他入党时说：“我们考验了你，你配得上这个荣誉。”〔注12〕入党后，戴迪耶尔先被派到一个制鞋工人的基层组织，让他多少体验一点工人阶级的经历；一个月后再把他调到一个律师的基层组织。

那些年代中铁托曾与之亲密合作，极为喜爱，并在党的工作中几乎视之为副手的另一位青年，是很有天才、朝气蓬勃的伊沃·洛拉·李巴尔。他从1937年就担任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书记。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极为聪明的李巴尔是萨格勒布的一个富家子弟。他的父亲李巴尔博士曾是1921年维多夫丹宪法通过时的新南斯拉夫国家国民议会议长。他因为极为钟爱两个儿子（兄弟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在战争时期牺牲），李巴尔博士在三十年代便已越来越同情他们的政治观点，多方帮助他们从事共产党的活动。战争期间他本人也终于和共产党人打成一片，成为铁托的

第一届战时议会的议长。^①

洛拉·李巴尔在战前的南斯拉夫处于上等阶层（那时已无贵族），这便意味着与实业界、政府、司法界和高级警察中的权势人物¹⁶⁵有关系，因此不但他本人，有时连他的伙伴也都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他有一次被捕，他父亲向一个朋友茨维特科维奇首相发牢骚，首相就立刻下令释放了他。^{〔注13〕}传说人们有一次曾看见洛拉·李巴尔乘坐由身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的自用“凯迪拉克”牌汽车，来到了共产党所组织的街头示威游行的地点。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他的单身公寓住所在内）都交给铁托自由支配，用于化妆、躲藏、旅行和一个非法分子生活所需要的其他各项复杂的安排。他还帮助寻找不致引起警察怀疑的房子，供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之用。

李巴尔兄弟同那些和他家庭出身相同的学生们交游往来，帮助吸收了许多有用的受过教育的青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这些年轻人毫不争辩地接受了党的贬抑他们资产阶级出身的方针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非难。一位中央委员曾告诉戴迪耶尔：“你们的本份就是每日每时地表明你们对工人阶级的忠诚。”^{〔注14〕}因为属于人数极少的特权阶级而负疚的心理激动着他们加倍努力。李巴尔和铁托一样善于联系各阶层的青年以及外国学生，包括一些英国学生，他在英国有些好朋友。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能够在学生的集会上鼓动他们支持各式各样的示威——反对政府政策或争取改善学生条件和增加助学金的示威等。

洛拉·李巴尔组织得极好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是一个半自治的组织，但这是斯大林式的自治，也就是说它接受莫斯科控制的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和南共政治局的政策和指示，但它又有自己的

① 指1942年成立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译者

工作人员、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等一整套机构，以通过这些政策和指示并研究实施的策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不同于共产党，自1937年以后铁托已使共产党大部份自给，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部份（但绝不是全部）经费还是依赖莫斯科的国际青年组织供给，它和国际青年组织另有直接联系的渠道。但既有洛拉·李巴尔负责掌握，共青联盟作为南共助手的地位便从来无可怀疑了。

1937年5月铁托在亲自给党的官方报纸《无产者》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为共青联盟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文章详细地阐述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青年国际所颁布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尽力从各界青年（工人以及农民和知识分子）中争取支持的那套人民阵线的主张。铁托写道，共青联盟的新任务是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战，为“面包、和平和自由以及较为安全与快乐的生活”而战。现在看来，这些提法未免陈旧，但在当年却并非如此。南斯拉夫大学和技术学校里的许多工农学生非常贫苦，甚至无钱住校和听课；注册后他们就带着几本书回家，直到参加考试时（如果是共产党员的话，那就是参加游行示威时）才回学校。答应给予更多面包对他们有现实的意义。而当时纳粹分子正在中欧大肆扩张，和平、自由与较为安定便也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铁托说共青联盟必须包括一切青年——农民、学生、青年工人和城镇居民。它必须深入基层，了解年轻人的真正需要和生活方式；它必须提供更多的文化活动以及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亦即当铁托自己还是个刚离开乡村的青年时觉得最有用处的那些东西。〔注15〕

共青联盟的新成员为党组织的种种辅助工作提供了大量自愿人员。他们在街头和校内搞示威游行。人民战线政策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共青联盟设法赢得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许多学生组织和俱乐部的合作。这地方比较容易组织政治活动，因为大学具有

自治地位，可以举行集会，铅印和油印传单，而不受警方干涉。一个帮助在塞尔维亚组织共青联盟的共产党领导人伏克曼诺维奇¹⁶⁷（泰波）说：“在这所大学的院墙里，我们几乎可以丝毫不受打扰地进行革命活动。”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学生和其他的人可以比较自由地举行示威游行。如警察因为追赶学生进入大学区，他们就侵犯了学校的自由。一些大学教授支持学生反对警察。〔注16〕共青联盟成员还充当南斯拉夫国内和国际的交通员；他们散发报纸和传单。他们之中有大批人被捕许多人遭警察毒打，一些人甚至牺牲。女学生在执行许多这类任务时特别有用；她们不是征兵的目标，比较容易乔装，较不容易被抓住。

共青联盟中女成员的比例，较党内要高。在这个男尊女卑的观念不仅在男性中，而且在女性中也同样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努力吸收妇女参加党的活动。他们出版了各种杂志（《妇女世界》、《今日》、《妇女》），极力宣传男女平权的思想，而许多共产党人对此既不相信也不实行。迟至1940年，铁托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还谈到这方面的错误。他严肃地说：甚至还有党员的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妻子乃至殴打她们，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一些人仍一再弃妻再娶。某些女同志以小资产阶级态度对待男人。所有这些大大地损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的威信，也大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

不妨以戴迪耶尔的一位朋友为例，也可以说明铁托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他是共产党员，曾坐牢三年，出狱后，因搞两性关系本领高强而被称为“色鬼”或“花花公子”。“我属于信仰自由恋爱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他边说边在桌腿上刻上一个记号，表示他最近又搞到手一个女人。“我知道，当前党的方针是不同了——清教主义，革命的清教主义。我看我还得遵奉维多利亚^①时代的习

^①维多利亚（1819——1901年），英国女王。——译者

俗，把我的桌腿都刻满。”〔注17〕

168 尽管有这样的堕落现象，南斯拉夫共产党对妇女来说，如同对青年一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年长的男人不但掌握了一切权力并且被认为也垄断了全部智慧的当时社会，无论妇女或者青年都没有自由，得不到重视。青年必须等到上了年纪；妇女必须柔顺、服从——甘心恪守妇道。青年和妇女都没有选举权。其他的政党都未能利用青年和妇女，虽然克罗地亚农民党、克罗地亚的“弗兰科夫齐”党和斯洛文尼亚教权派中都有青年组织。因此共产党内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就为步入现代世界、挣脱一个近乎停滞的社会的种种束缚提供了一条出路。共产党利用这种情绪，而被吸收的妇女和青年在战争时期更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铁托本人对妇女的态度，似乎溶合了正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在共产党人中间和他所处的社会中盛行的某些态度。如同他的演说所表明的那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理论上妇女和男子享有同等权利，但是，最高领导层中却一个妇女也没有，尽管有少数妇女得以跻身次一等的要职。在个人生活方面，铁托对妇女颇具吸引力，也喜欢和妇女相处；他一生曾有几位亲密的女友。但他从不允许私人关系干扰他的工作；他总是把私生活从属于对党的职责，他也不希望她们与自己生涯中的种种冒险活动有所牵连。

※ ※ ※

铁托是第一位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财政上独立的总书记，并以此而自豪。这消除了形成南共与共产国际以及工作人员之间的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削弱了共产国际对南斯拉夫党的控制。为了代替原来从莫斯科得到的收入，必须向党员收取党费，向旅居国外（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南共党员募款和取得国内富

裕的党员、同情者的捐助和服务。党员人数增加，党的收入也随之增加。〔注18〕党员交费金额根据收入而定。有的党员可以交纳¹⁶⁹五十第纳尔；有的付不起这么多，可以只交十个，但鼓励他们去另找四个能给十个第纳尔的党员，也算在他们名下。〔注19〕尽管这样做，在铁托掌管财务的最初几年里党还经受了严重的财政拮据。1934年高尔吉奇任总书记时，南共每月从莫斯科接受价值四百金卢布的南币或外币，另外，给青年组织每月二百金卢布。应共产国际要求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则额外另给报酬。虽然四百卢布按当时汇兑率为数可观，但却得支付种种开销——要租赁和经营一个庞大而繁忙的办事处，要付邮费、电话费，还要雇用交通员和其他职员。还有旅费和职员的个人生活费用。高尔吉奇的办事机构还得养活许多来访者和若干家属。理论上，他的预算不包括（然而实际上有时就包括）在南斯拉夫的政治犯家属的生活费，他们由一个称为“红色援助会”的莫斯科特殊机构照应。高尔吉奇的预算在维也纳的另一项支出是印刷宣传材料，这是些在共产国际的办公室里撰写的，而在南斯拉夫经常毫无用处的东西。印刷的成本几乎完全无法收回，尽管到1939年为止曾向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党员出售若干而得到一些钱。事实上高尔吉奇的进项既总是不敷支出，也不经常按时得到，这就使他常受拮据。

党的专职工作人员通常的工资标准并不高，虽然有些人可能从旅费中捞到一笔外快。以1929年为例，包括房租和生活费在内的月薪为五百第纳尔；交通员的薪金为一百第纳尔。肩负特殊任务的同志每月可得一千三百至一千八百第纳尔，与当时中小学教师工资相仿。〔注20〕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币值变化，薪金也就增高，月薪津贴一般增到六百第纳尔。1934年铁托为党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受权出价就是这个数目。但1937年莫斯科停发津贴之后，¹⁷⁰南斯拉夫党的工作者的月薪又降低为三百第纳尔，仅敷最低的生

活费用。〔注21〕

铁托就任总书记时便已告诉季米特洛夫，南斯拉夫党将自己筹措资金；但某些国际活动仍由共产国际出资支付。这包括专为共产国际承担的任务，如铁托往返莫斯科的旅行，共青联盟的某些活动，以及可能还有某些出版物的印行。铁托在南斯拉夫时，生活费用不由共产国际支付，虽然为了装扮成一个富有的工程师，他所必需的房屋、轿车、电话、钢琴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中的其他特别用项，必定糜费不堪。许多昂贵的开支项目——飞机票、自用汽车司机和高价服装等则是通过广大的党内关系网以低价搞到的。铁托在这段时期，乃至整个一生都享受着这种奢华的生活。人们，包括他的党员在内都有这种看法，但这既为一个积极从事秘密活动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巧妙的掩护和满意的休息，便也就成为正当的了。如果他的共产党员的良心因为这个短期的资产阶级生活而负疚（没有证据表明曾有这种情况），则还有他生活的另一面应予考虑：他得多次在秘密藏身的小屋里和较穷苦的同志一起过夜，还得多次长期在莫斯科执行危险而又屈辱的任务，虽然即使在那里他的薪给也相当高并能享受到与他身份相称的各种特权，但那时的生活条件却更为艰难。

※ ※ ※

战争的逼近造成了失望恐慌的气氛，这就使铁托和他的同事们为共产国际制定的人民阵线政策而进行的工作容易了许多。共产党既仍属非法，它就无法与那些合法的党派公开联合以反对保罗亲王政府；但是共产党人主动与许多政界领导人谈判协商，设法达成某种实际上的联合。这些安排都不太成功，因为塞尔维亚、¹⁷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对党都是以地区为基础组织的，它们

根本不急于获得共产党的支持。在 1938 年的大选中，没有一个政党愿意接受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因为他们相信（后来也证明确实如此）联合起来的反对党将能获得共产党人的选票。在塞尔维亚，人民阵线政策在争取那些主要政党以外的左翼人士的支持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功。早已对共产党的许多政策表示同情的李巴尔博士于 1938 年 3 月被开除出民主党，他组织了一个短命的亲共的民主党左派。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博士也组织了自己的党——人民农民党，它在一个时期内曾和共产党合作。但这些党派只不过为人民阵线提供了微薄的基础。

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主要的反对党也拒绝和人民阵线打交道，但是共产党员却成功地参加了各种文化教育组织和社交俱乐部。一旦参加进去，他们便都非常积极地活动，为共产党发展新成员。在克罗地亚他们控制了独立民主党，并宣称这个党全仗他们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他们还与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青年和学生组织紧密合作，并控制了该党的某些委员会。1928 年拉迪奇遇害后就任该党领袖的马切克在战争爆发前夕参加政府，这时他便处于足以对当时反战的共产党人实行残酷报复的地位。德国人即将接管南斯拉夫时，塞尔维亚和其他地区的政治犯全部获释出狱。马切克却拒绝释放克罗地亚狱中的共产党人。结果他们被交给德国人，大部份均遭杀害。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靠着父亲的势力才侥幸得以出狱。他曾率领一个代表团到马切克处恳求释放共产党人，但没有成功。这些共产党人终于被害，而马切克当时竟拒不援救；德国人失败后他不得不逃往国外以求活命，原因虽然很多，但这也是其中之一。

172

铁托还加强了党在那些非共产党的工会中的工作，使工人阶级对党的支持（这是党所渴望的）大有增加。与早些时期一样，工会活动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以及在斯洛文尼亚的某些工会

中最为成功。但直到1940年，在耶塞尼策和特尔博夫列两地的五千名钢铁工人和矿工中却只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铁托以前就感到在塞尔维亚工业中工会工作很难开展，如今也有类似的抵制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而直到1939年，塞尔维亚许多城镇里党的工作者仍然屈指可数。〔注22〕

迄战争爆发之时，南斯拉夫的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的耕种小片土地为生，大多数生活极端穷困，许多人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濒于饿死。但共产党人仍难以在农村中获得支持，而唯独门的内哥罗是个例外，那里有强烈的战斗的激进传统，而且，当地与沙皇俄国的旧有联系被保留下来，转而成为对苏联的支持。到1941年，共产党宣称自己在门的内哥罗四十万居民中享有一万二千人的支持，其中有一千八百名党员，三千名共青联盟成员，其余则为同情者。但在其他地区，农民仍然因循守旧，猜疑不定，谨小慎微。

在全国许多地方仍有显著的区域独立倾向，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以后。这一倾向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等地的主要地区都是明显的。建成一个团结的、铁板一块的、全体一致的党这个任务甚至难倒了铁托。克罗地亚分裂主义者、马其顿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达尔马提亚的独立和拒不服从的倾向，都继续给他造成困难。党内一些作家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窒息创作的指示，反对诸如德热拉斯等更为狂热的领导人强加于人的斯大林式的统治。铁托的朋友克尔莱扎，一个为写作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斥责德热拉斯和其他两个狂热的同伙为“三台压榨机”，并拒绝接受有关他应该写什么和如何写的命令。

173 但是，大体上铁托可以如实地宣称，他已出色地完成了共产国际相当勉强地授与他的任务。人民阵线政策已改变了南斯拉夫

共产党的国际性的基础，虽然这一点在当时还不那么明显，它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人和本国其他的政治团体自由联系，允许他们就有关本民族自身利益的问题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正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号召促进了党的发展，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削弱了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控制。

第九章

174

备 战

铁托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重新活跃起来的工作，是以最终导致战争的德国领土扩张为背景进行的。希特勒于 1936 年 3 月开进来因兰，一年后又吞并了奥地利；对南斯拉夫来说，与对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危险已迫在眉睫。在此之前，南斯拉夫政界人士还有可能接受亚历山大国王直到 1934 年死去时所奉行的政策，这就是，意大利既有领土要求，便是南斯拉夫的主要敌人。而在亚得里亚海和东欧没有直接利益的德国，则被认为是潜在的盟国。但在 1938 年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对纳粹扩张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威胁置若罔闻已不可能。1939 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地位已变得岌岌可危。南斯拉夫的首脑们面对一桩无法完成的任务，即找到一项政策，既能保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又能避开德国想变南斯拉夫为某种形式的傀儡国的仍未明确的意向。

1935 年，在德国的危险尚不明确之前，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亲王任命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为首相。人所共知，斯托亚季诺维奇甚至此时仍支持先前的理论，认为作为敌人，德国不如意大利危险。外交大臣博戈留布·叶弗季奇告诉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说：“如果要在德国和意大利之中选择其一的话，我们将选择哪一个是无问题的。德国人承认南斯拉夫，还愿意同我们合作。”〔注 1〕

斯托亚季诺维奇选择德国为盟国有其个人动机，他希望仗着

德国的保护在南斯拉夫获得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地位。他不惜一切地巴结德国人，为来访的纳粹分子和德国外交使团安排奢华的宴会。奥地利外交官冯·维默尔曾目击这样一次游猎会，斯托亚季诺维奇为此备办了雪撬，五光十色的陈设，吹吹打打的乐队，银制的餐具和亚麻餐巾，全部印有腓特烈大公爵的纹章。那天，游猎归来，号角声把客人召至巨大的帐篷和一只摆满各色美酒佳肴的宴会桌。斯托亚季诺维奇喝足了本地特产梅子白兰地，兴高采烈，开始和德国公使夫人跳起科洛舞。越跳越起劲，他也越来越兴奋，竟跳上了堆满食物的桌子。哗啦一声桌子塌掉了，宴会帐篷里满地酒、茶、火腿、香肠、乳酪和糖渍水果，斯托亚季诺维奇和冯·黑伦夫人便在其中滚作一团。“我不知道别人看法如何，”冯·维默尔在结束报道时写道：“一名老仆人蹑手蹑脚地向我走来，吻了我的手。”〔注2〕

德国回报他的款待则较有礼节。当斯托亚季诺维奇于1938年2月访问柏林时，希特勒安排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检阅，声称他的政策是南斯拉夫应该强大而独立。但他既未提供任何真正的保护以对付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领土要求，也未阐明德国自己的意图。12月，南斯拉夫举行大选，尽管恫吓和贿赂双管齐下，大量的反对票仍表明亲德政策不得人心；此后，斯托亚季诺维奇为德拉吉萨·茨维特科维奇所代替，并因犯有图谋自立为亲德的南斯拉夫“元首”的嫌疑于1940年5月被捕。1939年9月1日德国和西方同盟国的战争爆发，此时，南斯拉夫在德国战争部署中作用究竟如何尚不清楚。决定它的命运，还要再挨过极度痛苦的十八个月。

1939年夏季以前，南共对国际形势发展的总的态度，是由共产国际1934年规定，是根据苏联对威胁它的继续生存的危险的估计决定的。这项政策铁托很熟悉，就是宣传苏联是唯一拥护和平

的国家。铁托后来说：“它是我们的主要活动，占用了我们大部份经费。”〔注3〕迄 1933 年之前，这样做还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俄国
176 毫不含糊地采取谴责纳粹和法西斯侵略的立场，而那正是南斯拉夫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刻。这样，共产党人就可以把支持俄国说成与南斯拉夫民族利益完全一致。

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问题所采取的新的温和态度，也有助于铁托使人民欢迎共产党的政策。即使在象南斯拉夫这样的不民主和政治上不稳定的国家里，共产国际也不让进行武装暴动。只要俄国全神贯注于应付希特勒为完成反共救世的使命而造成的危险，它就不能支援，也无暇顾及东欧的共产党暴动。这样，铁托就得以解除党根据共产国际 1929 年的命令而承担的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向共产党员和其他人表明：苏联友好和结盟正是义务和自身利益之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领导人日夜担忧德国可能与西欧国家结盟，或一旦战事发生，西方可能被打败，而后被胁迫参与反俄战争。慕尼黑协定使俄国领导人认定英国不会真正反对希特勒，甚至丘吉尔接替内维尔·张伯伦之后，他们仍对英国人的存心感到恐惧。对于他们，丘吉尔的名字总与阿尔汉格尔^①和 1918—1919 年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侵略俄国的凶恶事件联结在一起。俄国领导人也深深意识到本国内部的弱点。1939 年是俄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生产仍然呆滞。此前三年的清洗严重地削弱了红军，尚无时间训练新的军官来代替成千上万被清洗的人。苏联领导人还很可能同大多数西方政府一样，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的作战潜力和生产武器的速率。所有这些都属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德苏条约的复杂背景。

^① 今苏联的白海海滨一港口城市。1918—1920 年外国干涉军和俄国的白匪曾盘据于此。——译者

这是一项十年互不侵犯的条约，附带一项规定瓜分东欧的秘密议定书，允许苏联武装吞并波兰东部（于1939年秋付诸实施），¹⁷⁷并放手处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根据后来的一项修正案，还可以同样对待立陶宛。这导致了1939—1940年冬季苏联在芬兰进行的战争，以及上述土地包括罗马尼亚的另一部份即北布科维纳等并入苏联版图。这样，这一条约就使俄国重新获得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失掉的大部份土地，成了俄国国家扩张和战略防御的工具，这与彼得大帝时期以来所奉行的外交政策的宗旨完全一致。

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和纳粹头目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虽然那时一般不为外人所知。这一条约彻底颠倒了苏联先前的政策，彻底颠倒了自1934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奉命追随的反纳粹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路线。世界各地的、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对此大为震惊。铁托后来解释说：“考虑到这个条约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所必需，我们作为严守纪律的共产党人接受了它。这一条约默许苏联干涉别国的权利，特别是干涉一些小国权利的那些秘密条款当时我们一无所知。”〔注4〕

小国被并入苏联版图，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来说当时还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尚未面临他们所不得不接受的这一政策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长期后果。在南斯拉夫，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党员忍受一个观念，就是俄国已和资本主义侵略者，反共、反南斯拉夫的，种族主义的和野兽般的纳粹分子结盟。这个政策只能理解为旨在争取时间，尽可能推迟纳粹对俄国进攻的万不得已的措施。但是又不能公开地向南共党员这样讲；另外，人们总抱有一线希望，但愿它可以防止一场全面的毁灭性战争落到南斯拉夫头上。无论如何，共产党对关于战争的宣传是怀有矛盾心理的——苏联真心

不愿发生战争，因为他们当时肯定无法预见到最后胜利的结局。

178 另一方面，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来说，战争提供了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唯一机会，因此可能受到欢迎。但他们的对外政策又决定于俄国领导人，只要俄国要求，他们就必须接受俄国与纳粹的联合并为之百般分说。

※

※

※

1939年夏初，铁托接到季米特洛夫要他赴莫斯科的命令。负责旅俄安排的共产国际巴黎办事处于6月10日写信，要求铁托去俄国的入境签证有效日期到7月底。^{〔注5〕}季米特洛夫给铁托本人的指示写在小纸片上，藏在一本书背里，由交通员带给洛拉·李巴尔面交当时在贝尔格莱德的铁托。铁托到贝尔格莱德郊外的泽蒙戴迪耶尔家里去取这封秘密信件。到达时，戴迪耶尔的妻子和朋友正在家中，乔装成工程师巴比奇的铁托只得先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与客人们谈论音乐和文学之后才接到这本书。铁托在书房里当戴迪耶尔的面拆阅了这封信，告诉他这是季米特洛夫写的。这意味着他——铁托又要远行了。^{〔注6〕}他当晚在戴迪耶尔家里过夜，次日登程。近6月底时，他乘意大利船“弗朗切斯科·莫洛西尼”号离开斯普利特前往热那亚，从那里经陆路到巴黎。然后在勒阿弗尔搭乘一条苏联船到列宁格勒。同船旅行的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的南斯拉夫工作人员，他不认识铁托，竟向船长告发铁托是间谍，幸而船长肯于替铁托作保。8月23日宣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铁托已经抵达莫斯科了。^{〔注7〕}

他又作为共产国际的雇员在莫斯科呆了四个月。共产国际的办公处仍座落在莫斯科的列宁山地区，但不久后又迁往郊区普希金曾居住过的奥斯坦基诺村。他的大部份工作是在外文出版部，

终于完成了将斯大林的《党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付印的任务。俄国人通过他们的秘密渠道，可能是外交邮袋，把书发往¹⁷⁹南斯拉夫。铁托后来说，在莫斯科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难捱的时刻。他说：“甚至在战争时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者）也要比这好过些。因为你在战时至少知道敌人在哪里。”〔注8〕“我去莫斯科时，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我在那里时，也根本不知道几时会半夜惊醒过来听见要命的敲门声。”铁托担心的是俄国人可能决定让他呆在俄国，就象他们后来对季米特洛夫和其他东欧领导人那样。

他们为什么决定让铁托返回南斯拉夫，正象他如何得以逃脱斯大林的清洗一样，这个谜谁也不明白。到1939年底，铁托已经证明是一名忠顺的共产国际雇员，不过总是处在共产国际等级制度中被视为低微的地区等级。他执行了年初交给他的任务，包括从党内发挥作用的岗位上清除那些曾去过西班牙或巴黎，并被控告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他在南斯拉夫重建党组织的工作由一个名叫施韦尔马的捷克共产党人加以检查，此人向莫斯科汇报时，说了不少称赞的话。铁托也可能是故意造成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的工人阶级出身（根据共产党思想，这是大可嘉许的）实际上起了一种保护作用，因为作为一个潜在的领袖，这种出身使他不象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那样令人担心。既然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便也就成了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由其他唯命是从、严守纪律、才器平庸的工人来代替。很长时期以后，俄国人才认识了这一事实：他们的估计是大错而特错了。至于铁托这方面，显然是正确地判断了俄国人愿意使用何种人物作为他们指定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并自始至终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令人信服地扮演了这种角色。〔注9〕

1940年1月,当他终于获准回国时,染上了流感。人们知道,铁托一生很少病倒,这就是其中的一次。他仍然在敖德萨乘一艘苏联商船去伊斯坦布尔。这次他使用的是一个入了英国籍的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加拿大护照旅行,希望乘火车进入南斯拉夫。旅途中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是在他下苏联商船时,受到新闻记者的访问,要他谈谈对苏维埃俄国的印象。他拒绝回答问题,避开了他们的注意。在豪华的帕克旅馆要了一个房间住下。他在伊斯坦布尔的逗留比预计的长得多,因为他发现在战争期间由土耳其过境到南斯拉夫需要签证。他通知萨格勒布要求派交通员给他送来带有伪造签证的新护照。他利用等待的期间游览了城中名胜,可能就是他在伊斯坦布尔买了那只至今还戴着钻石戒指。这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兑换成货币,是战争时期一项有用的保险。但此后却一直没有遇到非变卖它不可的情况。

第一位来到的交通员是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他出身于萨格勒布的一个塞尔维亚望族,父亲是个陆军将军。他带来的假护照粗制滥造,铁托不满意。在他一生事业的这个阶段,他已从莫斯科活着逃了出来,还有那么多事情仍成败未卜,他决心不要在进入南斯拉夫时被人抓住。他对伪造证件具有专家般的丰富经验,可凭本能察觉危险,他谁也信不过。他知道无论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共产国际,在党内都有他的许多敌人,而且不能肯定这些人都已全部被消灭掉。他捎信给萨格勒布要求再弄一份伪造得较为巧妙的护照。一位斯洛文尼亚姑娘终于给他送来一份,但他也认为不能令人满意,不能使用。这时金钱和时间都已快耗尽,而且他发觉土耳其警察已经对他开始有所怀疑。他又回头拿起斯皮里敦·梅卡斯的护照,在那个学建筑的姑娘的帮助下伪造了一份从南斯拉夫过境的签证。铁托后来叙述说:“最后,当土耳其警察在我后边紧紧盯梢时,我就买了一张乘意大利船‘萨伏亚伯爵’号去

美国的船票，那时候这船停泊在那不勒斯。”他这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乘东方号快车穿过南斯拉夫到意大利。这段行程中的危险关头是在火车穿过南希边境处的杰夫杰利亚站时。边境警察拿起了他的护照，从上面看到他曾到过苏联，就开始盘问他在那里干些什么¹⁸¹。铁托回答说，他按合同在那里当工程师，现在正回家到加拿大去。因为他是英国人，警察就相信了这一番话，把护照还给了他。“真可惜他是个英国人，”铁托听见其中一个警察说，“要不然就可以把他抓起来。”两天后火车到达萨格勒布，铁托下了车，很快便消失了。这时已是1940年3月底。归国之行整整化了三个月。^{〔注10〕}

铁托外出期间，党尽全力把大部份地区的日常工作维持下来。现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在萨格勒布，组织上却极度混乱。这是因为党承担了一桩尴尬的宣传任务：把人民阵线年代的成功政策颠倒过来。这对大多数党员都是个痛苦的差使，因此造成的精神上的创痛之深，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至今不愿谈及此事。由莫斯科下达的党的路线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争斗；它威胁着苏联，而苏联是所有进步人士和中立国家必须在它背后集结起来的共产主义堡垒，是唯一足以保全和平的国家——至于它的和平意图，则已见诸于它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俄国是唯一能够保护巴尔干半岛各小国的国家。把苏联的政策说成既具有高度原则性而同时又是权宜之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党的宣传家们尽其所能把宣传这一论点的各种指示和传单散发了出去。

“希特勒对英法帝国主义者作战，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就应该对希特勒作战”，党所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说，“相反，它意味着英法帝国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和苏联的斗争中的先锋队。”它把俄国对芬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侵略说成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的胜利”。^{〔注11〕}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先前奉行

的和平政策，以及与苏联为保卫小国的和平与权利所作的巨大努力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苏联签订这项互不侵犯条约是为了使自己免遭战争贩子暗算，是为了把战争局限于欧洲，使小国避开战祸。¹⁸²（注 12）共产党的某些宣传员，热衷于为苏联找一个承担责任的替罪羊而忘乎所以，把话讲得更加过头。一张在劣质纸上打字的，显然是本地炮制的传单，谴责英国金融寡头为了保护他们统治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性霸权，正在诸如西特林、艾德礼等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从事战争。另一张传单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两样。英法想强迫德国屈膝，以便在世界范围内维持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说英国和法国正在为民主、为小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是纯属谎言和捏造。芬兰战争是由英帝国主义间谍挑起的，其目的是把苏联拖入战争并利用芬兰作为向俄国进攻的基地，正象他们二十年前干的那样。”（注 13）

铁托外出八个月归来时，发现党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因为德苏条约使大部份党员感到震惊，许多人未能根据新的宣传方针的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铁托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接受的。他在俄国的经历没有动摇他为南斯拉夫革命而奋斗的决心。而在这个时期，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仍属不可想象。苏联制定的政策既然无可改变，那就只得接受。他所面临的棘手任务是，既要谴责资本主义的西方盟国，而又不宽恕纳粹主义。南斯拉夫尚未直接卷入战争，但是他确信这在所难免，他打算利用这场战争作为革命的跳板。他集中力量作出切实安排以保证党组织在全国范围基础上有效地建立起来。他在萨格勒布党总部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走遍全国，与领导干部接触，多次在党的基层小组会上讲话。铁托十分谨慎，所有这些活动他都通过秘密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这座电台是在韦莱比¹⁸³特帮助下装配的，安装在萨格勒布的一幢房子里，由共产国际雇

员伊万·科皮尼奇（也叫瓦尔戴斯）操作。当贝尔格莱德的俄国情报机关招募了一些铁托自己的工作人员为他们工作时，他发了一顿牢骚，但也没有把这事闹大。自担任南斯拉夫党的书记以来，铁托第一次感到可以比较独立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进行工作了。

他决定在南斯拉夫直接卷入战争之前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党的会议。希特勒的军队接二连三蹂躏了许多国家，卷入战争显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上一次党代表大会（党的四大）于1928年11月在德累斯顿召开，正值铁托开始长期监狱生活之时。这是由共产国际组织的，年轻的高尔吉奇在会上受命成为新的书记。现在铁托有意让大家看看他比高尔吉奇干得好得多。他在夏季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出命令，让他们召开会议选举或指定代表参加地区会议，地区会议再为大会挑选派出代表。他亲自出席了大部份地方会议：一次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所私人住宅内；一次在波斯尼亚的主要城市萨拉热窝；一次在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郊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次是在门的内哥罗的扎勃利亚克山中，他乘飞机到达那里，然后由一辆私人司机驾驶的汽车把他从小小的机场送往开会地点。一次会议在萨格勒布的一间咖啡馆举行，还有一次则在多瑙河以北伏伊伏丁那一所座落在葡萄园里的别墅中召开。所有这些工作胜利完成后，他便着手为大会作出安排。

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40年10月17日至19日在萨格勒布郊外一幢小房子中召开。^[注14]这时，正值墨索里尼发动进攻希腊之前一周。承担大会各项准备工作的是一个工作组，包括铁托、克罗地亚党的书记拉德·昆查尔，另外两个党员和党的专用汽车司机布兰科·马莱希维奇。每件事都在绝对的秘密中进行。要供应一百零一名代表的食宿，而又必须不引起邻人和警方的怀疑。需要安排租赁一幢房子，打通两间构成一个大间，在它的头端上设置一座主席台，挂着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¹⁸⁴

得找党员工人赶制的轻便椅子，在伪装下运进这所房子。女党员负责操办伙食，但通知代表们自带面包，因为这所房子里无法烤面包。最为重要的是做好旅途安排。向全国各地代表发出指示，要他们三三两两前来萨格勒布，到达的时间要互相错开，以便大会组织人员可以到约定的地点（火车站、汽车站、工会大厦等处）去迎接，然后把他们带到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会场。代表们都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还是出了一些小差错。门的内哥罗代表不失民族特色，在接头人尚未证明自己身份之前差点儿朝他开枪；波斯尼亚代表到达火车站时无人前来迎接，他们担心在站前逗留过久引起怀疑，只能在树木丛生的城郊冻了一宿。代表们于10月17日和18日到达，都挤在这幢房子里。大会于10月19日星期六上午八时三十分至下午四时举行。

每位代表必须填写一张表格，说明自己的情况，包括党员登记表的号码和登记地点、年龄、党内职务，曾否因从事政治工作服徒刑，属于何种社会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还是其他成份等。党的工作人员仔细地分析了这些情况。一百零一名代表中，三十三人自报工人（共产党中的精华），十四人是农民，二十九人是知识分子，五人是雇员。代表平均年龄为三十三岁，平均党龄为九年。八十名代表曾分别在某段时间被警察逮捕过，四十二名代表曾在狱中服过刑，刑期平均为二年。代表们得到通知，在会议结束后离开这幢房子之前，会议所有记录均必须撕毁，然后将碎片交给门口的工作人员。在整个开会期间，都有同志执勤，在这个地区巡逻。这些预防措施大为成功。没有人被捕，警察只是事后才听说这次会议。〔注15〕

185 在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第五届大会终于被看作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党从此第一次成为独立的党，并掌握在本民族的领导人的手中，

用党内的语言来说，也就是掌握在“最优秀、最革命的干部”手中。共产国际没有正式代表出席这次大会。

最近结束了十四年铁窗生活又在比累恰的一处臭名昭著的政治犯集中营度过几个月的莫沙·皮雅杰致欢迎词，宣布大会开幕。他是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十二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其他成员中有铁托、卡德尔、洛拉·李巴尔和马其顿人梅托迪耶·沙托罗夫（沙尔格），此人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从莫斯科来参加会议的，后来和铁托在战时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注 16〕}按传统的议程，领导人的演说要论述自上届大会以来的发展，间隔十二年了，这就意味着有许多令人痛苦的、充满争论的历史事件必须讨论。铁托亲自就这些最微妙的问题作了报告——党内权力之争的始末，制订对外政策方面的困难以及过去十二年来一贯反对南斯拉夫现政权这一多少容易一些的题目。^{〔注 17〕}他还用了一些时间谈他本人重新建立党的工作，其中包括“清除”不可靠分子。他反复强调“干部”的重要性，“干部”就是那些献身革命、忠心耿耿的男女，特别是年轻人。他尽力避免纠缠往事，集中全力展望未来。^{〔注 18〕}在他的讲话后接着进行了有准备的讨论，有二十五名代表发言，代表全国所有地区。

本届大会不同于先前的各届党的大会，十分明显的是铁托要造成一种团结一致的联邦制的观念，在这个联邦中各个区域（以及各个民族）仍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已经有了自己的党组织，其他区域，即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伏伊伏丁那建立了地区委员会。科索沃—梅托希亚和其他较小区域建立了区委员会。一种与亚历山大国王和保罗亲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里强加于人民的国家中央集权的观念迥然不同的新设想正在形成。没有¹⁸⁶任何其他党派具有如此富于建设精神的计划。

联邦制问题是南斯拉夫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一切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它曾是维多夫丹宪法中有争论的关键，也曾是斯大林论述过的题目，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马·马科维奇曾为它大丢其脸。铁托在三十年代曾为它进行过斗争，而直到七十年代它仍将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1940年萨格勒布大会上，铁托在选举和意见上获得的团结一致既不是最终的，也不象它表面上看来那样绝对。各区域与中央的关系，这一区域与那一区域之间的关系仍将是铁托一生中最重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战争威胁之下，铁托的强而有力、充满信心的领导赢得了热烈的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敌对已经消除，也不表示马其顿的分裂主义和某些马其顿共产党员的亲保倾向已被抛弃。团结仍只是意图的声明，还不是实现了的成就。大会在欢欣鼓舞、热情洋溢的气氛中结束。无疑的是，得知大会已圆满结束而未被侦破时所感到的满意，更增强了这种情绪。这是最后一次在非法情况下召开的大会。最后，铁托这样鼓励人们：“同志们，我们正面临着决定命运的时日，前进！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的下一次大会必须在一个既没有外国人又没有资本家的国度里召开。”〔注19〕

※ ※ ※

这次大会标志着铁托在战备政策方面的转变。德国与西方的战争爆发之时，由于1939年夏季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引起的震惊的影响，党所奉行的是反对为南斯拉夫军队征兵和征集预备役军人的方针；在克拉古耶瓦茨、瓦列茨和泽蒙兵工厂和飞机制造厂鼓动罢工，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其他城市组织了反战示威游行。共产党奉行这一方针，曾有过一些古怪的同床异梦者：因

为极端的克罗地亚分裂主义者、乌斯塔沙分子以及塞尔维亚狂热¹⁸⁷的民族主义者，所有这些共产党的死对头也都反对战争，并且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中，由于战争之不可避免已愈来愈加明显，党对服兵役采取了新的态度。为了使共产党人自己得以受到军事训练，也因为认识到这是在军人中扩大对共产党支持的唯一途径，必须鼓励共产党人参加南斯拉夫军队，因为军队能够在镇压暴动，或象1917年俄国发生的那样，在使局势转而有利于起义者方面起作用，军队中的工作如今便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铁托的现实主义眼光足以认识到如果不派共产党员进入军队，则将无法影响士兵，无法使军队中种种不满情绪的因由变为党的资本。此时军队中只有几个三、五人的基层组织，而且它们还不能积极活动。

战争前夕的南斯拉夫军队，仍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塞尔维亚军队大致相同的方式管理，仍由许多当年的旧军人指挥，既未机械化，也没有几件现代化武器。它有二十个步兵师，一个近卫师，三个骑兵团，运输工具大部分靠马匹牵引。它受的是重壕战的训练，完全不适应纳粹的坦克闪击战术。军队纪律严酷而摧残积极性，也是激起不满的一个原因。此外，它还是塞尔维亚军官、军曹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克罗地亚人实行歧视的工具。^[注20]这就利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也助长了不融洽的现象，从而导致许多克罗地亚人于1941年德国人入侵南斯拉夫时避不作战。

铁托在大会报告中提出的政策，必须在战争前的最后几个月中落实。他需要给党建立起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司令部，需要挑选靠得住的区域领导人，需要建立一个在军警和其他形式的监视下仍能畅通的强大的交通网，他需要可靠的人员担负种种性质不¹⁸⁸同的工作。除了党的官员外，还需要大量的交通员。男人、妇女，

甚至孩子都承担了任务。他需要非法的印刷所，需要许多在秘密室干活的工作人员，包括伪造通行证、良民证及印制党证等的熟练工匠。造一张高质量的假护照至少需要两天，因为设备既少又简陋。需要有可靠的特工人员（安置在政府各机关、军事机构、警察和情报部门的坐探），而搜集来的情报还得有人来核对、分析和整理。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方才组织就绪，而且还产生了相当大的混乱。

时局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及对纳粹和意大利的野心如何作出反应或如何加以利用，这种游移不定的心情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中，以各种方式影响了除共产党以外的南斯拉夫其他政治党派。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切克扮演的角色特别暧昧。他的党历来对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国家中的地位不满。他认为德国对中欧的侵犯是为克罗地亚谋求某种形式的自治的机会，其途径是通过与意大利或德国私下进行交易，或是利用轴心国扩张的威胁迫使保罗亲王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让步。

如所周知，马切克曾试图勾搭纳粹分子，而后者不感兴趣，于是他又通过一个旅居克罗地亚的意大利人阿马德奥·卡内尔卢蒂工程师和意大利政府接触。据齐亚诺日记和卡内尔卢蒂的证词，这一接触是马切克本人发起的。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现有的证据是对他不利的。最初几次谈判于1938年11月举行，那时意大利对支持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的可能性尚无兴趣。到1939年5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以后，形势起了变化。卡内尔卢蒂代表马切克和齐亚诺就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这个克罗地亚国在意大利保护下扩大疆界，可能作为中欧一个天主教国家集团（还提到匈牙利、波兰、卢西和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南斯拉夫联邦内的一个独立国家。

189 这些谈判没有获得成果，因为马切克在同时与中央政府进行

的谈判中取得了对方广泛的让步，并写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五天即1939年8月26日签订的一项协定中。马切克于是成为以茨维特科维奇为首相的基础广泛的政府中的副首相。人们知道马切克还找伦敦、巴黎、柏林、布达佩斯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政界人物就未来的克罗地亚国家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他与温斯顿·丘吉尔的谈判。马切克于战争前夕参加政府。英国的影响曾起过某些作用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已有一些密使在南斯拉夫施加影响，如能劝说南斯拉夫成为盟国，则力图促成一个稳定的政府。〔注21〕

南斯拉夫政府也正在从事复杂的外交活动以求保持中立，继续与德国和英国交好，并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墨索里尼实现其路人皆知的分裂南斯拉夫的野心。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夕，南斯拉夫政府已把它的大部份黄金储备存到英国和美国。1939年5月20日，驱逐舰“贝尔格莱德”号把七千三百四十四枚金锭卸在朴次茅斯；后来又把价值四千七百万美元的黄金送往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英国在南斯拉夫的谍报人员也大大增加。但是这些都被轻而易举地抵销了，因为德国从经济上卡住了南斯拉夫的脖子；它控制了出口，垄断了英法所属矿山所生产的贵重金属铜和铅。德国特务也多如牛毛，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北部土生土长的德裔居民中颇有影响。

由于希特勒在西部频频告捷——1939年9月灭亡波兰；1940年4月占领挪威；同年5月攻克荷兰、比利时；法国于6月陷落——英国的覆灭似乎已成定局，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开始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以免遭同样的命运。他们竭力与宿敌保加利亚交好，提出在边界上割让土地，但因为德国向保加利亚出价更高而化为泡影。6月25日，他们与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便断绝了关系¹⁹⁰的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南斯拉夫政府

曾允许一位“沙皇”俄国的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保持一处使馆；但当1940年苏联宣告赞同保持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现状时，一位名叫米兰·加夫里洛维奇的南斯拉夫公使便被派往莫斯科。

墨索里尼于1940年6月10日宣布参战支持轴心国家之后，整个夏季他都跃跃欲试，急于进攻南斯拉夫，只是由于德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才没有发动一场九月攻势。^[注 22]希特勒指出，在错误的时刻贸然行动，可能在巴尔干诸国燃起一片烈火，激起俄国干涉，甚至把英国推向与苏俄的提携。可是，墨索里尼不听他的总参谋部的建议，改变计划于1940年10月28日进攻希腊。意大利军队未能速胜，南斯拉夫南部边境眼前似乎免除了危险。事实上这却带来了更大得多的危险：德国施加更大压力，强求允许战争物资在南斯拉夫过境，破坏其中立，并坚持要南斯拉夫参加三国公约。希特勒在致墨索里尼的信中说：“如果我们对南斯拉夫人拿不准，就不能在巴尔干冒险发动战争。”^[注 23]与此同时，通过英王乔治六世致保罗亲王的信件，丘吉尔致首相的信件，通过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通过一位美国特别密使威廉·唐诺文（德国人弄到了他的密码，并得知了他与南斯拉夫人的多次谈话），英国也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求它不要加入轴心国。1941年2月，德军开始占领罗马尼亚；3月，占领保加利亚。环绕南斯拉夫的包围圈正在合拢。^[注 24]

希特勒这时认为（并且也对日本大使这样说过）南斯拉夫政府将与轴心国合作，于是便召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于1941年2月14日去会见他。紧接着于3月4日，即保加利亚加入1940¹⁹¹年9月27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联盟公约之后三天，保罗亲王访问了贝希特斯加登。经过五小时的会谈，希特勒确信尽管保罗亲王表面上有些不情愿，他仍将同意签字。保罗亲王回国后，3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八位大臣一致投票同意签署这

一条约。〔注 25〕

这一决定并没有立即执行，在此期间保罗亲王及其政府仍受到英国方面的强大压力，劝诫他们不要因为签约而一笔勾销自己的中立，而应该参加同盟国一起在希腊作战，那里有一支象征性的英国军队正在帮助希腊人抵抗墨索里尼的侵略军。南斯拉夫政府和双方都保持接触，同时继续拖延在条约上签字。他们此时得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备已提前完成，因而绝望之中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如果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及时发生，他们还可以避免被迫作出选择。

南斯拉夫驻柏林的武官弗拉迪米尔·瓦乌赫尼克上校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情报人员，他从若干不同的可靠消息来源获悉了关于希特勒计划进行的这一进攻的情报。向他提供情报的一位颇有眼光的德国人对他说：“老兄，这意味着德国要完蛋。”瓦乌赫尼克（他还把这项情报提供给英国人，他们再通过其驻莫斯科使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转告了俄国人）获悉德国将于 1941 年 5 月下半月以二百个师对俄国发起攻击。〔注 26〕瓦乌赫尼克把情报分程传递给南斯拉夫军政双方首脑，但始终未告诉他已送到，从而也就无法肯定它对南斯拉夫官方政策究竟有何影响。但这肯定说明了希特勒为什么决心巩固他在巴尔干诸国的地位。1941 年 3 月 23 日，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说，希特勒要求条约于四十八小时内签署。3 月 25 日午后，茨维特科维奇和外交大臣青察尔—马尔科维奇就南斯拉夫加入希特勒的三国联盟公约签字。

这消息一经发表，贝尔格莱德立即爆发了反对这个条约的示威游行，有自发地，也有有组织的。在塞尔维亚对这一条约的反对极其广泛——人群高呼“宁要战争，不要条约”，反对者有包括 192
共产党人在内的各个派别的人士以及绝大多数普通人民。至于国

内其他地方，特别是克罗地亚，舆论则并非如此一致。一旦条约签订则应如何行动，包括英国情报人员在内的一小部份人已有部署。丘吉尔电告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说，不要“忽略我们可能必须得采取的任何其他途径，如果我们认为现时政府已经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称为特别行动局(SOE)的英国情报部的首脑休·多尔顿秘密通知他的特务“利用一切手段发动革命”。为此，他说，“一切已事先充分准备”。〔注 27〕

3月26日英国广播公司欧洲联播网向南斯拉夫播送了利奥波德·艾默礼的一篇演说。演说热情呼吁南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抛弃那个条约。

“如果（南斯拉夫）人民清楚表明他们认为参加轴心国条约便是出卖荣誉和独立，那么政府肯定有责任在该条约批准之前同人民商量。不，要这样做为时并不晚。南斯拉夫整个前途正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注 28〕

大部份塞尔维亚人其实无需鼓动。3月23日，在条约签订前，南斯拉夫空军司令杜尚·西莫维奇将军觐见保罗亲王，重复了他已几度提出的警告——如果条约签订，他无法保证部下军官不哗变而推翻摄政王的统治。事情恰恰如此发生。1941年3月26日和27日之间的夜里，一部份陆军和空军军官成功地发动了推翻摄政王及其政府的政变。只有一个人丧生，这是一个军官，他拒绝交出无线电台。保罗亲王被废黜，并被迫离开南斯拉夫。新政府以年幼的国王彼得的名义接任。由一个和国王声音相似的人以国王的名义向全国广播讲话。国王本人于上午九点在收音机中听到了广播，直到几个小时以后才正式认可了这个讲话。

193 政变的幕后策动者是因多种原因长期以来反对保罗亲王政府

的空军准将博拉·米尔科维奇。为准备这次政变，他曾找过一些军官，他们拒绝支持他，但是西莫维奇将军答应一旦政府被推翻，他可以出任政治首脑。政变得到了塞尔维亚人的支持，他们不赞成摄政统治下的缺乏民主及亲德政策，或对这一政权心怀个人的怨忿。支持还来自一些真正具有南斯拉夫思想的人们，不仅有塞尔维亚人，还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另一些人；他们认为参加条约将导致德国人肢解自己的国家，而这也就是南斯拉夫的末日。英国人通过英国陆军和空军军官以及西莫维奇将军的朋友米尔科·科西奇，与米尔科维奇将军保持联系。人们认为他曾影响了许多人参与密谋。〔注 29〕

共产党人并没有参与这次政变密谋。但他们于 3 月 27 日晨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镇组织了示威游行。共产党人示威时高举着典型的共产党标语，要求“与俄国缔约”，“宁进坟墓，不作奴隶”，“苏联是兄弟”，“贝尔格莱德——莫斯科联盟”，还有根据铁托的新政策的“我们要保卫祖国”。

还不能说政变确实成功之后政府就恢复了正常，因为德国的反应这一主要问题仍未获解答。新政府的外交大臣莫姆契洛·宁契奇手术之后，“面色惨白，两耳全聋”，正在休养期间被从床上拖了起来，他试图执行新首相西莫维奇、副首相马切克和各党派组成的内阁所批准的政策。这就是以不谴责前政府签字加入三国联盟公约为条件，以求平息德国人的怒气。与此同时和英国人的非正式会谈正在举行。英国帝国陆军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于 4 月 1 日微服访问贝尔格莱德。另外，在希腊与威尔逊将军、安¹⁹⁴东尼·艾登进行谈判，看看可指望哪些实物援助。这些交涉没有一项能使人安心。〔注 30〕与此同时，也为缔结军事政治条约而与俄国进行了讨论，结果只产生了一项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对南斯拉夫的政变暴跳如雷。3 月 27 日下午二点三

十分他发布了第二十五号指令，命令进攻南斯拉夫，尽快击败它，从空中轰炸贝尔格莱德以示惩戒。紧接着是在南斯拉夫的德国人加紧活动以及撤离外交人员。德国人通过他们的间谍德富勒先生和马切克勾搭，以克罗地亚独立为价码试探他的反应。4月1日李宾特洛甫给萨格勒布的德国领事馆发电说：

“为回答多种渠道送到的有关马切克博士请求我方提出建议的要求，请将如下内容奉告，……我们力劝他和其他克罗地亚领袖，勿以任何方式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合作。对我们提出这一建议一事应予保密。如果他采纳我们的建议，我们将与他们保持联系。他必须选择适宜的中介人，保证通讯联络在他一方的安排稳妥可靠。”〔注 31〕

马切克经由另一个中介人告知德国人，他认为他必须参加南斯拉夫政府以防止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爆发敌对行动。他抱怨说，虽然他曾要求供应武器以建立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但是德国人却未提供。马切克同两方都在搞谈判，这一点德国人很清楚。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紧迫。瓦乌赫尼克上校在柏林与往常一样获得了有关向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命令的可靠又准确的情报。4月1日，他听说进攻定于4月6日。他把这个情报通过三条不同的途径发往贝尔格莱德，但无法确定是否送达。4月2日夜二点，他的电话铃响了三次。这是让他到从汽车房旁一堵墙上的裂缝中拾取文件的信号。他走过两个熟睡的盖世太保身边，找到了这个便条，上面写道：

东面从保加利亚，北面从匈牙利发起围攻。愿上帝的保佑和我最诚挚的祝福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与你们同在。”

瓦乌赫尼克发出几通电报并派遣助手亲自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传达这一警报。而贝尔格莱德的官员们对这些警告却不予注意，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任瓦乌赫尼克的情报来源。事实上他的情报来源再好不过：这不是别人，而正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外事及反间谍处的头子卡那里斯海军上将，他通过自己的助手汉斯·奥斯特少将与瓦乌赫尼克联系。西莫维奇对瓦乌赫尼克的警告如此无动于衷（假如他曾经接到了这些警告的话，而这一点并不确定），他竟然安排于4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给女儿举行婚礼。〔注32〕

1941年4月6日，星期日，清晨五点五十分，德国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袭击了几乎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炸死了大约一万人，炸毁了这个城市的大部份地区。同时，德军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的配合下侵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军队在极度混乱中几乎没有抵抗。德军全部伤亡为五百五十八名，其中一百五十一人阵亡，三百九十二人受伤，十五人失踪。4月15日，国王及其政府逃离本国，先逃往希腊，后又逃到中东。当天，南斯拉夫代表根据国王指示在贝尔格莱德会晤了德国冯·韦克兹将军，同意投降。投降书于4月17日签字。代表南斯拉夫在文件上签字的是扬科维奇将军和曾在三国联盟公约上签字的前外交大臣齐察尔·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被击败和占领，一共恰好十天。〔注33〕

第三部份

通过战争进行革命

197
198

从党的书记到军队统帅

199

入侵南斯拉夫决不是纳粹长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倒可能是一个军事上的错误，只不过为了发泄希特勒对3月27日政变的狂怒。德军虽然订有入侵巴尔干各国的应急计划，代号是“第二十五号行动”却表明南斯拉夫之役属于临时决策。对所占领的领土的处理也不得不仓促决定；履行曾向南斯拉夫的邻国许下的诺言和保证德国自身战略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决定是于4月下旬在德国外交部和希特勒的总部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作出的。由于被迫拖延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最初是延期一个月，后来又延期两周），希特勒仍在暴怒不已。他把这归咎于塞尔维亚人，用他特有的恶毒语言咒骂他们。他说政变是由“黑手”党策划的，1903年暗杀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事件，1914年塞拉热窝暗杀事件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应由这个秘密军事组织负责。作为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必须毁灭，塞尔维亚必须受到惩罚，这是希特勒亲自作出的决定，但他也采纳了他的专家们的意见：塞尔维亚还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继续存在。由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和对历史的一知半解的影响，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是反塞尔维亚的，而铁托抗击塞尔维亚的德国占领军早期取得胜利，更使他这种态度变本加厉。^{〔注1〕}

不仅如此，希特勒还一再说过，他对南斯拉夫的总的看法，是德国对南斯拉夫的领土政治上并无兴趣，但是他对它的食品和

原料，尤其是对塞尔维亚的铜和克罗地亚的铁矾土却极感兴趣。^{〔注2〕}而且这一地区在军事交通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其地跨通向希腊和爱琴海的南北通道，中欧到黑海的东西通道。希特勒想以尽可能少的麻烦，使用尽可能少的兵员和人力把它控制住。

南斯拉夫国家不复存在了。它被肢解成十个不同的区域，由八个不同的占领当局管辖。德国接管了斯洛文尼亚北部的三分之二地区和塞尔维亚的大部——大致等于1912年以前塞尔维亚王国的面积。这就使它控制了穿越巴尔干山脉和沿摩拉瓦河及多瑙河河谷的交通要道。它占有了贝尔格莱德，把它作为“德国的要塞和驻防地”。虽然从8月末起，即推出米兰·奈迪奇，一位塞尔维亚将军作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但在整个战争时期塞尔维亚一直是德国的占领区。意大利得到斯洛文尼亚南部的三分之一地区，包括卢布尔雅那、里耶卡南面的入海通道，克尔克岛、拉布岛和亚得里亚海北部的其他岛屿。它还获得垂涎已久的达尔马提亚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和沿海岛屿，北起扎达尔南到斯普利特（包括斯普利特在内），还有维斯岛和科尔立拉岛。意大利还得到波斯尼亚的一小部分，门的内哥罗全部及其海岸线，还有重要的科托尔港，科索沃—梅托希亚的一部分以及新帕扎尔州的桑贾克，该州大部分地区住着阿尔巴尼亚人，并已归并于意大利占领下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领土中极大的一部分则建成一个庞大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其疆域一直伸展到扎达尔以北的海岸，又从斯普利特一直到杜布罗夫尼克以南。按说它是个王国，但国王尚空位，因为这王位献给了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侄子斯波累托公爵，但他宁愿留在罗马。“他同一个著名的女人住在一起，”齐亚诺曾轻蔑地写道，“带她驱车四处兜风，经常出入酒吧间和夜总会，喝得酩酊大醉。”^{〔注3〕}保加利亚得到了马其顿的很大一部分，它

赶紧占领并使之保加利亚化。与阿尔巴尼亚毗邻的部分，连同科索沃划归意大利统治下的大阿尔巴尼亚，匈牙利获得了巴奇卡、巴兰尼亚和多瑙河以西的其他地方，而多瑙河以东的巴纳特地区则由当地德裔居民管理。这一瓜分是为了保证德国得以对整个地区在战略上进行控制，并通过分而治之的办法在政治上进行统治。²⁰¹这种作法使得除德国以外的所有受益者都感到不满，就边界问题互相争吵。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统治者对于把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划归意大利只是勉强接受，实际上格外恼火。

各个不同的占领当局，各自不同的占领制度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使德国对巴尔干经济财富和战略交通的控制陷入错综复杂的境地，因此受到削弱。这种情况后来遭到某些德国人的抨击，说这样反而便利了抵抗运动。铁托的抵抗运动时常得以利用这些分歧，而国家的分裂状态很可能还有助于南斯拉夫民族感情的复苏，铁托的抵抗运动在战争期间获得发展，这种民族感情正是它的力量的一部分。

在德国入侵期间，铁托仍然以巴比奇工程师的身份（虽然南斯拉夫雕刻家奥古斯廷契奇，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人称他为托马奈克工程师）和赫尔塔·哈斯以及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1941年生）住在萨格勒布郊区一幢小房子里。3月29日，他乘飞机到贝尔格莱德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商讨共产党对待政变的策略，并亲自去看看那里的形势。他很快又回到萨格勒布，因为必须留在秘密电台附近，便于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他从一个经常收听德国广播的邻居那里听到德军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消息，立即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接触，给了他们一桩虽然毫无成功希望但至少是具体的任务，即请求当地驻军司令武装工人保卫国家。萨格勒布局势急转直下，但并未出乎意料之外。4月10日晚，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上校控制了广播电台，宣布成立一个由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巴维

利奇博士统辖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此人当时仍在意大利。在国内有一大批追随者的马切克，不反对关于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的设想。克瓦泰尔尼克和许多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克罗地亚的方济各会教士，德国人对此也已获得情报）一样，一个时期以来即与乌斯塔沙有联系。于是，巴维利奇于4月15日凌晨顺利进入萨格勒布。〔注4〕

202 事态发展如此迅速，加以对未来的恐惧与捉摸不定，使人们不知所措。这些惨痛的日子激励铁托生气勃勃地投入活动。危难当前，总是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是这个人的典型特征，他一生中有多次都是这种情况。为了使他在过去几年中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不至于在战乱中支离破碎，荡然无存，他不得不拚命工作。党这时已经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的地下交通网，这一点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幸亏党的总部及其地下印刷所都设在萨格勒布，未遭轰炸也未经历战争，因而在起初得以从那里和由于德军入侵而分散各处的党员重新建立联系。在战争和敌人占领的混乱的情况下，这是不容易的。

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军队正在南斯拉夫各地调动。路上挤满了涌向各处的逃兵和难民——扔掉军装和武器，在遭到逮捕以前设法回乡或躲藏起来的南斯拉夫士兵，抢在边界封锁之前赶往国内地区与家人团聚的难民。还有许多没法逃离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和政治难民，其中包括一批英国人，他们已经由萨拉热窝逃抵海边，大部分人却被意大利人抓住。运输工具被征用，很难弄到汽油，电话、火车和公共汽车不是完全中断就是时断时续。〔注5〕共产党秘密情报网的交通人员不得不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避开大路，沿着偏僻小道来往于城镇和乡村之间。但是，铁托仍设法和他最重要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德军于4月10日开进萨格勒布时，他正在郊区的家中和其中几个人一起开会。

由莫斯科制定后通过无线电联系传给铁托的党的总路线说得很清楚——战争仍然是两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对手之间的斗争，王国政府的溃败并不值得惋惜。党号召党员反对德国人，但是，只要纳粹还被当作俄国的同盟者，则无法号召人民起义。对共产党与对民族主义的忠诚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此时尚不急需解决，因为²⁰³ 1941年春天，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气焰方炽，共产党人既无武装，组织又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铁托则有意听任局势发展，致力于若干当务之急。他确信战争已给予他在南斯拉夫领导发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的机会，确信苏联必然需要这一革命，并且将会帮助促成这一革命。果然，他没有等待多久。〔注6〕

铁托在4月10日召集的党中央委员会上作出决定：必须告知共产党员搜集并藏好武器以备将来使用。他们还应重建党的地方小组，秘密给以使用武器和急救的训练。他们必须搜集当地的情报，弄清谁同占领者合作，谁反抗占领者。他们之间必须建立交通联系并与铁托的总部取得联系。还决定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由铁托担任主席。这一军事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后来一道迁往贝尔格莱德，这里便于同全国联络。铁托本人在那里较少为人所知，也较不容易为人出卖。人们不得不承认，既然许多克罗地亚人欢迎建立一个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想法，克罗地亚便不会成为一个对占领者发动抵抗或反对的理想中心。只是到了以后，当这个国家的残暴的法西斯特色和缺乏真正独立这两点暴露出来，许多人才改变了主意。而在塞尔维亚，铁托眼下便可望对抗过德军得到更多的支持，搜集到更多的武器，因为那里饱受德军入侵之苦，而且抗击外来的土耳其军队占领的斗争传统仍然鲜明地铭记于心。

迁往贝尔格莱德的另一有利之处（虽然这一点不便公开讲出来）是铁托将对党具有更高的个人权威。因为设在贝尔格莱德一

位医生家中的、直通莫斯科的秘密电台在德机轰炸中被毁之后，同莫斯科的唯一直接联系便必须靠萨格勒布电台，但其报务员瓦²⁰⁴尔戴斯（科皮尼奇）系受雇于共产国际，并非铁托属下，这种情况使铁托越来越感到烦恼。他虽然也认为应按共产国际的命令行事，但却无意听任科皮尼奇篡夺他的最高权力而向萨格勒布党组织发号施令。那年夏天，铁托离开萨格勒布去塞尔维亚后，科皮尼奇就曾企图那样做，但却没有得逞。（注7）

铁托暂时继续留在萨格勒布，计划在门的内哥罗、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分别召集共产党人开会。在马其顿（保加利亚军队已于4月19日开始占领该地）发生的事件使共产党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马其顿的党组织书记，铁托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沙托罗夫（沙尔洛）拒绝接受铁托的命令，决定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合作。（注8）两党于是就共产党对马其顿的控制和策略问题发生争论，这场辩论化费了很长时间才得解决。这时从全国各地还传来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和被杀害的消息。同月，巴维列奇着手推行他那臭名昭著的消灭所有不愿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政策，要把克罗地亚变成一个他一心响往的纯民族国家。

※ ※ ※

5月7日，铁托不得不匆匆离开萨格勒布，他险些被捕。城内到处是乌斯塔沙军队、德国兵、盖世太保和警察密探。占领军征用车辆，为了避免引人注目，铁托没有交出他的福特汽车，而是雇用了工人修一堵墙把车藏在汽车房里。一个工人报告了警方，不多久就发现有警察朝他的住宅走来。铁托和往常一样幸运，这时正外出到萨格勒布市内去了。他的一位亲戚（他的助手中有

的是他的亲属，这一点一向很少提到）赶紧跑去报信，铁托于是乘夜车去贝尔格莱德。去车站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走在他的前面，穿过站上的警察检查站，以便确实弄清当晚没有实行特别检查，也不需要更换护照。〔注9〕他把赫尔塔·哈斯和他稚龄的儿子留在萨格勒布，托朋友照管。以后他再也没有在萨格勒布住过，这实际上也就是他与赫尔塔的家庭生活的终结。

5月底前，铁托得悉德国将入侵苏联。南斯拉夫投降后，留²⁰⁵驻塞尔维亚的德军（第六十摩托化师、第四山地师、第二十九步兵师，还有第一八三师的一个团）在司令官冯·韦克兹将军统帅下于4月末5月初开始调走，而代之以由年龄较大的士兵（出生于1907—1913年间）组成的三个师，这些部队只能驻守，而不适于执行战斗任务。也可看出德军正在从希腊向罗马尼亚调动。这些变动的意义很清楚，而且从一个德国军官对白俄的密谈中得到证实，然后传到铁托那里：俄国就要解放了。他把这一情报电告了季米特洛夫。〔注10〕铁托知道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对武装活动的禁令从此解除，于是狂热地投入工作，使全国各地人民作好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就立即行动。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的公告，固然是特大灾难的新闻，却也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极度欢乐和如释重负的事件。郁积心头使人灰心丧气的矛盾心理和难以忍受的期待终于到了尽头：他们已不再是一支孤军。对苏联的进攻使南斯拉夫共产党自德苏协定以来，特别是在纳粹入侵南斯拉夫的几周中，一直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虽然依旧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如今它发布的命令已与民族感情相一致，并允许南共呼吁人民给予爱国主义支持立即进行抵抗。如今，再不会与苏联的愿望发生矛盾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觉得，只要完满地执行苏联的命令，便会得到它的援助和赞扬。7月3日，斯大林发出全面呼吁，号召在德军后方开展

游击活动。

德军进攻苏联几小时后，“老爷子”（季米特洛夫给铁托的密码电报上用的化名）从无线电发表一项更加明确的命令：

206

德国背信弃义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进攻，不仅是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保卫被德国占领的各个国家的人民。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现在具有开展广泛的解放斗争抗击德国入侵者的机会。采取一切行动来帮助和便利苏联人民的正义斗争极为必要。……这一努力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胜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记住当前的问题是怎样从法西斯统治下求解放，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注11〕

那天下午，铁托在设于贝尔格莱德莫莱罗瓦大街一座私人寓所一套房子的党的总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当大家就这种新的形势进行讨论的时候，铁托起草了一份宣言，那份宣言立即送到秘密印刷所并于当晚发出。这份宣言是激动人心而又谨慎含蓄的：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抗击工人阶级的宿敌的决定性的一战已经开始，……南斯拉夫各地区的无产阶级，到你们第一线的战斗岗位上去。紧密地团结在你们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周围，……让你们的鲜血与英雄的苏维埃人民的珍贵的鲜血流在一起吧！”〔注12〕

费了好些天，这些传单才传遍全国。显然，破坏活动（贝

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线于6月23日夜间遭到袭击)需要某种形式的指导与协调一致才能取得最大效果。6月27日铁托召集中央委员会开会,决定设立人民解放游击队司令部。铁托后来曾谈到采用“游击队”(Partisan)这一名称,是因为联想到当年拿破仑进攻西班牙和俄国时也使用过“Partisan”在敌后作战,在斯大林的告苏联人民书中也采用了这一名称。实际上最初用的是“guerrilla”一词,几周以后才改用“Partisan”来称呼铁托的队伍。^①会议还决定派遣十二名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分赴全国不同地区去指导和建立游击队。还没有发出总起义的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此还没有作好准备。但是,到7月1日,“老爷子”又发来新的指示:

“共产党人必须对侵略者发动一场公开斗争,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一刻也不要浪费,要在敌后建立起游击队,展开游击战,……希接到上述指示后复电告知执行情况。”

207

铁托执行了命令。7月12日印发了一份新的特别宣言,7月25日又再次印发,重复了共产国际的呼吁:

“南斯拉夫人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其他各族人民,要象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进行战争,抗击屠杀我们人民的侵略者及其奴仆,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不要在敌人的恐怖面前动摇。猛烈地攻击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要塞,来回答敌人的残暴。”〔注13〕

^① guerrilla 和 Partisan 均译为游击队,前者源于西班牙文,后者源于法文。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战争中和苏德战争中均用后一词,指敌后斗争的部队。——译者

这一起义的号召书尽管有着激动人心的语言，实际上并未引起外部世界的注意。一段时间之内，也仅仅在条件有利于起义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得到较大的反响。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等地对举行起义尚缺乏普遍的支持，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还在不同程度上处于分裂状态。但各个地区发生了许多次孤立的破坏活动。7月7日，在塞尔维亚的贝拉·茨尔克瓦村有一个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打过仗的共产党员齐吉察·约瓦诺维奇，在村中街道上鼓动一大批农民参加游击队抵抗运动，宪兵企图逮捕他，他击毙了其中两名，然后逃脱（但一年后终被杀害）。人们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最终给铁托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带来胜利的起义的开始。

当铁托带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一小批参谋人员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司令部时，其他最能干最信任的副手则分赴全国各地，大多数是到他们的家乡去。来自克罗地亚的报告说，甚至党的领导干部中也有着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情绪；报告还说，正确的精神，即共产主义的精神以及南斯拉夫高于一切的精神不可能居于统治地位。一个叫安德里亚·赫布朗的人被从这个地区清除出去，此人后来在党的历史上果然声名狼藉。^[注14]卡德尔前往斯洛文尼亚去设法解决当地共产党员对在那里举行起义是否可行²⁰⁸的顾虑。斯洛文尼亚的起义大约于7月22日爆发。斯维扎尔·伏克曼诺维奇（人们一般只知道他的化名“泰波”）则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同时开展工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于7月27日开始起义。整个运动都从门的内哥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获得鼓舞。德热拉斯在这里很活跃。7月13日，全境一致举行了起义。在这个荒凉的多山之国，除几条稀疏而难行的交通线两侧之外，意大利人原就无法占领。这些门的内哥罗人想到如今又在传统的盟友俄国人支持下战斗，头脑冲动，忘乎所以。他们

在门的内哥罗全境横冲直撞，劫掠烧杀，杀意大利人，也杀任何迟于支持起义的本国人。德热拉斯对自己同胞的这种凶狠暴烈简直无法约束。他们夺取了大批武器，这一年的年末，除了驻兵的波德戈里察和策丁耶两地之外，意大利人被从所有的城市赶了出来，化了好几周时间，他们才又打了回去。

铁托手头也有一个门的内哥罗问题：德热拉斯和另一些党员不顾“老爷子”关于不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别指示，开始经由苏维埃组成极端形式的政府，杀死对手并以暴力手段报复敌人，因而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事业——如铁托所指出的那样。他不得不把泰波派往门的内哥罗去恢复秩序，解散那些革命的苏维埃。^{〔注15〕}到了7月底，大批游击队员在塞尔维亚破坏铁路线和电讯联络，袭击孤立的敌人据点、军火仓库、地方宪兵队和警察所，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德国人于是认识到他们也象意大利人一样，不得不着手对付一场全面的抵抗运动。

为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铁托原打算在城乡组织小游击队从事活动；其中一部份要呆在大城市外的山里和森林中，避开敌人控制的交通线。这时正值盛夏，天气、茂密的森林和南斯拉夫的大部份地形都给游击战帮了大忙。这个国家大部份是山地，其中大部份又被森林覆盖，道路很少，尤其是在高山上。铁托力图从²⁰⁹贝尔格莱德的作战司令部掌握已建立多少游击队，多少人从事战斗以及可以用作协调作战中心的营地地点。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记了一部战时日记，记录了这一时期在贝尔格莱德围绕着铁托的一些狂热的活动——暂时的等待和紧张的活动时期互相交替。情报由信使传递到司令部，或者另外通过诸如把情报写在香烟盒背面的临时办法传递；还要监听各无线电台，并逐日编写公报。人们整天进进出出，每天都收到关于抵抗运动成员被警察或盖世太保逮捕的报告。“武拉安蒂奇在国民银行被捕。今天早上米特

拉（密特罗维奇·德热拉斯的第一个妻子——编者）从多尔佐尔穿过最热闹的大街到戴丁耶去。我告诉她绝不能这么大意，她会被捕的。”戴迪耶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注16〕她果然被捕了。

铁托的司令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一位富有而著名的人士符拉迪斯拉夫·里布尼卡尔家中，他是自由派报纸《政治报》的所有者，也是共产党的秘密成员。在工程师奈纳多维奇住宅里，铁托也有一套房间，在浴室盥洗池后面的一个壁橱里，有一个秘密入口通到顶棚下的一个隐蔽的藏身处，万一警察搜捕，铁托可以躲在这里。他在这儿放了两只左轮和一些手榴弹，以备不测。他依旧在城里往来奔走，后来，危险越来越大，他才不再出去，每天大部份时间在里布尼卡尔的僻静的大花园里干活。〔注17〕他还得尽量掌握所有的军事行动，并且安排分配缴获、购买或临时军火工厂或车间制造的武器弹药。还必须掌握德军调动以及警察和盖世太保活动的情报。关于当地的密探或形形色色的德国和塞尔维亚伪政权的合作者的情报尤为重要，因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通常正是这些人干的。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从一开始就成为铁托的情报机构的首脑。他在这一职务上表现出特殊的专业才干。〔注18〕

1941年7月末，兰科维奇一生的事业几乎不幸夭折。他正在
210 密谋爆炸贝尔格莱德电台。一个密探报告了盖世太保。当兰科维奇去会晤一位伙伴时，盖世太保正在等着他。铁托很快获得关于他被捕的消息，立即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设法营救。报告说他曾和警察搏斗，被警察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起初连他关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盖世太保并不知道他们逮捕的是谁，他们把他弄到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警察医院，先使他恢复知觉，再进行审讯。不出戴迪耶尔所料，米特拉·密特罗维奇也已被捕，拘留在同一医院里。她设法捐出一张字条，一位医生还提供了一张医院的平面图，标出兰科维奇在严密监视下卧床就医的那间病房。警方当

局断定，还得五天才能提审兰科维奇。

7月29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四十名游击队员身穿便衣，带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以三人为一组包围了医院。他们之中十个人通过警卫森严的大门进入医院，其中一人带着手铐，看起来象个犯人，其余则是押送者。走廊里一个警察上前盘问，当场被击毙。他们闯进兰科维奇的房间，立即和四名看守搏斗。兰科维奇从床上跳起来，被急急忙忙拥出楼房，又翻过一道围墙跳到街上，游击队员在混战中掩护他撤退。却不见事先安排好来接他的那辆汽车，兰科维奇不得不到附近一座房子里躲避。他解下头上的绷带，脱下医院的病人服，人们给他一套服装，对他那高大的身躯来说，这套衣服太小了。他穿着瘦小的裤子和衬衫到了另一所房屋，套上一件勉强凑合的上衣和一顶帽子，乘一辆货车到达贝尔格莱德郊区一所安全的住宅卧床养伤。参加这次行动的游击队员有几名受伤，但没有一人牺牲。〔注19〕这次事件大大提高了他们亟需鼓舞的士气，也向铁托表明他继续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危险性。兰科维奇一恢复健康便立即离开贝尔格莱德。他乔装成农民模²¹¹样取道返回故乡，接着又到了设在塞尔维亚西部的游击队司令部。

铁托于9月16日离开贝尔格莱德。从此直到1944年10月德军撤退后他再没有到过这座城市。但当他再来时，已是拥有三十万男女战士的大军的当之无愧的统帅，和苏联红军一起凯旋入城。他这次离开贝尔格莱德，具有那样一种歌舞喜剧、真正危险和满不在乎的自信交织在一起的情调，这正是他过去多次逃亡生涯的特色。这一次，被捕的危险确实很大，但和过去一样，勇气和非常细致的安排起了作用。他断定，最稳妥的办法是和确象是旅客的人结伴同行。铁托于是仍以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巴比奇工程师的身份，在里布尼卡尔家的午餐桌上认识了东正教一位神父米卢蒂诺维奇。他事先知道神父同情游击队，而神父则不知道他的

真正身份。神父同意为他提供旅行证件，并主动与他作伴。一个叫亚沙·雷特尔的共产党员，是德裔居民，持有合法证件，因此让他也来搭伴。还有几个妇女也参加进来，因此使这一伙人在外表上显得极其寻常和正常。他们在火车站平安无事地通过了检查，然后乘车到塞尔维亚中部。据说铁托的兴致很好，他用德语与雷特尔开玩笑，使他的同伴都很开心。

火车快到克拉列沃时停下来，旅客被告知是由于共产党匪徒炸毁了摩拉瓦河上的桥梁。这伙旅行者只得步行到恰恰克。在恰恰克，一位姑娘发现了一个曾经认识她的密探，他们成功地避开他，安抵目的地——波热加这个小城镇，再没遇到什么麻烦。他们从这里雇了一辆马车去距离瓦列沃附近的游击队司令部不远的科谢里奇。马车夫告诉乘客路上有危险，因为森林里尽是匪徒。“我想你们不会是参加游击队去的吧？”他狡黠地问道。“穿这样的衣服象是到游击队去的吗？”铁托回答说，他仍象平常那样衣冠楚楚。车夫连忙认错，但又补充说：“这个年头你根本无法看出一个人是干什么的。”^[注20]最后，铁托见到了来迎接的兰科维奇，于²¹²9月18日到达他的司令部。巴比奇工程师和这趟旅行一起告终，铁托终于得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担负起也许是他最满意的一个角色——战场上的军事统帅。

1941年夏季，铁托在至少和他政治局中最亲密的同事（这指的是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和洛拉·李巴尔）经过深入的讨论之后，作出了几项决定。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决定对整个战争期间的军事和政治进展的模式具有重大意义。在实现作为铁托的长期目标的政权变革方面，这些决定也是重要的。它们虽然也包含着任何重大的政治决策中所不可避免的那种冒险成份，却也显示出对政治力量基本要素的深刻理解，这正是铁托伟大之处的标记。7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作出的把党的领导

机构改组为军事总参谋部的决定尤为重要。共产国际的命令并不是不明确的，铁托原可以直接以党的领袖的身份指挥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活动。

创建一支军队来从事游击活动的想法是南斯拉夫独有的想法，而且确实是铁托本人想出来的。1941年7月初，南斯拉夫领土上驻有十八个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陆军师，外加克罗地亚独立国还有地方武装（民团）五个师，以及数千就地招募的卖国的伪警察部队。没有军队的铁托在这个时候却要设立一个总参谋部，似乎未免荒唐。由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者组成的三、五个人一群，或是十来人或五十人一群的小组，没有制服，装备极差，武器缺乏，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即使最富于幻想的人也不能把他们称为一支战斗部队。建立一个总参谋部正是为了表明要建立一支军队。在南斯拉夫以外没有一个人，也许在铁托周围的小圈子以外也没有一个人，尤其是俄国人会相信这有任何可能。但不到六个月，按总参谋部计算，所统率的部队已达八万左右，虽然缺乏新式武器，但在理论上讲算是武装起来了。“你不能把这些人叫做正规军”，后来铁托这样说，“不实行征兵制便不会有²¹³正规军。这些人全是志愿兵。”〔注21〕

第二个重要决定也是7月初作出的，也许同样应归功于铁托，虽然这也同样经过和他的副手们反复研究过。这就是他的武装力量的目标应当是在国内某些地区肃清敌人，开辟后来称为解放区的作战基地，这是一种正规的军事策略，也许多少应归功于西班牙内战中所获得的经验，但终于取得了铁托预定要取得的重要的政治后果。它意味着，只要游击队控制着这种解放区，便可以在战时条件所允许的极有限的范围内把它作为一个小国家来治理——处理种种民政事务，向居民贯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并着手把他们的政治理论付诸实践。尽管在战争期间解放区屡屡易手，

得而复失，但从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起，就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地方政府的体制。〔注22〕

1941年7月铁托所作出的另一决定是，武装抵抗的呼吁应以人民阵线为基础向全民发出，这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一致的。共产党应为抵抗运动提供领导干部，但应收起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主义作法，不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直接目标。铁托的游击队运动依靠人民阵线，依靠爱国思想，而最终则依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主义。很难说他是否一开始即认识到这种做法将会激发出多么大的力量。有一点是明确的：铁托仍然感到他所负责的乃是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国际运动的一小部份。他尽忠职守，把一切重大决定汇报共产国际，竭力贯彻执行转发回来的命令。但就在这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南斯拉夫是在独立奋斗。“从1941年年初，我就已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领袖。”他回顾说，“我感到自己是完全独立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不会有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注23〕

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独立的后果，还得一段漫长的时期。1941²¹⁴年，苏联正在为保卫莫斯科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它这时对铁托在南斯拉夫所作所为无所关心，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当他们的处境并不那么危急之时，他们仍然常常低估铁托，贬低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就。这正是斯大林自共产国际早期以来对外国共产党的一贯态度。铁托这时也还不可能清楚理解他自己的政策的全部深远影响。他尚未看到独立、民族解放与全盘接受苏联权威，两者有如水火互不相容。铁托制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革命的规划时纵然高瞻远瞩，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仍未能看到这一事实，即对于那些在全球政治中指导着苏联战略的俄国政治家来说，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规划相对来说无足轻重，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不受欢迎。

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

215

具有抵抗思想的人并不只是铁托和游击队员们。早在 1941 年 4 月 15 日或 16 日，被击败的王国政府军队的部份军官和士兵，象他们的先辈过去经常做的那样，撤退到塞尔维亚的森林。不久，人们便按照传统的名称把他们称为“切特尼克”（源于塞尔维亚语 Četa，意为军队）。米哈伊洛维奇后来说：“切特尼克这一称呼来自人民，不是我定的。”它的最早领导人之一是科斯塔·佩查纳茨，一个身体魁梧、头发花白、仪表堂堂的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保加利亚战线后方的一支塞尔维亚游击队的领导者，很有名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切特尼克部队一直是一支塞尔维亚的准军事力量，用来对付克罗地亚人、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所谓国家的敌人。切特尼克另外还有几个领导人——留巴·诺瓦科维奇，身材高大，“头发灰白，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态”。还有凯塞罗维奇，“冷酷、残忍、狂暴地反对任何对游击队宽容的建议”。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德拉戈留布（通常缩写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当南斯拉夫溃败时，他来到波斯尼亚东部，在 5 月 10 日至 15 日之间到达塞尔维亚西部森林茂密的舒马迪亚山区的腊夫纳戈拉。〔注 1〕

米哈伊洛维奇生于 1893 年，也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塞尔维亚军队中一名年轻的中尉，曾随塞军从萨洛尼卡最后突破敌人防线而进入塞尔维亚。协约国的帮助怎样使他们转败

为胜，这些记忆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个正规军官他干得并不怎么出色。他曾在索非亚和布拉格担任过南斯拉夫的武官，但在军队中没有得到晋升。他和许多军官一样，极端亲塞尔维亚而反克罗地亚。德军入侵时期，防御准备的不足和克罗地亚人的背叛都使他深恶痛绝。

216 1941年夏季，他在腊夫纳戈拉的司令部成为抵抗运动中寻求某种领导的塞尔维亚爱国人士的聚集之所。米哈伊洛维奇不同于他的许多部下，例如巨人约瓦诺维奇，“公牛般的胸脯，金黄色的胡子垂到半胸，大猩猩似的双肩上飘散着长发，红里透金，简直象个女人，但一开口，女人味就没有了，再一握手，几乎要把你骨头捏碎”，他却身材瘦小，最初的印象往往使人误认为他性情温和，无足轻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态度和霭，举止文雅的人，一个典型的正规军官”。这是那时期他给铁托的印象。〔注2〕有一位后来见到他的英国军官形容他，“稍微有点儿驼背，穿着一件英国式野战服装，没有佩带表明军阶的肩章和领章，深蓝色衬衫纽扣一直扣到颈部，不系领带，两条裤腿塞到厚厚的农民式袜子里，……黑灰色浓发覆盖着塞尔维亚农民的典型的圆脑袋。从灰色的胡须下仍能看出面部轮廓分明，颧骨以下两颊深陷，深度的近视眼镜后面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带着使人误认为温和的神情。”1942年，一位从克里特岛逃出来的英国新闻记者克里斯蒂·劳伦斯也得到同样的印象。“我知道他的年纪在四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但看起来却很苍老。他身材瘦小，头发灰白，一张瘦削、有皱纹的面孔，戴一副金丝眼镜。”〔注3〕

其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米哈伊洛维奇性格复杂，但才能和目光都有限。由于所受的旧式军事训练，也因为出身于具有古风的农村社会，他具有军官们特有的魅力和虚荣心。他狡黠而机敏——这种性格使他玩弄种种复杂的阴谋诡计。结果常常败于更加奸猾

的对手或朋友手下，后来不免为流亡政府所利用，为他们火中取栗。他以军人自居，但所根据的却是这一职业的过时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他在1946年受审时这样说，接着又补了一句，“政治我从来不感兴趣。”可是，从他到达腊夫纳戈拉时起，他的所作所为大部份都与政治有关。对于他的勇气或是狂热的塞尔维亚爱国主义是无可怀疑的。不论战后成立什么样的国家，他都希望恢²¹⁷复塞尔维亚的权势，而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威胁。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革命情绪背后的更为深刻的种种社会问题，看来他并不理解。

当米哈伊洛维奇发动那场起初称作“腊夫纳戈拉”，后又改称“切特尼克”的运动时，追随他的约有三十名军官。到了6月，他已经和其他的“切特尼克”头子建立起联系。不久，他的密使便分赴塞尔维亚农村建立起一处处招兵站，并和一些头子接头。其计划是在乡村地区把所有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的塞尔维亚男子全部动员起来，编为十五至二十人的连队，组成一支战斗部队。三十至四十岁的专事破坏活动，年纪更大一些的则留在村里维持秩序。到1941年9月末，切特尼克已达五千名，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怎么听从米哈伊洛维奇指挥，还有一些（例如科斯塔·佩查纳茨）则不到夏末便背叛，投降了德军。

※ ※ ※

铁托的游击队也在乡村地区积极活动，特别是6月22日以后，他们劝说农民志愿参加游击队。到9月末，已征集约一万五千人。因此，这两位领导人便为了争取塞尔维亚人的支持而相互竞赛起来。米哈伊洛维奇，强烈的塞尔维亚爱国者；铁托，号召开展一场全南斯拉夫的、激进的、彻底反德运动的共产党人。这

种竞争就使原来已趋复杂的南斯拉夫局势更增加了一种内战的因素。1941年时虽还无人能预见战争的结束或其后果，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双方都知道无论将来的国家如何，他们的权力之争都将影响它的性质。至于目前，双方都还面对着德国的占领体制，它虽然组织严密，起初却没料到要对付大规模的抵抗运动。

德国人统治塞尔维亚把权力分属三个主要部门。理论上，三者各负不同的职责——军事、政务和地方行政。1941年夏季，军事行动归巴德尔将军指挥，他隶属于驻在雅典的陆军元帅李斯特。

²¹⁸ 塞尔维亚的军政府（相当于战争后期的同盟国军政府）则由前党卫军旅长哈罗德·特纳博士负责。这一部门负责一般治安、政治和经济政策，设有一些重要部门分工负责榨取粮食、原料和劳动力以供应德国进行战争之需。地方行政则大致还是通过原来机构，并且常常通过塞尔维亚战前的同一批官员来进行，而由一个卖国的塞尔维亚政府负责。该政府完全由德国人操纵，但部长则为塞尔维亚人，而且在8月29日以后，由塞尔维亚人、前南斯拉夫陆军将领米兰·奈迪奇任政府首脑。所有这三个部份都有各自的军队，各自的治安机构，各自的情报组织，又各以不同的方式镇压反对力量，迫使这个国家顺从地、卖力地为德国工作。它们的活动经常互相重叠，互相冲突，而各个不同的情报机构和反情报机构——卫戍司令部、安全局(SD)和包括盖世太保的治安警察(SIPO)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南斯拉夫人要同占领当局接触或合作，告密者和间谍要成为双重间谍都有无穷无尽的机会。虽然有这一声势赫赫的权力机器，德军在塞尔维亚仍只能以重兵驻守主要交通线和少数重要据点。1941年夏，他们开始在当地招兵，组成塞尔维亚部队防守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

德军没有能够预先防范1941年夏季发生的塞尔维亚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由游击队领导，并有一些切特尼克分子参加，尽管

米哈伊洛维奇曾命令其部下不要向德军进攻。暴动范围如此之广，清楚表明是一场大部份人民的自发起义。到了9月，德军对约三分之二的塞尔维亚乡村地区失去控制。维斯豪普特上尉在报告中说：“这不单是个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要对付一场全面的民族运动。”不久，特纳博士写道：

“游击队在森林里的那种阵地干脆无法正面进攻。目前虽加紧宣传说布尔什维克作战不利，并无什么作用。我们获得的印象是：甚至传说苏联投降也不能使这帮匪徒屈服，他们²¹⁹象魔鬼似地善于恢复元气。此外，他们的组织是出色的，一个秘密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足以作为楷模。”〔注5〕

随着起义的广泛开展，游击队和切特尼克有时各自行动，有时互相配合，进攻敌军阵地（公路、铁路、桥梁、村庄甚至城镇）极为成功。游击队控制了一些地区。切特尼克则控制了另一些地区。局势极度混乱，切特尼克的个别首领之间在各自利益和领导权上时常发生冲突；而游击队和切特尼克虽曾多次联合行动，但两者的目标、组织和作风是如此悬殊，因而也常常发生摩擦。游击队越来越纪律严明，越加服从中央领导；而另一方面，切特尼克的好坏却取决于他们地方头目的品行性格，这些人常常是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每当占领那些能带来大量缴获的较大城镇时，两个集团之间的敌对便更加激烈。9月24日，游击队占领了乌日策，这可是一块大肥肉，有一家银行，装满钞票（约五千五百万第纳尔）；一个日产四百支步枪和大量弹药的军火工厂。游击队还占领了摩拉瓦河流域西部的波热加和恰恰克，而切特尼克则占领了洛兹尼察和一所有用的铸造厂。

1941年的整个夏季，米哈伊洛维奇多方设法为他的切特尼克

运动寻求支援——或者说保护。他不希望在他的计划完成之前，或者确切地说，在德军比他当时所了解的更加虚弱之前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起义，从而丧失他的部队。他希望把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保存下来，以求保卫塞尔维亚，防止德军采取报复行动，大肆屠杀塞尔维亚人。他的一项主要目标是与流亡的王国政府和中东的英军建立联系。他曾多次设法取得联系。而于1941年6月19日首次获得成功，信使把他的游击活动的消息带到了伊斯坦布尔。这里既有王国政府的南斯拉夫人，也有英国的特别执行局（特执局）这个从事多种活动（包括宣传、军事情报和实战）的机构的人员。²²⁰米哈伊洛维奇也得到一部无线电发报机的原件，经过将近两个月的修理，发报机开始使用。马耳他收到了从这里发出了电讯。8月份，他已经和驻开罗的特执局建立了直接联系。他还设法通过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和土耳其大使馆给王国政府发出第一封电报，并于20日后得到回复。

他对于塞尔维亚起义的报道（只字不提游击队在其中作出的主要贡献），是盟国收到的有关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地区游击队活动的第一条消息。在德军席卷西欧和东欧，纳粹入侵苏联，在中东的隆美尔大捷以及德国空军狂炸伦敦之后传来这样的消息，使同盟国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都同样欢欣鼓舞。西方的人们正被接二连三的灾难弄得心力交瘁，意志沮丧，英雄的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的事迹传来，激发了他们的想象，鼓动着他们的热情。人们喜气洋洋地迎接这个消息，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则急切地尽量加以利用，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流亡政府中的塞尔维亚人来说，这一消息尤其值得欢迎，因为这给了他们一种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进行内部斗争时可以运用的武器，也给了他们一种强有力的杠杆，以索取援助，给予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而且在战后的任何夺权斗争中这都是有用的。这样，米哈伊洛维奇的运动从

一开始就成为政治阴谋和神话般的宣传的主题。没过多久，就弄得与真实情况相去万里了。米哈伊洛维奇成为中心人物，而在许多方面则成为这一神话的俘虏，最后更当了牺牲品。人们不得而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想，但却可以断言，这确实影响了他此后的全部行动。

米哈伊洛维奇和英国建立联系的同时，又一直和卖国贼奈迪奇的政府保持接触。他希望为他的运动寻求保护，也希望为其搞到武器，这样他就能粉碎共产党人，消灭这一对手；而奈迪奇这一方面也并非不乐于同一个塞尔维亚的爱国组织保持联系。德国人赞成这种接触，他们赞成建立“合法”的切特尼克，以防止出现一个游击队——切特尼克联合抵抗运动。9月初，米哈伊洛维奇²²¹和奈迪奇双方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若干次会谈。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没有出席。1946年米哈伊洛维奇在受审时说，这是因为他在军队中服役期间有两年是在奈迪奇手下，而“他两次惩罚我，两次关了我三十天禁闭。我不尊敬他，不愿意去。”会谈结果是奈迪奇提出他的军队停止进攻切特尼克，切特尼克方面则协助奈迪奇打游击队。可能还作出某些安排，由贝尔格莱德国民银行资助米哈伊洛维奇。他的情报官员皮潘带了一名奈迪奇政府的联络员马尔科·奥卢伊奇从贝尔格莱德前往腊夫纳戈拉。途中一起被游击队俘获，从他们携带的文件中游击队获悉这些会谈的内容。把奥卢伊奇作为卖国贼处决了。〔注8〕

与此同时，米哈伊洛维奇还进行着第三种谈判，这就是同游击队。尽管他憎恨共产党，相信他们是他最大的敌人，米哈伊洛维奇仍愿会见他们的代表并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要说——也许除了那种千方百计地加强和确保他自己的运动不顾一切的决心外，还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国际竭力主张建立战时的人民阵线，游击队催促举行谈判。8月，兰科维奇曾向党建议采取联合行动。经中间

人作出安排后，8月14日至15日夜间，游击队代表米洛什·米尼奇和德拉戈伊洛·杜迪奇前往腊夫纳戈拉。他们见到米哈伊洛维奇本人和另外两个人，后来他说是他的主要官员德拉吉察·瓦西奇（一位作家，以其排外的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观点著称）和德拉戈斯拉夫·帕沃洛维奇中校（一位前陆军军官）。游击队建议采取联合行动，米哈伊洛维奇的反应极其冷淡。他说德军的失败似乎还需很长一段时间，现阶段无须加紧进攻，否则德军将会对塞尔维亚居民大肆报复。〔注9〕会谈没有取得成果。虽然由于摩擦越222来越多，双方关系日趋恶化，但8月和9月初接着又交换了几次意见。铁托认为必须尽快达成某种明确的协议。9月19日，即他从贝尔格莱德到达游击队司令部的第二天，他亲自去会见米哈伊洛维奇，由此可见他觉得事情多么急迫。

会晤地点是腊夫纳戈拉附近斯特鲁加尼克村里的亚历山大·米西奇的住处，此人是半月前米哈伊洛维奇派往奈迪奇政府的密使之一。铁托骑马前来，由两名副官（米洛什·米尼奇和奥布拉德·斯蒂凡诺维奇）陪同，十五名徒步的游击队员警卫。米哈伊洛维奇派出骑兵卫队迎接。在互相握手和传统的饮宴之后，双方坐下来谈判。米哈伊洛维奇坐在首席，他的助手瓦西奇在右，铁托坐在他的左侧，游击队员和切特尼克人员交错地站在四周，全副武装，以怀疑的目光互相盯视着。瓦西奇开口头一句话便问铁托是不是俄国人，显然，铁托关于自己是一个曾在苏联住过一些时间的克罗地亚人和共产党员的简略介绍，并未使对方稍感满意，也不十分令人信服。铁托后来回顾这次会晤时说：“因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我不明是什么原因）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都把我当作俄国人，他讲起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所有其他各民族时说话毫无顾忌。”会谈不久便表明，两位领导人观点不同。铁托迫切要求采取联合行动，提议把自己的部队交由米哈伊洛维奇

指挥。但米哈伊洛维奇却对时机未到即行开展抵抗提出警告，并对德军实力加以强调。他说，获得外援的可能性几乎微不足道，盟国军队距离遥远，无法指望。两位领导人都无意把手中的牌全亮出来——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和英国，并且通过奈迪奇和德国人接触。铁托则与莫斯科有联系。他们于晚上八点分手，没有达成协议。〔注10〕关系虽未破裂，但六周后他们第二次会晤前，事态的发展已使达成协议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了。

到这一年夏末，米哈伊洛维奇发到伊斯坦布尔的电讯开始生效。8月25日，丘吉尔首相致函当时负责全部对敌秘密行动的经²²³济战大臣休·多尔顿：

“据西莫维奇将军报告称，南斯拉夫现有广泛的游击活动。他们需要同盟者，需要从国外得到支援和指导。请尽速和这些组织取得联系，并给予必要的援助。”

开罗的特执局奉命派出一个代表团试图和“爱国组织”联系。〔注11〕被选任为团长的是D·H·赫德森上尉（后为上校，通常称为“比尔”）。9月22日，他由王国流亡政府武装部队的两位少校（奥斯托伊和莱拉托维奇）陪同，乘潜艇在当时为铁托部队所占领的门的内哥罗海岸登陆。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军官韦利科·米朱诺维奇（后任铁托的驻华盛顿大使）引导他们穿过游击队解放的地区到达设在乌日策的铁托司令部。〔注12〕因此，赫德森得以有机会从一开始就了解铁托的抵抗运动的规模和作战情况。几天以后，游击队又引导他们到达腊夫纳戈拉的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

赫德森为他和米哈伊洛维奇带去两套无线电发报机和密码。电报最远只能发到马耳他。他到达时游击队和切特尼克之间已频频发生战斗，他向开罗所作的第一条建议便是：在切特尼克

解决他们与游击队的分歧之前，不给予切特尼克援助。他还建议铁托那里也应派遣一个代表团去。第一项意见未被采纳；第二项则直至十八个月后才得以实现，由于有关的英国官方文件尚未能查阅，所以其原因至今不明。但当时英国或开罗均无人置信，由一个一向不知名的人物（甚至铁托的名字当时国外也无人知晓）所领导的一伙共产党人竟能发动一场全面的抵抗运动，这一情况或可说明一些问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经过早期塞尔维亚历史中浪漫主义的渲染，加上南斯拉夫政府官员对切特尼克活动的热情的、几乎肯定是大肆夸张的陈述，以及与米哈伊洛维奇²²⁴的直接接触却足以使人们对切特尼克抵抗运动信以为真。铁托也逐渐相信（也许不无理由）凡属对他有利的消息多半都会被开罗或伦敦的某些人扣压下，只是因为他的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而且也是为了加强王国政府支持米哈伊洛维奇的地位。

赫德森既经到达，并将建议结束对游击队的敌对行动以及派代表团到铁托那里去的信息拍发出去之后，不久便失去了自己的发报机。有一种说法是米哈伊洛维奇控制了它，另一种说法是被德国缴获了，因为德国人将他的密码破译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他与开罗的通讯联系在将近十二个月之久的时间内一律遭到切特尼克的检查，对游击队有利的消息均被扣压。〔注 13〕米哈伊洛维奇的密使米洛斯·塞库利奇博士于 9 月 25 日离开贝尔格莱德。10 月 10 日到达伦敦，按照他自己的意图报道了切特尼克的活动。于是，英国也好，南斯拉夫政府也好，都未能充分获悉游击队的活动、组织和力量。这一时期德军却获得了对游击队的较为详细的情报。〔注 14〕他们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实力与政治活动也有更为真实的了解。他们有一个专门小组监听他的无线电发报，而且破译了他的密码。

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档案表明，1941 年 10 月期间为了给切

特尼克搞到补给，曾在伦敦进行了紧张活动。彼得二世国王曾于13日与丘吉尔会谈，一周后，王国政府首相西莫维奇将军继而提出一项备忘录，向丘吉尔提出请求为一万名伤员提供医药，并为八万至十万名敌后人员提供武器，这一数字只有在包括游击队的情况下才能是正确的。〔注16〕10月26日丘吉尔复信表示同意，虽然同时也指出地理及运输上存在的困难。在这期间，西莫维奇于10月20日会见了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23日会见了帝国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另一个南斯拉夫高级官员勃兰科·丘布里洛维奇则于28日会晤艾默礼，29日会晤休·多尔顿等两位大臣。28日他还会见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请他给予支持。麦斯基对所需实物的种类表示兴趣，并询及空投的可能性。〔注16〕10²²⁵月29日，迪尔将军在给西莫维奇的一封绝密信中称：数日内将给米哈伊洛维奇送去“三十门大炮、二十支自动〔步枪〕、九十支自动左轮手枪、一千副绷带和价值一万〔原文如此，大概是英镑〕^①的黄金，”其他物资随后送去。信中还说英军驻中东司令已与“爱国者”建立联系并将尽其所能供应他们的需要。〔注17〕伦敦磋商中的这种顺利情况都电告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维奇从10月6日至29日给王国政府发出二十九封电报。他在10月27日和铁托第二次会晤以前，必已得知他将收到盟国的援助物资。

这次会晤还受到另一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它甚至比第一次更难达成协议。10月间，铁托已和他的参谋部作出扩大军事规模的重要决定。9月26日于塞尔维亚的斯托利采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的有来自除马其顿以外的全国各地区的游击队领导人，会上决定在南斯拉夫各区分别建立军事司令部，统一由最高司令部统率。他们如今已为一支全南斯拉夫的军队配备了骨干，制订了全国

① []号内说明为作者所加。——译者

的总战略计划，还一致同意在一切肃清敌军的地区建立军政——民政行政机构。

9月16日，希特勒命令由伯梅将军指挥德军三个师，在空军支援下，对塞尔维亚的抵抗力量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参谋总长陆军元帅冯·凯特尔发布了一项关于在一切占领地区对付抵抗运动的方针的指示：

“为制止混乱于发端，一旦发现迹象便必须毫不迟延地立即采取最严厉之措施，……必须牢记，在本指示所指之国家中，一个人的生命并没有很高价值，因之，唯有残酷手段始能收威慑之效，……一条德国士兵的性命，按通例应以五十至一百名共产党人的死刑作为报复。行刑方式亦必须起到威吓之作用。”〔注18〕

226 10月20日至21日，这一命令以最恐怖的方式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付诸实施。这是为了报复两天前游击队在附近的一次袭击，德军十人被杀死，二十人受伤。德军把全城绝大部分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子驱入市内的兵营，然后以每一百人为一组押出枪杀。屠杀整整持续了一天，直到连德军的行刑队都感到恶心，有些人甚至无法支持才停止。大战结束时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时，克拉古耶瓦茨事件列为控诉案。屠杀人数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接近五千人。其中许多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因为该城是塞尔维亚工业中心之一，其余全为普通居民，还有许多儿童被从学校押出，集体枪杀。在米哈伊洛维奇看来，这次屠杀是他最怕的那种报复行动的令人恐怖的例证，也是他关于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说法的论据。在铁托看来，这就要求进行广泛的暴动。

几天以后，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在10月27日至28日举行了

第二次会晤。地点仍在切特尼克控制的腊夫纳戈拉附近布拉伊齐村一所大房子里。这次游击队改乘两辆汽车（从意大利人手中缴获的）前来。铁托由他的副官米塔尔·巴基奇和前共产国际同事，现任参谋的斯雷滕·茹约维奇（外号茨尔尼，意为“老黑”）陪同，还有一个八人卫队，配备着冲锋枪。米哈伊洛维奇也由一个武装卫队和他的亲密同事德拉吉察·瓦西奇和帕沃洛维奇中校陪同。对立双方隔着会议桌对面就座，其尖锐对照的情景一如上次会议。铁托回忆说“我的小伙子们年轻，脸刮得干干净净，个别人留着小胡子；德拉扎的人都是大胡子。”切特尼克“全身武装，交叉地背着子弹带。”〔注19〕气氛比上次更加充满敌意，会谈则更缺乏探讨精神。双方都更了解对方的情况，局势更为紧张，因为这时德军正长驱直入塞尔维亚。米哈伊洛维奇虽然知道自己将获得英国军援，但他并不知道数量多少，几时到达。在铁托这方面，他电告共产国际请求苏联援助的要求并未得到满意的答复。铁托希²²⁷望把游击队的活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因此要求允许赫德森上尉出席会谈。米哈伊洛维奇加以拒绝，赫德森只得留在隔壁房间里。但让他参加晚餐聚会。席上米哈伊洛维奇狡黠地请铁托喝酒。铁托满饮一大口，却发现是“舒马迪亚茶”，一种烈性梅子酒，或称梅子白兰地。当铁托被这种烈性酒精饮料呛得直咳嗽连忙拂拭军服上的“茶水”时，米哈伊洛维奇纵声大笑起来。

但会谈本身却并不是打哈哈的事。它是以铁托10月20日提交米哈伊洛维奇的一份十二点照会为基础进行磋商的。这些要点包括（对德军和奈迪奇部队）联合军事行动；一个联合作战参谋部；装备及补给；平等分享战利品；地区的联合司令部；解决分歧的常设联合委员会，以联合战线为基础在各解放区建立管理民政的地区行政机构，建议中说这些机构应为游击队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实行志愿兵役制而不采取征兵制；地区司令官不得擅自

行动，而应服从两个高级司令部，为避免冲突起见，此两个高级司令部应分设两地；加强反第五纵队的工作；设立联合军事法庭审判卖国贼，但特别规定对此类案件的制裁不得另行立法；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通敌的切特尼克组织（如佩查纳茨部队）对游击队的袭击；最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停止发给“第五纵队与间谍分子”身份证。^[注 21]米哈伊洛维奇似乎并未提出任何认真的反建议，但无论提与未提，他此时似已完全无意与游击队达成协议。对于米哈伊洛维奇来说，与德国军官及通敌分子塞尔维亚人奈迪奇将军合作，或是与铁托这个自称为克罗地亚人和共产党人在军事上联合，二者之间利害分明，轻重悬殊，根本无所谓选择，一定是前者大大占了上风。而且，在他看来，在他得到盟军援助之前，当德军四处凯歌之际，把他的部队投入类似自杀的战斗，不啻是为整个切特尼克运动自寻灾难。

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米哈伊洛维奇拒绝了铁托关于共同作战，建立一个联合作战参谋部以及关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等各项建议，因为那样一来，在解放了的地区，他势必被置于共产党控制²²⁸的政权之下。他主张征兵制，这能使他的切特尼克超过游击队的志愿兵。其他各点，有些达成了协议，如各自分设司令部，设立联合法庭以解决争端等。游击队一心渴望达成协议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出。他们主动从乌日策军火工厂为米哈伊洛维奇提供弹药和一千二百支步枪——在关系破裂前确实给了他们五百支。双方还一致同意从乌日策银行缴获的五千五百万第纳尔中各拿走五百万。

讨论过程中，游击队人员本着他们那种目前还不够专业化的军队所特有的平等的同志式的方式，开始插嘴发表意见，但游击队这一边大部份是由茹约维奇发言，铁托十分沉默。切特尼克方面于是效法起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突然摘下眼镜，神经质

地捻着他的胡子，突然厉声喝止他们：‘住嘴，没有谁让你们发言！’切特尼克们于是都不吭声了。”会谈结束了，游击队在布拉伊奇过夜。铁托说：“我整夜没有睡觉，把左轮放在枕头下面。”〔注 22〕第二天又进行了一些讨论后，他们回到乌日策。中途，还和切特尼克发生了一次极不愉快的遭遇战，因为这一伙人把他们必经的一座桥梁炸毁了。回顾起来，可以看出这次会谈并无成功的希望。双方都不想真正达成协议，虽然铁托可能曾经认为，在这一阶段有一个无论怎样的军事上的盟友总比没有要强。多年以后铁托曾说，他要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的努力”与共产国际丝毫无关。我们的想法，希望与意图是团结一切力量对侵略者斗争。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聪明的、野心很大的人。我提议由他掌握最高统帅权。但显然他不愿接受。”如果接受了呢，铁托说，他不会在其手下工作的，他要“干别的事情”。〔注 23〕

※ ※ ※

第二次会谈之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为内战，每一方都指责对方首开战端。11月1日至2日之间的夜晚，²²⁹切特尼克部队进攻乌日策和其他若干地方的游击队据点，包括恰恰克和伊瓦尼察。虽然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否认对袭击乌日策应负个人责任，但同时发动的这几次攻击都表明是出于统一的部署。米哈伊洛维奇当时的一位亲密的同事拉夫斯拉夫·朱里奇少校后来说起，他曾反对过这一计划。赫德森上尉（一位独立的观察家，同时也肯定不是铁托的支持者）曾说过：“米哈伊洛维奇由于严重低估了游击队及其追随者的影响，袭击乌日策又未能成功。”〔注 24〕赫德森处在一个足以了解事实真相的地位，并曾尽力把双方拉到一块来，当时他本人正在乌日策。

游击队动员了全部力量（包括兵工厂的工人）以击退切特尼克。11月3日，米哈伊洛维奇的参谋长帕沃洛维奇中校给在乌日策的铁托打电话，建议如果游击队让出波热加就可以停战，铁托拒绝了。战斗继续进行，切特尼克逐渐被击退。

米哈伊洛维奇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向伦敦发出紧急电报，要求立即给予援助。他11月4日的电报说：“形势紧迫，急需援助。”次日，他又发出三通长电说明紧急求援的理由：

“不能认为塞尔维亚那个化名铁托的共产党首领是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对德国作战不过是一场骗局，……游击队从人民手中夺取武器，我不能走那种道路。他们搞到了乌日策那个军火厂，从那里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而他们还想要英国武器，如果他们真得到英国武器，我们就永远完蛋了。”〔注25〕

随后几天，他电告了有关着陆地点的情报。11月9日，他得到了他的第一批空投物资，并请盟国要求莫斯科电台谴责游击队对切特尼克的一切敌对行动。11月12日，游击队已推进到距腊夫纳戈拉一公里以内的地方，切特尼克从波斯尼亚调来的增援部队仍未到达。为了防止电台落入游击队之手，切特尼克已经停止²³⁰发报。司令部也准备紧急撤退，并销毁文件，包装重要物资和档案。在一片慌乱与惊恐之中，瓦西奇哭了——他象一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你们可曾想到？”他哭着说，“德拉扎和我都要被判处死刑的。”〔注26〕

在这危急关头，米哈伊洛维奇转而向德国人求助以对付游击队。他通过德军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豪普特曼·约瑟夫·马特尔与德军接触，此人过去即到过腊夫纳戈拉进行谈判。11月11

日至12日之间的夜间，在瓦列沃附近迪弗齐的一个旅馆里举行了会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恐慌达于极度之际米哈伊洛维奇却不在腊夫纳戈拉。他带了三名参谋人员骑马走了九个小时前去参加会议。三名德国军官（驻塞尔维亚德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科格哈德上校，塞尔维亚德国军政司令部的哈罗德·特纳博士的代表乔治·基泽尔博士以及克劳斯博士，一名盖世太保官员）乘汽车到达。米哈伊洛维奇建议联合作战对付共产党人，一俟共产党被清除后，德国军队应即撤退，而由切特尼克接管塞尔维亚。但他眼下最迫切需要的却是武器。“我的主要目标，”据马特尔回忆，米哈伊洛维奇告诉德国人说，“是拯救大多数人民免于毁灭。”〔注27〕米哈伊洛维奇同意把切特尼克俘虏的三百六十名游击队员交给德军。德国人准备利用米哈伊洛维奇，虽然他们并不信任他，因为他们认为正如德军情报部门报告所说的那样（希特勒也一再重复这一点），塞尔维亚人“从根本上是反德的。”德国人不打算给他们武器，还命令他把手下的人员解除武装。米哈伊洛维奇在极度失望中离开会议室时，他对马特尔说：“告诉你的同僚们，我还不全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英国人。”这次会谈后不久，一份德国人的报告说：

“他不再有一大批追随者紧跟着他，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应予以过低估计，因为还有许多有头脑的塞尔维亚人同情他。在目前情况下，他对我方尚无任何严重威胁，尤其是虽然他起初与共产党合作，现在却已成仇敌，而且正与之作战。但从长远观点看，他可能是危险的。”〔注28〕

米哈伊洛维奇回到腊夫纳戈拉后获悉，他已被任命为“祖国²³¹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这是11月15日由英国广播公

司宣布的。〔注 29〕这项任命给他的性格打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他在军事上的雄心壮志屡受挫折，至此达于顶峰，于是不禁对自己和他的切特尼克运动的前景都觉得不可一世。他能获得流亡政府的支持，以及政府所能到手的同盟国的一切援助，如今已成定局。以上这些以及他自以为已使德国人对他保持中立，使他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他用不着和游击队合作，而他眼下迫切的任务是消灭他们。

游击队对切特尼克司令部没有采取猛攻到底的办法。看来，铁托大概受到来自俄国的命令的约束，俄国领导人直到此时还在敦促他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甚至要他就联合指挥一事作出安排。王国政府官员也为此大肆活动，王国政府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于 11 月 17 日会见了维辛斯基。次日，又会见了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急切请求苏联协助以使铁托接受米哈伊洛维奇的领导。俄国人的命令以及德军以坦克和飞机为掩护在塞尔维亚西部的挺进，促使铁托继续力求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虽然这时他已听说切特尼克把俘虏的三百六十五名游击队员移交德军枪决。米哈伊洛维奇后来说，这些游击队员是按“每头多少钱”卖给德国人的。〔注 30〕

当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和德国人进行谈判之时，他手下的军官朱里奇少校和莱拉托维奇少校会见了游击队代表兰科维奇、佩塔尔·斯塔姆博里奇和洛拉·李巴尔，达成了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九点协议。11 月 18 日、24 日、26 日和 27 日又进一步举行了会谈，这时由铁托的军事专家科察·波波维奇替换了政治问题专家兰科维奇。〔注 31〕当这一系列会谈结束之前，德军已调来增援部队，从东线来的第一一三步兵师以及七〇四师为一部，包围了恰恰克、波热加和乌日策三处地方。显然，游击队已无法在塞尔维亚坚持下去。在 9 月 27 日的会议中间，铁托给谈判的代表们打来电话，

朱里奇少校去接，铁托要他促请米哈伊洛维奇采取共同行动。朱里奇答应和他的上司联系。事后当他转达这一要求后，米哈伊洛维奇答复说，共同指挥无可考虑，因为他本人是南斯拉夫抵抗力量唯一的公认的领袖。

游击队已经撤出（11月25日至29日）乌日策，军火工厂也已于数日前被敌特炸毁。如今他们负担着很多伤员。铁托肩挂一支冲锋枪，由赫德森上尉陪同，在德军到达前二十分钟才离开这座城市，和参谋人员失去联系达数小时之久。11月28日，部队仍在全面撤退中，铁托再次给米哈伊洛维奇通电话，要求协助阻止德军前进。米哈伊洛维奇答复说，对德军公开作战是不可能的，切特尼克和游击队应当分别撤至各自的地区。^[注 32]这是两位领导人最后一次个人联系。铁托为争取联合行动而进行谈判的尝试失败了。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决定对占领军按兵不动，而且投入部队和德意军队共同作战，以图消灭他的国内政敌——共产党。

铁托命令游击队穿过兹拉蒂波尔山的崇山峻岭，撤至塞尔维亚边境上荒凉的、人迹难至的山区。米哈伊洛维奇的策略没有这么明确。某些切特尼克领导人仍继续对游击队作战，而他所关心的却是保存实力，探索使切特尼克“合法化”的途径，避免意大利人，还有德国人以及奈迪奇部队对他发动攻击。这几支部队目下在塞尔维亚的攻势正锐不可挡。随着严冬的来临，游击队运动似将一败涂地。从这时起，各式各样的证据（缴获的切特尼克文件、英军派驻切特尼克的联络军官们的报告，盟国在战时以及战后缴获的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文件）都表明：许多切特尼克领导人从德、意和卖国的塞尔维亚伪政权获得武器和经费。在意军对游击²³³队发动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中，切特尼克都进行了支援，有些切特尼克则与德军并肩作战。而尽管存在着米哈伊洛维奇同西方盟国的敌人携手合作这种古怪的事实，他仍然继续得到盟国的援助

至少达十八个月之久。

1941年年底以前,当在苏联和中东的德军还在挺进的时候,米哈伊洛维奇作出了无可挽回的决定:同占领军达成协议并且只对共产党人作战。德国人最终的胜利似已在望,凭借德、意军队的帮助游击队似乎一定可以消灭;如果万一盟国获胜或在巴尔干登陆,米哈伊洛维奇在盟国阵营中仍占据有力地位,届时他准备“转弯”,德国人也机敏地猜到了这一层。至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它无疑是米哈伊洛维奇推行这种政策的合伙人),它和英国政府及苏联政府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有一段时期它对它们隐瞒了南斯拉夫境内局势的真相。在这方面,米哈伊洛维奇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错误地估计了铁托这个对手的力量,错误地估计了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占领的民族主义情绪,误以为德军天下无敌,也错误地估计了丘吉尔对待军事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们还错误地认为即使英国人一旦了解事实真相,对于切特尼克和英国的敌人携手合作一事仍会继续宽大为怀。

显然,按照赫德森的报告,至少是英国陆军情报机构的某些部门,在1941年年底以前便获悉游击队的活动和米哈伊洛维奇的通敌行径。但英国最高层对此或无所知悉,或有所怀疑并打了折扣。苏联方面,由于铁托逐日发电,共产国际是知情的,因此,须设想苏联高层权威人士必然知情。但铁托提供的证据甚至在苏联也受到怀疑。莫斯科电台就曾把游击队的战绩归功于切特尼克,使铁托感到简直难以置信,十分愤怒。当1941年11月11日自由南斯拉夫电台从苏联境内开始广播时,对于游击队胜利的报道,在西方只被认为是一种宣传。

234 这种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41年末和1942年初,南斯拉夫境内的事态对于英国和苏联来说只具有极小的重要性,这两个国家在德军最初的几次攻势的锐气面前正在撤退。巴尔干并

不是一个重要战区，应予优先考虑的是其他战场。由于这一原因，两国对于有关南斯拉夫境内事态的重大政策决定，都没有给予密切注意。对于铁托来说，这一点还并不那么明显，他看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有一个英国联络军官，切特尼克明明在帮助德国人，竟仍然得到英国的援助。还有那件（在他看来）阴险的事实，即切特尼克对乌日策的进攻发生在英国军事代表团到达米哈伊洛维奇那里以后不久。武器、食物、医药奇缺，在铁托看来，游击队既是真正抗击德国人的，获得援助的早就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切特尼克。英国人没有这样做，看来正是他们那种建立在反对共产主义基础上的背信弃义政策的典型例证，而这正是长久以来，由于事实的教训，铁托所能指望从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的一种政策。这一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他对英国及英国人的态度。

第十二章

235

孤 军 奋 战

1942年是大战中决定性的一年，对同盟国是这样，对铁托也是如此。这在作为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生平事业中，或许也是关键的时期。因为正是在这灾难深重的几个月里，铁托把起义变成一场全民性的运动，仍由共产党领导，但却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支持。对这一发展变化起作用的虽有种种不同因素，但铁托本人的人格及其方略和领导才能，无疑至关重要。尽管作战条件非常艰苦，吃了败仗，而且苏联援助和盟国承认化为泡影，但是，构成革命不可缺少的基础的这一大转变却已发生。

铁托于2月底在福查召开的一次参谋会议上，强调指出了在军队中并通过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居民中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游击队的领导人必须竭尽全力赢得农民对游击队运动的支持，还说甚至连切特尼克的同情分子，也是可以说服参加游击队的。但明显的是，1942年冬天游击队里的生活如此艰苦危险，大概只有那些为伟大的理想主义所鼓舞的人们才会受到吸引。〔注1〕

游击队和普通居民的伤亡惨重，尤其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农村地区。许多人死于敌人的军事进攻，还有许多人死于饥饿和地方性斑疹伤寒。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人死于内战，死于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分子的冲突，死于对支持外国占领者的地方势力的战斗。此外，还有许多人在宗教的和民族的敌对行动中丧

生，这在南斯拉夫中间一直存在，占领者以及借战争机缘出现
的其他势力，则推波助澜，利用了这种冲突。在桑贾克和南塞尔
维亚，切特尼克分子大肆屠杀伊斯兰教徒，企图在被他们宣布为
塞尔维亚故土的地区造成清一色的塞尔维亚居民区。在波斯尼亚
和克罗地亚则有大批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由于有自己的宗教而惨²³⁶
遭杀害。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统治者巴维利奇自诩为反东正教维护
天主教的卫道者。在克罗地亚，特别组成的乌斯塔沙匪帮屠杀了
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男女老幼，其行为之残暴和灭绝人性，如果
不是已被证实无疑，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关于乌斯塔沙，有一个
人们反复诉说的故事：他们搜集被害者的眼珠或身体的其他部
份，藉以炫耀自己的赫赫战果。有位英国医生曾经写道，他亲眼
看到过这种可怕战利品。“我走近前去，拿起放在桌上的袋子，
打开了它，起先我以为是蛤蜊肉，再仔细一看，原来全是人眼
珠。”〔注 2〕这类的故事很多，有些人被赶进教堂，然后锁上门，
再放一把火；还有些人被割断咽喉或被扔进湍急的河流。有些人
比较幸运，接受逼迫改宗天主教，因而拣了条性命。〔注 3〕波斯尼
亚的绝大多数穆斯林，由于巴维利奇把他们看成是纯克罗地亚种
族，倖免于遭到这种命运。

克罗地亚天主教大主教区斯特皮纳茨大主教和天主教的各级
成员，起初是支持巴维利奇政府的，后来对这种灭绝人性或强迫
改宗的政策也开始怀疑起来。大屠杀于 1941 年夏季开始，一直持
续到冬末。1942 年初，游击队从门的内哥罗向波斯尼亚和克罗地
亚转移时，他们所经过的村庄各有一段血泪史，几乎无不都已成
为一片焦土，被洗劫一空。铁托不得不竭尽自己的权威，制止使
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进行报复。游击队穷追乌斯塔沙分
子，抓住就处决，但铁托不容许动用酷刑。“当乌斯塔沙分子被带
去处决时”，戴迪耶尔在日记中写道，“有一个农妇冲进他们中间

又抓又打，大哭大叫。游击队好不容易才把她拉开，……枪声响后，她又一次冲了过去，在尸体和血泊中跳舞。有人告诉我们，她的儿子都被乌斯塔沙杀害了。”〔注 4〕

乌斯塔沙血腥屠杀所造成的恐怖，终于使巴维利奇政权遭到报应。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乡村，有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家乡加入²³⁷了游击队，其中有位姑娘成了铁托的夫人。1942年夏天，铁托部队进入克罗地亚时，许多留下来的人都来热烈欢迎。游击队此时既未取得重大的或持久的胜利，原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得到这样的支持的。这就给游击运动大大地增添了克罗地亚（包括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成份，而在这以前，游击队的兵员在南方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在北方则主要是斯洛文尼亚人。到了1942年年底，铁托的运动已逐渐发展为全南斯拉夫的运动，根据地遍及全国各地。入伍新兵数目超过了战斗减员数目。直到1943年11月，铁托的部队从来没有征过兵，而新入伍的都是志愿人员。但毫无疑问，爱国心和讨伐敌寇的热情如此高昂，以致对游击队占领区的居民来说，回避加入或保持中立都是困难的。一旦加入，便必须贯彻始终。谁要不站在这个运动的一边，就会被看成是反对它。

整个1942年，铁托及其最高司令部按照正规军事路线的正式组织形式，致力于缔造和训练一支职业军队。在1941年夏季的起义中，农民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斗的。铁托却需要一支机动的野战军。1941年12月22日，铁托把从塞尔维亚跟随他一道转移出来的人员组建为第一无产者旅。这支队伍的基本成员是来自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部队的一千一百九十九名志愿兵，第一任指挥员是曾经在西班牙作战过的塞尔维亚共产党人科察·波波维奇。其后六个月内相继建立了另外四个无产者旅，每旅兵员都在一千人左右，而且主要来自一个地区。〔注 5〕他们作为突击部

队，可以调往任何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铁托的部队达八十万人以上，组成四个军团，他们便是核心，其作用相当于近卫团。

铁托认为对敌作战既是政治革命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组成部份。在与德、意的战斗中，他对使用无产者旅毫不吝惜。1942年2、3月份在军事公报中发布的军事条令宣布：必须实行铁的纪律，严厉制裁不服从的现象。官兵之间应为“同志式的²³⁸关系”，但执行任务时必须遵守纪律。每旅都设有司令员和政委及其副手组成的指挥部，有突击营、警卫连、炮兵、医疗队和摩托化连队。他们有自己的红色军旗，中央是游击队的五角星，右上角是镰刀和锤子。最初，除人员外，这些东西大部份都不过是书面上的计划，因为那时游击队所拥有的只是他们设法缴获的武器和运输工具。

铁托公开宣布了这些无产者旅的共产主义性质，使俄国人大为恼火，他们反而主张把这一点隐藏起来。“为什么你一定要搞个什么无产者旅？”季米特洛夫在3月5日给铁托拍了这样一封电报，“当前最根本的迫切任务是联合一切反纳粹运动，打败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这总是毫无疑问的吧！”铁托相信并带着几分气愤答复说，这两件事他都正在做并继续照常做了下去。游击队竭尽一切可能，向部队和老百姓一视同仁地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办法是通过报纸、传单、书籍等等，而对于人数众多的文盲则通过成百成千次会议，无尽无休的讲话、唱歌和朗诵诗来进行。几乎生活的每一侧面都成了传播思想感情的媒介。如同任何处于战争期间的社会一样，除官方宣传外，听不见别的东西。但每当游击队丢失“解放”区时，当地的居民便有机会见识他们的敌人的行为举止，把他们和游击队加以比较。

游击队的纪律从一开始就极其严格，特别是在部队对待老百姓

姓（无论是友好的或敌对的）的态度，以及男女（部队中男女并肩战斗和生活，接触密切）两性关系上。大战后期被派到游击队的所有盟军军官谈及他们这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时，无不赞叹不已。〔注 8〕甚至在 1942 年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铁托也不想让他的运动为意志薄弱者所败坏。对抢劫和偷盗（即使情节极其轻微）均予立即审判，立即处决。传说有几个游击队员，由于犯了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罪过，偷了几个土豆，一双鞋或一双袜子竟被枪决。

239 一对对破坏两性关系准则的男女都被分开；据说有些坚持不改的人甚至被枪决。〔注 9〕但由此铸成的纪律却形成了一个光荣传统，并且带来了极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广大居民对游击队的爱戴和信赖，从而使铁托可能得到支持和无比重要的供应，否则便会适得其反。

可是要把游击队仅仅看成是军事组织那就错了。铁托认识到他的队伍不可能处于真空之中，因此在解放区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来处理民政问题。到了 1942 年，地方政府管辖区已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其中有一些（与军事单位一样）都是很小的专业小组。铁托司令部建立了一个特设机构来协调它们的工作，极其注意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保证它们工作有效率，并且符合游击队运动的共产主义精神。

必须建立密切的军民关系，使人民感到军民一家，……政府机关（哪怕是最小的单位）正确执行任务，是解放战争取得成功的基础；没有这一条，战场上的最大胜利都不过是沙堆上的楼阁。〔注 10〕

乡、镇、较大的县区以及诸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等国家和省份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作为共产党政府机构的

样板而设计的。凡支持游击队的人（这就是说，其中许多人并不是共产党员）都可以参加进来。重要的职位通常由共产党员担任。与党内相同，有许多妇女和青年人负责重要的工作。对老年人以及其他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不能参军的人亦有工作安排。人民委员会主要处理当地事务。吃住问题特别重要。绝大多数解放区都有许多难民，因此必须改进福利和社会工作。卫生保健必不可少。“勤洗衣、理发、灭蚤，你就不会得伤寒病。”有许多这种口号刷²⁴⁰在墙壁上。可是，当过分热情的同志强行给别人理发时，兰科维奇便制止了他们。为居民着想是赢得他们支持的基本条件。债务可延期偿还，但赋税却必须征收。工资和物价固定，修复了交通运输设施，焚毁的村庄得到重建，地方工业和农业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正常。地方委员会必须自筹资金，但遇紧急情况，则由最高统帅部的基金中拨款。^[注 11]居民和部队的给养分配，要求全国各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当地指挥部多方联系；军队中特设了一个军粮部门主管这项工作。根本的问题是从余粮地区调拨给养到缺粮地区。这就是说要从农民那里买进粮，而且通常要经过长途发送，有时甚至要越过敌占区。游击队有时给农民打欠条，答应在战后付款。当时看来，这很有些象空头支票，但却在 1946—1948 年间全部付清了。

对铁托来说，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存在缺乏现金的问题，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1944 年以前，游击队并未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财政支援。1943 年 3 月中旬，铁托给共产国际电报答复季米特洛夫关于游击队财政来源的询问时声称，他们掌握着许许多多在国内不同地区通用的五花八门的货币。他解释说，最高统帅部在乌日策缴获的现金中还剩下八百万第纳尔和五十万马克。他又补充说，为了供应部队，还得征用某些东西，并没收各种“占领者代表人”^[注 12]的财产。

人民解放委员会和部队工作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教育，既有狭义的教育，即青年、老年分别编班学习读书写字；也有政治教育，²⁴¹以争取人民对铁托的运动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支持。将近 1942 年底，当铁托控制了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一大片解放区时，他发布了一项指示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有这一大片领土，而且我们的军事力量又集中在这里，这就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现在，必须从政治上把这片根据地组织起来，以巩固我们的军事胜利，扩大和加深我们在人民中的影响，并肃清敌人及其走狗的流毒。”〔注 13〕

游击队每逢被迫放弃一块地方时，战前的行政机关的档案和傀儡当局的档案，只要能找到，统统都加以销毁，使旧制度复辟更加困难。而只要有可能，撤退时总要把自己的文件带走。这是一场在铁托监督下由于战时环境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并以军队为后盾的从基层系统进行的革命，连细微末节都给予极大注意。同样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又和争取解放的、爱国主义的南斯拉夫全民运动结合在一起。1942 年，同盟国对他不理不睬，对此铁托可能感到不满，但是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为他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打下了基础。既没有被同盟各国（尤其是俄国人）所觉察，也未受到干扰。

※ ※ ※

1942 年头几个星期，铁托对得到俄国援助满怀希望。他给季米特洛夫发出详尽的报告，转呈俄国领导人，从来一丝不苟。电报的抬头是发给季米特洛夫，而铁托自己签名则用他在共产国际

的名字瓦尔特。这些电报通常都是他亲笔用俄文写成——大多用的是铅笔，还小心翼翼地加上标点，反复修改。纸张则是从放在他背包里的普通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它们所提供的详尽情报有：游击队的活动，包括对战斗情况的定期全面汇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种决定；德国和意大利部队的调动，切特尼克的活动及其暴行和通敌活动。铁托小心谨慎地回答季米特洛夫提出的问题，向他提供那些由他委派在总参谋部担任职务的，以及被德国和意大利逮捕的共产党员的详情；他和马其顿人的关系以及他同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联系的情况。他还提供了关于在苏联境内设立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所及范围，以及许多关于切特尼克同南斯拉夫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接触的情报。〔注14〕

铁托的电文中最重要的是他引用大量实证，详尽地向季米特洛夫报告关于切特尼克同意大利、同德国勾结的情况，以及请求援助的电报。早在1941年8月铁托便曾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他的士兵需要武器；12月底，他指定了一个可以用降落伞空投的地点。1942年2月初，他得到一项答复：“最近有可能派人到你处。盼告飞机降落场地详情……”2月17日铁托回答说：

“我们急需医药用品，特别是预防伤寒的血清，……盼送来军火，自动武器、皮靴和士兵军服材料，……请在门的内哥罗杜尔米托尔山麓扎勃利亚克为我们空投。此地已经下雪，机场不宜降落，除非飞机带有滑雪装置，……你们不论送来什么东西，都将是极大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注15〕

就在当天，铁托又作为附言发了第二份电报补充说：

“地点是在完全解放了的地区内，十分安全，……为了日

后能使巨型飞机着陆，请火速运来相当数量的各种自动武器、机关枪、信号器材、火箭、轻机枪和弹药。”

铁托又补充了纬度，提供了辨认的标志，并说他们将从2月23日起期待苏联飞机的到来。着陆场地已准备就绪，莫沙·皮雅杰，一个五十二岁的热心的共产党员被派往督促安排，相信他定能妥善地完成一切任务。皮雅杰后来写道：

243 “我于2月22日晚到达扎勃利亚克。这是飞机预定到达的前一天，因此我有时间检查所有准备工作。云贾多尔村附近的辽阔高原积雪六英尺深，我们在2月23日和其后的三十七个夜晚就在那里等候飞机。我们经常到扎勃利亚克村四英里外的一片荒凉的大雪覆盖着的高原上等飞机，每天都是天黑前往，拂晓返回，徒步而行。”

最后，他们修建了一个小雪屋（看起来象是北极探险队的住处）以供人们在其中掩蔽。传令兵守候一旁，准备给在福查的铁托报信。

2月25日铁托给皮雅杰写信说，季米特洛夫曾建议要游击队最高指挥部以南斯拉夫人民名义向欧洲人民发表一项声明。铁托立即作了回复，附了一篇措辞生动，他认为会是令人高兴的声明草案。这篇声明一直未公布，而且从3月初起季米特洛夫来电的调子转而趋于冷淡。铁托仍继续不断地发出情报并请求武器。铁托电告，英国飞机空投了两名南斯拉夫军官和两名英国军官，但他们都被德国人俘虏；萨格勒布的李巴尔家遭到袭击；赫尔塔·哈斯被捕。第二无产者旅已经组成，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建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3月5日，“老爷子”就无产者旅一事申斥说：

“研究了你们电告的全部情报，得出印象是英国和南斯拉夫政府成员确有某些〔根据？电文字迹不清——编者〕怀疑游击运动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旨在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难道除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同情者外，你们就不能联合其他爱国者共同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吗？……我们认真地要求你们密切留意你们的策略和行动。”

铁托在回电中为自己的政策作了强有力的辩解，他说：“游击队运动处于被第五纵队瓦解的危险之中，无产者旅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他们并不是在为苏维埃化而战斗，但却以其英雄行为“给我国人民树立了榜样”。……铁托在3月9日的另一份电文中尖锐地指出：“我们需要武器弹药。这才是创建民族解放阵线最好的办法。我们国家有大量人民，他们都渴望对侵略者战斗，但他们没有武器。”铁托进而采取攻势：为什么苏联电台不向世界说明切特尼克反游击活动的真相？季米特洛夫赶忙安抚铁托：

“可惜，你误解了我们的电报。我们不是责备你，……我们完全地、毫不动摇地信任你。……鉴于苏联对外广播（由于政策上的原因）现时不提切特尼克，如果再提到斗争主要是针对切特尼克显然不妥。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动员世界舆论反对侵略者；至于指名或揭露切特尼克则是第二位的事情，……我们坚定地紧握你那有胆略的手。”〔注16〕

铁托并未平静下来，他对握手不感兴趣，除非这意味着援助。3月19日他发电说：“由于缺乏弹药，我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务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送来武器和军事物资。盼告能否送来任何东西及日期。”一周以后，他写信给仍在杜尔米托尔山麓雪地里等待

的皮雅杰说，他相信援助迟迟不来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写道：“妨碍我们取得援助的主要障碍是南斯拉夫政府，而不是我们的政策。”事情后来非常明显：2月底3月初的这段时间，援助铁托的政策被否决了。关于这件事情，俄国人迄今未发表自己的说法。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只能揣测是斯大林亲自撤销了起初要援助铁托的决议。这项决定是什么时候通知季米特洛夫的，我们不得而知。3月19日，季米特洛夫开始婉转地透露不会送援助来了。“为了支援你们武器，已经竭尽一切努力，但技术困难极大。唉，你们别指望我们能在短期内克服它们了。切记尽力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现有的军事物资吧。”对铁托来说，这无非是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再加阐述的一番昏话。恰如六年后铁托和斯大林关系破裂时所揭示出来的情况那样，此事的整个历程创痛至深。〔注17〕

1942年上半年，铁托和游击队员们为求得生存而进行着战斗。²⁴⁵ 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危急的阶段。运动仍处于从地方性的起义向全国性的解放和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军队几乎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完全赢得人民的支持。难民有些参加了游击队，也有些参加了切特尼克匪帮。英国援助切特尼克，这对没有政治信仰的农民是一种很大的吸引力。德国和意大利从本国和当地的部队中调集了援军。铁托没有放弃施加压力以使俄国领导人体会他的严重处境。他在接二连三的电报中，把三件事情说得很透彻：切特尼克和德意勾结；奉行援助盟国敌人政策的南斯拉夫政府的通敌活动；游击队在对德国人及其同伙作战中所面临的十分危急的现实情况。5月24日铁托给“老爷子”发电报说：

“自5月20日起，我一直在门的内哥罗前线。形势危急。战斗持续不断，游击队员已筋疲力竭，……他们弹药殆尽。

全国人民都在诅咒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因为它通过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正在给侵略者大帮其忙。各界人民都在问为什么苏联不送援助来，……难道果真就无法在伦敦对南斯拉夫政府的现有叛国政策采取行动吗？”

几天后，铁托谴责了英国广播公司所报道的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对侵略者“共同作战”的消息：

“那是弥天大谎。请尽力揭露这种骇人听闻的背叛，将其公诸于世。……我们打算几天之内发布一项反对切特尼克和南斯拉夫政府的声明。请电告你们的意见。”

铁托小心谨慎地回答了俄国人提出的一切问题，试图表明他领导的运动，恰如俄国人要求的那样，是立足于全民族的支持的，虽然他也并不隐讳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注18〕

我们不知道苏联领导人以何种形式接到这类情报，也不知道他们接到了多少。但到1942年夏天已经有了一些迹象，表明这种情报至少在苏联和王国流亡政府的关系上产生了某些效果，当时²⁴⁶流亡政府正在伦敦和古比雪夫不断地施加外交压力，企图迫使铁托将其军队置于米哈伊洛维奇的统率之下。季米特洛夫要求提供的一些情报，显然是为了掌握情况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内阁大臣们进行谈判。1942年1月5日米哈伊洛维奇受任为南斯拉夫内阁的国防大臣——陆海空三军统帅。这一事实使局势复杂化了。8月，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首相斯洛博丹·约瓦诺维奇教授提出了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军队支持意大利军队的详细情报。但俄国人仍然行动十分谨慎，唯恐冒犯西方同盟国，从而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他们也仍然害怕同盟国可能和德国达成交易转而支持一

场共同对付苏联的反共十字军。援助铁托，乃至他的运动能否幸存，比起这种危险来都不过是次要的事情。

9月14日季米特洛夫打电报给铁托，要他送来关于切特尼克通敌活动的真实文件，同时警告说，德国人理所当然要在南斯拉夫人中间挑拨离间，有些文件可能是伪造的。铁托掌握了大量文件，而且了解它们确属真实。其中有许多如今已从德国和意大利官方档案中得到证实。^[注19]俄国人当时提议派出他们自己的观察员到米哈伊洛维奇那里去。11月30日王国政府首相约瓦诺维奇给米哈伊洛维奇打了“绝密”电报：

“俄国人已建议派遣高级军官到你的参谋部去，以便同你取得联系，而且还要从俄国的南斯拉夫人连队中为你争取援助并组织联合广播。建议已被拒绝。我们坚持首先要立即停止在电台和报纸上对你所领导的南斯拉夫军的攻击；其次要告知游击队不得进攻我方部队；第三，游击队要置于你的指挥之下。只有在这几点做到以后，方能谈得上进一步合作。”^[注20]

12月，还有其他几份电报也重复了同样傲慢的不现实的观点。²⁴⁷但这时，同盟国方面（包括俄国人在内）已确切无疑地认识到切特尼克同敌人的勾结。据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官方消息说，英国军官彼得·博吉少校和王国战时内阁首脑日·克奈热维茨少校会谈时说，米哈伊洛维奇和奈迪奇一样是个卖国贼。^[注21]尽管如此，同盟国直到1943年年中仍给米哈伊洛维奇输送军事援助而不给铁托帮助。至于俄国，直到1944年才向铁托派出军事代表团，带去的援助也很有限。铁托终于赢得这场斗争，取得了同盟国的承认和援助。但在他看来，这时若干次最艰苦的战斗已经过去，

而防止战争中最严重的损失和最惨痛的苦难已为时过晚了。

※ ※ ※

1942年夏，铁托决定把他的大部份军队从波斯尼亚东南部北撤二百英里到克罗地亚，那里敌军较为分散，并且有可能开辟解放区。游击队后来所说的“长征”从6月24日开始。调动这一支三千人的军队（一路上阵亡者不断由新兵补充）化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伤员和往常一样随大军同行。这是铁托的老规矩：伤员如不能安置在安全地方，部队就必须带着他们。敌人不承认他们是战斗人员，一旦被俘，便要斩尽杀绝。上次游击队从乌日策撤退时便发生过这种事：德国坦克在游击队伤员躺卧的田野上开来开去，把他们通通压死。

正当铁托把他的司令部逐步向前推移——到库伦—瓦库弗，到普罗佐尔，到格拉莫奇，到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最后到波斯尼亚的小镇比哈奇时，他和若干正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获得一些胜利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11月12日铁托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

“迄今为止我们已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组成八个师，每个师都有三个整编旅，……眼下我们正着手成立类似政府的机构，叫作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包括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代表和某些过去的党派的代表。”他接到一封措辞谨慎的复电，告诉他：

248

“要使委员会在人事和纲领方面都具有一种各党各派联合的反法西斯的性质。不要把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政府，而要看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机构。现阶段不要提出废除君主政体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共和性质的口号。政体的问题，

……可待德意联盟被粉碎，国家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后再解决。〔注22〕

铁托于是着手安排在比哈奇召开一次盛大的会议。这次大会于1942年11月26日至27日举行。与会者有来自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军民都有）的代表，也有南斯拉夫战前的某些政党的成员。这个会称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AV-NOJ），没有成立政府（这是出于尊重俄国人的命令），但是却选出了一个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便具有这种职能。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在一所女修道院的大厅召开的。会场装饰着许多旗帜和各同盟国国旗。会场上一条条横幅标语，写的是游击队的口号：“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人民”。南斯拉夫的老政治家伊凡·李巴尔博士担任主席。这次大会激起了巨大的热情，而且是争取国际国内舆论的一场心理战。会议闭幕后，铁托电告季米特洛夫：

“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并将遵循它，但我们必须预先通知你：现在全体人民都斥责南斯拉夫政府是卖国政府。我们虽不把这个执行委员会看成一种政府机构，但它仍然必须料理国家事务和军事工作，各个人民解放委员会将会支持它。……在南斯拉夫，除了这些委员会和指导战争的军事当局之外，再没有别的当局了，……它们在全南斯拉夫享有巨大的权威。”〔注23〕

这份电文显然有一种新的语调，包含着自豪、权威甚至还有
249 挑衅。尽管这次胜利是短暂的，比哈奇会议仍可以看作是游击队运动的转折点。这件事向俄国人表明：铁托现在已认为他既有军队，也已拥有国家。这标志着铁托在政治上的成熟。虽然他继续

同俄国人提供周密的报告并就许多不涉及主权问题征求意见，但是，现在却要求享有一种新的独立地位。如果 1942 年俄国人果真送来了援助，特别是如果他们派来了军事代表团，那就难以设想铁托如何能防止俄国在军事和政治战略上对他实行某些控制，并进而把他从那无可争执的领导位置上撵走。果真如此的话，这几乎肯定要妨碍游击队运动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运动，从而也就会改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战后发展的整个性质。

同盟国的承认

1943年给同盟国的军事形势带来了巨大变化。德军于北非受阻，俄国人在东线转入进攻，盟军攻入意大利，在9月初迫使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由此德国的最后失败已成定局。铁托所处的局势同样也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年年底以前，他得到了同盟国的援助和承认。他也担任起南斯拉夫临时政府首脑的职务，这个政府是对王国流亡政府权威的挑战。

当盟军着手计划进入意大利之时，势必考虑巴尔干的军事形势。在这个如今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军被迫用于保卫交通线以防游击队袭击的师团越多，可用于对抗盟军在意大利挺进的师团就越少。这就意味着盟军首脑如今头一次有必要下定决心弄清南斯拉夫起义人员的真实情况。1941年夏至1942年6月，开罗特执局曾先后八次试图把军事代表团派入南斯拉夫。一个军事代表团空降到萨拉热窝的山里，被克罗地亚部队（多莫布兰团）杀害；另一个代表团的部份成员由海路到达，在科尔丘拉岛被意军俘虏。^[注1]

由特伦斯·艾瑟顿少校率领的这个代表团的遭遇成了一个谜，引起了许多推测。1942年1月，特执局派艾瑟顿率领另外两名英国人和两名南斯拉夫人去南斯拉夫，在门的内哥罗海岸登陆，据估计他是奉命与米哈伊洛维奇接头。他和控制着该地区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由他们带往波斯尼亚的福查铁托司令部，于3月初到达。代表团受到铁托的盛情接待，铁托为了使自己的抵抗运

动得到承认和援助，正渴望同英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艾瑟顿中途丢失了他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而这时铁托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系²⁵¹统刚刚建立。很费了点时间才做出安排，使艾瑟顿得以继续前进。他在福查呆了几个星期，并在这期间，他同前南斯拉夫王国的一个将军留巴·诺瓦科维奇接上了头。艾瑟顿熟悉这一带地方，他早年曾在这里度假钓鱼。但也不能排除他自愿承担这项任务另有人目的。他显然决定不等待游击队为他安全通过他们的解放区及各占领区去切特尼克司令部作出安排，而是在两名反游击队的南斯拉夫人斯帕索耶·达吉奇和拉多万·布拉戈耶维奇协助下秘密地自行另作安排。诺瓦科维奇同意只是在艾瑟顿给他一封函件写明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条件下，才肯参与这一越轨行动。4月16日夜晚，艾瑟顿和小组其余人员稍稍地离开福查奔向米哈伊洛维奇。诺瓦科维奇带领他们走完一段路程之后便把代表团交给了当地的向导，但自己却没有离开他们。当向导们了解到艾瑟顿携带着大批金钱，主要是金币时，便设法把诺瓦科维奇打发走，杀害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抢走了金钱和其他贵重物品。这一谋杀案的消息在西方传开，亲切特尼克分子便指控铁托制造这起事件，并以此破坏铁托的威信及其所领导的运动。铁托愤怒已极，下令查明和缉拿凶手归案。达吉奇后来是东波斯尼亚的一个切特尼克司令官，次年，同游击队作战时被击毙。诺瓦科维奇被捕关押，布拉戈耶维奇被处决。这起事件使铁托对英国情报人员一度十分怀疑。〔注2〕

但到了1943年初，英国却顺利地把另外几批联络官派到切特尼克处。1942年12月25日S·W·贝利上校接任驻桑贾克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其后几个月中，另一些英国军官访问了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切特尼克部队。贝利上校的报告以及英国从王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情报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切特尼克的政策。那就是：在盟军进入巴尔干，塞尔维亚²⁵²

人得以和他们并肩投入战斗之前，米哈伊洛维奇不打算动用他的切特尼克部队抵抗德国及其同盟者。他甚至拒不许可他的部队从事破坏活动。1943年，同盟国当局得到可靠情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限制着米哈伊洛维奇的行动：他与德国和奈迪奇的官员有种种勾结，许多切特尼克部队与意军密切合作。〔注3〕

1941年11月至1943年6月，英国给米哈伊洛维奇送来二十三吨补给，包括武器、黄金、无线电设备、衣服和医药用品。他和王国政府首脑一面拒绝实行同盟国的要求，一面却益发纠缠不休地索取更多的援助。〔注4〕贝利上校曾报告说，米哈伊洛维奇竟指摘英国要求“战斗到最后一个塞尔维亚人”；英国人和南斯拉夫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注5〕

铁托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到1943年，英国已经了解到他拥有一支不可忽视的部队，积极转战南斯拉夫许多地区。这时候他们已经了解铁托不是什么编造的神话，也不象一度谣传的那样是个什么女人。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人，而且以为他很可能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俄国人。但是他们没有多少详尽的情报，甚至不知道某个时间他的司令部在何处。他们没有给过他援助。当贝利上校向切特尼克争取合作未成时，才于1943年初决定同游击队领导直接接触。这是根据特执局和中东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建议作出的军事上的决定，而且不是没有遭到相当大的反对，因为它意味着可能要承认正与切特尼克打得你死我活的共产党造反分子，而切特尼克的总司令是流亡政府的军事大臣。这一决定以及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都通知了王国政府。〔注6〕

双方后来都指摘英国的政策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①。切特

①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他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后人称这种权谋为马基雅维里主义。——译者

尼克和王国政府自称遭到背信弃义的投机家的出卖；游击队则坚信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们，实际支持的是米哈伊洛维奇，目的是让亲塞尔维亚集团在战后复辟。但是英国对战前南斯拉夫的政策看来可能尚未明朗化。英国政府曾积极支持过 1941 年的贝尔格莱德政变，这一事实以及支持从希特勒欧洲流亡出来的各国政府的总政策，使英国有责任支持王国政府及其军事大臣。如果米哈伊洛维奇协同英国向南斯拉夫境内的德军和意军作战，那就很难想象事态会发展到英国援助铁托的地步。²⁵³

遵照丘吉尔及其顾问的决策，开罗特执局于 3 月 25 日授权与游击队取得正式联系。4 月 21 日，两队加拿大国籍的南斯拉夫人“盲目地”空降到确知是游击队所在的地区。有一组官兵顺利地乘汽车到达克罗地亚司令部；第二组降到游击队正在作战的东波斯尼亚，遇到了一些困难；第三组由两个英国军官率领，于 5 月 19 日空降到波斯尼亚。但两天之前铁托已和头一个军事代表团接上头，并已电告开罗同意接受一名英国联络官到他当时设在门的内哥罗的司令部。〔注 7〕

同盟国对游击队感到兴趣，正是铁托在军事上的危急关头，因为 1943 年头六个月，德军两次连续发动进攻，目的是要歼灭铁托主力部队，粉碎游击队运动，打通从希腊经南斯拉夫到意大利和中欧的德国交通线。已经为这个德军称作“魏斯”（白色）行动而游击队则记载为“第四次攻势”的战役制定了计划。这个行动的第一阶段是包围铁托司令部所在地比哈奇地区的游击队阵地，然后在第二阶段插入波斯尼亚游击队控制的领土并消灭大部份游击队武装力量。还有一个一直未能达到的第三阶段：德军计划将切特尼克缴械，让他们担任辅助勤务。

动员了一万八千名以上的切特尼克分子参加这项行动。其中

约有一万二千人在门的内哥罗，由斯塔尼希奇上校指挥；黑塞哥²⁵⁴维那则有意大利穆尔杰师在南部和东南部占据阵地以切断游击队的退路。〔注8〕铁托及其军事顾问们决定游击队必须从这个方向突围，以游击队突击队突然发动进攻，掩护主力部队和大批的随行伤员、难民且战且退。游击队主力用三周时间才经过波斯尼亚中央高地撤向奈雷特瓦河，而为了突破敌人包围圈，必须过河。病号和伤员一开始就超过二千人，而且随时增加。他们被分成能步行的，能骑马的和必须用担架抬的三类。戴迪耶尔当时参加协助伤员纵队的安排，利用行军中屡次停留时间写了日记：

“我去察看伤寒病号，……面颊深陷，骨瘦如柴，两眼圆睁，炯炯有神，……整个荒山遍布担架，直达迪纳拉山脉，……什蒂潘尼齐有四百名伤员而无运输工具。”

这次攻势开始后十天，铁托电告季米特洛夫：

“不得不再次询问是否确实没有可能给予某种援助。数十万难民濒于饿死。已经历了二十个月英勇卓绝，几乎是超人的战斗，难道真的没有可能找到某种途径来帮助我们？……目前伤寒已开始蔓延，而我们缺乏药品。人们饥饿而死如同苍蝇，……请尽最大努力给予援助。”

十一天后，1943年2月11日，他得到了季米特洛夫惯常的答复：

“苏联人民及其领导们都完全站在你们一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编者）和我本人曾经多次（电文不

清一编者)讨论支援你们的方式方法。遗憾的是至今由于不能克服的技术困难,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满意的办法,……一俟条件具备,我们将竭尽全力采取一切紧急措施。难道你对此还会有怀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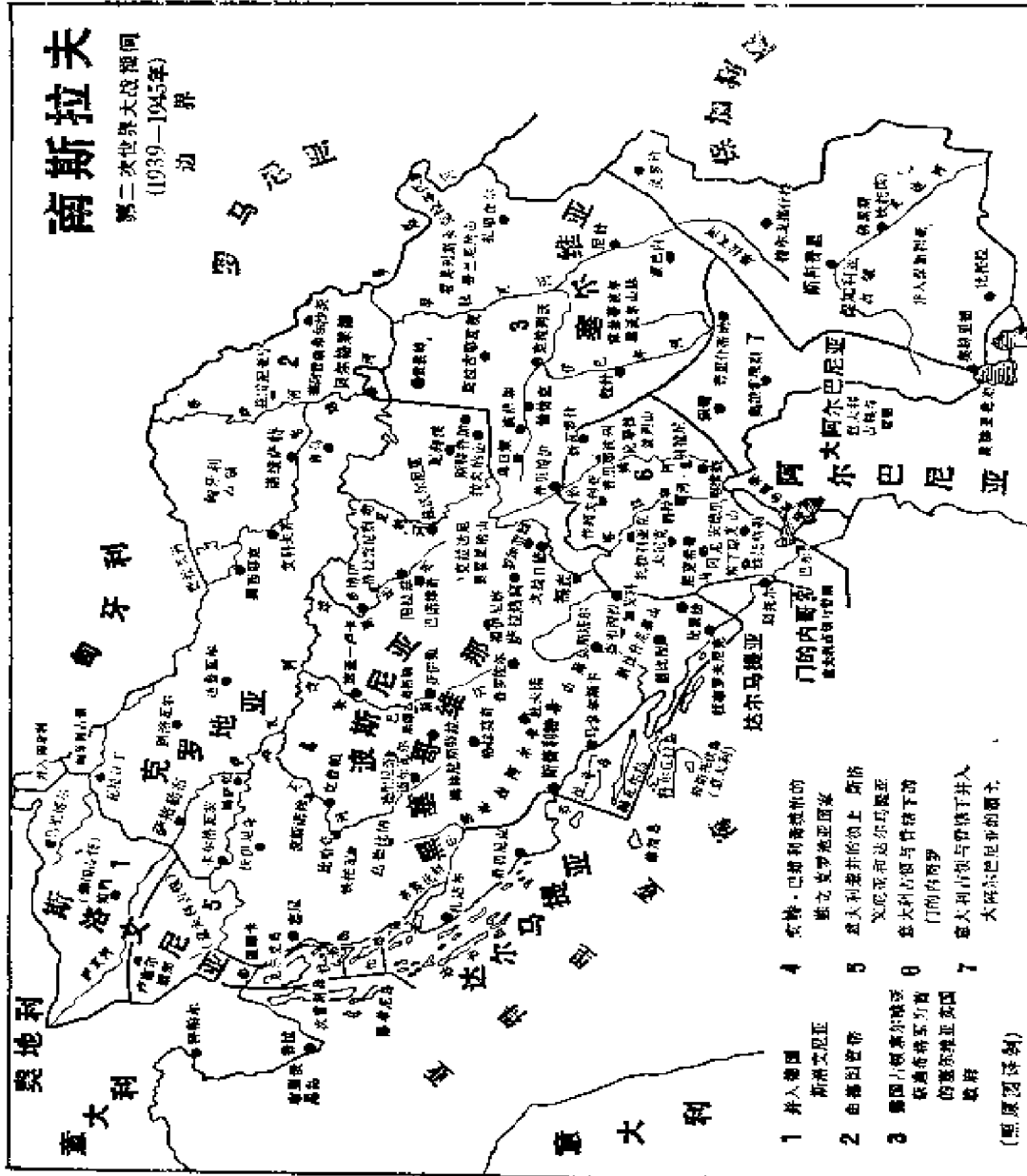
铁托的评论只得压下不表,但是几周后,在就游击队同德军和乌斯塔沙交换战俘问题而与季米特洛夫的来往函电中,他让自己²⁵⁵讲了句辛辣的话。游击队争取使一批人获得释放,其中包括赫尔塔·哈斯。季米特洛夫对这项谈判表示不满。铁托随即顶了回去:“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目前如何艰难,而且又不能帮助我们,至少别妨碍我们。”以两名乌斯塔沙的要人换回了三十名游击队员,其中包括在斯洛文尼亚参加游击队的赫尔塔。〔注10〕

2月22日,第二师攻克亚布拉尼察,击退了切特尼克的进攻,而第一、第三师则到达孔日奇附近的奈雷特瓦河,巩固了他们的侧翼,防止敌人从萨拉热窝方面进攻。先头部队从普伦伊山上的切特尼克队伍中杀出一条血路,击溃了全部切特尼克部队。到3月15日,铁托知道主力部队已得脱险,于是下令撤到门的内哥罗心脏地带。他又派了三名高级军官(德热拉斯、韦莱比特和波波维奇,全用假名)就停火问题同德军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保全伤员(因为游击队不被认为是战斗人员,不受红十字会公约的保护)以及安排交换战俘和抽空集中他的溃散的部队,追击逃窜中的切特尼克分子。结果之一是:切特尼克部队虽然屡次集结,继续与德国军队合作,对游击队作战,直到战争之末,但他们从此未能集中足够力量,对游击队构成重大威胁。游击队此时处于不利地位,而德军的攻势显然还将继续下去。

“魏斯”行动此时已并入“史瓦西”(黑色)行动(这是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攻势),因为游击队没有时间休息,整编或选择有利

南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39—1945年)
边界



- 1 并入德国
斯洛文尼亚
- 2 在塞拉耶沃
- 3 第四克罗地亚
保加利亚与希腊的
的塞浦路斯英国
政府
- 4 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的
斯洛文尼亚国家
- 5 意大利在并进的领土
又原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
- 6 意大利占领与希腊下的
门的内哥罗
- 7 意大利占领与希腊下并入
大阿尔巴尼亚的领土

(照原图译制)

的地势。铁托后来曾说，一度是他们的掩护所的群山，这次战役中却成为游击队的不利条件。他们的机动性大受限制，以致几乎未能逃脱。

参加抗击后来称为“第五次攻势”的游击队，只是铁托的总兵力的一小部份。铁托的兵力分布在南斯拉夫不同地区，彼此用无线电通过地区司令部与最高司令部联络，但却常以极小的部队为²⁵⁶单位相当独立地进行战斗，补给全部自理。他们在全国的总人数约达十五万。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及其后相当长时期，游击队的人数只是大约数字。人数是由战地指挥官掌握的，而他们任务繁多，既无方法又无人员记录每天的人员变动情况。山地战中，伤亡数字往往难以统计。敌人的战地兵力压倒铁托，众寡悬殊情况很可能远远超过官方公报的六与一之比。〔注11〕

铁托原打算把他的主力部队朝东南方向调动到南塞尔维亚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边境的科索沃—梅托希亚。在这点上，他再次把政治和军事联系起来考虑，因为这样就能在一个完全新的地区里争取支持。他的代表一直与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共产党以及马其顿人保持接触。铁托以其惯常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可能已经在考虑协调整个巴尔干南部的游击活动。然而他不同意建立巴尔干联合司令部的设想。但由于德国从东南方向迅速进军，铁托未能向这个方向撤退。

5月6日，正当这次战役的中期，铁托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通知：鉴于共产国际已经过时，建议予以解散，急切要求南共政治局发表意见。铁托正全神贯注于危急的军事形势，加之全体政治局成员都在战地指挥，没有立即答复。5月22、23日又重复来电，他终于在5月26日按来电要求表示了赞同，但心里十分明白：他之同意与否其实不起作用。早在5月15日共产国际已被解散。斯大林亦公布了他的理由：因为它已经成了“反法西斯

共同斗争中的进步力量”创建统一战线的障碍，而且还因为它蛊惑人们相信，莫斯科通过各国共产党干涉别国内政。〔注 12〕这是俄国人为了在战争的后期阶段进行政治交易、宽慰同盟国的舆论而采取的许多行动之一。

共产国际的寿终，对于铁托同俄国的正式关系起初几乎毫无影响——这无疑正是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直到 1943 年底，他和往常一样继续向季米特洛夫详尽汇报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发展情况，汇报为接受英国军事代表团而举行的谈判，关于他们送来的物资并就同他们的关系一事向他征求意见。从迄今所获得的凭证来看，他得到的答复仅仅是一般性的指示，因为俄国人一心关注军事战役，只要铁托不干出什么疏远同盟国的事情，便暂时乐于听任他在南斯拉夫自作主张。

铁托以令人难以觉察的方式，极其审慎地巩固了自己自德国侵苏以来所获得的政治上的独立。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他确实仍旧相信（且不论他对苏联援助一事如何失望）他要在南斯拉夫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仍需依赖俄国的支持。他不打算切断这条生命线；战后的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国家要采取何种形式，看来他也没有明确的主张。

5 月中，当正在安排英国派代表团到铁托司令部时，他的军事局势正在恶化。德军从四面八方合拢，在马格里奇山坡占据了居高临下的阵地，俯瞰苏捷斯卡河以及一条深谷，谷口则在苏哈；铁托的部队如果要由此自拔，势必要由东向西横渡这个谷口。时机万分紧迫，但铁托为了等候英国代表团到达，还是把撤离的时间推迟了三十六个小时。这个代表团由六人组成，其中包括威廉·斯图尔特上尉和丘吉尔的朋友 F·W·D 迪金上尉。他们乘降落伞顶着每小时四十英里的强风，于 1943 年 5 月 27 日至 28 日之间的夜里到达，并不得不随铁托及其参谋部赶在德军合拢包围圈之前立

即出发。如果再晚来二十四小时，是否能够着陆都成问题。这伙²⁵³人行军数天，设法渡过了狭窄的苏捷斯卡河。6月9日，他们正翻越对岸树木繁茂的山坡时，天气转晴，被敌机发现，遭到轰炸。斯图尔特上尉和铁托的警卫员德尤罗·武约维奇牺牲。铁托左臂崩进一块弹片，迪金的足部受伤。〔注13〕铁托的幸免，又一次全凭非同寻常的运气。当他纵身卧倒之时，他的爱犬卢克斯也紧贴着主人头部躺下，卢克斯被一块弹片打死，否则这块弹片就会打中他。

到6月底，司令部成员和游击队主力的余部都已突围，越过泽伦戈拉（青山）奔向福查—卡里诺维克公路，进入东波斯尼亚比较安全的地带。战斗员和伤病员损失都很惨重。铁托的主力部队此后从未再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但事实证明德军直到最后一支是一支善于随机应变的顽敌，此后还有着许多场你死我活的恶战。

※ ※ ※

铁托最迫切的需要是补给和空中掩护，而英国军事代表团起初并未能够按他所希望的速度和数量提供这些东西，使他大失所望。他始终未能释去那种怀疑，即补给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克扣不发的。给铁托输送的补给中，有一部份真可能是由于盟军指挥系统中某些个人所采取的拖延战术而遭到阻碍，但主要的困难却在于初期负责输送补给的开罗特执局缺乏可供使用的飞机。对此，游击队觉得难以置信。及至丘吉尔详细了解到铁托的积极作战方针，他就亲自过问这件事，催促加速提供补给。盟军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官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赞成真正扩大给铁托提供补给的渠道”，并为此不遗余力。〔注14〕

派驻铁托处的首批军事代表团到达后，送来了六十五吨军需

品，其中大半是用来破坏德国横贯南斯拉夫南北交通线的爆破器材。当游击队表明他们为此目的把这些物资用得既迅速而又有效²⁵⁹（与米哈伊洛维奇恰成对比）时，其他补给随之而至。6月23日丘吉尔决定，这些物资应以每月四百吨的速率运来；为了协助并观察这些行动的结果，经铁托同意，全国游击队组织都配备了英国军官和技术人员。8月，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被任命为驻铁托司令部军事代表团团长，直接对丘吉尔负责，所有英国联络官员均归他指挥。〔注15〕

铁托因终于获得补给而产生的宽慰和他对英国的信任，由于仍有物资送给米哈伊洛维奇这一事实而受到损伤。1943年9月派驻切特尼克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阿姆斯特朗提升到和派驻铁托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同样的军衔，为此他也感到不悦。铁托还遭到进一步的打击，使他既恼火又失望；他无意对英国军事代表团掩饰这种心情。同盟国没有把意大利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的情报提前告诉他。由于他错误地相信贝利上校曾把这一情报泄露给米哈伊洛维奇，因而更加恼怒。〔注16〕

意大利投降时，驻在南斯拉夫有十四个整编师和四个缺员师。收复他们的占领区，夺取他们的装备而不让德军或切特尼克抢先得手，对铁托是万分重要的事。他命令部队全速进军，占领达尔马提亚海岸和沿海岛屿，尤其是斯普利特和希贝尼克这两个装卸港，以阻止意军逃跑并接收集中在那里的仓库。游击队成功地解除了十个意大利师的武装，获得了大量的军火和库存物资。他们还为自己的部队扩充了大约八万兵员。其中部份是意大利俘虏，他们自愿加入了游击队为他们编设的特别部队——加里波第师和加里波第·纳蒂索内师。

截至年底，铁托部队的男女士兵人数达二十九万人左右。这时，德国在南斯拉夫的部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二十万德国

兵，十六万保加利亚兵以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傀儡兵。〔注17〕他们仍然担心盟军在达尔马提亚登陆，决不敢让铁托控制达尔马提亚海岸。不出几周，他们就把游击队赶出了大多数海岸阵地，以及除距离意大利本土最近的维斯岛以外的全部岛屿。从1943年9月底起，整个异常寒冷的严冬（1943年和1944年之交），他们继续袭击散布于辽阔地带的、特别是波斯尼亚的游击队。他们所采用的是新的、流动的反游击战术，并用空军配合，这正是游击队所缺乏的。²⁶⁰

铁托如今知道他有充分的人力对付德国人，但必须能继续在武器、食物、装备、空中支援和医药方面获得足够的补给。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他的要求，并获准派出自己的军事代表团飞往开罗盟军司令部进行磋商。洛拉·李巴尔受任为代表团团长。11月27日，当他正登上一架俘获来的敌机（当时他对英国派来的飞机几经推迟而不耐烦）准备飞往开罗时，被一架单独入侵的德机炸死。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受命接替他，于12月与麦克莱恩准将一起飞往开罗，麦克莱恩前往向与斯大林、罗斯福举行德黑兰会议后当时路经开罗的丘吉尔汇报。

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同意“尽可能以最大的限度的规模对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并且派遣突击部队给予支持。”韦莱比特留下磋商细节，麦克莱恩带着丘吉尔写给铁托的一封令人宽慰的信件回到南斯拉夫，信中说：

通过我的朋友迪金少校获悉你们的一切英勇战绩。我最诚挚的愿望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海路供应，空中支援以及派遣突击部队给予你们一切援助，协助你们的岛屿战。麦克莱恩准将也是我的朋友和下院的同事。我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少校也是一个议员，不久将会同他一起在你们的

司令部供职。

我们当前最崇高的目标就是把纳粹的污秽从欧洲土地上清刷干净。你可以放心，我们英国人无意支配南斯拉夫未来的政府。同时，我们希望大家尽量齐心协力打败共同的敌人，然后再按照人民的意愿决定政府的形式。

我已决定英国政府今后不再给予米哈伊洛维奇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你援助；如果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从内阁中撤销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我们将感到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童年从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阴险控制下逃脱，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而且作为一个处于危难之中的年轻王子投奔我们，大不列颠如果把他抛弃不管，那将是不义的或者说是不得体的行为。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同他的祖国断绝现存的一切联系。因此，我希望你们谅解。在尽一切可能给予你们军事援助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将保持同他的正式关系。我希望你们双方就此停止论战，因为这种争执只能帮德国的忙。

你可以相信，我将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在工作中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热切地希望苏联政府即将派驻你们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将与麦克莱恩准将率领的英美军事代表团在工作中同样协调一致。请通过麦克莱恩准将和我通信，让我得知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我一定竭尽全力。〔注18〕

从此时起，给游击队的援助稳步增长。丘吉尔对铁托的援助犹如他在巴尔干的政策，美国军政当局起初既不赞同也不接受。他们怀疑英国的动机在于干涉巴尔干，把它看成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个分支，或在东欧夺得特殊地位的一种尝试。他们不希望“卷入巴尔干”，而且即使共产党可能真正对德军作战，他们起初也不

愿予以援助。他们原则上宁愿支持现存的政府，而不愿撤销对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支持。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罗斯福本人即倾向亲塞尔维亚；由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大使福蒂奇领导的王国政府的院外集团在华盛顿很有势力，活动得非常成功。美国的这种态度只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才慢慢地转变。与此同时，他们和美国一起卷入地中海的战略行动，看清了铁托游击队采取行动破坏德国交通线的重要性；到了1943年下半年，事实已很明²⁶²显；击败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的战争进程将要大大拖长。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关于南斯拉夫近况的情报来源，于是在1943年和1944年间派来了若干美国军事代表团。1943年8月中旬一名美国军官沃尔特·曼斯菲尔德上尉在南塞尔维亚切特尼克控制区空降，到达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随后在9月又派来艾伯特·塞茨中校。他就在阿姆斯特朗准将接任英国代表团团长的几乎同时到达米哈伊洛维奇处。这两位美国军官于1944年调离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而由乔治·穆苏林中尉接替。他一直守到这一年的5月，然后与阿姆斯特朗同时调离。虽然英国决定切断同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联系，美国却于1944年8月派遣麦克多维尔上校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再到米哈伊洛维奇处。派遣这个代表团的确切目的没有弄清，但游击队相信是想设法安排德国人届时向米哈伊洛维奇而不向游击队投降。而如今得知，麦克多维尔也确实和米哈伊洛维奇手下的军官一起会见过德国人。有过一种说法，认为麦克多维尔的任务是为美国空军安排地面勤务，但事情并不如此，因为这是以尼古拉斯·莱里奇上校为首的另一个代表团的任務，此人是同时来到这里的。后来丘吉尔向罗斯福提起麦克多维尔代表团引起的敌对情绪，特别是影响了和铁托元帅的关系，对此表示不满，该团遂于1944年11月撤回。

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向游击队派了军事代表团，分驻铁托司

令部和各区战地指挥部。第一个到达铁托司令部的美国军官是梅尔文·奥·本森上尉，他与美国派驻米哈伊洛维奇处的第一名军官于同一个月内空降着陆。一个月后又派来了里恩·法里什少校。到1944年4月为止，他在铁托处呆了短短的几段时间（中间曾几度返回意大利）。他写过一份高度赞赏游击队活动的报告，据认为²⁶³影响所及，促成了德黑兰会议作出援助铁托的决定。1944年夏季，铁托把司令部移到维斯岛时，派来了埃勒里·O·亨廷顿上校率领的又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所有美国军事代表团都捎来了物资——虽然规模不大。战争后期，美国人并曾从意大利组织医疗、空运和空中防护方面的支援，协助铁托部队作战。〔注19〕

※

※

※

援助游击队主要是英国的责任，因为这是在地中海战区。俄国人的援助则属于象征性的：派出小小的一组六架“达科塔”式飞机，归巴里的盟军指挥。直至大战末期当游击部队从游击战转为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时，俄国人的主要援助方才到来。按照苏联方面的资料，这些援助共计二万零五百二十八支步枪，六万八千八百一十九支机枪，轻机枪和自动武器，三千七百九十七支反坦克来复枪，三千三百六十四门迫击炮，一百七十门反坦克炮，八百九十八门各种类型的大炮，四百九十一架飞机，六十五辆坦克，一千三百二十九部电台，七所后方医院，四所战地外科医院以及其他各类物资。〔注20〕全面统计西方的援助甚难，因为英国记录迄今尚未完全公开以供查核，而游击队的记录必然不能完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没有。补给以降落伞空投到南斯拉夫大多数地区；也用飞机和各种小型船只运送。起初约有十二个或十二个以上的英国三军特种部队进行运输。〔注21〕为了协调这些活动，

1944年6月成立了以空军少将艾略特指挥的新的司令部机构：巴尔干空军，司令部设在意大利东海岸的巴里。这些特种部队的许多古怪特色仍然保留下来，对于补给的发送没有统一的或集中的记录制度。1944年期间“大约”有九千吨补给空投给南斯拉夫游击队，其中包括十万支步枪，五万支机关枪，一千四百门迫击炮，以及一百万发迫击炮弹、手榴弹和一亿发轻武器弹药。〔注 22〕而这并不包括海路运来的补给，其中有食品、药品、卡车、大量燃料以及一百零七辆坦克，三百六十四架飞机，以及若干登陆艇和 264 小型船只。此外，英国皇家空军还为南斯拉夫游击队培训了两中队飞行员。同盟国给铁托的援助中一个起了重大作用（他对此表示非常感激）便是他把伤病员撤至意大利并在英国建立的特设医院里进行治疗。单是在 1944 年就有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伤员用这种办法撤离，总数超过数万人。英国并曾派出内外科医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战地医院工作。〔注 23〕

不论所获援助总数如何，总也满足不了游击队的需要和要求；他们一面真诚感激，一面却总是有另外一些想法，按照他们的盘算，总量本应该更多一些，而且如果早些给他们，而不是向米哈伊洛维奇提供援助，就可以避免不少令人寒心的损失。对同盟国在全球战争中的全面补给问题，绝大多数游击队员都未觉察到，铁托本人在 1944 年以前也是如此。惨痛的经历和消息闭塞使他们缺乏远见，只纠缠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也是自己的宣传方针的受害者：只集中向本国人民报道苏军的损失，英勇作战和胜利，而对于英国为在中东遏制和击退轴心国军队而不得不进行的苦战，却几乎只字未提。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斗争以及苏联的斗争要不是有英美在西方奋战的话，很可能尽属徒劳，很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铁托和同盟国军事代表团的个人关系良好。这是他有机会很

好地了解的首批英国人，他随即发现有可能以相互尊重和共同使命为基础与他们交朋友。铁托和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在个人关系上没有摩擦；许多英国军官都发现铁托是一位使人一见难忘，使人喜欢，高度机敏而通达人情的人物，他们比他的追随者（这些人的英雄崇拜此时已成为整个游击队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²⁶⁵更能客观地评价他。曾有充分机会观察作为领袖的铁托的麦克莱恩准将写道：“铁托的同伴们远远不能望其项背”。

“他为反德战争带来了……自己的领导、勇气、现实主义、刚毅果断，以及专心致志、智谋、随机应变和普通常识。什么地方有重要事项需要决定，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军事问题，他便着手处理，……沉着而镇定，不论形势如何险恶，……每逢游击队行军，他总和他们一起行动，骑马或徒步，长途跋涉，……他的信条是，只要可能，事必躬亲。一旦把那些需要他亲自处理的迫切问题安排妥当，他就会同司令部人员一齐坐下来，高高兴兴吃一顿饭，下一局棋或干脆席地而卧进入梦乡。他有一种天赋：只要愿意，便能把一切烦恼置之度外，彻底休息。这时他就会谈笑风生，好象世界上全没有使他费心劳神的事情。〔注24〕

林赛·罗杰斯医生在描述铁托给他的最初印象时说：

“我打量了他那饱经风霜、刚毅坚定的面容，但这却与我走遍全国所有村庄所有的画像绝不相同。这面容既充满了力量而又蕴藏着善良；每说一句话，那双愉快的蓝眼睛总直视着你。”〔注25〕

中东盟军司令部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塞爵士，在铁托于德尔瓦尔遭遇一段严峻经历之后到达巴里时初次与他会见：

“他很快地给我留下了印象，其后我总是有充分的理由确信我当时对他形成的看法是对的，他远远不止是一位游击队的领袖——而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位有潜在力的非同寻常的政治家。……他形貌英俊，十分聪明。虽然他的某些下级人员固执不通情理，常常使人气愤之极，但通过和铁托直接谈话，便总有可能从他本人那里得出某种合乎常识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种种难题。”〔注26〕

战地盟军代表团和游击队员之间，尤其是和某些满腹狐疑，经过狂热的理论灌输的政治委员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误会和困难。但问题也并不是总是出自一方，因为代表团的某些成员觉得游击队的严酷的生活条件及其狭隘的政治灌输难以接受。²⁶⁶盟军军事代表团吃得好，装备得好，穿得好，一进入南斯拉夫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便显得象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对极端艰苦、时时危险的生活习以为常的游击队员之中：

“这里一块咸肉油，那里一片面包皮，处处都在欢迎，……没有靴子，没有袜子，没有维生素，没有大衣，弹药奇缺，枪支破旧过时，……但是处处都有如此高昂的热情，如此热烈的信心：自由总有一天会来临，……每根绷带都破烂不堪，因为至少洗了十次二十次还在用，直到烂成一把布渣子。”〔注27〕

“虽然不得已已在污秽中生活，决不容动摇游击队员的信

奈：如有条件便必须讲究卫生，……生活的起码要求和任务是减少身上必然带着的昆虫群体；这一点只要对游击队的习惯给予应有的尊重便能办到，亦即躲入林中脱光上身，……除了自己天天动手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减轻虱子的祸患。”〔注 28〕

尽管条件如此，所有盟军军官都高度评价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兴高采烈的情绪和唱不完古老民歌，歌唱游击队的成就或颂扬铁托的新歌曲。而盟军人员也由于他们的技术熟练、勇敢以及对种种生疏环境的欣然接受而博得人们的赞美。总的说来，盟军军事代表团和游击队之间关系是协调的，有时甚至是友好的；尤其是在边远部队，在那里由于人们对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不总是那么常挂心头，情况就更加如此。

第四部分

革 命 成 功

257
268

第十四章

向和平过渡

269

1943年11月29日至30日，铁托在亚伊策召开了类似战时议会的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从政治策略上来说，这次会议是绝妙的一着，甚至超过比哈奇会议，为的是在就战后南斯拉夫政府一事讨价还价之前先确定和加强铁托的地位。回顾起来，这可以看作是这场政治革命中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开端。这一着占了先。铁托当时并不知道，1943年8月在魁北克召开的盟国会议（旨在为次年入侵诺曼底的“太上皇行动”制定协同作战计划）已经达成协议，将以有限的空投和海运以及少量的突击兵力援助“巴尔干游击队”，但他知道英国对他的活动已经改变了态度。〔注1〕他期望盟军有可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愿意与它们联合行动，但不愿让它们取而代之。他深知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政策一直是按兵不动，坐待战争后期参加盟军作战，从而得以重新上台。他不打算在国际领域的斗智中输掉，以致丧失他的运动已在南斯拉夫赢得的地位。

铁托获悉盟国领导人准备举行会议，当即电请季米特洛夫通知苏联政府，游击队运动既不承认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国王。“我们不允许他们到南斯拉夫来，因为那就意味着内战。”他声称现时代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是民族解放委员会。〔注2〕这是亚伊策会议预定要作出的基本决定。关于正在拟定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他事先既未通知季米特洛夫，也并未请求俄国人

许可，虽然他还是谨慎地就有关组织的问题征求了意见。〔注3〕

270 他想让西方盟国，也让俄国人面对着一桩“既成事实”。这并不难，因为双方当时都全神贯注于与亚伊策会议几乎同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

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是铁托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时刻之一。会上洋溢着成就斐然和胜利在望之感，一片欢欣气氛，而且进行得颇为顺利，既未受到盟国干预也未出现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由于亚伊策当时是正式属于克罗地亚这个卫星国的一个地区，会议使人有一种对德国人成功地进行挑战的感觉。铁托带着一大批人员在该城以两个月的时间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他的司令部设在一个小木房里，附近筑有地下室，以备德国人发觉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增加空袭时用作防空掩蔽部。他此时五十一岁，两年来不断奔波，备极艰苦，加以长期食物不足，使他异常消瘦。由于日晒雨淋，饱经风霜，时而又在防空洞或临时掩蔽部内长时间办公，他面色腊黄，脸皮紧绷在颧骨上。但他精力仍然极其充沛，工作起来几乎比任何下属人员都更能持久，小睡片刻便又精神焕发——这种本领他一直保持到老年时期。在他的追随者眼中，他已经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构成这种传说是为了激励人们去战斗，以此作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哪里有游击队组织，哪里就会在行军歌曲或叙述英雄事迹的民谣里听到对他的颂扬。这也是基于事实和真正的成就；他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物。

除马其顿外，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都委派或推选了代表团前来与会。有些代表团（例如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代表团，其中有赫尔塔·哈斯，即铁托次子的母亲）步行了好几百里，历时数周，到达亚伊策时会议已经开始。各代表团在这里相遇，战争一开始便分离的人重聚一堂，其中有些自从在西班牙并肩战斗

至今还没有见过面。代表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有些则不是，但所有代表都与游击队的抵抗运动有某些联系。男女游击队员穿着形形色色的临时制服，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平民打扮的人。这次会议注意到使持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天主教、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代表参加。〔注4〕²⁷¹

在亚伊策镇剧院的舞台上，铁托向挤得水泄不通的狂热听众发表了讲话；这不仅是讲给他们听，讲给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地区的全体人民听，而且也为了引起聚集在德黑兰的盟国领导人以及流亡的王国政府的注意。其主要目的是重申游击战争旨在解放南斯拉夫的全部国土，并宣告一个全国性的临时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要组成它的拥有全权的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它宣布自己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以代替国王和王国政府，他们原先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合法权利已告无效。这些决定均纳入一项决议，全体一致通过。反法西斯会议行使政府权力，其成员迅即选出。铁托当选为主席兼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衔。他于是具备了他认为与其他国家首脑与军事领袖进行对等谈判所必需的地位。但他仍然得使这些决定为盟国领导人所接受。

11月30日，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结束，当时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正开始举行会谈。铁托在这一天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详述了所作出的各项决定。这遭到莫斯科极其强烈的反对。马努伊尔斯基告诉设在苏联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南斯拉夫负责人弗拉霍维奇说，“老板（意指斯大林—编者）大发雷霆。他说这是在苏联和德黑兰决议的背后捅了一刀”，并禁止弗拉霍维奇广播反法西斯会议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注6〕斯大林害怕因此惹恼盟国，妨害他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在德黑兰会议结束时，他却发现盟国决意承认铁托并给以援助，也不反对铁托所作出的各项决定。他们希冀这将有助于推行其政策，即说服铁托同意与一个经

272 过改革、基础较为广泛的王国政府合作。看来他们对斯大林发火也可能是一无所知，反倒深信铁托所采取的行动是受到这位苏联领导人鼓励的。他们正忙于为诺曼底登陆进行准备；美国还在专心致志地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作出战略部署。为此，英美两国都急于同俄国人保持良好关系。西方盟国和苏联都不想在赢得主要胜利前在次要区域发生利害冲突，这就使铁托在一段时间内从中得益匪浅。他的有利地位更由于盟国之间缺乏了解而加强；在此阶段，这不是有意采取使双方相争以坐收渔利的政策的结果。但这一政策的某种因素即使在当时也并非不存在，特别是在有关援助和供应方面。

尽管非正式的苏联使者可能在1943年9月即已空投到铁托的司令部，正式的苏联代表团却到1944年2月才终于到达；很明显，它并不打算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权力的军事或政治使团来取代铁托的领导。这个代表团以前集团军参谋长科尔涅夫中将为首，关于此人斯大林曾轻蔑地说过：“这个可怜虫并不愚蠢，但却是个酒鬼，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这一点即将由这批俄国人空运来的大量烈酒证实。〔注7〕由于时届严冬，俄国代表团乘坐装有雪橇的滑翔机来到，为此修筑了特殊的简易机场，确保不受德国人袭击，并不断扫除厚厚的积雪。代表团先到阿尔及尔，接着到意大利的巴里，然后才到波斯尼亚。〔注8〕

对红军战绩的歌颂，加以多年来对作为共产主义革命之乡的俄国的崇拜，使游击队员们把苏联代表团的来到视为重大的时刻，他们安排了一场热烈的欢迎。然而他们如痴若狂的热情却未得到相应的回报。科尔涅夫将军走下飞机，“一个发胖的、容貌可亲的中年绅士”，沉甸甸的绣金肩章以及许多勋章绶带，使崭新的红军制服分外夺目，长统马靴擦得雪亮，找不出一丝灰尘。铁托则一
273 身战地士兵的土灰色制服，什么勋章也没有。科尔涅夫由八个军

衔至少是少校的军官陪同，其中包括副团长戈尔什科夫将军，一位俄国游击战专家——他不久就发现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与俄国的大不一样。这一行人中还有一名军医，数名政治情报军官以及若干技术人员和随从参谋。他们一到专门准备的住处休息就声称盥洗设备不齐全，只好按他们的具体要求赶修。〔注9〕

随在数月后德国人袭击德尔瓦尔的短暂期间以外，俄国代表团很少与其他代表团往来，偶尔有之也只是在一些正式场合。这是按照来自莫斯科的官方指令行事，而铁托早些时候就已接到这些指令。象英美代表团一样，俄国人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游击队司令部都驻有代表，但却几乎没有派军事人员到战地去。他们负责铁托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注10〕增添了这条新的通讯渠道，却反而使苏联对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越来越不了解，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这种极不了解也鼓励铁托在采取行动时带有更大的独立性。英国军官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俄国人把南斯拉夫人视为文化上处处落后于自己的次等斯拉夫民族。从5月起，俄国人的飞机（由盟国根据租借法供给的“达科塔”式飞机，从巴里附近的英国空军基地起飞）为代表团运来给养，也为游击队员提供了某些援助。但这种援助从未达到西方盟国此时所提供的援助的数量——铁托与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每周例会时，冷冷地提到了这一事实。〔注11〕

俄国人到达后不几天，铁托也把自己的军事代表团派到莫斯科去。目的是请求援助，特别是请求给予一笔二十万美元的贷款，以解决游击队驻伦敦代表以及铁托正打算派往西方的一些代表团所需的经费；而更重要的则是，求得苏联支持他所提出的要求：与新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拟议中的盟国用于战后重建的援助，应归他的官员而不由王国政府或盟国军管政府所指定的人员支配。这个代表团也抱有党的政治目的，即与苏共官员重建直接²⁷⁴

联系，南共觉得，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已失掉了这种联系。〔注12〕

铁托最信任的同事之一，政治局委员密洛凡·德热拉斯，被指派为代表团团长，预定与季米特洛夫接洽。据德热拉斯自述，他那时也希望苏联领导人对游击队作战成果，以及南共深信自己已为共产主义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嘉许与称赞。尽管德热拉斯未能获得苏联对南斯拉夫战绩的充分赏识，尽管他发现对方在这次会谈中的主要目的是警告铁托不要暴露他在南斯拉夫建立共产党统治的意图，以免“吓坏”英国人，他对苏俄的狂热感情仍未稍减。斯大林告诉德热拉斯游击队员没有必要在军帽上佩戴红星，反复警告德热拉斯要注意丘吉尔口是心非，说他是“那种只要你稍不留神就会把那怕是一个戈比也从你衣袋里扒走的人”。罗斯福也被说成一丘之貉。他警告德热拉斯要提防英国情报机构以及英国人有可能谋刺铁托。他说：“就是他们在机舱里杀害了西科尔斯基将军，然后又干净利索地把飞机击落—既无物证，又无人证。”他坚持铁托必须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妥协，对德热拉斯说，“你应该同舒巴希奇进行会谈，看看能否设法达成和解。”〔注13〕德热拉斯带着这种出自斯大林本人之口因而份量格外沉重的规劝，于6月初回到了新近在维斯岛于建立的游击队司令部。

※

※

※

德热拉斯外出期间，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事件，有力地说明了游击队员需要更多的援助，尤其是空军支援。这就是1944年5月25日上午德国空降部队对设在波斯尼亚的德尔瓦尔的铁托司令部的袭击。或许是由于受到1943年9月空降部队成功地劫走墨索里尼的启示，²⁷⁵德国人极其秘密地筹划了这一以“跳马”（国际象棋中马的走法）为密码代号的军事行动。主力是由五百名党

卫军所组成的空降营，这些人都犯了军法，这次获准参与特别危险的战斗队以立功赎罪。他们人人发了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活捉他。为了确保这次行动出其不意，袭击的地点和时间连军官们都没有事先告知。事实上游击队员们早在1943年11月就曾接到萨格勒布一个特工人员的警告：德国人正准备派空降部队歼灭他们设在亚伊策的司令部。但是，该城除受到几次一般空袭外，还没有发生过什么更为严重的事情。1944年，铁托的司令部迁往波斯尼亚的一个工业小镇德尔瓦尔。^[注14]

德尔瓦尔有一座纤维素工厂，位于铁路沿线，是游击队的老根据地，看来作为司令部的新驻地是合适的。它座落在山谷之中，北有亚塞诺瓦茨山脉峻峭陡立，南为巍巍群山，林木茂密。游击队的部队环绕着德尔瓦尔分布在周围的群山之中，驻地与该地均有一定距离。城内建有一所军官训练学校。游击队的青年运动（反法西斯青年）准备在5月23日举行一次会议，预定请铁托在会上致开幕词。

由于与盟国之间的新的军事、政治联系，铁托的司令部工作量大增，规模也随之在过去一年中大为扩充。此时已设置了一套兼任临时政府首脑的总司令所必需的繁忙而近乎复杂的组织机构。英国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供职的英国代表团驻于城郊的一家农舍。附近是单独设立的美团代表团，其中有数名气象专家。但这两个代表团的团长当时都不在。俄国代表团则住在更远的一个小村里。当时还有许多其他来访者，其中有盟国军官、英美记者、萨格勒布芭蕾舞剧团的几个舞蹈演员，以及来此与铁托商谈国事的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城内正准备在5月25日庆贺铁托的五十二岁寿辰，一派欢乐繁忙气氛。铁托在两天之前还托往克罗地亚送邮件的交通员把一张明信片带到他的故乡²⁷⁵库姆罗维茨，颇为自信地向那里的人们问候；这个村庄当时仍处

于巴维利奇伪政权统治之下。〔注15〕

铁托本人的住所位于刚一出城的地方，四周警卫森严，几乎坚不可摧。出入通道是一条小径，沿着乌纳茨河，一边群山相连，一边陡岩壁立。循岩石上一处天然裂口内的三段木制阶梯拾级而上，往前豁然开朗而进入一天然洞穴，洞内修筑了若干房间，前面还带有一座阳台，由此俯瞰山谷内外，美景尽收眼底。建筑结构以巨大木梁支撑，铁托办公室内四壁贴了一层隔板，挂着用降落伞绸料制作的窗帘；办公桌后，墙上覆盖着一大张英国人绘制的军用南斯拉夫地图。已经发现，德国人的侦察机接连好几天出现在这一地区；5月23日，一架单机在山谷中上下盘旋多时，显然是在拍摄照片。英国人警告铁托，德国人正在准备袭击。尽管如此，游击队却未采取任何另外的防御措施，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包括铁托本人在内，已经疏忽大意到对于自身对付德国人威胁的能力过于自信的程度。

5月25日清晨六时三十五分左右，铁托刚起床就看到窗外飞来德国人的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它们立即开始轰炸镇内的目标，多处中弹起火。七时又飞来四十架“容克—52”巨型飞机空投下伞兵部队，他们着陆后便集合起来冲向特定目标。十分钟后又牵引来滑翔机群，机身一降落地面，机关枪手就蜂涌而出。九时德国人已占领包括无线电讯中心在内的大半个城，但在乌纳茨河右岸，由于最高司令部警卫部队与军官训练学校师生拚死抵抗，他们却未能建立起阵地。向来得及赶到的四个游击师分别派出通讯员或发电紧急呼救。英国代表团设法向巴里发出电报要求空军支援，飞机于次日派来。驻地最近的游击部队第六利卡无产者师在十二公里以外，他们几乎一直跑步前进，于九时左右赶到。其他游击队部队也在天黑前先后到来。中午时分，德国人投下了空降增援部队，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直到次日

凌晨三时三十分，战局才明朗化：德国人已无法实现其目的。

铁托及其司令部所有主要人员都已逃出。他在正午刚过不久就经由一条巧妙策划的路线脱身，即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打了个洞，垂根绳子到下面的河床；沿河往前三十码便可涉渡而遁入彼岸的果园。铁托身边的人员大部份逃脱，其中卡德尔因德国人通过时与他藏匿之处近在咫尺，险些落入敌手。铁托的女秘书兹登卡和奥尔加走在前面，他和警卫员及其爱犬虎子（虎子只好用绳子往下吊）随后跟着。他们设法在森林中觅路前往波多齐，游击队在那里有几间隐蔽在树丛中的小屋，由此得以搭乘火车沿一条短短的铁路穿过森林。游击队所有重要领导人都脱身了；来访的外国人也大都逃出，但有一名美国摄影记者和一名英国新闻记者被德国人俘获。〔注16〕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代表团与铁托会合到一起，他们接连好几个晚上不停地转移，避开德国人从班亚—卢卡、亚伊策、利夫诺、克宁集中起来的摩托化部队，敌人正在空军支援下搜索这个地区。从5月25日起的一周中，从意大利起飞的盟国战斗机和轰炸机群为援助游击队员出动达一千架次以上。铁托极其冷静地亲自指挥了好几场死里逃生的战斗。这一行人食物和弹药都不足，但他们设法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次空投中获得了补给。

在此之前有个时期，曾讨论过铁托在维斯岛建立永久性司令部的问题，由于那里有盟国的空军掩护和陆军支援，他可以不必一再转移，也能免遭袭击。这个问题此时变得迫切起来，因为这一行人随时都有被俘获的巨大危险。苏联代表团逼迫铁托逃往意大利。他终于同意了，虽然他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极不愿意离开²⁷⁸本国，即便是短时间的。6月3日至4日之间的那晚，铁托从姆利尼什特附近的临时机场飞往意大利的巴里，同行的有司令部的几个人员、他的爱犬虎子、一个英国军官和苏联代表团。他们乘坐

的是一架苏联的“达科塔”式飞机，驾驶员是俄国人，飞行由英国人从巴里指挥。其余的人则分乘数架英国飞机撤离。

铁托在巴里城外的一座别墅逗留了两天——这一时间足够他与英国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塞爵士就所需供应进行谈判。尽管疲惫不堪，且又稍感沮丧——偶尔一次，他还是能从新近的经历中获得教训：德国空军在南斯拉夫的天空简直可以随心所欲；游击队要能协助盟军在意大利作战，就必须得到强有力的空军支援。三天后，他在夜间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猎人级驱逐舰“布莱克默”号渡海驶往维斯岛。舰上军官室里的宴会，一片欢乐气氛。铁托死里逃生，既没有当战俘，也不再是避难者，深感宽慰；而重返南斯拉夫，即将再度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也使他十分高兴。因此，晚宴结束时，他乘兴操着不流利的英语，朗诵了一首《猫头鹰和猫咪》，听众无不啧啧赞美。

※

※

※

1944年夏，英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专注于试图劝说王国政府与铁托的临时政府达成和解协议。英国希望以此结束内战，加强铁托的军队与盟国的军事合作，把德国军队牵制在巴尔干，直至俄国人来到。英国还深信只要能真正达成协议，就将是走向奠定战后南斯拉夫由一切政党组成的民主政府的基础的第一步，并有助于防止丘吉尔所称的“巴尔干共产主义化”。这种政策获得一些流亡的南斯拉夫政治家，特别是前克罗地亚巴昂（即总督）伊凡·舒巴希奇博士的支持。5月间，铁托委派一直在开罗的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博士为自己的代表，去伦敦将谈判的基本条件告诉英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这就是：承认反法西斯会议政府及其已经宣布的各项目标；放弃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国

王回国的问题，则留待以后解决。

当时的整个形势给王国政府带来了深重而持续的危机，但首相博日达尔·普里奇终于辞职，从而为英国和斯大林所劝告的和解打开了道路。舒巴希奇于6月初赴维斯岛，6月16日，签署了铁托—舒巴希奇协议。这个协议中纳入了铁托的一切基本要求。双方同意：在由“进步民主分子”所组成的新王国政府建立后，其主要任务是为铁托的军队筹划援助和军需品；战后国家形式与国王回国的问题，必须留待南斯拉夫人民作出最后决定。双方认为，应由新王国政府和铁托的人民委员会各派代表，组成一个过渡政府。接着，舒巴希奇被任命为这个新政府的总理；米哈伊洛维奇被解除了军事大臣的职务；国王彼得向南斯拉夫广播了一封信，谴责他与德寇的勾结，并号召对铁托和人民委员会给予支持。

回顾起来，这可以说是铁托在政治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他取得了王国政府对他的运动的支持，并使之也承认了这一运动的合法性。但是，铁托对此却感到十分不安，他说：“这是盟国作为承认南斯拉夫国内新事态的条件，我们不得不表示同意，……因为盟国顽固地坚持这一点。”^[注17]他仍然怕英国人会设计骗他，尤其怕他们会以某种方式动用军队图谋使国王在南斯拉夫复辟。他这时正日益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而他在这方面却尚无经验。

还在1944年较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曾一再建议铁托亲自去意大利与盟国领导人会晤。铁托和他的同事们对待这些建议一直极为审慎，甚至抱有若干怀疑，特别是他的同事中那些极端分子。德热拉斯还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的警告。德国人突然袭击德尔瓦²⁸⁰后，铁托从英国人那里所获得的帮助，以及他与舒巴希奇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谈判，有助于驱散这种猜疑气氛。1944年8月初，他从维斯岛飞往设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随行人员有他的副总司令茹约维奇、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以及

军事情报、医务、军需等部门的负责人。他的警卫员和爱犬虎子到处与他形影不离。铁托的个人随从中还有他的长子扎尔科·布罗兹，新近才从俄国（他自幼在那里长大）回到南斯拉夫。^[注18]他参加红军作战失去一臂，正在逐渐恢复健康。

铁托如同往常一样注意衣着，他穿了一套崭新的、紧紧绷在身上的灰色军服，裤子缀有一道深红色条纹，军服上还饰以金黄色穗带以及元帅军衔的标志。丘吉尔后来称之为“金边紧衣”。铁托不愿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把他看成不过来自深山莽林的游击队领袖，而表现出屈尊的样子，决意使他的游击队运动的地位和成就不被低估。他想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数量比以前大大增加的援助；他的一些参谋人员对盟国的供应状况缺乏了解，一味设想认为自己需要，也理应得到极大数量的飞机和坦克。

盟军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官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决心尽一切办法使这次访问成功。8月6日他与铁托举行了第一次会晤；次日，铁托又与驻意大利盟军统帅亚历山大将军进行会谈。磋商援助数量，参观军需仓库及在意大利的英军前线花费了整整一周，这使铁托更好地了解了盟国的作战成果，也使双方得以互相作出估量。彼此都知道，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即将亲自到意大利来与铁托会晤。

8月12日，在俯瞰那不勒斯湾的威尔逊将军的别墅中，丘吉尔与铁托会见。铁托穿上他那套漂亮的军礼服，丘吉尔则穿着一身白色工人装²⁸¹。但地位和仪表很快就都无关紧要了，这两个人尽管社会背景和政治信仰不同，却一见便成知交。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两人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境遇大不相同。他们都具有一种热忱而富于人情的性格，都爱好生活中的乐趣和职务上的权势，又都是注重实效的领导人，坚信他们正运用自己的地位作为一种力量，进行一场善良反对邪恶的战争。他们之间的谈

话通过铁托的译员奥尔加·宁契奇（共产党员，一位南斯拉夫前外交大臣的女儿）进行，但两人却设法取得了直接谅解，会谈的特色是双方都开诚布公，言辞坦率。谈话是轻松的，从盟军新近登陆后的诺曼底军事形势，一直谈到意大利战线向前推进的缓慢状况。他们还讨论了德国人在巴尔干的情况，以及铁托的军队所起的作用。丘吉尔问铁托，如果盟军在伊斯的利亚建立桥头堡，通过南斯拉夫北部朝着卢布尔雅那山口方向进攻中欧的话，他的军队能否给以配合。铁托回答说：“能，我们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有军队，他们一定会给予协助。”两位领导人都明白，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提法，因为铁托害怕一旦盟军在南斯拉夫登陆，这部份军队就可能被用来阻挠他接管政权，或遏制他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人侵占的伊斯的利亚与其他地区的领土要求。

谈话接着转到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上。丘吉尔向铁托问起切特尼克与游击队员之间的战斗，铁托说：“是有战斗，很激烈的战斗。”丘吉尔回答：“我们宁愿看到我们的子弹用来杀德国人。”他继而解释说，他的联络军官迪金和麦克莱恩所打回的报告，使他终于确信英国必须撤回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丘吉尔说：“我希望看到，南斯拉夫之间尽可能不要发生战斗。”对此，铁托回答说：“我们始终反对内战，始终认为德国人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对切特尼克作战。倘若我们把米哈伊洛维奇当作主要敌人的话，游击队就不可能在国内如此受到人民拥戴。”

丘吉尔于是把话题转向塞尔维亚的农民，暗示他们不愿看到²⁸²在战后引进共产主义制度，又谈到了斯大林通过农业集体化所强加于俄国农民的种种苦难。铁托回答说，南斯拉夫的情况与苏联并不完全相同，他说：“我们并不想把任何这样的制度强加于人民，这一点是我经常公开讲的。”接着又补充说，他的运动认定南

斯拉夫只有两个阶级——卖国贼与爱国者；驻南斯拉夫的俄国代表团从未试图将共产主义制度引进南斯拉夫施加过任何影响。会谈快结束时，铁托说丘吉尔为南斯拉夫人并为游击队的事业做了许多事情，丘吉尔于是又把话题拉回到内战上，铁托回答说，这不见得会在南斯拉夫发生，接着又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实际上取决于盟国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丘吉尔问铁托战后在南斯拉夫是否允许有个人自由，铁托回答：“我们的基本原则始终就是民主和个人自由。”他对丘吉尔问及是否许可工人罢工的回答是：“只要战争还在进行，就不许可。”在谈论了一阵战争在南斯拉夫所造成的惨重破坏之后，丘吉尔问铁托是否还想说些什么。铁托回答说，他对那些关于战后南斯拉夫要引进共产主义的议论颇为关心。他强调南斯拉夫将实行民主制度——但并未说明是哪一种民主制度，他也拒绝了丘吉尔让他就共产主义问题公开发表声明的要求。他说南斯拉夫能从苏联的经验中获得益处，也指望从盟国得到帮助；盟国与苏联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对南斯拉夫至关重要。双方直率而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但很明显，两位领导人所使用的政治语言不尽相同，对“民主”一词也各有不同解释。丘吉尔在英国两党制政体下长期从事议会活动，而铁托则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有过种种不同的经历，因此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由于丘吉尔曾暗示盟军有可能在伊斯的利亚登陆，并发表了他对南斯拉夫未来政局发展的看法，这次会谈并不能使铁托完全安下心来。

人们对作为会谈成果，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的“友谊”，有过种种议论。两人都赞赏对方品质中的伟大之处，但他们的基本政治观念却未改变。铁托在会见后对盟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有了更多的了解，英美两国各级人员之间毫无拘束的友好合作（这与共产主义世界各盟国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使他颇有感受；而尤其是丘吉尔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说，这次会谈使他祛

除了对英国政策的某些疑虑：

“我在1944年会见丘吉尔时，与他进行了极其坦率的讨论。我亲自了解到英国人备尝艰辛，认识到他们想要调动所有盟国的力量来结束这次战争。我同丘吉尔彼此都有了很好的了解。只是有一点：丘吉尔认为塞尔维亚人民拥护国王，而我说塞尔维亚人民对国王出亡一事深感憎恶，就连他们也不拥护君主制了。”〔注19〕

铁托与丘吉尔会见后返回不久，就为他和斯大林举行会谈作出了安排，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斯大林早就表明他决心不让铁托与英国人的关系转为友好，也不愿使铁托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任何减弱。安排铁托访问莫斯科就是为了表明这一点。1944年9月18日至19日之间的那晚，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他与科尔涅夫将军搭乘一架俄国飞机飞往罗马尼亚的红军司令部，两天后又接着飞往莫斯科。要乘夜间从维斯岛英军管辖下的机场飞离，躲开机场安全警卫人员而不通知英方，事先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密谋活动，这种事情竟然发生于铁托在意大利受到热情接待后不久，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丘吉尔恼怒异常，说铁托“潜逃”了。莫洛托夫事后把这种秘密行径委过于铁托说：“对于一个巴尔干农民你还能指望什么别的！”然而，这一事件却带有斯大林那种在同盟者之间进行挑拨的恶毒手法的明显印记。〔注20〕

铁托对斯大林的首次访问，标志着他与这位俄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臻于顶点。他仍然毫无疑问地承认苏联有权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深意识到受斯大林接见的的光荣。他对自己有责任向莫斯科汇报并不抱怀疑。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和他的政党的辉煌战绩极感自豪，深信“南共出色地经受了考验，而且是独一无二

地做到了这一点。”〔注21〕他期望为此受到赞扬。斯大林接见他时热情洋溢，使劲地把他搂在怀里，确实使他双脚离开了地。铁托在很久以后说，“我当时有这样的印象：斯大林对我们的战绩深表赏识，”接着他又若有所思地说：“或许这仅仅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正的。”

在随后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的讨论中，铁托谈吐之间充满自信，明显地表现出新近所获得的权威。其他领导人对他这种表现是并不喜欢的。但是，他却使斯大林确切认识到：他的兵力足以承担在南斯拉夫的占领任务；这支军队应该继续由他统率；苏军进入南斯拉夫只应限于它通过中欧进军所必需的那些有限军事行动；而且南斯拉夫军队应同时参加作战，并与红军一起向贝尔格莱德挺进。双方也达成了协议，苏军在南斯拉夫无权过问行政或民政事务。铁托早已正确地看到，为了有可能在战后实现政权的革命过渡，要求苏方作出上述让步至关重要。他自信即使没有红军的援助也能取得胜利，不愿表现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苏联领导人与抵抗运动之间达成此类协议，这是仅有的一例。

斯大林尽管并非轻易地就同意作出这些让步，但他显然没有象铁托一样把这些看得如此重要。他把铁托视为又一个傀儡，既可加以利用，又可在不俯首听命时予以摒弃。由于红军进逼柏林，美国人也打算在远东增派兵力，有比南斯拉夫更为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而且斯大林充分自信，只要他乐意，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南斯拉夫。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在战争期间所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²⁸⁵ 尽管他看到了铁托的所有电报，以及苏联代表团所作的种种估价。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并不认为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他们正象莫洛托夫的话所表明的那样——把铁托看作是一个巴尔干农民，与三十年代在莫斯科的那个瓦尔特毫无区

别。他们一贯低估铁托所作的全部汇报，对南斯拉夫情况的缺乏了解达到惊人地步，这一点后来在 1948 年就转而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对南斯拉夫的这种不怀好意和缺乏了解，铁托在与斯大林讨论战后南斯拉夫的政局变化时就隐约有所察觉。斯大林劝告铁托与王国政府的政治家们，甚至与国王一道工作，这表明了他的性格特征。他说：“你用不着让他永远复位。暂时先把他弄回来。然后，你可以在适当时刻悄悄地给他背后来一刀。”铁托对英国人抱有疑虑，斯大林也就此火上浇油，在会谈的过程中告诉他，有家通讯社报道过英军在达尔马提亚登陆。铁托没有上钩，反而解释说英军曾答应在该地区给他炮火支援，斯大林便问铁托，如果英国人真打算在南斯拉夫登陆，他将怎么办？铁托回答：“我们将坚决予以抗击。”〔注22〕就当时来说，斯大林得到这样的答复也就足够了。这次访问的其余时间便以斯大林款待客人所特有的野蛮方式度过，大摆筵席，没完没了地干杯，痛饮葡萄酒与伏特加。

对铁托来说，这次访问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虽没有受到奉承，却得到了他要求的各项实际安排。对斯大林来说，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要小些，但也是一种成功。他作了一些对他来说是很方便的让步，他也确已做到使铁托与英国人继续互相猜疑和敌视。铁托于 10 月 5 日回到南斯拉夫，途经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时停留数日，会见了保加利亚游击队的一些代表。他接着飞往巴纳特的弗尔沙茨，当时英军和游击部队正在向贝尔格莱德进攻，他等了几天后，于 1944 年 10 月 27 日飞往贝尔格莱德市郊机场，换乘汽车进入这个城市。

铁托离开莫斯科不久，斯大林于 10 月 9 日在克里姆林宫与盟国领导人举行另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丘吉尔以及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就是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了东欧的前途，²⁸⁶

斯大林对丘吉尔的建议（丘吉尔用铅笔写在一张纸条上，推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斯大林面前）表示同意，即南斯拉夫应在对半平分的基础上分属大不列颠和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作为召开和会之前的临时措施，事先曾与仍对丘吉尔的巴尔干政策抱有疑虑的美国领导人进行过商讨。这就引起了疑问：斯大林几天前与铁托会晤时是否即已对这一妥协有所考虑。此事对铁托未来的全部政策极为重要，但斯大林既未同他讨论，也未向他暗示过有此可能。妥协达成后，斯大林又未通知铁托，而丘吉尔却在会后不久便通过麦克莱恩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这一个对半平分的协议（实际上从未得到贯彻）曾使一些南斯拉夫人误解，但南斯拉夫在战后世界中不应属于两大政治阵营中任何一方这种想法，铁托最终还是接受了，并转而使之成为南斯拉夫带来了莫大好处。〔注23〕

战争结束前铁托与英国人关系之所以恶化，事实证明并不完全是由于斯大林的影响。最初是由于双方在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报酬划归意大利的萨拉（扎达尔）、阜姆（里耶卡）、伊斯的利亚等地区的占领问题上的分歧所引起。铁托在他的意大利之行中就已通知英国人，南斯拉夫将对这些从种族上或历史上来说都属于自己的领土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丘吉尔则告诉他，这一问题要由和会作出决定。两位领导人都明白，夺取这些地区并对此实行军事占领，就将大大加强自己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要求。铁托与亚历山大将军在意大利和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各次会议中，已就军事合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双方同时对南斯拉夫北部和威尼斯——朱利亚区的德军阵地发起攻击。当盟军第八军强行通过意大利北部时，铁托的第四军应从扎达尔以北沿亚得里亚海岸向内陆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在这两部份军队的夹攻下，德国人拼死顽抗，希望能向英国人投降。到1945年4月的最后一周，两军均已进入的里雅斯特的攻击距离之内。4月

27日，丘吉尔给杜鲁门总统打电报说：“当务之急是抢在铁托的游击队占领该地之前到达。”铁托则发出命令必须立即“解放”的里雅斯特。^{〔注24〕}南斯拉夫第九军团放弃了突破德军第九十七军团防御阵地的打算，迂回绕过德国人的侧翼，兼程赶往的里雅斯特，于4月30日攻入该城，并于次日以强大兵力加以占领。与英军第八军协同作战的第二新西兰师所属部队，于5月2日从该城的另一端开进，并于5月3日增强了那里的兵力。于是该城在一段时间内为双方军队共同占领。^{〔注25〕}亚历山大将军认为铁托逾越了双方协议所规定的条款。铁托则确信盟军正在采取步骤以求有效地阻挠南斯拉夫实现其主权要求。双方剑拔弩张，僵持达数周之久。

最后，尽管斯大林曾为铁托说过情，铁托却未能获得苏联支持而不得不从的里雅斯特把军队撤退到所谓摩根分界线之后，这条线将此争议地区划分为A、B两区：A区包括的里雅斯特，归英、美军队占领；而规定由南斯拉夫人占领的B区，却连伊的利亚的一部份和斯洛文尼亚的滨海地区也不包括在内。俄国人不得不考虑到，如果他们支持铁托对的里雅斯特的主权要求，不仅有可能引起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反对，还会影响他们与盟国的关系。铁托确信他受到大国强权政治的欺骗，因而丧失了他的国家有合法权利提出要求的大片地区。他此时已知道了那个对半平分的协议，认为这就是其恶果之一。他在卢布尔雅那的一次演说中发泄怒气说：“我们决不愿意在国际交易中被当作找头来使用。”在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中，他从未表现为一个驯服的卫星国，对俄国领导人要他把苏联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期望，毫不予以理会。他所表现的那种战斗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他赢得许多并非共产党员的南斯拉夫人的支持。莫斯科怀着极大的不满，注意到了这一点。

第十五章

288

国际政治家

1945年，铁托的运动取得了政权，南斯拉夫重新统一，成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联邦共和国。铁托立即面临建立新国家及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维护其地位的种种复杂问题。这两项任务是互相依赖的。为了把他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作为长远目标的革命变革进行下去，他需要和平与安全。而为了维护南斯拉夫在国外的利益，他也必须使国内稳定。这两个目标他都终于达到了；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担任国家元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国内成为深受崇敬的团结和统一的象征，也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照原图译制)

他治理国家各方面的事务，总是与多年来其成员时有变动的一个班子里的同事一道工作；但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的个性和影响却格外重要。他所表现的政治家才能，为南斯拉夫赢得了自从这个国家建立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威望，也为他本人在全世界赢得了尊敬和有时是出于无奈的钦佩。1945年时，他在外交事务的更为广泛的领域里还是个新手，他的经验局限于战争时期的体会。他仍然承认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却可以看作是，他在战争时期即已开始发展的外交关系的一种延伸。然而，毫无疑问，铁托一就任重新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总理，便深信他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不同阶段，认为他有权采取独立行动，这在他仅仅是一个与共产国际或苏联共产党官员打交道的共产党领导人时是未曾想到的。

起初，这种局面中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矛盾。南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欧洲第一个靠自己夺得政权的共产党，其领导人自然要求教于苏联，要引以为榜样。根据南斯拉夫的请求，²⁸⁹大批苏联专家涌入这个国家，充当军事顾问，建立合股运输公司，以及在诸如重建工业等技术事务上给予帮助。铁托在很久以后说过：“1947年以前我们对苏联寄予极大的信任，由于我们把苏联人当作自己的榜样，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组建有着很大的影响。”〔注1〕然而在外交事务方面情况却有所不同，因为迄今尚无适合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先例，人们也从未预见到南斯拉夫会与苏联在民族利益上发生冲突。铁托及其同事不得不寻求一种能保护南斯拉夫利益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们觉得南斯拉夫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因为游击队员在战争时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金字塔中权威分等级的观念，认为自己的地位理所当然地仅次于苏联，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则是乐意接受的。

冷战此时已开始东西方之间发展起来，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铁托在内，以他们那种特有的魄力投入了这场其势汹汹的斗争。他们同以前的西方友邦断绝往来，关系变得极度紧张，尤其是与美国。至少在1947年以前，甚至可能更晚些，他们一直深恐盟国会企图扶植王国政府复辟。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官方文件只是现今才陆续公布，我们并不确切了解英国当时的应变计划（特别是倘若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爆发战争的话）是什么，但在英美两国确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只要当时出现这个机会，就一定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而干涉南斯拉夫。美国军用飞机多次从意大利和奥地利境内的基地飞越南斯拉夫领空挑衅，使铁托怒不可遏。当外交上的抗议不起作用时，南斯拉夫防空部队奉令用火力截击入侵飞机。1946年8月9日，两架美国飞机被击落，其中一架全体机组人员毙命。^[注2]莫洛托夫听到这个消息，“几乎拥抱²⁹⁰了”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即便是此举表明了南斯拉夫的独立性；但他警告卡德尔下不为例。^[注3]

1945年4月11日铁托为签署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访问苏联时，受到了十分隆重的接待；在庆祝宴会上，他的席次被安排在斯大林的左侧。但从斯大林对铁托的恶意取笑中，却可看出苏联的真正态度的蛛丝马迹。他说保加利亚的军队比南斯拉夫的强，又说南斯拉夫的士兵仍然是些游击队员，“不适应重大的前线作战”。他还追忆了上一年冬季德国人一个团就击溃游击队一个师的情景。考虑到保加利亚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占据着南斯拉夫的部份领土，而保加利亚的游击队直到获得铁托的部队支援后才活跃起来，这些话简直是莫大的侮辱。铁托对最初的一些话还强忍着不作声，但终于被激怒而忿然叫嚷说，南斯拉夫军队很快就会消除自己的弱点；当时他还没有达到能用同样的话语反驳或回敬斯大林的地步。^[注4]这件事暂时还可以耸耸肩膀一笑了之。1946年

春铁托再次访问莫斯科时，他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仍然是亲切友好的。

由于斯大林扶持东欧各国共产党一个接一个地执政，南斯拉夫便按照苏联的模式，与这些国家分别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注5〕}1947年美国向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推行马歇尔计划时，南斯拉夫拒绝接受，虽然本国的人民仍处于战后极其困厄艰难的境况之中。铁托怕资本主义美国会利用这些援助达到颠覆他的目的。事后二十年，他还在准备为这一决策辩护。他说：“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是我们自己的主意，这是正确的，这样做就使我们得以不受美国的影响。”他坚信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种种决策都是独立作出的。他说：“我们没有接受苏联的影响或指导，这一政策是我们主动决定的，没有人把它强加于我们。”^{〔注6〕}

利害关系上的某些一致，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政策的真相未能洞察。1945年和1946年，斯大林忙于解决更为紧迫的问题²⁹¹，还不打算干预铁托的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不背离苏联总的路线就行。斯大林战后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安全问题上。他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受他控制的由东欧傀儡共产党国家组成的保护地带。他并不打算听任各卫星国的领导人执行独立的政策路线——他想把南斯拉夫也纳入这一模式。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铁托本人在内，还没有充分摆脱战前那种教条主义的信念，以及战争期间关于共产主义兄弟情谊和团结的空想，因而不可能认识苏联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这一残酷现实。真情实况如何，他们原已有大量证据，但却对此视而不见，这是由于他们总是一相情愿地对苏联的友谊寄予信赖，由于他们过分自信，或许也是由于战时的显著成就他们产生了一种天真的乐观情绪。

斯大林建议各共产党国家遵循已经解散的共产国际的类似路线，成立新的国际组织，铁托对此表示支持；这似乎有可能使南

斯拉夫在东欧起到共产党语言中所谓的“领导作用”。铁托后来说：“起初我们曾对此表示赞成。有一个可供共产党国家彼此进行商谈的组织，看来是个好主意，因而我们在华沙会议上赞成这样做。一俟我们看清了这个组织的真相，我们便转而反对它了。”〔注7〕共产党情报局（或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根据俄国人的建议，决定把它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似乎是对南斯拉夫人的一种恭维，但实际上斯大林却意在借此控制铁托，并从而获得更多有关铁托所作所为的情报。

这一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南斯拉夫人与俄国人在这些事件中都有纠纷。其中之一是德热拉斯谈到苏联军官途经南斯拉夫时行凶、强奸和酗酒，说话有失斟酌；他指出英国军官行为比较检点而未“耽于此类暴行”。〔注8〕尽管这场风波后来暂时止息，斯大林对他始终耿耿于怀。铁托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²⁹²所表现的独立性（以及他在卢布尔雅那演说时的直言不讳）也使斯大林不悦。铁托曾访问过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到处被作为英雄加以欢迎。但他为在东欧取得领导地位的最危险的一着，或许是他对巴尔干联邦的设想。这是共产主义世界中早就存在的一种想法，并非出自铁托，因此如果他认为俄国能接受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战争期间，铁托曾在苏联的同意下，与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有过密切接触；战后，阿尔巴尼亚实际上被南斯拉夫作为附属国来对待。〔注9〕当这一做法后来受到批评时，南斯拉夫领导人指出，他们给予阿尔巴尼亚的待遇要比他们自己从苏联得到的慷慨得多，即使这种援助（食品、专家、投资、合股公司等）所遵循的路线是相同的。德热拉斯1948年初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声称他并不反对成立南—阿联邦。斯大林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特殊利益，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掉阿尔巴尼亚”，他边说边作手势，把手指送向嘴巴。德热拉斯对这种异乎寻常的

坦率颇为吃惊，连忙抗辩说，“这不是什么吞掉，而是联合！”莫洛托夫突然插话：“可那就是吞并。”〔注10〕

斯大林却比较关心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建立联邦的问题，虽然他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才明确起来。早在1944年，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就在苏联的赞同下讨论这件事，但没有达成协议。〔注11〕1947年1月，季米特洛夫终于获得斯大林允许返回保加利亚后，又与铁托商讨这一问题。同年7月，季米特洛夫到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与铁托会晤。这两人是老朋友，彼此都很了解；即使如此，把两个国家建成联邦的种种问题还是非同小可——季米特洛夫热心于建立联邦，却不愿使保加利亚仅仅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共和国，与原先组成这个国家的那六个平起平坐。他也考虑过建立一个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联邦的可能。双方在保属马其顿应如何并入南属马其顿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虽然季米特洛夫准备最终同意这样做。而仍属于反共的希腊政府治下的那部份马其顿也是问题。两位领导人取得一293致意见的是，建立联邦还要等一等，但双方可以立即开始在贸易和文化事务上密切合作。〔注12〕斯大林对这种独立自主的表现颇为生气，立即召两位领导人前往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去了，铁托则派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前往。

尽管斯大林在早些时候曾催促过成立联邦，这时却变了主意，他先对季米特洛夫恫吓一番，然后开玩笑似地对卡德尔说：“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事先等一等，你看怎么样？或许在这期间苏联也能参加南斯拉夫联邦呢？”〔注13〕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提法。难以肯定斯大林此话是否当真，但卡德尔知道，斯大林早些时候曾考察过把东欧国家分别组合而与苏联建立联邦的可能。他的设想是南斯拉夫应与保加利亚合成一组；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合成另一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白俄罗斯则合为第三组；但

这一想法从未达到形成具体建议的地步。〔注14〕卡德尔返回南斯拉夫之前不得不签署一项文件，答应南斯拉夫将在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务上同苏联商量。铁托此时已在外交政策的其他事情上惹恼了俄国人——他把南斯拉夫军队派往阿尔巴尼亚加强阿希边境的防务，当时希腊的内战已在进行。南斯拉夫人主动地开始向希腊共产党叛乱分子提供相当可观的援助。此举使斯大林感到尴尬，因为他已与丘吉尔达成协议，希腊应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他此时不想背弃这一协议，因为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与西方盟国对抗。尽管情况确实如此，西方却没有人会相信，南斯拉夫支持希腊叛乱分子是铁托独自决定的政策。斯大林于是决定，该是教训一下铁托的时候了。

1948年6月28日，一家捷克报纸刊登了一则报道南斯拉夫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的简讯，把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公布于众，使全世界大吃一惊，难以置信。俄国人接着从他们与南共高级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来信中摘选了一部份内容加以发表。作为回敬，铁托将决裂之前的双方信件，除两封信（这两封信始终未公布）以外，全都发表了。〔注15〕外界以前对南、苏领导人间嫌隙之深一无所知，这些信件便成为引人入胜的读物。由于这都是些私人信函，原不是为发表而写，它们就更能淋漓尽致地刻划出苏联领导人对待卫星国的态度，也使人们异乎寻常地洞悉了铁托的性格和信仰。双方在3月20日到5月22日期间的通信，开始于俄国人突然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军事和非军事专家，声称他们“被敌对情绪所包围”之时。从此展开了滔滔不绝的彼此抱怨和互相斥责，双方郁积已久的不满一泄无遗，它起源于战争年代，从1945年起又明显地越积越多。事无巨细，不分轻重，均在争辩之列；信件字里行间，敌意与日俱增。苏联领导人指责南斯拉夫人先是请求派给大批军事专家，之后却借口开销过多而又请求缩减

其人数。〔注 16〕俄国人在信中硬说，南斯拉夫人（并未指名）把苏联军事专家形容得纯属多余，把他们的规章制度说成是因循守旧，死搬教条，毫不适用于南斯拉夫军队。南斯拉夫人拒不向苏联经济专家提供情报资料，并以秘密警察尾随跟踪他们。“南斯拉夫的领导同志”（又未指名）曾说：“大国沙文主义在苏联猖獗已极，……共产党情报局是苏联共产党用以控制其他共产党的工具。”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还被指控宣称南斯拉夫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这封苏联信件中挖苦地说：“对苏联的此种议论，竟然出自德热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以及其他一些大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听来自然令人可笑。”另一封信则极力表明卡德尔一直急于使南斯拉夫与苏联结成联邦，企图以此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之间（尤其是在联合签署南斯拉夫信件的铁托与卡德尔之间）挑拨离间。俄国人说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批评“既卑鄙而不²⁹⁵真实，又出于伪善。”他们把南斯拉夫领导人比作托洛茨基——这在苏联的词汇中意味着最大的侮辱。他们还对南共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攻击——说南共不民主，不光明正大，使自己混合于名为人民阵线的更广泛的政治运动之中；又说南共二十年未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脱离群众，对农民持错误态度，处于兰科维奇的秘密警察统治之下。〔注 17〕

这一书信往来按说是两个共产党之间的一种兄弟般的往来。铁托与卡德尔代表南共作答之前，曾先在政治局，继而又在整个中央委员取得一致意见。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斯雷滕·茹约维奇，不同意给俄国人复信时采取强硬路线。南斯拉夫的复信，从中可以看出铁托和卡德尔两人的手笔，说俄国人所获得的情报（有些是来自茹约维奇和赫布朗）不符事实，造谣生事，立场偏激，都是来自“反党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人。”复信中还作了如下说明：“不管我们每个人怎样热爱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对自己祖国的热

爱无论如何也不稍逊，因为祖国同样是在发展社会主义。”——这一说明从此成为铁托政治信条的精粹而驰名于世界。它迥异于铁托在青年时代曾一度接受的那种排斥民族性的国际共产主义，而俄国人此时则想再度以此强加于南斯拉夫。

铁托和卡德尔抓住俄国人的种种指责，逐一加以批驳，为他们那些受到攻击的同事辩护——他们说，

这些人“都为苏联在南斯拉夫大得人心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都在解放战争中赢得了无可估价的声望。……人们对苏联的热爱并非自发产生，它是新南斯拉夫的现领导人坚持对广大党员和一般人民群众谆谆教导的结果，而（苏联的）的来信中所指控的却正是这些领导人中的首要人物。”

他们激烈地驳斥了对南共的种种非难，认为指责南斯拉夫存在资本主义残余与事实不符：

296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从未有过象南斯拉夫所进行的那样坚定、一贯的社会改革，……我们党基于自己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不但在我国，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南斯拉夫在社会改造方面的许多独到之处，对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都能有所裨益，并已在为其所用，……我们向苏联的制度学习并引为榜样，但我们正以稍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比苏联优越，……而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决定我们非如此不可。”〔注18〕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对

铁托及其同事最反感之处——他们在复信中称之为过于野心勃勃，它在南共党内造成了一种令人惊恐不安的形势，并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俄国人为了对因自己的战绩而自豪的南斯拉夫泼冷水，就说东欧所有其他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都与南斯拉夫的成就不相上下，但他们却谦逊得多，“不象南斯拉夫领导人那样一味夸耀其成就，自吹自擂，无止无休，把人们的耳膜都震破了。”〔注19〕苏联领导人召南斯拉夫去参加一次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此时该机构已迁往布加勒斯特，其所有成员都接到了俄国人的书信和指控的抄件。南斯拉夫拒绝出席，理由是争论的问题未经审议就已作出裁决。事实证明情况果真如此，共产党情报局一致通过了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把苏联信件中的指控详细加以引证。决议末尾呼吁南斯拉夫领导人公开承认错误并加改正——“屏弃民族主义，回到国际主义道路上来；从各个方面巩固反帝统一战线。”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决议号召南共应撤换他们而代之以“一个新的、坚持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班子。”

斯大林自信地对他的一些密友说：“我只消动一个指头，铁托就得完蛋。”按照他的命令，各卫星国加紧开动宣传机器，铁托被痛斥为英国情报机构雇用的代理人，目中无人的“侏儒”（他其实比斯大林个子还高一些），“华尔街的行吟诗人”；他们派遣特务纷纷²⁹⁷潜入南斯拉夫制造暴乱，谋刺铁托。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对南斯拉夫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制裁，旨在造成南斯拉夫经济崩溃，使人民群起反对现政权。苏联军队云集于南斯拉夫边境，准备南斯拉夫一发生民众暴动就采取行动。所有这一切通通失败。铁托在党内得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其中包括除茹约维奇、赫布朗和铁托的前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以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俄国人事先没有估计到南共党员和南斯拉夫非党群众对铁托的这种巨大支持。支持来自拥护他的政府的人，也来自一些宁可要这

个政府而不要那种由苏联领导的、形式更趋极端的共产主义的人，他们就怕后者成为唯一的其他抉择。这就再一次表明，铁托完全有资格自称为全体南斯拉夫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在世期间，这一决裂始终未能弥合。铁托后来说：

“斯大林在战后把我们设想为他的卫星国，这种可能性我们却连想都没有想过。但他在1948年没有进攻我们还是够聪明的，当时他看出了后果将会如何，也看到我们准备应战。他使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以求挑起战争，并在我们的边境屯集重兵，只等机会一到就动手。但是，他终于认清我们国内的形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注20〕

对铁托本人，正如对他的许多党内同事一样，与苏联的决裂无异是猛然一击，这使政治诺言从根本上撕毁无遗。铁托生活中的动力，一直是为使他的同胞生活更加美好而工作这种深深的愿望；他过去也始终深信，这同样是苏联领导人的目标。年复一年，他对与此背道而驰的迹象往往给以合理化的解释，使之符合共产主义教条的语言和理论。1948年，他再也无法这样做而不得不正视现实。他象季米特洛夫一样，始终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革命家”。他那种能迅速恢复元气和敢作敢为的秉性以及夺取胜利的坚强意志帮助了他。他善于识人，机敏精明，富有经验；他也被迫学会

²⁹⁸ 审慎地估量现实处境。当他终于得以凭借这些本领对苏联领导人及其政策作出判断时，事实真相使人骇然；但是，他仍然有孤军奋战取胜的可能。如果没有他的同事们的支持——他们拒不同意他提出辞呈，又如果不是由于他坚信南斯拉夫人民支持他，他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自1948年以来，他一直置身于苏联统治下的共产主义世界以外，按照适合南斯拉夫需要和处境的方式来解释

社会主义。

※ ※ ※

战争结束不久，南斯拉夫就不得不面对南苏关系的现实，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幸运（尽管当时看来并非如此），因为俄国人此时自觉尚未强大到足以挑起一场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处于西方通往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战略前沿，这也是一种幸运。美国和英国决不能坐视如此要地落入俄国之手而不出场，这一点在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的对半平分的临时性协议中即已得到承认；南斯拉夫对这个协议恨之入骨，此时却证明它对铁托政权倒提供了一种保护。

铁托以其特有的精力和注重实效的态度来应付他的新处境。他的首要目的是保证南斯拉夫不挨饿，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因苏联撤销援助以及停止了与东欧的贸易（这占南斯拉夫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五）而遭破坏。他不得不与西方建立关系，因而只好按捺住自尊心，迅即开始了贸易对话。由于南斯拉夫的铜、铁等富饶矿藏无需再交苏联支配，他就有了可以做买卖的物资。首先迫切需要的是小麦、面包和工业用煤；为了支付这些费用需要信贷，为了购置工厂和矿山的机器设备也需要贷款。

英国从1949年秋后开始与铁托谈判，它认为若是铁托被推翻，苏联的影响必将占据优势而给西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那里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仍然强大。美国一开始较有戒心，²⁹⁹部份人士仍然以为整个共产党情报局事件是南、苏为世界共产主义博取财政援助的一个阴谋，但也终于改变看法，认为有必要提供援助，“使铁托免遭灭顶之灾”。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铁托也从来没有卑躬屈膝，乞怜于人；他十分明

确地表示，援助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概不接受。为了着重表明他不象俄国宣传所经常描绘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他仍然倨傲而冷淡，他的官员们也都很困难对付。俄国人嘲讽说收买南斯拉夫只需一亿美元，作为对此的答复，铁托宣称：“谁也收买不了我们！”但南斯拉夫终于通过许多不同形式获得了规模相当大的西方援助。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中，铁托获得了价值约二十四亿美元的援助——其形式有贷款、为工业购置重型机械设备的信贷、农民需要的肥料、种子和牲畜，美国的剩余小麦和做面包用的面粉，医药用品、军事装备、军用飞机、军舰和商船，以及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许多其他重要物资。一个新的特点是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动提出为南斯拉夫训练各种专家。〔注 21〕援助计划的大部份项目来自美国，英国也作了重大贡献，法国提供的援助则是象征性的。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防御力量以对付苏联侵略的最便宜的办法。南斯拉夫接连好几年都有为数三十万以上的士兵处于动员状态，国民收入中有百分之二十三用于防御。铁托深知受惠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坚决指出西方援助总额只达南斯拉夫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但他同时又说：“如果我们对处境最坏时所获得的这一援助的重大作用也矢口否认的话，那将是我们这方面的一种不恰当的、愚蠢的态度。〔注 22〕

除接受援助外，铁托认识到南斯拉夫需要寻找朋友和同盟者³⁰⁰以加强自己孤立的地位。这也需要把对资本主义国家所抱的极端冷战态度来一个重大转变。雄心勃勃地策划在东南欧把共产党国家组合起来的时代过去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问题受到阻止，迄今一直没有再被提出。如果说铁托对过去因困难太大而无法实现这一雄心壮志感到失望的话，他却一刻也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悔恨上。他具有一种非凡的天才，能够在必要时杜绝往事而毫不动摇。

1949年，南斯拉夫停止了对希腊叛乱分子的援助，靠之维持的叛乱于是崩溃。〔注23〕他耐心地着手改善与希腊、土耳其两国政府的关系，得以在1954年同希、土签订了巴尔干公约，这一公约纵然未能发展成为任何深厚的友谊，却使南斯拉夫南部边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全。

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北部边境令人不满的局势，万一苏联从匈牙利发起进攻，那里容易成为突破口。他得出结论，继续与奥地利互持敌对态度是不现实的，南斯拉夫必须接受和约的决定，将其在卡林西亚所要求的全部领土让给奥地利。此后两国关系逐渐改善，贸易有所增长，铁托并于1965年亲自对奥地利进行国事访问。〔注24〕奥地利总统1968年访问南斯拉夫时，受到了热烈欢迎。

与意大利的关系转为微妙，原因在于的里雅斯特和A、B两区的问题悬而未决。1952年和1953年，盟国军管政府未经铁托同意即开始将A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移交意大利人接管，这样一来，铁托似将丧失就他在这一地区的主权要求进行谈判的可能。南斯拉夫虽然弱小，铁托却威胁说，如果未经他同意就让意大利人偷偷地接管这一争议地区，他将不惜使用武力。他终于设法使有关各方面接受了他的观点：这个问题基本上应由提出要求的双方来解决。最后，事情是这样解决的，南斯拉夫放弃了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的要求，但却得以使B区的边界稍向A区推移，并获得了其所要求的哥利西亚的部份土地。这或许是南斯拉夫所能得到的最为有利的解决——铁托采取强硬政策和进行现实谈判的³⁰¹一个胜利。此后，尽管双方进行交接的地区在居民互迁上有过一些麻烦，与意大利的关系迅速改善，终于使之成为南斯拉夫最有力的贸易伙伴之一。

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及与西方接触日益频繁，战前和

战后头几年那种较为生硬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开始消失。就铁托本人来说，由于他在战争期间的经历，采取这种态度决非出于十分自然，虽然他承认，那些更走极端和较欠成熟的同事对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铁托自己并不愿意让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妨碍合作和共处政策的推行，他知道这一政策对南斯拉夫的安全和繁荣昌盛都是必要的。他努力改善同英、美两国的关系，于1953年访问英国，在白金汉宫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共进午餐。他在此行中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语气温和地说：“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好些，我们则认为我们的制度好些。然而，这必须留待未来作出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哪种制度在实践中更好；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来加以证实。”当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应邀访问南斯拉夫时，铁托愉快地借首次正式接见之机把他已再次结婚的消息报露于众。

铁托在他同美国的关系中始终抱冷淡态度。美国到战争结束时还不断与米哈伊洛维奇接触，战后头几年又一直对他的政权抱敌视态度，他对此特别忿慨。直到1960年他才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会谈，并在联合国大会致辞。他在这个场合表现得比赫鲁晓夫更令人尊敬，也更具有政治家风度，后者在同一届大会上讲到某点时，竟拿起鞋子敲击讲台以示忿怒。

1955年，即斯大林逝世二年后，终于同俄国达成和解，这是由苏联领导人主动促成的。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遭到反对，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又面临着中国的毛泽东的挑战；他需要铁托的支持³⁰²以巩固他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的地位。为此他准备作出让步，并错误地以为争取铁托回心转意是很容易的。但此时南斯拉夫人已经走上复兴之路，并已懂得珍惜独立所带来的种种好处。铁托无意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当苏联总理尼·亚·布尔加宁和以苏共书记身份出访的赫鲁晓夫在5月末到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时，他们受

到的是冷冰冰的接待。铁托脸上毫无笑容，表情严峻，听着赫鲁晓夫向他热情问候并为苏联的过错道歉，然后粗鲁地一挥手，让俄国人坐上等候着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赫鲁晓夫不甘心于对他的敷衍应付，在公开举行的招待会上，又是举杯祝酒，又是插科打诨，手舞足蹈，活蹦乱跳，一刻不停地大肆表演，想给人以闹哄哄地庆祝两国兄弟情谊的印象。幕后的谈判却很费劲，但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从于铁托提出的基本条件。

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俄国人同意：“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铁托自始至终坚持这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而不是两个共产党之间的谈判，他还坚持，为了表明这一点，在公报上签字的应该是作为总理的布尔加宁，而不是作为党的书记的赫鲁晓夫。这是铁托生平事业中最大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使苏联不仅承认了南斯拉夫的独立权利，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内一切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一原则。这似乎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之上并拥有最高权威这一理论从此告终。然而，一年之后苏联对匈牙利的侵略，却表明独立也适用于南斯拉夫以外的国家这个原则纯属幻想。十三年以后，俄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重演故技，继而又推行否认共产党小国独立主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都表明了同样的惨痛教训。

虽然如此，倘若铁托在 1955 年不曾为南斯拉夫的这一胜利欢欣鼓舞，那反倒是不近人情了，但因此而洋洋自得却决非他的天性³⁰³。他的反应一如往常，还是实际的，力图凭借所处的地位去争得最大的利益。他要求解散共产党情报局，这在翌年 4 月 17 日实现了；他要求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实行经济合作，这也恢复了。他还获得了其他许多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让步，诸如遣返 1948 年以来一直未让离开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偿还以前拒绝支付的债款等

等。但他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则是使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非斯大林化”。这使他获得机会再次努力把他的影响扩展到南斯拉夫以外的共产主义世界。

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满意地看到赫鲁晓夫为他的思想所影响。赫鲁晓夫这时试图通过其他方法把铁托争取到他这一边来。1955年和1956年，有好几个月这两位领导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1956年4月，铁托访问俄国——十年来的第一次，赫鲁晓夫以极其隆重的礼遇接待了他。甚至有传说，是铁托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他那篇揭露斯大林生平罪恶的著名演说的。东欧国家的斯大林分子开始被废黜，代之以比较自由化的共产党人。但在有些共产党内，特别是匈牙利，对“独立共产主义”这种思想的反对仍然是强烈的，尽管铁托要求顽固而可恨的斯大林分子、匈牙利的领导人拉科西必须下台。1956年夏，铁托看来几乎不断地与苏联领导人商讨匈牙利问题。7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与米高扬到亚得里亚海滨布里俄尼岛上铁托的夏季官邸访问他。10月，铁托到黑海之滨赫鲁晓夫的度假地索契回访；双方在那里取得一致意见，拉科西应由格罗代替，而铁托仍嫌他过于右倾，不能适应匈牙利变革的要求。铁托刚回南斯拉夫就听说
304 匈牙利暴乱已经开始。10月24日，苏联军队和坦克入侵匈牙利，铁托谴责此举并非必要，不可原谅——这是苏联以残暴武力侵犯一个共产党小国的明证，也正是他整个夏季一直在努力防止的那种情况。但在苏联第一次入侵后，匈牙利暴动却进一步升级，直至整个共产主义阵地都受到了威胁，苏联遂于11月4日第二次入侵匈牙利，铁托此时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同意这是必要的。如果共产主义在匈牙利被推翻，他自己在南斯拉夫进行的革命，以及东欧所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就都可能受到威胁。

苏联的莫洛托夫等人，原来就一直不赞成铁托的自由式共产

主义，并以毫不掩饰的敌意注视着赫鲁晓夫同反斯大林主义的变革眉来眉去，匈牙利暴乱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弹药。这一事件标志着铁托对苏联政策直接施加影响的终结。南苏关系一度极为紧张，从那时起，他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始终在冷淡与有分寸的友好之间摇摆。铁托的独立共产主义对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及共产党的重大影响，是俄国领导人所决不能忽视的，但应采用何种方法抵消这一影响，这些领导人之间却一直存在着分歧。

尽管 1956 年以后铁托已不能直接起到领导共产主义东欧的作用，他却竭力要确保使其他共产党国家都了解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一切，并能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对俄国人的继续挑战。他拒绝被拉回到苏联阵营之中；他不肯派正式代表参加赫鲁晓夫于 1957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家的会议。卡德尔只是作为观察员出席这次会议，而且还是受到毛泽东的一定压力，后者作了最大努力劝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回到信徒的行列中，说中国吃斯大林的苦头甚至比南斯拉夫还要多，但仍未拒绝接受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注 25〕铁托拒绝参加华沙条约这一苏联防御体系；虽然南斯拉夫已加强了与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联系，他却顶住了把南斯拉夫拉入称为经互会的这一苏联控制下的经济共同体的种种尝试。³⁰⁵

1958 年，南共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利用这一时机公开宣布了选择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以及南斯拉夫正在采取的实际做法。〔注 26〕在兰科维奇的挑战性讲话讲了一半时，苏联以及除波兰以外的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观察员退出会场以示反对。

既拒绝接受苏联的领导，又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无法与美国控制下的西方建立密切联系，铁托不得不寻找摆脱孤立地位的其他出路。他的解决方法是创立一个不结盟运动。其目的在于取得

所有不承担条约义务的国家（无论它是大国、小国还是弱国）以及所有不愿参加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的国家的国家的支持。不结盟运动是铁托自己的创造，他为获得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的支持作了艰巨的努力。还在1956年以前他就已开始在国外游访结友。1958年到1968年的十年中，他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一开始他乘坐私人游艇“海鸥”号出访，后来访问的国家越来越远，范围也日益广泛，他便克服了自己对空中旅行的反感而改乘飞机出访。铁托与夫人偕行，到处受到同他的国家元首这一地位相称的隆重礼遇。为他们举行盛宴，披戴花环，从城市到乡村给以夹道欢迎，还邀请他们骑乘大象。他们接受了许多异国情调的礼品，后来或送往南斯拉夫各博物馆，或用以装饰铁托的官邸。布里俄尼岛铁托别墅附近的一个私人动物园，即以各国赠送的动物（鹿、幼狮、长颈鹿等）为主。

频繁的旅游也许满足了铁托与其他国家接触的愿望，但却使他颇感劳累。铁托年逾八旬，仍在为不结盟运动到处奔走。他的出访使南斯拉夫赢得了世界上一些以前实际对其毫无所知的地区的尊敬。访问也为商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南斯拉夫派出一批批专家援助其他国家；他们帮助在叙利亚修筑港口，在印度建设水电站，在阿根廷兴办工厂。〔注27〕作为对铁托的回访，一些外国领导人也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南斯拉夫进行游览。南斯拉夫在世界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威望和地位。铁托满意地看到，他的国家领导着一场囊括半个世界的国际运动。不结盟会议几次举行——第一次于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有二十三个国家参加；但俄国人却在会议开始的那一天爆炸了一颗核弹，使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受到损害。第二次于1964年在开罗召开，有四十七个国家参加，但在说服某些成员国搁下本国的政策坚守不结盟宗旨上费了不少周折。铁托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获得了

一个世界讲坛宣传其外交策略思想——和平、共处、不结盟、裁军以及通过联合国机构进行调解。南斯拉夫在联合国成为小国中的一个领袖，在投票中表现了一种既不为苏联，也不为美国所喜的独立性。〔注 28〕

虽然不结盟运动从未成为一种足以向大国挑战或在他们之间起调停作用的强大的世界力量，它却使南斯拉夫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使铁托作为国际政治家而享有一种独特的威望。作为对铁托出访美、英两国的回访，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于 1970 年对他进行了正式访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也于 1972 年访问了他。然而，尽管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他却从未能在任何干扰世界和平的重大争端中成功地起到调停者的作用。1967 年以色列——阿拉伯战争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方案。他在敌对行动开始时即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使他一开头就处于不利地位。没有同他的政府官员充分磋商就采取行动，这在他的生平事业中是少有的一次。他与纳赛尔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密切联系导致两人之间的亲密友谊。这使他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作为调停者的可能，但他还是能运用他的影响使纳赛尔采取克制态度。纳赛尔³⁰⁷去世后，虽然他访问了埃及，他的影响却显著减弱，部份是因为他与纳赛尔的关系是以私人友谊为基础的，而他却未能与纳赛尔的继承人建立起同样的关系，部份则是由于苏联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增强了。对南斯拉夫来说，苏联的势力及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出现，较之尚未解决的中东危机更为严重。这对所有巴尔干国家普遍造成战略上的威胁，单靠铁托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可能就是这一点，促使铁托既在后几年中改进南斯拉夫与巴尔干邻国的关系，也接受了勃列日涅夫 1971 年访问贝尔格莱德时所提出的改善南苏关系的建议。他同意改善关系，密切经济合作并接受苏联的巨额贷款，但必须以苏联承认南斯拉夫有权在完全独立的情况

下决定自己的社会主义政体为条件。

铁托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是他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权威的成功挑战，他对各共产党国家拥有独立和自治权利这一原则的坚持。他揭露了隐藏在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词句背后的赤裸裸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也促使东欧所有的共产党都要求更大的自由。1956年在匈牙利以及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既表明上述发展为苏联带来的种种危险，也表明俄国为捍卫其民族利益准备走得多远。它们还表明，当面临一个世界强国的全面威胁时，铁托以及一切弱小国家所处地位的真正软弱性。

铁托在1949年就预言过，“很清楚，任何一种军事占领，即便是由红军占领，都包含着固有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从而使民族压迫和奴役不可避免，一切平等统统丧失，只好无条件地屈从于占领者。更大的讽刺则在于现在居然有人把这种占领认为是援助。”〔注29〕

铁托所以能保卫南斯拉夫免遭这种命运，是由于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由于他赢得了一致公认他为民族领袖的南斯拉夫人的巨大支持。但他不得不忧郁地承认，说到底，最关紧要的还是这样一种认识，即南斯拉夫人要用战斗来保卫他们的自由。他在1951年说，“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决心再次用鲜血来浸透它，而它将仍然属于我们。南斯拉夫决不会被征服，除非她的各族人民都已战死在疆场上。”〔注30〕在似有可能发生俄国入侵的那些艰苦日子里，铁托一直持这种看法。1968年，他谴责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据说他曾告诉苏联大使，南斯拉夫如遭进攻，必将战斗。这是一个那怕是最有成就的小国领导人所能摊出的最后一张牌。南斯拉夫与苏联控

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直到 1973 年才恢复关系。此时，南斯拉夫本身的地位已受到世界事务中的“缓和”的影响，这种“缓和”是随着越南战争结束，美国同苏联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改善而出现的。过去一直得以灵活利用处于冷战中间地带这种地位的南斯拉夫，回旋余地于是大为缩小。铁托为应付这种形势所采取的对策是，确保南苏关系发展到一个更为密切和友好的水平。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不但有助于对付美国的冷淡态度，也能使南斯拉夫免受苏联干涉。

铁托既已进入八旬高龄，他的政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使他所帮助创立的独立型式的共产主义得以巩固和持续。国际领域内唯一的严重威胁看来很可能来自苏联；许多人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继续保持其独立，自成一宗，置身于苏联组建的国家所构成的经互会集团之外，苏联是决不会甘心的。只要铁托健在并继续能起作用，他的革命保持独立而不受苏联干涉似乎还有保证，但未来如何，却是一个威胁着人们的问题悬在那里；因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的革命将如何继续，苏联（或美国）对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新局势反应又将如何，谁也无法预卜。

第十六章

309

国 家 元 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铁托有机会以他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时所接受的信念为基础创建一个国家，“一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崭新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注1〕这是很少有人获得的机会，而象铁托那样能够活着看到自己创建的国家发展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人就更少了。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具有同样的权力和威望，但是他此后只活了不几年，而且一生中从来获得铁托在战争结束时的那种个人声望和普遍的拥戴，也未获得铁托由于丰功伟绩直到晚年而享有的那种特殊的权威和崇敬。

战争结束时，铁托面临着艰巨的问题，但这对他并不新鲜。他过去一贯能够经历困难而最终取胜，深信能够再次如此。国家成为一片废墟，成千上万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房屋只剩下断壁颓垣，道路悉遭破坏，全国几乎没有一座桥梁完好无损。〔注2〕死亡了九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很多人死于南斯拉夫人之间的战斗。往后的岁月中，那些经历了战争及其后果的人，发觉简直无法向年青一代说明，战争结束时出现的那种悲哀、希望、恐惧和胜利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的感情，使他们如何深深激动；而对年青一代来说，这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段插曲。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时期的困难只是战争年代困难的延续，铁托的领导便被人们自然而然、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没有第二个领导者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南斯拉夫人的拥护。战前的政党看来

已经过时，与现实毫无关系了，而在国外度过战争年代的政治家（在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心目中，国王也包括在内）都已声名狼藉，因为他们没有和大家一起经历国家的改造和净化的过程。铁托决心不让任何别的政治集团摘取共产党的胜利果实。到 1945 年革命³¹⁰已完成了一半以上，不容许任何对抗行动干扰，使之功败垂成。他准备毫不留情。他后来愤然说过，1944 年在西方盟国的强大压力下，他接纳三名王国政府代表舒巴希奇、格罗尔和舒特伊参加临时政府。他们深信能加入某种统一战线并在其中得到人民拥护，甚至把王国政府的卷宗随身带到贝尔格莱德。但是，他们大大低估了铁托这个对手。“谁胜谁负，他们对此抱有幻想，但我们没有这种幻想。我们知道全部事情将如何结局——那就是不利于我们的对手。”“我们知道同舒巴希奇、格罗尔和舒特伊的合作不会长久，因为我们必须沿着我们明确规定的道路迅速前进。”〔注 3〕在竞选运动中王国政府代表被禁止组织自己的竞选活动。他们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在选举前全部辞职。

尽管共产党人深信游击队运动将在普选中得到广泛的支持，但仍害怕外来的干涉反对他们。在得到无可争辩的合法授权以前，一直感到神经紧张，觉得不够安全。他们严密控制全国的政府机构。游击队员手持冲锋枪，动辄开枪，把每个陌生人都看作是潜在的敌特，他们警卫所有的政府机关，劲头十足地在城乡巡逻。人们熟知的通敌者（兰科维奇的情报系统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在搜集档案）被搜寻出来，多人受审，一些人被处决。甚至那些反对过游击队运动的人，或看来会反对新国家的人（按照定义指属于为数不多的战前资产阶级而又尚未表示拥护游击队的人）也受到了惩处、恐吓和监禁。一些人失踪了，在这几个月内清算了一大笔旧仇宿怨。

1945 年 11 月 27 日普选时，只有一张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

名单，赞成或反对，选民可选择，不愿意对那个赢得了战争并拥有如此明显权力的政党投赞成票的人寥寥无几；而胆敢把选票投入反对票箱的人就更少了。铁托的运动得到了总票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弃权或废票不多。虽然曾竭尽一切努力动员人民投共产党人的票，并可以预料，如果反对党被允许参加竞选，共产党人得票的百分比会减少些，但铁托及其游击队那时享有巨大的真正的支持，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赢得多数，这一点都是无疑的。现在铁托得到了合法的权力和一个顺从的议会，它仿照苏联议会的做法，既无倡议的权力，又无行动的自由，成了一方专盖决议的橡皮图章。这些决议先由铁托主持下的人数不多的政治局作出，然后由人数较多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

11月29日议会废除了君主制，使南斯拉夫成为联邦人民共和国。^[注4]工业、银行以及所有商业企业全部国有化，无偿地加以接收，只剩下单独经营雇用劳动力的手工业者，他们成为私营工业的唯一残余。土地未收归国有，但私人占有至多只许六十英亩。据此收归国有的土地或没收通敌分子和被剥夺财产的德裔居民的土地，分配给曾经支持过游击队的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的许多人必须加入称为合作社的集体农庄。房产只限于自住房屋，由于住房奇缺，很多房屋被征用。这些和许多别的激烈改革都写进了1947年1月31日通过的宪法。它以1936年的苏联宪法为蓝本，保证了许多在这个新国家里实际上干脆无人理睬的权利。例如，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召开群众大会和发表言论的自由，人身不受侵犯。这些都不过是一纸空文。真实情况是这个新共和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制性国家，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党内权力则掌握在一小部份人手中，而铁托在这部份人中间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铁托及其党内领导班子中的同事认为，他们³¹²有权执政，因为他们得到人民的授权，他们行使人民的最高权力。

他们将创造一个南斯拉夫历史上最美好的新世界，人民将为此感谢他们，拥护他们。战争年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包括铁托在内的（尽管他早已表明自己讲求实际而且稳健慎重）领导人具有一种心境：对于懂得怎样勤奋劳动和刻苦生活的南斯拉夫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有一桩大事必须加以解决，铁托才能不为他的革命的安全担心。这就是米哈伊洛维奇的问题。他在战后逃亡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毗邻的山区。铁托决心要把他活捉回来公开审讯，以便他的战时通敌活动和亲塞尔维亚政策公诸于世，使整个切特尼克运动声誉扫地。米哈伊洛维奇在1945年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象他的很多支持者那样逃离南斯拉夫。但是，他拒绝逃跑。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骄傲的塞尔维亚爱国者，他继续抱有在战争年代中使他归于失败的那种幻想——幻想有朝一日他将能领导一次全国性的塞尔维亚起义，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并恢复塞尔维亚政权。他逃亡数月，餐风露宿，众散亲离，只剩下一小撮追随者，终于在1946年3月初被抓住。铁托在第二次去俄国访问斯大林的途中收到了兰科维奇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计划已完成。”米哈伊洛维奇的审判于6月10日开始，历时一个月。他在法庭声称他在狱中受到很好的待遇，这一点已由不受外界影响的证人证明属实。审讯将如何结局，是明白无疑的，因为米哈伊洛维奇的通敌活动罪证如山，他也爽快地供认了。他在法庭上远非怯懦，他为自己辩护而作的最后一次演说长达四小时，对他的战时经历和使他不知所措的“时局的旋涡”作了极其清晰和详尽的分析。关于他自己的动机，则说得不太明确。他觉得他是同盟国的政策变化和“残酷命运”的牺牲者。“我有很大的抱负，我开头也搞得轰轰烈烈”，他最后说：“但是，世界的狂风把我连同我的工作都卷走了。”1947年³¹³7月17日他同其他被判死刑的切特尼克分子一起被处决。〔注5〕

战争开始时，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一万二千名党员，倖存者不过三千。这些老党员必须在战时和战后入党的大约三十万男女党员的协助下领导浩繁的政府工作，在这个新国家进行巨大的改革。^{〔注6〕}要说现在成为政府各部的部长或地方政府的头头、企业的领导人、国家计划的编制者、住房、土地改革或食物管理人员的，便是战前那些善于编印和散发非法小册子的共产党人，那将给人造成错觉。大部份有各种才干的共产党人（正是因此才挑中了他们）在战争时期已获得了计划和管理地方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的经验。但是，事实证明，和平时期管理国家的复杂工作以及为一个稳定的未来制定计划，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共产党人自己把几乎所有战前那些在技术、行政或政治方面有经验但却未曾参加过游击运动的人们的帮助一律排斥在外。这样作是根据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因为按定义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一部份，是新国家的敌人。

关于当时如何制定政策以及领导人如何作出政治决定的细节，我们所知甚少。正象俄国人在1948年轻蔑地指出的，南共保留了战前的秘密活动性质，部份原因出于老习惯，部份原因是为了掩饰其实际政权的薄弱基础。大量事实证明，少数几个人共同作出决定，而铁托本人则保留了与他在战前和战时相同的权威和个人权力。铁托的大部份亲近同事经历战争而仍健在，但是伊凡·米鲁丁诺维奇于1945年乘船在多瑙河上触雷身亡。最大的损失还是伊沃·洛拉·李巴尔的牺牲。这个精悍的年青人同铁托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他还活着，或许最有可能成为铁托的副手和接班人。

314 在称为政治局的最核心的决策集团中，同铁托关系最密切的人是由四、五个人组成的小组，其成员因议题不同而差异，但核心人物包括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尔、塞尔维亚人莫沙·皮

雅杰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以及门的内哥罗人密洛凡·德热拉斯。接近这个核心集团的还有克罗地亚人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斯洛文尼亚人博里斯·基德里奇以及马其顿问题专家门的内哥罗人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注7〕所有这些人都是战前的老共产党员。他们体现了国内各民族间的大致平衡。更细致的平衡则维持在人数多得多的党中央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讨论政策，就大量次要问题提出建议，但是在此阶段总是把铁托的核心小组的重大决定作为最终决策来接受。我们知道，有关建立政府和编制计划的方法的讨论是热烈的，争论得很激烈。特别是关于制定计划和继续保留私有土地的问题有过很多分歧意见。铁托总是鼓励讨论，但是决定一经作出，固执的反对意见便必须放弃。领导人已有实行这种共同工作方法的长期经验。大部份革命变革的基本原则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决定，其中很多项早在1943年的亚伊策反法西斯会议前就已决定。领导人一旦就战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就得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就战术问题作出决定，为此一周要开几次会议。他们是一个结合得很紧密的班子。铁托作为首脑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威。这在他最亲密的同事和范围更大的政府官员中都得到公认。政府官员都是受严格纪律约束的共产党员。那些不承认这种权威的人（克罗地亚人安德里亚·赫布朗就是这样一个使人捉摸不定的人）一定是把对党的领导的怀疑隐藏在心里，因为怀疑就等于背叛。

铁托同这个班子的每个成员都自有特殊关系。很难了解这些关系中哪一些称得上友谊。铁托比他所有亲近同事都年长二十来岁，唯莫沙·皮雅杰除外，铁托同他早已建立了友谊。但是别人都把铁托看作是与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对铁托充满敬意的描绘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可以肯定，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同他们一起消遣、开玩笑、打猎、下棋和从事其他娱乐。³¹⁵

年事虽高而外表年青，这对他很有利。也许是由于身心健康，精力旺盛，他总是喜欢同年青人在一起，对他的两个最活跃的同事德热拉斯和基德里奇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两人都是精力过人，足智多谋，雄辩健谈，才华出众，都不是标准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德热拉斯出身于门的内哥罗一个贫寒但绝不是最贫苦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陆军中尉，但在密洛凡童年时代就已去世。他的家史，正如德热拉斯后来叙述的那样，是一部典型的门的内哥罗家史小说，每一代都发生宿仇、谋杀和暴行。而德热拉斯对这部小说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情节。“我父亲的祖父，我自己的祖父的祖父和外祖父，我父亲和我叔叔都被杀害，好象遭到了可怕的诅咒似的。……我觉得似乎我生时双眼就沾染了鲜血。我看到第一样东西就是鲜血。”〔注8〕这可以说明德热拉斯性格中的某些东西，说明他为什么全心全意信奉共产主义，后来又强烈地反对它，说明他的多情善感和奔放不羁的理想主义。博里斯·基德里奇则大不一样。他是卢布尔雅那一个教授的儿子。还在学生时代就成了共产党员。他曾被监禁，后来出国到布拉格、维也纳和巴黎为党工作，但他宁愿回到自己的家乡斯洛文尼亚从事地下活动，而不愿意在三十年代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受训。

1945年，战时掌握全权的最高参谋部变为在新的国家管理政府的领导班子，这种转变无需多少调整，因为人员大体未动，党组织未变，政治局保持了权力的延续性。政治局的每个委员如同战时那样管一个方面。莫沙·皮雅杰继续从事立宪，即国家的理论和法律基础的工作。这是他从1943年起就已从事的任务。兰科维奇继续掌管极其重要的安全工作。他组织各种情报机构，反间谍机构和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注9〕为了保卫铁托和新的革命国家，以残酷无情而著有成效。年复一年，他搜集国内一切重要人

物的秘密情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终而被认为是危险的个人王国。德热拉斯成为在文学和宣传方面负特殊责任的副主席。卡德尔专门从事他战时就已开始的对外关系工作，处理日常外事，偶尔担任特殊出访使命。铁托本人则负责国际关系。作为总理^①他协调整个班子的工作。但显然他无法过问在许多领域内同时进行的工作的实施细节。国内事务的琐事，只得委托给别人。

铁托除了专心致力对外事务，还有十分繁忙的公开活动——接见外宾，主持议会开幕，在国内各地的纪念集会或在需要给人民鼓干劲，向他们保证情况将会好转的时候发表演说。人们看到他身穿元帅服（夏天白色，冬天土灰色）胸前战争勋章（苏联曾授予他一枚勋章，但从未获得英国或美国授予的勋章）和金色穗带灿烂夺目，给人以深刻印象，甚至是以满足铁托在衣着方面的自豪感。战争年代已经消逝，除军事场合外，制服似乎已与时代不合，铁托于是更经常地穿着裁制得无瑕可击的便服露面。

领导者们面临的最严重的紧迫问题之一就是确保人民有饭吃。铁托终于接受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但以由他自己的人，而不是由西方盟国来负责分配为条件。援助的很大部份是提供粮食、种子、牲口和农具，帮助农民重新把土地耕种起来。^[注10]对农民施加了十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尽可能多生产粮食，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他们得到所需要的那种刺激。土地占有受到了限制，政府强迫农民以严格控制的低价出售大部份余粮。黑市买卖受到严厉惩罚。农民则报之以消极抵抗，³¹⁷拒绝生产超出他们自己所需的粮食。宣传、罚款、监禁都未能制服他们，于是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

为了改组实行国有化后的国家经济，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

^① 宪法规定，铁托是主席团主席。——译者

五年计划。它以苏联的样板为基础，旨在开发本国工业的潜力。这个计划对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富有吸引力，因为它将带来新建工厂生产的商品，较高的生活水平，给工人以就业机会以及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从理论上来说，它将输送一批干部同志成为未来的共产党的精华。这反映了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游击队观点，即认为尽管缺乏足够的资金，单靠英勇奋斗，因陋就简和南斯拉夫式的共产主义也能取得成功。甚至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中间对这个计划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最后博里斯·基德里奇受命负责这项任务。为了使这个计划取得成功，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未能坚持到底达到成功。1953年他患白血病去世，他的同事们却认为他的死是由于操劳过度。

五年计划化为年度计划、月计划、周计划，甚至日计划。为每个共和国，每个工厂、每个部门规定了计划。工厂被告知生产什么产品，何处销售和销售价格。据说仅年度计划一项用纸就重达三千三百磅左右。联邦和各共和国的二百七十七名部长向数以百计的企业负责人下达命令，后者再向下属下达命令，而企业负责人自己每年得发回约六百至八百份报告，可惜的是，计划虽然在理论上看来完美无缺，包罗万象，而在实践上得到的却是可怕的结局。计划人员忘掉了许多诸如针、梳子、别针一类的必需品，致使这类商品的黑市价格暴涨。对某些商品(诸如拖鞋等)的需要，则明显地估计过高。因为只强调增加生产，超额者得到特别报酬，数量重于一切，于是无人问津的劣等货充斥商店。尤其重要的是

³¹⁸ 国家自己不能创造出计划中规定的重工业所需的主要资金。〔注 11〕

战后年代中，人人都拼命劳动，往往二十四小时内干两种工作，以求收支两抵，得到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食物、衣服、燃料和住房，或者完全是出于理想主义。当人民慢慢地意识到只能获得极少的物质报酬时，他们的情绪就转为不满。他们倦于过度

劳累、肮脏、困苦，倦于听取那种用将来情况会好些的诺言来动员人们做出更大努力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们从来到南斯拉夫的外国人那里发现人家在战争期间并未遭到这么多的苦难，如今却穿得更好，吃得更好，有更好的药物，更多的奢侈品，生活得更舒服。南斯拉夫人再也不甘心相信，这是由于他们属于一个经历了四年全面战争的长期未得到发展的国家。同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对于规划一个尚属假说性的美好前景的种种理论失掉了兴趣。他们觉得这一切全是领导人的过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幻想破灭了。但是这种话他们不能太公开地说出来，因为兰科维奇的警察当局的密探比比皆是，批评社会主义就是破坏活动，说了这种话的人就要坐牢。对疲劳过度的居民来说，一个警察国家与共产党人希望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平等和富足的幸福美梦之间相距何止万里。

铁托本人尽管专心致志于别的方面，不可能没有觉察到南斯拉夫人民的情绪。他阅读报纸，但新闻检查很严，报纸上见不到批评意见。他在许多集会上的讲话，但对象总是热情高涨的听众，他们对他报以对英雄的欢呼。两个办公室、商店或旅馆都悬挂着他的像，他几乎被供奉起来。他被与公众舆论隔绝起来，达到了从来未曾有的地步。然而，政治上的直觉一直是他最突出的特质之一，而这不可能不继续发挥作用。铁托在他经历中的这个时期陷入了政治困境。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规定的实践路线必定是正确无误的。确实，苏联领导人批评过南斯拉夫的经济计划。——“你们要工业干什么？”一个苏联代表曾质问，“我们乌拉尔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注12〕他们还对南斯拉夫组织自己的军队、容许农民私有土地，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其他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³¹⁹但是，如果接受这种批评，就意味着把南斯拉夫的经济、武装力量并入苏联的经济和武装力量。土地的集体化将导致同农民一场

血战和大规模的饥谨，就象苏联三十年代发生过的那样。铁托不打算把南斯拉夫从属于苏联，也不愿意同曾经大力支持过游击队运动的南斯拉夫农民进行生死搏斗。

尽管1948年初他收到俄国领导人的信件中所说的那些话，他仍旧深信自己是个好的顺从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一个党员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体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而结果怎样呢？南斯拉夫人民和苏联领导人都对他不满意。需要检查一下纪录。弄清楚错误出在什么地方。同俄国人的争吵就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严重的关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断定，铁托过于独立自主，过于野心勃勃，过于南斯拉夫式，尤其是过于成功了，不可能充当他在南斯拉夫要求的那种顺从的卫星国领导人。必须把铁托除掉，而代之一一个因靠俄国人上台而心存感激俯首听命的人。斯大林认为铁托是易于推翻的，这一点说明他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普通南斯拉夫人）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我们不知道斯大林心中打算由谁来代替铁托，然而人们经常猜测俄国人一直在培养克罗地亚人安德里亚·赫布朗担任这一角色。使这种说法具有可信之处的事实是，俄国人有一封关于五年计划的信是写给赫布朗和铁托的。另一个几乎肯定同苏联领导人作过某种秘密安排的南斯拉夫高级共产党人是铁托的前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知道约瓦诺维奇的人绝不会对他站在俄国人一边感到惊讶。他是一个阴沉的、狂热的门的内哥罗人，前王国³²⁰陆军军官，只是在起义后才成为共产党员。他一直如痴如狂地仇恨西方。1944年他陪同铁托访问意大利会见丘吉尔，每次同英国人接触，他都显得疑忌、暴躁、不让步、不肯妥协。看来很有可能（但目前尚无证据）他曾企图把南斯拉夫军队带到苏联一边，反对铁托。但他从未得到此种机会。他在共产党情报局争论之初被枪杀，按官方说法，当时他正企图越境逃往匈牙利。

对铁托本人来说，俄国人之采取行动反对他是一种可怕的打击，直捣他心灵深处。尽管他为共产主义效力多年，他还是被抛弃了，这种打击因此更具有毁灭性。根本起因何在，他起初并未清醒地觉察到。他在此后的生涯中一直感到委屈。过了多年后他说：“对我来说，这是十分苦恼的。特别是我从早先同斯大林的谈话中得到一种印象，他赞赏我的正直。”〔注13〕然而，他在那个时候却表现出他特有的在打击下迅速复原的能力。他知道他毕生的工作，甚至他的生命取决于能否获得并保持他的同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大多数党员对他的忠诚——而训练这些人去赞扬苏联领导人的却是他自己。他们必须在他与苏联领导人之间作出选择。这似乎是从来也不可能的事。

如他早年生活中遭遇于危急情况的一样，铁托的反应是目标明确的行动。“生活教会了我，在这种危害关头最危险的事情是不采取一种立场，犹豫不决。遇到此种局势，反应必须始终大胆而坚定。”〔注14〕甚至在6月份宣布正式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之前，铁托就把苏联的批评这一整个问题提交给4月13日召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赞同政治局采取的独立路线，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除外，他们在会后不久就被捕。在此种时期，意见一致是最关键的。公开支持俄国至为危险，以致必须视作叛国行为。然后把这一争吵和领导人的反应向党组织作了解释，直至最基层单位。党员们听说他们一直被教育要尊敬的苏联领导人批评了铁托，并³²¹撤回了对南斯拉夫的支持时所感到的那种可怕的震惊，至今记忆犹新。刚开始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要幡然改变自己对俄国的观点是十分困难的。想到要独立面对未来，没有苏联的援助，没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同志情谊，这似乎预兆着必然的灾难。

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后的十八个月，是对铁托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品质最严峻的考验。在此期间，存在苏联入侵的威胁——

铁托认为如果国内形势崩溃，从而给干涉提供了机会的话，这种入侵必将发生。此外，还存在国内的危机。存在少数人的反革命活动的威胁，这些人仍旧认为应该听命于苏联领导人，或认为南斯拉夫革命没有苏联的支持便不可能继续存在。约一万二千人因支持共产党情报局而被监禁，可能不少人由于保持沉默而躲避了逮捕。但是在四十万名党员中这仅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其他人都团结在铁托的周围，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感到失望。一旦得到领导人、党内的多数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铁托知道他已有可能去进行斗争（那怕是与俄国斗争）并夺取胜利。而且从他的行动可以明显看出，有一个时期他还不能相信斯大林方面毫无和解余地。

有意思的是，在开始的十八个月内，南斯拉夫领导人还努力在行动上接受那些他们认为苏联提得有根据的批评，俄国人批评南斯拉夫党过分秘密化，二十年来不曾召开过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7月21日，被开除还不到一个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五次党代会。铁托的正式报告阐述了自1928年上届党代会以来党的历史。这个报告有匆匆拟就的迹象，讲了几个小时。〔注15〕铁托不顾俄国人贬低游击队的骄傲的那些言论，在报告中以大部份篇幅讲述了游击队的胜利和悲惨的经历。这正是大部份党员要听的东西，³²²因为除少数人外，大家都是通过参加游击队加入党的，而铁托正是由于他战时的领导才得到人们的拥护和追随。战争既是事实，又是神话，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因素。低估这种史实和经历将会伤害南斯拉夫人民的自豪感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根基。这种事情即使有斯大林的命令，铁托也不打算干，尽管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俄国政策的真实目的是要摧毁他的革命。铁托讲话以后，党的其他领导人就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做了报告。兰科维奇、德热拉斯、卡德尔和基德里奇分别报告了组织、宣传、外交和经济计划

工作。谁也没有公然向苏联挑战。大家都强调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纯正。他们仍然相信只要他们证明自己是好共产党人，他们还可能争取到一条归路。

六个月后他们仍在沿着这种路线行事。到了1949年，已采取了一些步骤来回答苏联对继续存在土地私有者一事的批评。建立了一个组织来强迫占有土地的农民把他们的耕地并入合作社，从而取消了土地私有。为达到此目的使用了野蛮的高压手段。共产党员组成的小组到全国各地游说，宣传合作农场的优越性。反抗过于激烈的农民被投入监狱。合作社的数目从1948年的一千三百一十八个增加到1950年的六千零七十五个，占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强。可是，这种政策未获成功，俄国人无动于衷，却使南斯拉夫经济濒于崩溃。农民们敢怒而不敢言，用消极抵抗的办法进行了反抗，并产生效果，只要够自己生活需要他们就拒绝多干活。土地荒废，牲畜被屠宰吃掉，粮食收成大减，而恶劣的气候使这场灾难更加深重。国家于是面临着饥荒的危险。

这几个月里，兰科维奇高效率的保安机关全力以赴，百般警惕，这才应付了从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渗入的苏联间谍。有过阴谋暗杀铁托的传说，但细节从未披露过。各卫星国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条约，中止了贸易，停付赔款，并持续地掀起对南斯拉夫的恶毒谩骂式的宣传运动，还对³²³被认为曾经赞成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横加罪名，交付审判。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以及另外一些人均以此种罪名被处决，后来又承认纯属诬告。〔注16〕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铁托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他想重新争取斯大林的好感已无希望，必须另觅一条生路。同样明显的是，他面前还摆着另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一个虽然他当时并不认识但今后却必须终身应付的难题：如何既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而又不损害他的共产主义立场，

如何既继续脱离共产主义集团其他国家，而又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铁托在处理各种危急问题的过程中，缓慢地、步步维艰地为南斯拉夫困境找到了出路。1948年以后的三年，他全神贯注的问题是争取生存——争取他的革命和南斯拉夫的独立得以继续存在。他本人作为一个领导人能否生存的问题只不过凑巧同这些重大问题连结在一起，很显然，他的成败将取决于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存或亡。此时，考虑一些实际问题重于一切；如何在政治理论上作出解释，是以后的事。首要任务是避免国家由于饥谨而崩溃。为此，铁托必须改变他原先作出的不接受资本主义西方的援助、不同他们发生经济关系的决定。他怀疑西方国家有反革命意图，他也知道俄国抱着同样的目的，因此必须对两者进行权衡。很明显，西方的危险性比较小一些。正如前面所说明，他同西方缔结了贸易协定，接受了西方的食物、军备以及为一项经过修改的工业化计划提供的贷款和赠款。

改弦易辙与非共产党世界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个方针是缓慢地执行的，使铁托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双方均有时间来消除相互之间的猜疑。毫无疑问，这种政策得到绝大部份南斯拉夫人的竭诚拥护，不只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了食物与工作，最后还带来商店里的商品，而且还因为这种政策使他们同他们感到有着共同文化和传统的西方世界恢复了联系。南斯拉夫极少对苏联

³²⁴ 怀有强烈的好感，这种人大都是传统上长期同俄国交往的门的内哥罗人。〔注17〕战争时期对苏联的拥护如此热烈，是通过大力宣传人为地造成的。幻想破灭所带来的最初的震惊一旦过去，这种拥护就象捅破了的气球那样崩溃了。而铁托建立在现实成就上的个人威望和地位却保持了下来，更加由于他政策的改变而大为提高。他精力充沛地周游全国，发表演说，接见代表团，激励南斯拉夫

人以自己的努力来挽救自己。他象往常那样看起来体魄健壮，衣着讲究，以坚定的信心激励他们。他们勒紧裤腰带，响应了他的号召。南斯拉夫的恢复是领导者与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是这是铁托领导的胜利。

※ ※ ※

同苏联的决裂和同西方重建关系，触发了对南斯拉夫新国家的根本性质的重新审查。这种事早晚总要出现，正如过了很久以后在东欧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斯大林的无情的敌意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放下审查1945年以来按苏联的授意在南斯拉夫实行的那些做法。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苏联卫星国的轨道上，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这是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性质的一次严峻检验——究竟是为南斯拉夫人民谋取更好的生活的手段呢；抑或其本身就是一种目的？铁托及其同事们作出了民族的、更合乎人性的抉择。中央集权的强制性国家和强加于人的合作社已引起了不满和经济灾难。这些做法于是全被放弃。1953年合作社准许解散。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去重新领回他们私有的土地，尽管他们被课以重税并长时期得不到发展生产的适当鼓励，但还是允许他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中的私有企业的重要成份存在下去。〔注18〕

解散强制性的国家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需³²⁵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而且起初还认为这也为共产党继续执政所必需。1949年以后，党的理论家开始考虑采取何种方法在保证共产党继续掌权的条件下实现政府体制民主化，而同时又与马克思列宁的教义相一致。人们此时已直率地承认这种教义对南斯拉夫的现状没有提供任何详尽的指导。提出来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工厂

中建立工人自己管理的体系，1950年以一项法律付诸实施。要选举工人委员会，参与工厂管理的所有决定，包括如何处理利润。工人委员会起初受到许许多多限制，工人根本无法有效地参加管理。按政治信仰和资历得到任命的共产党员继续控制全部要职。但是工人自治机构接连被写入其后的几部宪法，成为铁托的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注19]到七十年代，原有的体系中又引进了许多改革，工人担负了更多的管理工作。这种做法在实践上究竟有多大成效，南斯拉夫国内外的意见均有分歧，但是作为一种机构，看来已经生根，其他共产党国家和资本家都把这个做法作为解决管理部门与劳工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种途径而加以研究。

从1950年至1969年之间，依靠西方援助和本国的努力，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全国各地都受到影响，虽然南部较落后地区不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贝尔格莱德一带的塞尔维亚发展那样迅速和顺利。这个国家缓慢地、痛苦地走向人民前所未有的繁荣。南斯拉夫分享了西欧战后的经济发展；要是继续留在共产党国家集团内，受到苏联的发展、防务和工业计划提出的要求的限制，这是做不到的。为穷人争取较好的生活，是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法斗争的时期亲自撰写的许多小册子中提出的一个朴素的口号，这一点如今已在实现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愈来愈清楚：这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基础，而且如果铁托和共产党要保持政权的话，这也是一项根本需要。这样，经济发展就成为政治变革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为了鼓励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只得抛弃许多事先想出来的共产主义理论。采用了制定计划的新方法，取消了老的中央集权的方法；经济计划的权力分散，强调赢利以及积累资金的再投资，以求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更高的利润，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经济上的分权导致政治上的分权，因此，六十年代后期，最重要的政

府职能已由联邦的六个共和国执行，只把协调全局的权力和下余部分职能留给中央政府。十分注意维护区域性的独立，地方爱国主义（共和国的和区域的）显然比任何南斯拉夫主义的感情更为强烈，甚至在很多共产党员中间也是如此，尽管大家都同意共和国不可能离开联邦的南斯拉夫而独立存在。地方利益和经济需要，特别是落后地区的要求和较先进地区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反复地导致危机。〔注 20〕

这些事态发展，与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的共产党继续存在和行使全部权力，两者之间殊难调和。党本身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新一代党员的成长而变化；对他们来说，战前的非法活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党史中的故事，只是用来培养他们成长的一种传奇，但对他们本身并无意义。这种传奇最终成为一种恼人的障碍，妨害了从 1945 年到六十年代一直掌权的老一代党员和在战后南斯拉夫受教育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党员之间相互了解。年青党员开始迫切要求革新那个他们感到已在老模子中僵化了的党，使之现代化。铁托的大部份同事都在十分年轻时就掌了权，³²⁷这个事实使情况更加复杂。1962 年铁托七十岁时，他大部份最老的同事才五十多岁，此外，有许多人还更年轻，他们尚无放弃权力或隐退的打算。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铁托年事已高，总有一天免不了要去世，从而留下一个由谁接班的严重问题。这一无可讳避的事实，使原已矛盾纷繁的党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战后的头几年，人们公认共产党员应在新国家中组成一个统治阶级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受信赖的人员，占有全部负责岗位，对党的最高统治阶层唯命是从。作为报酬，他们获得高薪和特权，从而把他们同社会的其他成员截然分开，使人嫉妒，有时甚至使人憎恨。就是此种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和与之相联系的属于警察国家的某些情况，在五十年代初引起了德热拉斯的批评——尽管他

自己也参与了这方面的过火行为并从特权中得到很大好处。这促使他写了一篇粗鲁的短篇文章，攻击一些党员及他们的妻子的自私和庸俗的社会习俗。

这次攻击是他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但是更深的原因则是，尽管他同铁托长期共事，两人之间有过一段友谊，德热拉斯竟藐视铁托的权威，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批评。如果他只私下谈谈，也许还可以保持自己的观点而不致受到惩罚。但这是一种对铁托个人的背叛行为，铁托决不宽恕。废黜和监禁使他更加愤激；两年后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更加深思熟虑地对当代南斯拉夫社会进行批判，公开反对他自己长期以来狂热信仰的共产主义，赞成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注 21]由于他过去是个极端主义者，他的攻击就尤其凶狠。他并未指出怎样能使这种主张在南斯拉夫行之有效。德热拉斯对自己原来的理想主义感到了厌恶。他不是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愿接受妥协或等着看看国内事态的结局如何。当他决定起来反对他原先的同事并因此成为牺牲者的时候，在南斯拉夫正好开始了自由化的改革，而他³²⁸后来是赞成这种改革的。这就是他的悲剧。这些改革一旦开始，就缓慢地但随即愈来愈快地向前发展了。

1952年德热拉斯刚开始攻击南斯拉夫的共产党社会时，斯大林还在世，南斯拉夫的地位软弱而不稳。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和解访问后，南斯拉夫至少可以有数年的时间继续走完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必担心苏联的干涉。警察国家放弃了，许多政治犯获释，共产党人的特权受到了限制。^[注 22]随着贸易和新兴工业的扩大，同西方接触的发展，共产党人不再是这个国家内唯一领取高薪的人了。在1958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示其作用的改变——不再是居领导地位的高贵集团，而将从内部对社

会施加影响。另外一个阶级替代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这是些专家治国论者，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和专家们，他们凭自己的资格取得高薪和特权。他们可能是党员，但不是必须如此。社会上最富有的人可能是手艺人、重工业工人或从事外贸的人。到六十年代后几年，任何人想成为党员便可以成为党员，但是一旦入了党，他就必须接受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并承认负责的工作只能分配给那些资格相当的人。

与这些变化同时，地域性的情绪也在南斯拉夫逐渐滋长，而在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的相互关系上反映出来：联盟的成员之间在拨给各自的共和国的投资基金，各种语言的正式地位，以及其他文化经济等问题上发生争执。共产党人自己在自由化和权力分散是削弱了党还是加强了党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联盟面临分裂为两部份人的危险——一部份人赞成改革以及不同观点的公开讨论，包括让反对派以某种形式发表反对意见；另一部份人则认为³²⁹这样一种改革本身便将毁灭这个政权。在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过程中，铁托本人置身于冲突之外，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中心地位，不时进行干预，抑制过火的改革，总是谴责以容许其他政党这一形式使反对派制度化的要求，但同时又赞许在某种限度内的自由化。铁托的声明常常是保守的，然而众所周知，他的权威如此之高，若不是由于他的许可，上述种种重大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1966年夏党内出现了一场严重危机：铁托不得不同他最老的最受器重的同事之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从此分手。在整个战争时期，战后创建国家，以及同共产党情报局决裂后斯大林企图推翻这个国家的最困难岁月里，此人一直是安全机构的首脑。所有这些年代里兰科维奇在党的历届委员会中都占有中心的地位。除铁托外，党的领导人员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为数不多，而他是其中之一。他神秘莫测，隐身暗处，担负着以残忍的高效率铲除

共产主义敌人这一最不得人心的任务，给自己博得了一种不太令人羡慕的名声。五十年代自由化时期，他更换了正式职务，在公众中的形象也随之改变，以致人们认为他已排在卡德尔后边而成为如果铁托身后便最有可能继承权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到了六十年代，人们认为他已超过卡德尔，而直接成为铁托的继承人。但人们知道他与铁托不同，他反对自由化改革和权力分散。1966年6月28日铁托突然召集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在机密和紧急状态下到布里俄尼岛举行全会。中央委员们被用飞机分批从贝尔格莱德运至，军队从平时的驻地出动。^[注 23]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审议对兰科维奇的严重指控。他被控多年来反对党所进行的改革并在遍布各地的国家安全系统中保持他个人的权势。这使他有可能控制全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各项决定，不仅对地区政府，³³⁰而且下至公社和甚至工厂一级的地方政府也是如此。调查揭露兰科维奇控制着一个强权王国，这个王国私自设立了国内每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档案——他以从不销毁任何文件而闻名。他的下属甚至窃听铁托本人的电话。兰科维奇承认他曾利用他的权力反对最高层领导一致决定的改革。^[注 24]他从其他党员，从他自己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得到多少支持尚未查明，但是这不足以使他有能力向铁托的地位挑战，也无法使他避免蒙受耻辱。这次危机同德热拉斯事件相似，但造成的创伤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兰科维奇还未达到反对革命的地步。这对铁托是一次可悲的打击。但是铁托不同意把他的老同事投入监牢。兰科维奇被撤职而未开除出党。他从此进入了彻底而驯服的隐退，继续从侧面静观局势的发展。

兰科维奇虽已削职，但他和他的同事之间的根本矛盾却未解决。现实问题是南共联盟如何保持权力和威望，而又同时满足党内公众的扩大民主自由的要求？如何做到既扩大了民主，而又不破坏这个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基础？要求进行种种改革的压

力使铁托处于危急局势，而在解决这种危局的办法尚未找到的时候，1958年夏，苏联竟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自由化改革；这种改革比铁托打算容许在南斯拉夫进行的改革还要更进一步，也更为迅速。铁托坚决谴责入侵，但对南斯拉夫来说，无论是否共产党员，教训都是明显的。苏联无意听任中欧的共产党政府丧失政权，而南斯拉夫正处于险境，除非共产党人继续执政。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即鉴于南斯拉夫的地位和苏联对东欧的共产主义改革的态度，铁托的有控制的自由化政策是明智和现实的。

1969年3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成员出席第九次全国代表³³¹大会的时候，普遍有此感觉。党为了使对1958年以来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革提出更相适应的提案，在会前曾进行了许多改革。甚至曾有人谈到把容许表达不同意见定为一项党内规定。大会最后还是定下了几项大规模的改革。很多1945年以来一直垄断党和国家大权的老一代的游击队战士未能连选连任党内领导职务。战前以来代表大会第一次为新的一代所控制。大会活动是公开的，发表了大量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上。改革了党的机构以便完成在国家系统内早已完成的民主化和权力分散。会议作出决定，大会每四年（不是五年）举行一次，共和国和联邦级的党的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注25]发布了包含上述决定的新党纲，党纲规定今后党员有权对已作出的决定持不同意见，但必须接受多数的意志。作为把自治纳入政治生活的总运动的一部份而设计的这些改革，得到了铁托的支持。然而他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一样，显然担心这些改革可能会导致过分的权力分散，并削弱党的南斯拉夫民族性质和权威。鉴于外来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和不同共和国各民族的内部离心趋势，很多人认为这些改革有可能破坏国家的统一。铁托以折衷办法为这一难题提供了答案，展示了他独特的政治才能。大会开幕的那天，他宣布

创设一个新的机构，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局。这是一个小型委员会，由每个共和国各出二名代表，伏伊伏丁那和科斯梅特各出一名代表，加上作为联邦国家总统的铁托本人组成。这是一个进行统一³³²和联合的机构，一切决定在此作出，所有共和国负同等责任。而今南斯拉夫既已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人们希望这个代表各地区、各民族的委员会的成员能就如何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意见一致是未来的稳定所必需的，由于铁托年事已高，这一点就特别紧迫。这些希望未能实现，在随后的两年中，不同的共和国和地区的代表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争论主要涉及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各共和国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当南斯拉夫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之际，应当容许发展何种形式的共产党政府。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明显存在，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存在宪法上和经济上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历史尤其久远，曾经是分裂战前南斯拉夫国家的那些分歧的原因。1965年以后，这两个矛盾一齐戏剧性地表面化了。

1948年与共产党情报局分裂后，铁托本人曾经支持自由共产主义的概念。正如上面表明，这一点终于导致接受市场经济，导致工业和其他领域的自治，导致政府的以及某些程度上共产党组织的权力分散。成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后，党自己放弃了部份的中央集权并决定在政府和社会中发挥“指导”作用，而不是“领导”作用。正是这些改革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才引起了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危机。当时南斯拉夫同其他国家一样，正进入一个经济困难不断增加的阶段，这个事实使几年来的问题更加严重。

某些共和国，特别是克罗地亚，长期以来潜在的积怨变为公开辩论的问题。在各共和国的宪法地位，各民族的文化独立，包括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力或共同语的形式，又特别在各共和国的³³³经济地位等问题上，人们表示了强烈的忿懣。关于经济地位一事，

在投资数额以及各共和国所得外币准许保留或分配以供自用的数额问题上，人们的情绪特别强烈。而所有这些争论中都包含着地区民族主义的强烈因素，这甚至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中间也很明显。这种情况各共和国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以克罗地亚最为激烈。1971年11月下旬，正是在那里危机终于爆发。当时，萨格勒布的学生受到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怂恿，上街游行示威，支持把所得外币留在他们自己共和国的极端要求。同时，一些非共产党极端分子，人数不多而能量很大，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他们要求克罗地亚享有全部主权，包括独立的外交政策、独立的驻联合国代表权、独立的国防部队在内，而克罗地亚只向南斯拉夫联邦国家提供“自愿”的财政捐献。虽然这些要求只发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中一些狂热的偏激分子，但是整个局势已显得如此严重，不仅威胁党的统一，并且还威胁铁托自战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在这危急时期，铁托以他特有的果断采取了行动。他试图调解未成，转而诉诸早年那种更为强硬的办法，以最大的努力控制猖獗一时的民族主义（特别在克罗地亚，同样在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或别的任何地方）以便恢复党与人民的团结，维持联邦国家。1971年12月1日他在塞尔维亚的卡拉卓尔杰沃召见克罗地亚的共产党领导人讨论他后来称之为“反革命”的活动。这次以召开的地点命名的会议，后来被认为是铁托式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卡拉卓尔杰沃会议没有开除任何人，但是铁托明确表示不赞同克罗地亚事件的民族主义的分裂倾向，并对怂恿这种倾向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12月1日³³⁴和2日召开了全党的主席团会议，铁托在会上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把这些观点反复向全国广播。全国各地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是所有人都讨论了这种局势，因为大家知道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已达到影响全国的危险规模。铁托使用了个人

权威，呼吁全党和全国的支持——他得到了这种支持，与此相结合，他也使用了没有说出口的那种威胁，即他有武装部队的力量作为后盾。

局势逐渐平息下来。危机集中发生在克罗地亚，但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从中汲取了教训。克罗地亚一些领导人承认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辞去了重要职务；接着别的共和国也有几起辞职。少数人以进行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性活动罪被捕。人们普遍感到，国家已从一种极其危险的局势的边缘退了回来。组成南斯拉夫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未解决的争端曾促进了战前国家的破灭。如果1971年时竟容许这些争端继续不决并逐步升级，则外来干涉（人人明白是指主要威胁将来自苏联）就象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难以避免。

这次危机导致对1945年以来容许发展的自由共产主义进行若干重大的修改。解职或强制性的辞职继续了一段时间。继克罗地亚之后，塞尔维亚的变动尤其多，那里党的领导被指控未能抑制大型金融及银行联合企业的垄断性（用这个词指的是亲塞尔维亚）活动，这些企业是随着南斯拉夫的现代工业化专家治国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持不同政见者抱怨他们的共和国未能得到经济发展利润中应得的一份的一个答复。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其中之一是各共和国和联邦国家之间如何分配利润、投资基金和财政来源的问题。同样重要的问题是联邦国家内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的自治权的新定义和宪法保证问题。

335 政府的第三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在铁托强有力的支持下现在重新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统一和权威。

所有上述问题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此时已年过八十高龄的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政权的问题。没有指定的继承者，没有人能象铁托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内所做到的那样，掌握大

权或博得各民族（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效忠。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分裂因素已经大肆宣扬，但危机也表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团结的因素也是强有力的。事到紧要关头，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组成南斯拉夫的共和国中没有哪一强大到足以自立，单独立国的地步——这一点对克罗地亚（尽管极端分子于1971年提出了种种要求）、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一些不太发达的共和国来说都是同样确实的。如果哪个共和国坚持要求独立，那么它不被别国接管，也肯定要遭控制。对所有南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来说，学会共存显然都是两弊之中较轻者。能够于铁托在世之日产生若干各民族都能接受，实践上证明可行的宪法条款，是以确保南斯拉夫能拥有一个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因而得以继续独立存在下去，这不只是铁托一个人的愿望。为处理这些问题而进行的修改宪法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过程导致1974年宣布的新宪法，但是曾经需要进行困难的谈判。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尽管年青一代缺乏耐心，未来变化莫测，铁托可以怀着对成就的可以理解的满意和自豪，回顾他担任公职的漫长岁月。南斯拉夫实现了现代化，已发展到按其增长率再也不能称为不发达国家的程度了。虽然还存在落后地区、贫穷、失业和不平等现象，南斯拉夫人民一般说来对铁托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十分满意的。现代化的套间公寓和扩大了的城市居住面积、新修的公路、大量的轿车乃至交通阻塞、电视、洗衣机、³³⁸ 支付逆差、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南斯拉夫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当代进展是相一致的。尽管有政治活动和发表个人观点方面的限制，南斯拉夫人意识到在铁托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他们享受着任何别的共产党国家所未曾有过的那种自由。铁托也为这种成就感到自豪并渴望保全它以贻未来。

第十七章

337

铁托其人

当铁托从成年进入老年时，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性格是怎样经受了一场最大的考验——长时期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呢？1945年，他五十三岁时，成为南斯拉夫总理；五十六岁时，他被斯大林开除；当赫鲁晓夫求和时，他六十二岁；他几乎来不及打量一下南斯拉夫的国内情形，并觉察到他一心为普通人民争取的物质条件有些正在达到，就已年近七十。七十六岁时，他不得不面对苏联对南斯拉夫独立的新威胁；年逾八十，他仍是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宰，是全部南斯拉夫人公认为领袖的独一无二人物。与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都已消逝，唯他依然健在，而且还是那些曾经目睹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仍在世的最后几个人物之一；他是那些在本世纪的早期成长起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掌权并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的最后一人。无论从民族的或国际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俄国以外的欧洲共产主义所培养出来的头一位和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

晚年时，无论是在危机时期还是处于相对平静的岁月，他的基本性格仍然和他早年一样未变。在有些方面，他变得温雅、老练；与青年时代相比，他的政治态度确实增添了宽大容忍，减少了天真和浪漫气息。他的经历使他懂得，人的天性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会改变，共产主义理想尽可以渴望追求，但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任何地方也不存在，苏联



1953年5月
铁托和老农妇，在斯拉沃尼亚布罗德

尤其不存在”，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大可能达到。〔注1〕本着他那无时不在、随年龄俱增并曾使他只取得部份成就也不沮丧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他的理想主义作出了让步。在战后最初的年代里，由于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贡献未获应有的评价，铁托曾怒气冲冲；但到了七十年代，他得到了他所能希望的一切赞赏和承认。他接受了那些看来确实期望着的与他的职务相称的种种荣誉，但并没有表现出这一切荣誉都只应归于自己。他显然欣赏身为南斯拉夫总统，但与此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要求，以辛勤工作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的品德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从未陶醉于权力；他虽然欣赏权力，但未被它腐蚀。他的举止既不浮夸傲慢，又不妄自尊大。他是无情的，但只有当事关生死存亡之时才这样做。同时，他从不肆意暴虐，从不耽迷于清洗。他这样做的理由埋藏在他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中的深处，难以确切说明，但他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却表现出许多前后一贯的特色，这有助于说明他的性格。他虽然树敌，但却是一个被人喜欢的人（虽说不是每个人，但至少是许多人），诸如他的家庭成员，各种极其不同的共事者，一些妇女以及各种年龄的男人。他喜欢名望，但从不牺牲品德，哗众取宠。他具有一种夺取成功的巨大干劲，这使他不论遇任何机缘总会登峰造极。他一向乐观；这给了他一种应付危难的高度发达的本能，藉此他多次化险为夷，而倘若是别人，可能早已一命呜呼。不论童年或成年，他总是谨慎对待不熟悉的环境，及至胸有成竹，他便以高度的自信行事；一些南部斯拉夫人往往出于刚愎自用终于危及生命，铁托却在一切情况下极少过分自信。他既具有这些品德，便用不着拜占廷式的浮华排场。他接受了与他那近于帝王的高位和伟大相称的一切——但从不做得过分。他拥有许多房舍、大马力的汽车、游艇和飞机，但这些东西充其量只不

过是大多数国家元首所享有的，也许他们比其他共产党国家首脑所能被允许的更豪华些。倘若有一个南斯拉夫人对此批评，就必有另一个人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总统并不过分。

339 成为国家元首之后，铁托的工作习惯和过去大致相同。他喜欢和同事们（但不是那是阿谀奉承之辈）一道工作。虽然他一向威严自处，却喜欢与善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人讨论一切问题。他与人共事脾气通常是好的，对笨蛋却不太能忍受，而一旦由于愚蠢或缺乏效率造成问题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但旋即平息。他自己效率既高又严于律己。即使在老年，他的工作日程仍然繁重，把四至五个助手及其下设的工作班子忙得不亦乐乎。铁托每日早晨六点钟起床，他的习惯是自己烧咖啡，在他的工作人员上班之前读当天报纸。他在午夜或以后方就寝，这长达十八个小时的工作日被分成三、四段紧张工作的时间，其中间有散步或休息。他具有充分休息的能力，一放下工作即能转入娱乐，或要睡便能睡着，如有必要，一刻使醒来，精神振作。

铁托在战后设法重建了正常的私生活，这是他从二十年代早期和第一个妻子波尔卡一起生活以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他和曾是一个游击队员约万卡·布迪萨夫列维奇建立了满意而长久的关系。她是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姑娘，比他年轻约三十岁，1952年4月成为铁托的夫人。铁托年岁虽大，人却年轻，而且生命力出奇地旺盛，所以这种年龄上的差别（这在南部斯拉夫人中并不象在西欧那样不寻常）关系不大。作为南斯拉夫总统的漂亮的夫人和铁托本人的出色的助手，约万卡·布罗兹的品德非常合适。她出身低微，由于战争错过了原就不可能深造的高等教育，她和铁托早年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象铁托一样，她也秉性聪敏，充分利用她后来所得到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她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文学学位，教授们发现，根本不必考虑她的

特殊地位而在这点上对她加以任何照顾。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她的学业都是高质量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她伴随丈夫多次出国，学会了多种外语，并对他们所要访问的国家的历史和风³⁴⁰俗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她处处表现出是一个受人欢迎并对访问饶有兴趣的客人。她养成一种受她丈夫喜欢的质朴的优雅风度，她那开朗的笑容和善良的性格，被全世界认为是南斯拉夫形象的宝贵财富。

妻子只是妻子，除了作为夫人而外，基本上只以个人身份出现而不起任何直接作用，这是典型的铁托作风。不管这是否属于对待妇女的家长式态度残余的反映，这总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把他的私生活置于政治之外——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使他在因胜利而变得高高在上的年代中，以及在他的同时代人大多数相继逝去的日子里，得以享受友谊和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在工作和休息时从不缺少同伴，但他超脱于政治纷争之上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可能获得密切亲近的友谊，因为这将引起纠葛和猜疑。约万卡未为他生儿育女，但他帮助铁托抚育了已于战后改嫁的赫尔塔·哈斯留下的儿子，以及铁托长子扎尔科的子女。扎尔科和妻子离婚后，铁托便把孙儿孙女都领来抚养。铁托把他的家庭严格地放在不突出的位置，用他的权威使他们不为公众所注目，而让他们到社会上去自闯出路。他一直关怀地照料着他的亲属，但既不让他们特别有钱，也不让他们特别有势，这儿根本不存在什么布罗兹王朝。而且，无论情况如何，继承权势和财产的做法都是与铁托所坚守的信念格格不入的。

铁托身为国家之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他会见过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许多杰出人物，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谈论过他的吸引人的丰采，坦率的态度和他的聪明才智。他长于凭借他那多重性格的各种特色，或者运用他的广泛兴趣的某些方面与种种个性

极其不同的人们进行结交，就象他在战时赢得了诸如丘吉尔、亚历山大、麦克莱恩、林赛·罗杰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敬慕和欣赏³⁴¹一样，他也在战后的各种不同的人物中激起同样的感情，这些人中包括纳赛尔、尼赫鲁、海尔·塞拉西、埃莉诺·罗斯福、艾夫里尔·哈里曼、安奈林·比万以及一些英国皇室成员。在不同的恰当场合，他既能严肃又能诙谐——甚至是说些粗话。当激怒时，他也会态度粗暴，恶语伤人。他富于人的感情，喜怒哀乐常常激发于外，又乐于与人交际，年事虽然已高，这种能力看来并未衰退；他对户外生活和活动的喜爱也一如既往。

他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布里俄尼岛上接待了许多官方的和私人宾客，在他的若干官邸中，这个地方最为他所喜爱。这座方圆大约七十英亩的美丽的亚热带海岛成为一所特殊的庄园。除了他自己的私寓外，还有为官员和来访者准备的别墅和宾馆。他自己的别墅相当简朴，屋内饰有游击战争时的照片，他生活中其他时期的纪念品，以及从南斯拉夫和世界各地收到的礼物。由于他对国事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工作持有这样一种永久不懈的兴趣，由于他一贯认为自己有责接见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人，他自己就剩不下多少时间了。为了得到一个连布里俄尼也不能提供的私寓，他在布里俄尼对面的小岛万加岛上修建了另外一幢房子。这里有他休闲用的各种设备。他是个热情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这里设有一个供他自己冲洗旅途中拍摄的照片的暗室。他有一个车间，可以在这里亲手进行金属加工，保持他在很早以前学来的手艺。他也种一个小园子，在丝柏与棕榈中间随坡陡下，直达蔚蓝色的海面。他的物质生活已超过了童年时代的梦想。他拥有想得到的、适合在各种场合、由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一切漂亮服装。他一直爱好服装，把它作为成功的外在标志，而又笑自己竟能宽恕这样一种弱点。他依然戴着在1940年用他翻译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挣

得的钱买的那只钻石戒指。这是成功的标志呢，对恶运的护符呢，还是另一种生活遗留下来的纪念品呢？

而1928年在萨格勒布法庭上对社会高声挑战的那个英勇而热情的年青共产党员又怎样了呢？经历了四十年的共产党人生活和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当年的东西保留下来？回顾这一特定经历时，铁托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虽然当时他的举动可能看来有些傻气——连许多共产党员也持这一看法，虽然这样是有失谨慎，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性格不相一致，但却触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推动他承担起他的事业，终而使他达于高位。经历这次徒刑之后，铁托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虽然他一生中对于共产主义的含义的理解有过变化，他仍然自己认为终身是个实心实意的共产主义者，“从一开始我就是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铁托在七十多岁时说过，“但我总是设法避免意见分歧，一直现在我也没有真正改变。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是个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注2〕

讲这番话时，他按照纪律接受俄国对于共产主义的解释（残酷、愚昧和缺乏效率，恰如过去经常表现的那样）的时代早已结束。1941年以后，铁托的纪律和服从是对自己的共产主义原则和行为准则的纪律和服从。到这时，铁托已亲手并以他人的大量帮助，注重实效地发展了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全世界称之为铁托主义。铁托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名词。他在南斯拉夫所协力发展的政治制度，一直是由南斯拉夫特定的条件决定的。铁托知道这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他宁愿称之为社会主义，因而表明这是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共产主义，他承认则是属于未来的理想（这和他青年时代的信念显然不同，他已经成熟了）。他也许还感到共产主义永远只能是个理想而已。他没有这样说，但当埃莉诺·罗斯福让他明确地谈谈自己的政治哲学时，他的说法和这点极其

近似，他回答说：“我认为可以把自己称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注3〕对于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是合适的写照。南斯拉夫已经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国有化和私有财产、强大的中央权力和地方分权、工人管理和国家控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合为一体，取得了令人满意的³⁴³结果；而当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铁托主义便表现一种灵活性或及时掉转方向，或调整各种成分的比例，而不为预先想出的教条般的概念所束缚。当教条本身证明无效时，也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铁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28年时不允许他在法庭上作出的这一解释，有力地说明了他青年时代所目睹的大多数人民的悲惨境遇。他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是为了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而为了进行这一努力，他欣然接受了伴随一个革命者的生涯而俱来的那些艰苦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所得到的物质上的报答是他绝对不可能预见到的，而对他的政治抱负也从未起过任何作用。一旦得到这些酬答，他便安然享受，但在铁托的大半生中，这种理想却是前进的动力和目的；这一理想的部份实现，便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虚此生。今日的南斯拉夫社会在繁荣、平等和受到外人尊重等方面来说，都远远地超过了铁托年青时代的南斯拉夫，这是任何人也不会怀疑的。

这一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必然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铁托的干预，不可能确切判别。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个人在指南斯拉夫和共产主义的这些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人们甚至怀疑，倘若没有铁托南斯拉夫的革命能否成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没有了铁托，目前的南斯拉夫国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使之永久稳定，确保它的独立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性质（铁托坚持不渝为之奋斗的原则）不致失掉，这一直是铁托晚年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他知道他将永远见不到答案的问题。

铁托籍以掌握政权，使革命取得成功和新国家赖以统治的工具是共产党。虽然它更换了名称、作用和组织，铁托相信，它的继续掌握无可争议的权力，是他花费了如此巨大精力去建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铁托决非是那种相信它应当一成不变的人；他知道，要生存下去就要变革。他支持自由化政策从而取消了党的机械控制。但他从未接受多党制政府的想法，相信这些想法将使政治生活陷于地区性和宗派性的纷争，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这就不仅会毁掉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毁掉现在的这个国家。这很可能导致西方式的民主或俄国的干涉，把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强加于南斯拉夫。他认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场灾难。这些考虑，特别是对俄国的担心，说明铁托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得到如此普遍的拥护。他一直是稳定、战斗的领导班子和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保证，是一个赢得和保持了人民的信任的人，是一个可以向他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并深知他定能尽力找到一个公正的和公平的解决办法的人。

铁托是否也曾考虑过他的革命的代价，这一点他却没有表现出来。他是足够现实的，他懂得，每一场革命都要求以死亡、监禁和不公正作为牺牲。他感到他已竭尽全力限制了革命中的过火之处，若不是由于他的制止，他的一些同志必然还会更走极端。^{〔注4〕}虽然，当面临着生存问题时，他准备无情地消灭敌人，铁托本人基本上仍然是个很通人情的人，是个正常的而在许多方面极为寻常的人。

与此同时，他又远非寻常，因为他既具有产生伟大所必要的品德，又有无法说明的极好的幸运。他自己否认他能从斯大林的清洗中逃生是出自偶然，说这是由于他自己了解俄国正在出现的事情，懂得应采取的躲避办法。^{〔注5〕}他多次逃脱表面看来虽属倖免，而其实很可能应归功于他的才能；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确实也是格外幸运。同时，他具有一种高超而可贵的能力，善于洞察

时代的特点，并抓住瞬息即逝的时机。他具有先见之明，而且一直相信必须预先对形势作出充分的估量，进行相应的准备以便掌握主动权。为了达到长远的目标，他善于把慎重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与抓住时机赢得更大赌注的才能结合起来。失败往往使他激怒发奋，而不是自叱自怜。但他却从未为胜利所陶醉。而对危机，他总是英勇果断。这些品质在战时就已引人注目，及至战后，为了能够以此反抗俄国人，他不得不痛苦地，开始时是勉强地抛掉他对俄国领导人顺从的习惯。但一经丢弃了这种习惯，他便把他的才干用于为南斯拉夫造福。他既革命而又保守。1963年，当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巨大压力时，他说：“总的说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现代化，但我反对有害于我们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化，无论在文学方面还是在总的方面都是这样。”最为重要的是，即使在老年时期，他还表现出他有学习的能力和随着时代而变化既不仓惶又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的意志。

这位历经沧桑，数倍于常人的非凡人物，在有生之年便已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是不足为奇的。作为一个活着的神话般的人物也许有其不利之处，使铁托的形象高大威严，高高在上，但却形孤影单，但这一处境也自有其报偿，他的成就必定使他深感满足。当被问及倘若能再获得一次生命，他是否将会另有打算时，他答道：“我想，我将走同样的道路。也许我会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些。我只能说，我遗憾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注6〕当被问及他乐意人们纪念他的那些方面时，他答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历史将会决定哪些是我生活中的积极方面，而人民将由此怀念我。历史也将指出哪些是不好的。就我而言，我一生尽力为人民和国家造福，只要我还能够，我将一直这样做下去。”〔注7〕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在共产主义和他自己的时代的历史上，将占有一个位置，这已是能保证的了。

注释及其来源

① 已列入参考书目（第 375—385 页）的书不再在此重复

347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1. 这一审判的过程曾多次复述。见弗·戴迪耶尔：《铁托自叙传》（以下简称为《铁托传》），第 62—68 页；非·麦克莱恩：《争夺中的防寨》（以下简称为《防寨》），第 53—57 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81—83 页。
2. 铁托诞生于 1892 年 5 月 7 日（维·温特哈特：《约瑟普·布罗兹的一生》，第 51 页。以下简称为《布罗兹》。）铁托生活成长的那所库姆罗维茨的旧居里展出了学校注册簿，上面记有这个日期；这是铁托头一次入学注册时登记的。库姆罗维茨铁托旧居纪念馆所展出的铁托奉召入伍奥地利军队时的军方文件（《铁托的生活与欢乐》，萨格勒布，1962 年出版，第 9—10 页曾加以引用）；以及各种警方文件则分别为 3 月 5 日或 3 月 12 日。1943 年警方专为德国人编制的另册（美国外交部图书馆藏德国文件，第 6136/E 458407 号）也是 3 月 7 日。南斯拉夫正式庆祝铁托的生日则为每年 5 月 25 日。亦见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6 页。
3.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9 页。
4. 斯扎博：《扎果烈山后之乡》。本书对扎果烈作了极好的描述，几乎重现了铁托童年时代的情景。

5. 描述铁托童年时代克罗地亚农民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从农奴制度下解放之前的生活状况的有许多著作，其中如：比恰尼奇：《我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和《1848年的农奴解放》（见卷宗三，萨格勒布，1948年3月），亦见托马塞维奇：《南斯拉夫的农民、政治与经济变化》，第60、86页和其他各处。1906年克罗地亚人口为二百五十万，选民仅达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人。
6.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6页；斯扎博：《旧萨格勒布》，第189、190页。
7.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7、8页。
- 348 8. 戴迪耶尔的《铁托传》第3—4页有简述；茨尔尼亚所著《克罗地亚文化史》第247—255页也有叙述。亦见N·克莱奇和B·格拉菲诺尔关于这次起义的讨论，载于《南斯拉夫历史杂志》，1963年第2期，第68—87页。
9. 茨尔尼亚：《克罗地亚文化史》，第250页。
10. 茨尔尼亚：同上书。
11.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4页。
12. E·I·冯·特卡莱克：《离开克罗地亚的少年时代（1749—1823, 1824—1843年）》，来比锡，弗莱格·冯·奥托维甘德书店，1894年出版。
13.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5页。
14. 关于“扎德鲁加”有大量的著作，对二十世纪存留的“扎德鲁加”情况也有若干很有趣的专著。见P·莫斯利：《农民家族：巴尔干各国的“扎德鲁加”（公社性质的联合家族）及其近期的演变》，载于O·韦尔（编）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第95—108页；哈尔彭：《扎德鲁加，一个世纪来的变化》；厄利奇：《演变中的家族》；亦见奥蒂：《南斯拉夫》，载于D·沃里纳（编）：《发展中社会之间的对比》。

15.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6 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52—53 页。
16. 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17 页。
17.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8 页，麦克莱恩：《防寨》，第 16 页。
18.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10 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19、20 页。
19. 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21 页。
20. 这封信保存在库姆罗维茨铁托旧居纪念馆。
21.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12 页；托马塞维奇所著《南斯拉夫的农民、政治与经济变化》第 154 页对克罗地亚这一时期出国移民总数作了更高的估计，为四十万至四十五万人，其中包括因逃避兵役而迁出者，这种人未被列入官方的统计数字。

第二章 从孩子到成人

1. 铁托曾向若干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讲述过自己的早期生活。故事基本上总是一样的，虽然某些细节和插曲有时不同。本章充分利用了各个传记作家都必须作资料来源的三种叙述：戴迪耶尔的《铁托传》，麦克莱恩的《防寨》和齐利亚克斯的《铁托》。此外，还有报刊文章和发表的访问记，增添了新的情节，其中最重要的是 1963 年 12 月 14 日菲·麦克莱恩爵士对铁托的访问记（发表于 1964 年 5 月 12 日《战斗报》）。在《铁托的生活与欢乐》的第十四至二十四节中，发表了铁托早期生活的轶事和令人感到有趣的照片。库姆罗维茨、锡萨克、萨格勒布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里有大量照片、文件和其他展览品。在温特哈特的《布罗兹》的书中能找到一些新的情节。温特哈特在贝³⁴⁹尔格莱德一个为撰写铁托总统的全面而详尽的传记搜集材料

的特设机构工作。本章中所引的同卡拉斯的谈话，系根据戴迪耶尔的《铁托传》第 13 页、齐利亚克斯的《铁托》第 22—23 页，以及 1950 年 2 月 9 日同瓦尔特·李普曼的谈话。

2. 麦克莱恩：《访问记》，1963 年；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60 页。
3.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20—21 页。
4.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23 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62 页。
这个工厂在波希米亚的京涅—克琴科夫。
5. 马丁·布罗兹（1884—1964）是父母养大的第一个孩子，比约瑟普大八岁；中间有一个哥哥德拉古廷（1885—1932）和三个姐姐安卡、玛丽亚、亚尼察，他们都没有养大。此外的弟弟妹妹是斯捷潘（1893 年生）、玛蒂达（1896 年生）、弗耶科斯拉夫（1898 年生）、特丽扎（1902 年生）以及弗兰伊察（1906 年生）。
6. 据铁托 1963 年同菲·麦克莱恩爵士的谈话，他原打算去炮兵服役，那就能在维也纳驻扎。但发现那也意味着得与奥地利人在一起，而与讲克罗地亚语的多亲们分开了。因此，他请求调到萨格勒布，被分配到第二十五多莫布兰团。
7.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26 页。彼得罗瓦拉丁是一座古堡，位于贝尔格莱德以北、诺维萨特附近的多瑙河上，外观非常引人注目。古堡是中世纪时期修的，后经奥地利加固，用以对付土耳其人。再后又被土耳其人用作对付奥地利人。现在是国家文物建筑，堡内设有档案馆和博物馆。
8.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28—30 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38 页；麦克莱恩：《访问记》，1963 年。
9. 约瑟普·布罗兹由于在这一役中的军功，本应授予奥地利战争勋章，但因奥匈帝国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而瓦解，局势混乱，未能得到。当他以南斯拉夫总统身份于 1965 年正式

访问奥地利时，奥地利当局建议给他授勋，他婉言辞谢了。

10.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30—35 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39 页；麦克莱恩：《访问记》，1963 年。
11. “士官生”是人们送给在 1917 年的俄国政府中占统治地位的立宪民主党人的绰号。见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一卷。
12.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30—35 页；《战斗报》，1964 年 5 月 10³⁵⁰ 日；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50、51 页。
13. J·F·N·布雷德利：《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布尔什维克叛乱》，载于 1963 年 10 月《苏维埃研究》，第十五卷第二期，第 124—151 页。
14. 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51—53 页。
15. 约瑟普·布罗兹结婚的确切日期一直没有公布。库姆罗维茨铁托旧居纪念馆展出的警局档案提到了结婚地点，并称婚礼于 1918 年举行。这个日期看来有错误。所有其他证据都说明不可能这样早。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75 页）说是 1920 年 1 月。
1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的战俘中约有四万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人（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82 页）。

铁托加入共产党的准确日期和情况都相当模糊。有人说，他于 1919 年 1 月在鄂木斯克地区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并说当他于 1920 年归国后申请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时，这一情况曾经转到南斯拉夫党，并据此得到批准。但鄂木斯克当时在白俄手中，这个日期因而值得怀疑。铁托本人认为自己的党籍始于 1920 年 10 月回南斯拉夫后入党之时。见本书第三章。

17. 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于 1918 年 12 月 1 日宣布成立，命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十一年后，改称为南斯拉夫 (Jugoslavia. “Jugo”的意思是“南”)，本书所使用的始终是这一名称的英语形式——南斯拉夫 (Yugoslavia)。

第三章 转变为革命者

1. 威克海姆·斯提德同帕西奇的谈话，见奥斯托维茨：《南斯拉夫真相》，第 88、89 页。
2. 赖德尔：《巴黎和会上的南斯拉夫》，第 309—312 页。
3.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IMRO)，1896 年马其顿民族主义分子达米安·格鲁也夫和哥则·德尔切夫创建的。“内革”在宗旨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争取自治，另一派日益与主张兼并整个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结为一气。
4. 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以下简称为《政治报告》)，第 14 页。
5.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40 页。
- 351 6.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史纲》(以下简称为《史纲》)，第 60—62 页。
7. 《史纲》，第 63 页；阿瓦库莫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史》(以下简称为《党史》)，第 29—32 页。托帕洛维奇是社会民主党人，1919 年支持与共产党人联合。后期反对共产国际控制南共。他始终是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其种种活动与其说是为了南斯拉夫，毋宁说是为了塞尔维亚。他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思想也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的原因之一。他是米哈伊洛维奇在 1944 年 1 月召开然而却告流产的圣萨瓦代表大会的主要倡议者。

8. 南斯拉夫农民虽然在许多方面态度保守，但却蕴藏着激进的革命的感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的灾难性的经济条件，尤其使这种感情不断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铁托的游击队运动的主要支持即来自农民。
9. 克罗地亚工人运动档案馆（萨格勒布），ZB，第八卷，I3/32。
10.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40页。
11. 铁托：《政治报告》，第32页。
12.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40页。见库姆罗维茨铁托旧居纪念馆保存的1928年警局报告，根据克罗地亚独立国当局所掌握的警局档案为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编撰的有关铁托的记事。记事于1943年2月13日由巴维利奇办事处送交大使馆。文件编号为德国战争文件，6136/E458406—458411（后面的号码是缩影印本的英国编号）。此件亦存华盛顿和波恩；其他抄件存莫斯科。
13. 南斯拉夫《政治报》的文章，1957年5月25日；戴迪耶尔：《铁托传》，第42—43页。
14. 同上书，《政治报》和《铁托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比奇在南斯拉夫的一个集中营被杀害。
15. 这些武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由铁托的游击队从地下找到，挖掘出来使用的。在这以前始终无人发现。见戴迪耶尔：《铁托传》，第44—46页。
16.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日报《战斗报》的文章，1949年5月25日。这是作者于1968年4月在萨格勒布采访巴维尔·格里戈里奇医生的记实。M·贝基奇（编）：《铁托与当代纪实》，第12页。
17.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52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111、112页。
18. 《战斗报》，1959年7月8日；戴迪耶尔：《铁托传》，第53—

56 页。

352

第四章 政治犯

1. 克罗地亚农民党拒绝接受维多夫丹宪法。1925 年 7 月,拉迪奇和帕西奇达成协议,最后承认宪法与王朝以前一直在自己的名称中继续保留“共和”二字。见马切克:《为自由而斗争》,第 105 页。
2. “弗兰科夫齐”,是指约瑟普·弗兰克(1844—1911)博士的追随者。他于 1896 年在克罗地亚创建了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党,称为纯净右翼党。其纲领是就克罗地亚领土问题提出广泛的要求,不支持建立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张。这一国家已建立,塞尔维亚的领导也经确定之后,弗兰科夫齐即致力于分裂这个国家,并另建一个扩大的独立的克罗地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短命的塞尔维亚独立国,他们的领土要求大部份实现。这个所谓的独立国家只不过是德国的一个卫星国而已,并没有真正独立。
3. 阿瓦库莫维奇:《党史》,第 74 页注释;马切克:《为自由而斗争》,第 100 页。
4. 《史纲》,第 61、122 页。这些数字是根据地方党组织书记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汇编的报告作出的,难以肯定其准确性,但大致上似无错误。
5. 见本书第八章,第 169、170 页。
6. 《史纲》,第 121、122 页。
7. 阿瓦库莫维奇:《党史》,第 61 页注释。
8. 《史纲》,第 91—97 页、113—116 页。
9. 同上书。《历史档案》,第二卷,第 424—429 页。

10. 铁托：《政治报告》，第 28 页。
11. 铁托：《政治报告》，第 28、29 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122、123 页；《历史档案》，第 11、138、139 页。
12. 克罗地亚工人运动档案馆（萨格勒布）ZB，第十八卷，L1/3、4、5。
13.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60—61 页。
14. 英国外交部所藏的未发表的德国文件汇编（以下简称为德国文件），6136/E458407。
15. 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78 页；克罗地亚工人运动档案馆，K1、第八卷，/73；《铁托的生活与欢乐》，第 55 页。
16. 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78 页。
17. 库姆罗维茨铁托旧居纪念馆保存的布罗兹笔记本所写的提纲，警局打字抄件。编号的标题是：
 - （1）国内外形势：中国内战。法国、英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失败。
 - （2）对各国共产党的迫害；第一阶段战斗的结束和新阶段³⁵³的开始；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迫害，其力量却不断增长。
 - （3）印度和希腊的流血战斗在继续。
 - （4）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斗争和群众的不满。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和严刑审判。
 - （5）巴尔干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南斯拉夫——白色恐怖的欢宴。
 - （6）英国、德国、法国和波兰共产党的斗争。
 - （7）苏联的巩固与准备对付进攻者的战争。第二个大标题南斯拉夫的政治形势下的小标题是：
 - （1）沃奇乔维奇—达维多维奇政府上台；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2) 内图诺议定书：6月20日事件；萨格勒布游行和南共的地位。

(3)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执行党的政策的新方案，发挥党员的主动性与党的加强。

18. 这次审讯在所有有关铁托生平的主要著作中都有记述，戴迪耶尔：《铁托传》，第62—68页；麦克莱恩：《防寨》，第53—57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78—83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127—134页；报道这次审讯的《消息报》文章被收入《铁托的生活与欢乐》中，见第56页。1958年7月8日《战斗报》刊登了这次审讯的记述。当时的法庭审讯记录保存下来。这仅仅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次同样审讯中的一次。当时曾给共产国际送去一份对犯人的判决报告，现保存在贝尔格莱德克罗地亚工人运动档案馆，192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文件(CKKI)。
19. 麦克莱恩：《防寨》，第59页。
20. 1959年11月29日《政治报》；齐利亚克斯：《铁托》，第90—91页。
21. 1952年5月25日《政治报》刊登的莫沙·皮雅杰的文章。
22. 1968年4月格里戈里奇医生接见作者时的谈话。
23. 1968年4月罗·乔拉科维奇对作者的谈话。

第五章 逍遥法外的地下共产党员

1. 关于铁托他本人出狱后去莫斯科前这段时期活动的叙述，见戴迪耶尔：《铁托传》，第79—91页；并见麦克莱恩：《防寨》，第63—73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91—93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156—162页和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帕尔地耶村》

(以下简称为《铁托在……》),第17—38页。关于他与尼古³⁵⁴拉·齐卡拉联系的情况,仅在德国文件6136/E458407—458408中有所提及。他的姨母是指他母亲的姐妹。

2. 齐利亚克斯:《铁托》,第91—93页。
3. 德国文件6136/E458407—458408;乔拉科维奇:《关于某一时期的谈话》,第二卷,第290页。
4. 普里比谢维奇:《亚历山大国王的独裁》,第99—127页,对导致亚历山大国王宣布独裁统治的环境和这一独裁统治的性质提出了对立的观点。
5. 1939年南斯拉夫按人口的收入,除罗马尼亚外是欧洲最低的。
6. 托马塞维奇:《南斯拉夫的农民、政治与经济变化》,第248、249、426、427、675—680页。
7. 根据官方的南共党史,贾科维奇和N·赫西莫维奇是在萨格勒布被捕的,他们受了刑,然后被带到南奥边境处决。因此,关于他们曾企图逃跑的说法可能是虚构的。见《史纲》第156—157页。铁托所说的这一时期的党员人数,见1967年4月18日《新闻晚报》。
8. 这张传单引自克罗地亚工人运动档案馆(萨格勒布)ZB,第八卷L1/11,1931年。铁托的谴责引自《政治报告》,第33页。
9. 关于高尔吉奇的这些情况是1968年4月罗·乔拉科维奇告诉作者的,他很了解高尔吉奇。
10. 博里斯·基德里奇是1930年获释,卡德尔是1933年,布拉哥耶·帕罗维奇是1934年,巴维尔·格里戈里奇医生是1935年。
11. 德国文件,6136/E458408。
12. 1962年11月29日《战斗报》。

13.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83—84 页。
14. 此处称铁托出席了这些天在维也纳举行的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是根据达米扬诺维奇所著《铁托在……》第 23 页引用的党的文件。铁托这一名字在布罗兹政治生涯的早期就已正式使用，这一事实否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一些出自想象的说法，这些说法对铁托这一假名的来源作了想当然的解释。说法之一是，布罗兹习惯于命令别人去干这干那，于是他取假名时就用了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吩咐别人时惯常用的“ti to”^①，意思是“你去干那个”。
15.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 24—25 页。
16.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87 页。
17. 《铁托传》，第 88 页；亦见《铁托与当代纪实》第 26 页所引 1962 年 11 月 29 日《战斗报》发表爱德华·卡德尔的一篇文章。
18.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 28—30 页。
- 355 19. 铁托本人修改了把南斯拉夫政府说成是“好战的法西斯专政”的说法（《政治报告》，第 33 页）。他说，他不知道为何把这个词语用来形容亚历山大国王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过是“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国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最反动部分的普通专政。”
20. 法国总理路易·巴德欧先生同时被暗杀。
21.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90 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99、100 页。
22. 人们给高尔吉奇叫“索美尔”。出席会议的其他党员是伊凡·马切克、约瑟普·布里莱伊、弗兰克·霍赛瓦尔、托恩·苏斯塔里奇和弗兰科·奥托卡尔。

^①“ti to”的汉语译音即“铁托”。——译者

23. 铁托：《政治报告》，第34页。
24. 《史纲》，第193—194页；《铁托传》，第90—91页；《铁托在……》，第36—38页。

第六章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受训

1. 康克斯特的《大恐怖》一书第43—54页叙述了暗杀基洛夫事件，这一事件的后果在书中都有论述。
2. 麦克莱恩：《防寨》，第73页。
3. 《防寨》，第82页。
4. 匈牙利起义失败后，贝拉·库恩首先逃到维也纳。奥地利政府允许他继续前往俄国，以此交换俄军帮助奥政府镇压1848年匈牙利起义时夺得的几面奥地利旗帜。他于1937年5月末被捕，是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较早被消灭的外国人之一。见康克斯特所著《大恐怖》，第431页。
5. 在铁托的所有传记中都有关于他在莫斯科的活动的这一记述。见戴迪耶尔：《铁托传》，第95—104页。
6. 哥斯尼亚克：《在特察尤和列宁学校》，载于1962年11月29日《战斗报》；乔拉科维奇：《谈话》，第80—81页。
7. 温特哈特：《布罗兹》一书第164—165页及其他所有传记都举出了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铁托本人在1968年10月8日接见作者时，说明了他与马努伊尔斯基的关系。亦见乔拉科维奇：《谈话》，第135页。
8.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40页。
9. 麦肯齐：《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1928—1943）》（以下简称为《共产国际》），第16—43页；关于共产国际的组织的叙述，见第24—33页。

- 356 10.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97—98 页；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 42—43 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167 页。
11. 麦克莱恩：《防寨》，第 82—83 页；《史纲》，第 198 页；麦肯齐：《共产国际》，第 146、325 页注。
12. 麦肯齐：《共产国际》，第 43 页。
13.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 46、47 页。
14.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99—100 页；1959 年 11 月 29 日《政治报》；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 48—49 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 170—172 页。
15. 《铁托传》，第 100 页；《铁托在……》，第 49—50 页。
16. 《史纲》，第 216—217 页；德国文件，6136/F458409。
17. 《共产主义者》（周刊），1946 年 10 月 1 日，第 69 页；铁托：《政治报告》，第 34—35 页。
18.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103 页。1967 年 4 月 18 日《新闻晚报》。
19.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103 页；1967 年 4 月 18 日《新闻晚报》；铁托：《言论集》，第八卷，第 101—102 页。关于马努伊尔斯基和季米特洛夫的话是铁托在 1968 年 10 月 8 日接见作者时说的。
20.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104 页；《共产主义者》（周刊），1946 年 10 月 1 日，第 69—70 页。

第七章 国际经验

1. 西里加：《俄国之谜》，第 282—283 页；库克斯特：《大恐怖》，第 428 页。
2. 铁托对他在 1936—1940 年间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曾作过许多

叙述，包括他对戴迪耶尔、菲·麦克莱恩和齐利亚克斯的叙述。他还在一些重要的政治演说中谈过这种关系，包括1948年他在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政治报告》）；1940年11月在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载于《共产主义者》，1946年10月1日，第71—74页）；1959年4月11日他接见《共产主义者》周刊编辑部人员时的谈话（见《言论集》，第十四卷，第202—210页）；以及他在贝尔格莱德第十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载于1967年4月18日《新闻晚报》）。见《言论集》，第204—205页；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04页；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59页。

3. 《史纲》，第229页。
4. J·乔尔称之为“三十年后的人民阵线”，是《现代史杂志》，1966年第一卷，第30—31页。
5. 这些地址是罗·乔拉科维奇在1968年4月接见作者时说的；关于南共在巴黎的情况在所有的传记中都有记载，见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04—107页。
6. 克罗地亚工人运动档案馆（萨格勒布），ZB, S 952/342.。
7. 戴迪耶尔：《可爱的土地》，第215—222页。
8. 《共产主义者》，1959年4月16日；《政治报》，1959年11月29日；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08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37/26；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61页注。这艘海船准备搭载的志愿兵人数说法不一。戴迪耶尔说是“一千人左右”；达米扬诺维奇说是五百人，铁托给共产国际的信中也是说五百人（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37/26）。
9.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37/26，31。
10. 《史纲》，第234—237页。
11.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37/?1, 3, 51；达米扬诺维奇：《铁托

- 在……》，第61—67页。
12.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11—113页。
 13.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67—69页；《史纲》，第22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37/51。
 14. 《战斗报》，1952年5月25日；M·贝基奇(编)：《铁托与当代纪实》，第31—40页也曾刊载。
 15.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71页。
 16.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09—110页。
 17.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37/70、73。
 18. 引自1968年10月8日接见作者时的谈话。
 19. 1967年4月18日《新闻晚报》。
 20.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75页。
 21. 康克斯特：《大恐怖》，第428页。
 22.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74页；铁托在1968年10月8日接见作者时表达了对季米特洛夫和皮克的感激心情。
 23.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82页。
 24. 与米莱蒂奇有关的这段史话有许多记述，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76页；1967年4月18日《新闻晚报》；铁托：《言论集》，第十四卷，第206页。这段文字引自1957年3月17日《战斗报》。见本书第八章第160—161页。
 25. 德国文件，6136/E485410。安娜·格尔泽提奇(伊凡·格尔泽提奇之妻)于1938年3月3日被南斯拉夫警察被捕，审讯中供出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情况，但在警方的报告中，并没有说关于铁托即将到来的情报是从她口中得到的。看来更可能的是，情况是由巴黎的一位了解铁托未来行动的详情的人提供的。
 26. 戴迪耶尔：《可爱的土地》，第251—257页。

27. 戴迪耶尔：《可爱的土地》，第 251—257 页。
28.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 90—91 页。
29. 伯迈斯特：《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后遗症》，第 7、14 页。
30. 铁托：《言论集》，第十四卷，第 207—208 页。
31. 见 1969 年 3 月 11 日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革命斗争的五十年》（正式英译本，³⁵⁸第 34 页）。并见 1969 年 3 月 12 日出版的《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联合会通讯》，第八卷第 617 页。德热拉斯提到的引文见《与斯大林的会谈》，第 35 页。德热拉斯又说：“没有人做南斯拉夫人的后盾。相反，他们进行党内权力的争夺。热衷于证明自己对于斯大林和列宁主义的忠诚，从而互相掘下坟墓。”这些话是德热拉斯与他从前的同事们决裂后写下的。德热拉斯没有在大清洗期间莫斯科工作的亲身经历。有这种经历的人在他们的叙述中并没有指出南斯拉夫人彼此特别不忠实。但这些叙述确实指出他们努力忠于共产国际。见德热拉斯：《会谈》，第一章。乔拉科维奇：《谈话》，第 11 和 79 页以下各页。大量证据表明，斯大林的清洗（清洗中推翻了共产国际以往所有的办事规则）的荒谬性是主要因素；见康克斯特：《大恐怖》
32.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8 日）。

第八章 党的总书记

1. 由戴迪耶尔撰写的 1952 年出版的第一本铁托传记，把委派铁托任南共总书记职务的时间确定为 1937 年 12 月底至 1938 年初的某时（《铁托传》，第 109—111 页）。迄最近为止，这个日期一直为其后的作家所沿用。1968 年初，佩罗·达米扬诺维奇发

表了有关铁托取得政权过程的短篇论文《铁托在帕尔地耶村》。这篇论文是采自戴迪耶尔所著铁托传记发表后才公开的文献基础上写的。根据这些文件提供的证据，达米扬诺维奇确定铁托访问莫斯科为1938年，而不是1937年；并提出铁托被授与党的总书记职务的那次与季米特洛夫的会晤是1938年10月20日（《铁托在……》，第92—95页）。达米扬诺维奇列举的证据似乎是确凿的，我已把它作为正确的史料而接受。这一日期也被温特哈特所采用，参见《布罗兹》，第218—225页。温特哈特的书出版于1968年夏季，与达米扬诺维奇一样，利用了新近公开的同一原始资料。这两位作者的书里所取的事件发生的先后程序，澄清了某些由于戴迪耶尔的书日期错误而引起的混乱。戴迪耶尔的记叙产生的问题之一是，如果铁托是在1937年受任，季米特洛夫怎么能称波兰党的解散是已发生的事件（《铁托传》，第110页），而我们知道这一事件实际发生在1938年夏？若如达米扬诺维奇所说，铁托会见季米特洛夫是在1938年10月，这一事件便极可能在季米特洛夫和铁托的谈话中谈及。

2.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34页，《史纲》，第252页。
3.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4. 麦克莱恩：《防寨》，第103页；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25—126页。
5. 铁托：《言论集》，第八卷，第104页。据报道，约瓦诺维奇于1941年在俄国获释，目的是让他参加红军作战。
6.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93页。与马努伊尔斯基的历史性会晤的确切日期尚不清楚，大概是在铁托与季米特洛夫会谈之后，可能迟至12月。参加这次会晤的除铁托外，还

有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所有的人都极力争辩，主张保留南斯拉夫共产党并由铁托领导。

7. 多种著作叙述了这个情节。参见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10页；麦克莱恩：《防寨》，第99页；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94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222页。
8. 麦克莱恩：《访问记》；1967年4月18日《新闻晚报》。
9. 1967年4月18日《新闻晚报》。铁托：《言论集》，第十四卷，第206页；铁托：《政治报告》。1945年有人在莫斯科看见米莱蒂奇一事，是未经证实的传闻。各书也未提及铁托以奉行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审查的确切时间。无法确定此事发生在他在公共汽车上偶然遇到米莱蒂奇之前还是之后。似乎较大的可能是在这次邂逅之前，因为根据铁托对事件的叙述，米莱蒂奇在铁托会见达米扬诺夫之后立即消声匿迹了。
10. 温特哈特：《布罗兹》，第225页。
11. 《史纲》，第212、272、274页。一万二千这个数字是铁托在1969年3月11日举行的南共联盟九大的演说中提出的。参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革命斗争的五十年》，第22页。
12. 戴迪耶尔：《可爱的土地》，第251、253、268页。
13. 阿瓦库莫维奇：《党史》，第39页注。
14. 戴迪耶尔：《可爱的土地》，第217页。
15. 档案馆（萨格勒布），ZB,KOM10/208；《史纲》，第229—230页。
16. 阿瓦库莫维奇：《党史》，第165页注。
17. 戴迪耶尔：《可爱的土地》，第205—206页；阿瓦库莫维奇：《党史》，第147页。
18. 《史纲》，第252页；1967年4月18日《新闻晚报》。
19.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与铁托在一起》，载于《年鉴》，第三

册，贝尔格莱德，1961年出版。另载于《铁托与当代纪实》，第46页。

- 360
20. 档案馆（贝尔格莱德），OK—KPJ，1929/2；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34/101，1938/43；德国文件，6136/E458408。自1934年4月1日至1936年10月26日，一金卢布价值0.15英镑（0.87美元），四百金卢布价值六十英镑，那时月薪六十英镑是可观的数目。卢布贬值后，四百卢布约等于十二至十八英镑。
21.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261页。
22. 《史纲》，第269页。另据党的若干工作人员向作者的叙述。

第九章 备 战

1. 霍普特纳：《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第110页。
2. 霍普特纳：同上书，第112页，引自冯·维默尔所著《一个奥地利外交官的经历和磨难》，第221—224页。
3.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14页。
4.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24页。
5. 温特哈特：《布罗兹》，第230页。
6. 戴迪耶尔：《可爱的土地》，第265—266页。
7. 温特哈特：《布罗兹》，第230页。
8. 铁托：《言论集》，第十四卷，第209页。
9. 麦克莱恩：《防寨》，第103—104页。除了在国内组织共产党外，共产国际还交给铁托另一任务，即“劝说我们在国外的人员，特别是那些曾去过西班牙后被拘留在法国集中营的那些同志回来，……当然，我们关心的只是那些正直的同志。”见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11页。有关铁托谈及施韦尔马向共产

国际汇报南斯拉夫状况一节，见《铁托传》，第126页。

10. 铁托曾多次描述他1940年返回南斯拉夫时充满危险的旅行。各次说法互相吻合，虽然某些细节略有出入。见麦克莱恩：《防寨》，第108—110页；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26—127页；温特哈特：《布罗兹》，第238—239页，均以戴迪耶尔的记述为根据。有关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到伊斯坦布尔给铁托送护照一节，是在1969年3月27日的一次接见中他告诉作者的。
11. 档案馆(萨格勒布)，ZB. KOM, 4/71。
12. 档案馆(萨格勒布)，ZB. KOM, 6/87。
13. 档案馆(萨格勒布)，ZB. OKKPJ, 1/15, 16。
14. 有关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如下记述，是以达米扬诺维奇的《铁托在……》第109—149页和与会者的回忆为根据。没有公布有关这次会议的成套文件，据说由于战争，文件未能全部保存下来。没有留下当时照片；有时印行的一张照片是1952年由战争中幸存的政治局委员坐在大会主席台上重新摄制的。有³⁶¹有关大会的部份记述（主要是铁托在大会上的讲话）载入《1940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萨格勒布大会材料》，见《共产主义者》，1946年10月1日，第59—122页。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内，代表会议不如代表大会重要。
15.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121页。赫尔塔·哈斯，即铁托的次子亚历山大（次年生于萨格勒布）的母亲，是这次会议的代表。
16. 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131页。
17. 议程规定十二个主要发言：铁托讲组织问题；卡德尔讲政治问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讲工会；伊万·米卢蒂诺维奇讲农业与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即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题由密洛凡·德热拉斯讲，博里斯·基德里奇讲宣传问题；洛拉·李巴尔讲青年问题；维达·托姆西奇讲妇女工作问题。特约代表米塔尔·巴基奇讲军队工作问题；关于组织与秘密活动问题由保罗·帕普讲；德拉普·帕夫洛维奇讲人民支援问题。未列主要发言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发言是关于选举领导人。见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第131—132页。

18. 《共产主义者》（1946年10月1日，第99—100页）曾载有铁托关于“南斯拉夫党内和许多其他国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论，表明了当时铁托接受了（或至少认为有必要表现为好象是接受了）斯大林主张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主义曾是大清洗的种种借口之一。他没有提及被清洗的南斯拉夫人的名字，虽然其中许多人的名字曾在党的报纸上公布过。
19.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28页。
20. 托马塞维奇：《南斯拉夫的农民、政治与经济变化》，第241—243页。
21. 卜·博班：《马切克维奇·普里戈沃拉与G·齐亚诺的会议》，载于《二十世纪历史汇编》，第六卷，第304—355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卷，第141页。
22. 齐亚诺：《日记（1939—1943）》，第281、284、295页。
23. 霍普特纳：《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第188页。
24. 霍普特纳：同上书，第205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卷，第140页。
25. 里斯蒂茨：《1941年的南斯拉夫的革命》，第62—65页；霍普特纳：《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第238—240页。
26. 霍普特纳：《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第238—240页注。

27. 霍普特纳：同上书，第 241—243 页。
28. 霍普特纳：同上书，第 242 页注释中所引用的 1941 年 3 月 26 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稿，第 21 期。
29. 《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1969 年 3 月 23 日。 362
30. 此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曾简要记述（引用某些正式文件）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前夕英国与南斯拉夫政府的官方接触。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卷，第 152—155 页。
31. 霍普特纳：《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第 272 页引用的德国文件 USMT, Doc, NG—3260。
32. 霍普特纳：同上书。
33. 《战争百科全书》（贝尔格莱德，1959 年出版）第一卷，第 189 页。提供的数字介于一万人和三万人之间。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卷第 153 页提供的数字为一万七千人。当时贝尔格莱德居民总数不详，而死难者人数也未加查点，故不可能提供确切数字。

第十章 从党的书记到军队统帅

1.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四卷，第 146—148 页。
2. 德国文件，H.
3. 齐亚诺：《日记（1939—1943）》，第二卷，第 87 页。
4. 德国文件，Pol, 3/H 81057。
5. 金斯科特所著《巴尔干出海口》对德国入侵时期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局势有着生动、翔实的描述。
6. 齐利亚克斯：《铁托》，第 122 页。
7. 约瑟普·科皮尼奇是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曾在莫斯科受训，在 1941 年和铁托一起经伊斯坦布尔回国。他由共产国际派回

南斯拉夫，负责韦莱比特在他的萨格勒布家中安装的秘密电台，此处电台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传递秘密情报，始终未被发现。一个女人扮作他的妻子和他一道回国，后来真的成了他的妻子，他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无线电报务员。他俩在铁托之前离开伊斯坦布尔，安全到达萨格勒布。见本书第九章，第179—180页。虽然那年夏天他和铁托发生争论，他仍继续在南斯拉夫工作。战后他在南斯拉夫最大的工厂之一担任经理这一要职。

8. 历史档案，第三卷，第383页；普伦察：《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和与苏联人民友好的年月》，第64—65页；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第82—83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1/9,3。
9.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42—143页。
10.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43页。
- 363 11. 切特尔德塞特·普尔尼：《南斯拉夫人民的复兴》，第67页；J·马尔扬诺维奇的文章，载于《共产主义者》，1951年1月号，第116页。
12. 《有关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的报道与文件汇编》（以下简称为《汇编》），第一卷，第一册，第12、15、17页；《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第一卷，第44页。
13. 马尔扬诺维奇的文章，载于《共产主义者》，1951年1月号，第117页；贝尔格莱德档案馆，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1/1。
14. 贝尔格莱德档案馆，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1/33,34。
15. B·多马泽托维奇：《黑山的革命》。
16. 戴迪耶尔：《随铁托度过大战期间（1941—1944），游击队日记》（以下简称为《日记》），第24页。
17. 戴迪耶尔：《日记》，第25页。

18. 戴迪耶尔：《日记》，第 25—26 页。党的档案中保存了一部分兰科维奇写给铁托的报告，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1/27。但是这类材料的大部分在任何国家都不会公开供人使用。战后，兰科维奇仍继续担任铁托的情报首脑多年。甚至在他正式放弃这一职务后，他对内部情况的渊博而详尽的知识使他在党内仍然握有特殊的权力。这也是 1966 年他被贬黜的原因。见本书第十六章，第 329 页。
19.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155—156 页。
20.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157 页。
21.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8 日）。
22. 头一批委员会于 1941 年 7 日在门的内哥罗建立，不久在斯洛文尼亚和门的内哥罗又建立起许多这样的委员会。见本书第十六章，第 329—331 页。
23.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8 日）。

第十一章 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

1. 劳伦斯：《不寻常的冒险》，第 96、98、104 页；《切特尼克：南斯拉夫切特尼克活动概况（1941 年 4 月—1944 年 7 月）》，第 22 页；《德拉戈留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审判记（速记记录和文件）》（以下简称为《审判》），第 109 页。
2. 麦克莱恩：《防寨》，第 145 页。对约瓦诺维奇的描述采自鲁塞姆：《没有打响的子弹》，第 192—193 页。
3. 劳伦斯：《不寻常的冒险》，第 230 页；鲁塞姆：《没有打响的子弹》，第 211 页。
4. 《审判》，第 131 页。
5. J·马尔扬诺维奇：《塞尔维亚的民族解放战争与复兴》（以下

简称为《复兴》),第220页;《汇编》,第一卷,第一册,第159页;J·马尔扬诺维奇:“1941年德国在塞尔维亚的占领制度”,见《1941—1945年南斯拉夫的占领制度》。

6. 斯威特—埃斯科特:《杂乱的面包师大街》,第40—43页;F·W·迪金:《设防的山峰》,第126—128页;又见关于德拉扎的书,第一卷和第二卷。切特尼克的支持者常说切特尼克武装力量在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以前已举起义旗。关于切特尼克和游击队两者谁先起义的争论尚无法解决;1941年夏,两种力量都很活跃;铁托的方针是积极抵抗,米哈伊洛维奇的方针则是不鼓励抵抗,但那时有许多切特尼克不顾他的禁令进行了战斗。见布兰科·拉策奇:《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悲剧》(巴黎版),第19页;福蒂奇:《我们打输了的战争》;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184页及其他各页。
7. 《审判》,第155页。
8.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192页。
9. J·马尔扬诺维奇:《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冲突特写》,载于《二十世纪历史汇编》,第一卷,贝尔格莱德,1959年,第185页。
10. 铁托曾对作者谈到(1968年10月8日)他建议把他的游击队交给米哈伊洛维奇统率。见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226—228页;铁托:《言论集》,第一卷,第188页。
11. 关于英国和米哈伊洛维奇之间关系的一段重要记述,见迪金:《设防的山峰》,第125—166页。本书对于1943年9月为止英国与铁托之间的关系也有精采的第一手报道。
12. 韦·米朱诺维奇对本书作者谈话(1966年8月)。
13. 见迪金:《设防的山峰》,第45—46页;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06—307页;齐利亚克斯:《铁托》,第150页;《审判》,第124页。

14. J·马特尔教授对本书作者的谈话（1969年6月18日）。
15.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04—307页；马尔扬诺维奇教授曾利用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方面的材料，包括英国政府各部大臣寄来的秘密和绝密信件、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复信的复制件以及与米哈伊洛维奇的来往信件。这些文件（英国方面的复制件和原件根据英国档案存档三十年的规定，于1971年公开）现存贝尔格莱德战史馆。这些文件是舒巴希奇于1944年参加临时政府时带回贝尔格莱德的。见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279、310页。
16.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05页。
17.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06页。
18. 《汇编》，第一卷，第一册，第159页。
19. 马尔扬诺维奇：《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冲突特写》，第205—207页；《复兴》，第315—316页；麦克莱恩：《防寨》，第151—153页；《切特尼克》，第9页；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61—164页。
20.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63页。
21.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15—318页。
22. 乔拉科维奇：《谈话》，第1卷，第203—205页；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23.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24. 《切特尼克》，第10页及脚注。
25.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56页及其他各页。
26.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52页。
27.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52页；《1941年初切特尼克与德国在迪弗齐村的谈判》，载于《哲学系文集》，第十卷第一册，1968年；J·马特尔：《第三帝国与欧洲》，第158页；马特尔

对本书作者的谈话（1969年6月18日）；《审判》，第27—29页。

28. 1968年6月18日作者访问马特尔教授时，他引用了米哈伊洛维奇的这句话。又见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54—355、389页；德国文件，H 310467。
29.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
30. 《审判》，第129—130页。
31.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88页。
32. 马尔扬诺维奇：《复兴》，第387—388页；麦克莱恩：《防寨》，第154—155页；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第十二章 孤军奋战

1. 乔拉科维奇：《赢得自由》，卡泽万耶英译本，第一卷（以下简称为《自由》），第205、227—230页。这本书是由著名的共产党和游击队领导人所著，对游击队在全国许多地区的生活和问题作了生动的描述。

《福查会议集》，盖尔斯科维奇出版：《关于发展人民政权的文件》，贝尔格莱德，1948年，第29—35页。

2. 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第46页。
3. 麦克莱恩：《防寨》，第161—167页所引F·卡瓦里：《Il Processo dell' Arcoviscovodi Zagabria》，第201—222页；戴迪耶尔：《日记》，第163—165、199—200页；鲁塞姆：《没有打响的子弹》，第55—56页。
4. 戴迪耶尔：《日记》，第208页。
5. 第二无产者旅成立于1942年3月1日，第三旅成立于3月5

- 日，第四、五旅成立于1942年6月10日。铁托：《政治报告》，第78—83页。
6. 铁托：《军事著作选集》，第240—244页。
 7. 皮雅杰：《关于南斯拉夫起义全靠苏联帮助的传奇》（以下简称《传奇》），第9页。铁托就游击队活动、切特尼克通敌行以及英国对切特尼克援助问题所作的详尽的答复，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文件，1942/31号以及其他号。
 8. 麦克莱恩：《防寨》，第172页；戴维森：《游击队的写照》，第30—31、231页；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第109—112页。
 9. 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第31—33页。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批准了一个兵士和一个游击队员结婚。见《游击队³⁶⁶外科医生》，第205—211页；琼斯：《同铁托的游击队员相处十二个月》，第75—77、81页。
 10.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第10页。游击队在1941年较长期地占领乌日策，1942年较长期地占领福查，从而得出战时对居民军事管理问题的经验，并且使铁托得以在仔细斟酌制定政策时身临现场。颁布了普遍适用的公告，称为《福查会议集》（见本章注1），并根据最高总司令部的命令制定了一整套管理民政的法律，后来由在亚伊策成立的军政府批准。盖尔斯科维奇：《关于发展人民政权的文件》；铁托：《政治报告》，第66—69页。
 11. 戴迪耶尔：《日记》，第10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2/77；铁托：《政治报告》，第68页。
 12.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2/41；在答复季米特洛夫（老爷子）无线电报中的询问时，铁托回答说，游击队只得使用由许多来源获得的五花八门的货币。在克罗地亚用库纳尔和意大利

里拉；在塞尔维亚用新第纳尔和德国马克；在波斯尼亚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钱币；在门的内哥罗用意大利里拉；在斯洛文尼亚用德国马克。他说，在波斯尼亚、门的内哥罗和桑贾克解放区内，许多地方不得不为饥民设立施食站。

13. 《汇编》，第九卷，第二册；乔拉科维奇：《自由》，第254页。
14.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2/101,118。
15. 皮雅杰：《传奇》，第6—9页；戴迪耶尔：《铁托传》，第17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1/3、31、42、55、56、61、71、80、84、95。
16.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2/31、38；皮雅杰：《传奇》，第9—12页。
17. 皮雅杰：《传奇》，第13—1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2/1、4、10、14、35、86，另见本书第十五章。
18.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2/109、115、147、155；皮雅杰：《传奇》，第13—21页。
19. 《切特尼克》书中到处可见。乌戈·察瓦莱罗：《最高统帅》，1948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通信和文件》，米兰，1946年出版。德国外交部文件（战争后期缴获并制成缩微胶卷）H 310528、H 310565、H 312145、H 312233、H 312739、H 312731等，仅是未公开发表的大量德国文件的少数例子。德意双方反游击队的作战命令是可以见到的，从而表明是哪些切特尼克部队曾用于这几次围攻中。
20. 皮雅杰：《传奇》，第18—19页。
21. 普伦察：《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和与苏联人民友好的年月》第158页所引南斯拉夫王国政府文件，见《战史档案》，第七卷，AVII,第173页，33/4-2。

22. 皮雅杰：《传奇》，第 20 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2/269、285、289、327、329。
23. 皮雅杰：《传奇》，第 20—21 页。

第十三章 同盟国承认

1. 迪金：《设防的山峰》，第 154 页以及其他等等。普伦察：《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和与苏联人民友好的年月》，第 124 页及脚注。
2. 我能得到关于艾瑟顿军事代表团的材料，得感谢 V·克里亚科维奇上校，他给我提供了贝尔格莱德战史档案馆保存的原始资料。1943 年，当英国军事代表团被派到克罗地亚时（见本书第十三章，第 253 页），铁托提醒克罗地亚司令部成员不要担心他们会搞出某些“挑衅”事件，如同去年发生的那样。1942 年，当艾瑟顿到达福查司令部时，铁托在给莫斯科的一份电报中通报了他的来临（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 1942/46），而且所有证据似乎都表明他极希望和军事代表团保持良好关系。艾瑟顿如能向他的上级报告游击队积极同德国人作战，显然对铁托有利。他如果活着，会对铁托有好处，他的神秘的死，只能对他不利。戴迪耶尔 1942 年 3 月 20 在日记中记载了艾瑟顿来到福查，还提到他在贝尔格莱德当了六年记者，并且同萨拉热窝的一位穆斯林姑娘结了婚（《日记》，第 78 页）。关于游击队应对谋杀艾瑟顿负责这样一种指责，是在 O·苏尔兹伯尔吉尔发表在 1943 年 2 月 4 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出来的。铁托从莫斯科打来的电报中知道了这篇文章。关于游击队的反应和关于事件的简短报道，见 1943 年 2 月 15 日《战斗报》以及《汇编》，第二卷，第二册，第 284 页。

3. 《切特尼克》，第 15 页及以下各页；迪金：《设防的山峰》，第 177 页及以下各页；普伦察：《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和与苏联人民友好的年月》，第 134 页。《战争百科全书》，第六卷，第 115 页。
4. 鲁塞姆：《没有打响的子弹》，第 49—50、107 页。据说由贝利上校在 1943 年 5 月 28 日向米哈伊洛维奇提出的建议，以及米哈伊洛维奇给伦敦南斯拉夫首相的答复，均引自克奈热维茨：《同盟国为何抛弃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南斯拉夫部队（附正式备忘录和文件）》，文件，10—13。
5. 克奈热维茨：同上书。这里说的米哈伊洛维奇的讲话是他在 1942 年 2 月 28 日在一个地方集会上发表的，内容非常强烈地反英。他说英国人为了适应自己的战略目的，促使切特尼克采取军事行动，但无论当时或以后都毫无给予援助之意；又说英国人要战斗到“最后一个塞尔维亚人”。当英国政府接到贝利上校（他当时在场）送来的有关这篇讲话的报告后提出抗议时，南斯拉夫政府否认米哈伊洛维奇曾经说过这种话，并说贝利上校不可能听懂塞尔维亚语。其实贝利上校的塞尔维亚语非常好。他在南斯拉夫住过好几年，在很多年以后他仍精通塞尔维亚语。毫无疑问，米哈伊洛维奇说过这番话。尽管说得过分，这些话确是表现出他对由于仍然无所作为而得不到更多援助的极端失望情绪（1969 年 6 月贝利上校告诉本书作者的）。
6. 克奈热维茨：同上书。在克奈热维茨的著作中全文引述了英国外交部文件和南斯拉夫政府给米哈伊洛维奇的答复和电文。迪金：《设防的山峰》，第 71 页。
7. 迪金：《设防的山峰》，第 52—53 页；琼斯：《同铁托的游击队员相处十二个月》，第 1 章和其他各处。

8. 《战争百科全书》，第六卷，第117—118页；《南斯拉夫人民的解放（1941—1945）》，第一卷，第362—368页；B·佩罗维奇：《在“魏斯”行动期间的战斗》，载于《战史公报》，第十八卷，1967年5—8月；费边·特尔戈：《第四和第五次攻势》，第5—13页，贝尔格莱德，1956年出版；《切特尼克》，第45—62页。
9. 戴迪耶尔：《日记》，第273页；皮雅杰：《传奇》，第21—22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31,49。
10.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73,74；麦克莱恩：《防寨》，第206页。
11. 特尔戈：《第四和第五次攻势》，第53—81页（英文摘要本，第84—86页）；《战争百科全书》，第六卷，第117—118页；迪昂莱吉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斯拉夫》，第116—121页。
12.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140,143,150,155。
13. 迪金：《设防的山峰》，第52页；麦克莱恩：《防寨》，第231页；戴迪耶尔：《日记》，第195页。
14. 斯莱塞：《中心的蓝色》，第594页。1968年8月和空军少将威廉·埃略特爵士的会见。博特勒（编）：《重要战略》，第78—79,196页。
15. 迪金：《设防的山峰》，第53页；麦克莱恩：《防寨》，第232页；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第135—13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161,178。
16. 麦克莱恩：《防寨》，第242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232,276；《审判》，第211—212页；迪金：《设防的山峰》，第114—116页。
17. 迪金：《设防的山峰》，第57页；《战争百科全书》，第六卷，第119页说游击队有三十万人以上。德国第二机械化部队司

- 令伦杜里奇将军报告说，游击队的残酷性和南斯拉夫的艰苦条件导致许多德国士兵要求调到俄国前线（伦杜里奇：《Gekämpft, gesiegt, geschlagen》，第210页）。
18.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70—478页；普伦察：《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和与苏联人民友好的年月》，第299—300页。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贝尔格莱德战史馆（JNA 31/1a）；博特勒（编）：《重要战略》，第10页。
 19. 我感谢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办事处美国常驻代表团的华特尔·罗伯茨，因为他提供了美国派到南斯拉夫的军事代表团的详细情况。亦见马特洛夫：《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1943—1944）》，第424—425页、510页；墨菲：《勇士中的外交家》，第187—188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五卷，第358页；霍华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中海战略》，第49—50页；《审判》，第212、255—258页。罗伯茨：《铁托、米哈伊洛维奇和同盟国（1941—1945）》，第207—208页。
 20. 迪昂莱吉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南斯拉夫》，第175页注所引的科莱克提伏·奥托洛夫：《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苏维埃武装力量》，第50—53页。
 21. 特种部队包括沙漠空军（由北非调至意大利）；司令部设在塔兰托的沿海空军；美国第十五航空队，在布林迪西的英国第三三四飞行大队以及海军统帅部所属特种部队和附属于特执局的英、美的情报机构。
 22. 斯莱塞：《中心的蓝色》，第21页。
 23. 迪昂莱吉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南斯拉夫》，第149页；铁托：《言论集》（1941—1961），第61—62页。
 24. 麦克莱恩：《防寨》，第234—235页。
 25. 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第83—84页。

26. 斯莱塞：《中心的蓝色》，第 597 页。
27. 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第 57 页。
28. 戴维森：《游击队写照》，第 165 页。

第十四章 向和平过渡

1. 博特勒：《重要战略》，第 10 页。
2. 皮雅杰：《传奇》，第 23—24 页。
3. 铁托曾在 10 月 12 日发电报向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报告反法西斯会议的准备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296），同月后期，又提出进一步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350）。他那份详述在亚伊策所作四点重要政治决策的报告则是在 11 月 30 日发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300）。这四点（1）不承认国王和王国政府；（2）不许可国王和王国政府重返南斯拉夫；（3）作为绝大多数人民的代表，亚伊策政府要求一个以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基础的共和国；（4）国内的唯一政权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反法西斯会议。³⁷⁰
4. 乔拉科维奇：《自由》，第 287—293 页；
5. 《民族解放运动》，第 34 页；《反法西斯会议的第一、二次会议—a》，萨格勒布，1963 年，第 206—208 页。其正式内容除包括上述四点外，还包括一条内容：反法西斯会议主席团将审查“流亡的王国政府以南斯拉夫名义签订的一切国际条约和承担的一切义务，以便最终决定予以废除或确认与批准；该政府今后再承担任何义务，反法西斯会议概不承认。
6.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207 页；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 14 页。
7.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 103 页。

8. 迟至1944年仍有必要采取此路线，可能旁证俄国人早些时候所说因交通运输困难而无法将援助送交游击队员一事。
9. 麦克莱恩：《防寨》，第251—252页；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第96—97页。
10.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4/29、60、62。
11. 麦克莱恩：《防寨》，第254页；斯莱塞：《中心的蓝色》，第604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4/65。
12.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18页；苏联同意给予这笔贷款，在韦莱比特上校临赴伦敦前一刻才空运到达。装钱的板条箱不得不急速卸下并用刺刀撬开，韦莱比特上校在他乘坐的飞机的引擎发动声中把纸币塞满了公事皮包，又匆匆忙忙地打了收条。
13.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70、71页。
14. 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1943/361。
15. 这封信现保存在库姆罗维茨铁托旧居纪念馆展出。
16. 菲·麦克莱恩爵士当时不在德尔瓦尔，但他在事件发生后陪同铁托从意大利去维斯岛。他对事件的叙述（从铁托和当时在一起的其他人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见他所著《防寨》，第256—261页。我要对当时在德尔瓦尔的维维恩·斯特里特上校、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等人表示感谢，此处的记述也取材于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回忆。亦见《战争百科全书》，第二卷，第630—633页；D·约瓦尼奇：《战争记事》（1954年6月）中的“德尔瓦尔军事行动”部分；S·奥迪奇：《战争日志》（1954年4月）中的“空降德尔瓦尔”部份；《解放战争》，第二卷，第96—104页；克利索德：《旋风》，第184—185页；斯莱塞：《中心的蓝色》，第596—599页；乔拉科维奇：《自由》，第362—373页。

17. 铁托：《政治报告》，第114—119页；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一个国王的继承权》，第160—166页，亦见K·圣帕夫洛维奇：《Glasnik SLKD 'Njegos'》（芝加哥，1962年6月）中的“摄政的组成”部分，第26—41页；福蒂奇：《我们打输了战争》，第183页及其后各页。
18. 克利索德：《旋风》，第190页。
19. 我对斯蒂芬·克利索德允许刊印这一关于铁托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会晤的记述表示感谢。克利索德先生参加了这次会晤，曾获得已故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允许，在《旋风》一书中发表他的记述。铁托总统也在1968年10月8日向我谈起过这次会晤。南斯拉夫当局似无这次会议的逐字记录文本，英国官方即使有记录文本，也尚未公开发表过。亦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第79—85页。
20. 麦克莱恩：《防寨》，第280页。
21.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18页；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22.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234—235页。
23.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第198、204页；埃房伯爵安东尼·艾登：《清算》，波士顿，1965年出版，第605页；科德尔·赫尔：《回忆录》，第二卷，第1451—1459页。亦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中的“1945年柏林会议”，华盛顿，1960年出版，第一卷，第66页，以及同一书中的“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第103—106页；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苏南争端》（以下简称为《争端》），第35页；铁托：《言论集》，第一卷，第276—280页；爱德华·卡德尔对本书作者的谈话（1965年8月）。
24. 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六卷，第 482—487 页。

25. 《亚历山大回忆录（1940—1945）》，第 152 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六卷，第 482 页。

第十五章 国际政治家

1.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8 日）。
2.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260 页。
3.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 119 页。
4. 德热拉斯：同上书，第 103—106 页。
5. 铁托：《政治报告》，第 129 页。
6. 铁托：《政治报告》，第 128—129 页；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8 日）。
7.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8 日）；1951 年德热拉斯接见作者时的谈话，描述了在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苏联与各卫星国代表之间的尴尬气氛。
8.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 81—86 页；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争端》，第 13—20 页。
9. 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第 133—137 页。
S·斯肯迪（编）：《阿尔巴尼亚》，第 230 页；戴迪耶尔：《南阿关系（1938—1948）》，第 69—70 页。
10. 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谈》，第 130 页。
11. 爱德华·卡德尔对本书作者的谈话（1965 年 8 月）。《文件汇编》，第二卷，第十册，第 361 页；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第 143—148 页关于马其顿问题的详细探讨。
12. 莫沙·皮雅杰发表于 1949 年 12 月 29 日《战斗报》的文章；德热拉斯：《与斯大林的会议》，第 157—162 页；皇家国际事

- 务研究所：《国际事务文件集(1947—1948)》，第290—292页。
13. 同上书。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莫斯科：《世界政治中的克里姆林宫》，第231页。
 14. 卡德尔对本书作者的谈话(1965年8月)。
 15.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争端》，《南共中央与苏共(布)中央的来往信件》，贝尔格莱德，1948年出版；《南共中央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就南共情况所作决议的声明》，贝尔格莱德，1948年出版。
 16. 《争端》，第9—17页；亦见乌拉姆：《铁托主义与共产党情报局》。
 17. 《争端》，第18页及其后各页。
 18. 《争端》，第27页。
 19. 《争端》，第31—52页。
 20.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21. 坎贝尔：《铁托的独立道路》，第22—27页、第45、46页，英美对南援助的总数，因计入的援助项目不同而各有异。我们引用的数字系根据英、美官方给我提供的统计资料。
 22. 铁托：《言论集》，第229页。引文出自1958年4月22日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南共联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3. 据1950年南斯拉夫官方资料，希腊内战期间，南斯拉夫收容了一万名希腊难童及他们之中九千人的父母。
 24. 在这次访问中，奥地利政府曾提出授予铁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奥帝国勋章，铁托以此举与时代不合而婉言辞谢了。见本书第349页，第二章注9。
 25. 卡德尔对本书作者的谈话(1965年8月)。亦见奥蒂：《铁托的国际关系》，载于武锡尼奇(编)：《当代南斯拉夫》。
 26. 铁托：《演讲和论文选集》，第229页。

27. 坎贝尼：《铁托的独立通路》，第72—73页。
28. 奥蒂：《铁托的国际关系》，载于《当代南斯拉夫》。
29. 铁托接见路易斯·达尔马斯时的谈话，载于1949年12月28日《战斗报》。
30. 铁托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51年2月）。

第十六章 国家元首

1. 铁托：《政治报告》，第119页。
2. D·沃里纳：《南斯拉夫的城市思想家和农民政策（1918—1959）》，载于《南斯拉夫与南欧评论》，第三十八卷，第90期，1959年12月，第67页。
3. 铁托：《政治报告》，第121—122页。
4.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六个共和国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后者包括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梅托希亚（通常称为科斯梅特）自治区。这已写入1949年的宪法，见《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宪法》，贝尔格莱德，1947年，第39—40页。
5. 散见《审判》一书各处；戴迪耶尔：《日记》，第253—256页。
6. 铁托在1969年3月11日南共联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载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革命斗争的五十年》。党员数字也引自同一来源，第32页。
7. 有关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事务，即使在战后也仍然十分保密，政治局的成员未曾发表过。
8. 德热拉斯：《没有正义的国度》，第25页。全书充满了关于

德热拉斯及其同时代的门的内哥罗人所继承的可怕的仇杀私斗最动人的叙述。

9. 即使在离开内务部职务之后，他还继续保持对情报资料 and 人员的控制，这就是他 1966 年被降职的主要原因。参见本书第 329—330 页。
10.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的官方数字是四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11. 《五年计划》，贝尔格莱德，1947 年。我感激已故的鲁道夫·比恰尼奇教授使我获得有关五年计划结果的大量重要资料。见比恰尼奇：《中央统一规划下的经济发展：南斯拉夫典型研究》，载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六卷，1957 年 10 月。
12.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286 页。 374
13.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 年 10 月 8 日）。
14. 戴迪耶尔：《铁托传》，第 346 页。
15. 铁托：《政治报告》。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第 138 页提供某些共和国内开除党员的比例，提出在门的内哥罗为六比一。
16. 《白皮书：关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活动》，贝尔格莱德，1951 年。又见《对特雷科·科斯托夫及其一伙的审讯》，索非亚，1949 年。拉伊克、科斯托夫、克莱门蒂斯及其他许多人，因曾经充当亲南斯拉夫的间谍罪名而被处决，斯大林死后又由他们本国的共产党政府“恢复名誉”。
17. 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第 138 页及脚注。作者指出，在与共产党情报局争执时期门的内哥罗开除的党员比例很高，达六比一，而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则为二十三比一，克罗地亚为二十比一，马其顿为三十一比一。

18. 参见比恰尼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共和国的农业经济收入（1953—1955）》，载于《经济评论》，1956年，第8、9期。
19. 铁托：《工人管理工厂》，贝尔格莱德，1950年出版；《南斯拉夫新的根本大法》，贝尔格莱德，1953年出版，第53—54页；《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贝尔格莱德，1963年出版，第13—18页；《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ILO，日内瓦，1962年出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9年出版，第143—193页。
20. 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第227—260页有关经济及民族问题的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在1969年3月11日至15日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南共联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济委员会上进行了公开的、详细的讨论。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20—136，137—193页，并散见全书各处。
21. 德热拉斯：《新阶级》，1957年出版。
22. 见尼尔：《铁托主义在行动中：南斯拉夫的改革》。
23. 关于军队调动的报告是危机发生时未曾得到证实的一种说法。
24. 《共产主义者》，1966年7月7日和1966年9月22日；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第257—258页。
25.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46页，并散见全书各处。

第十七章 铁托其人

1. 1952年铁托同埃莉诺·罗斯福的谈话。

2.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3. 1952年铁托同埃莉诺·罗斯福的谈话。
4. 1951年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
5.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6.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7. 铁托接见本书作者时的谈话(1968年10月8日)。

参 考 书 目

贝尔格莱德档案馆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档案。

包括中央委员会文件（1919—1945年）以及与共产国际的信件（KI, 1919—1941, CKKI, 1941—1943, 以及OK—KPJ）。

萨格勒布档案馆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克罗地亚分支的档案（主要是传单和标语）。

贝尔格莱德战史馆档案（特别是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的文件和某些德国文件）。

伦敦英国外交部研究司所藏的未发表的德国文件汇编。其中特别是 Lösch 文件, H310528—H312739, 6136/E458406—458411。

已出版的资料

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档案，第一至七卷。贝尔格莱德，1949—1958年。

南斯拉夫共产党 Zgodovinski 档案，第一至十一卷。贝尔格莱德，1949—1958年。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1948年7月18日至21日。贝尔格莱德，1949年。

南斯拉夫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1952年11月2日至7日。贝尔格莱德，1953年。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

1958年。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1964年。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1969年。

有关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的报道与文件汇编，第一至十四卷。

贝尔格莱德，1950—1960年（共一百三十卷）。

德国外交文件，第O辑，1933—1937年；第D辑，1936/1937—1940年。

苏联外交政策文件，J·德格拉斯(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

国际事务文件，惠勒·本内特(编)，伦敦，1929年版。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二辑，1929—1938年；第三辑，1938—1939年。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

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华盛顿，1961年出版。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F·埃普斯坦(编)。(译成德文的苏联会议纪录)。科隆，1968年出版。

其 他 著 作

路易·亚当米奇：《山鹰和草根》，纽约达德书店，1952年出版。

A·R·L·G·亚历山大(陆军元帅、第一伯爵)：《亚历山大回忆录(1940—1945年)》，J·诺思(编)，伦敦卡塞尔书店，1962年出版。

J·文默礼：《山鹰之子》，伦敦麦克米伦书店，1948年出版。

H·F·阿姆斯特朗：《铁托和巨人》，伦敦高兰茨书店，1951年

出版。

菲利斯·奥蒂：《南斯拉夫》，载于R·B·贝茨（编）的《1945—1948年的中欧与东南欧》，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1950年出版。《建设新南斯拉夫》，费边社小册子，伦敦，1954年出版。《南斯拉夫》，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书店，1965年出版。《南斯拉夫》，载于D·沃里纳（编）的《发展中社会之间的对比》，伦敦阿恩隆出版社，1965年出版。《铁托的国际关系》，载于W·武锡尼奇（编）的《当代南斯拉夫》，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69年出版。

I·阿瓦库莫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史》，阿伯丁大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

埃房伯爵安东尼·艾登：《回忆录》（第二卷，〈面对独裁者〉），伦敦卡塞尔书店，1962年出版。《回忆录》（第三卷，〈清算〉），卡塞尔书店，1965年出版。

H·贝莱恩：《南斯拉夫的诞生》（两卷集），伦敦帕森斯书店，1922年出版。

伊丽莎白·巴克：《马其顿在巴尔干政治中的地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1950年出版。

M·贝基奇（编）：《铁托与当代纪实》，萨格勒布，1965年出版。

M·贝洛夫：《苏俄的外交政策（1929—1936年）》，伦敦，1962年出版。

R·比恰尼奇：《我国人民是怎样生活的》，萨格勒布，1936年出版。《中央统一规划下的经济发展：南斯拉夫典型研究》，载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六卷第一期，1957年10月。《南斯拉夫大小经济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1954—1957年）》，载于G·格罗斯曼（编）的《价值与计划：东欧的经济计算与经济组织》，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60年出版。《1848年的农

- 奴解放》和《对“扎德鲁加”的态度》，载于沃里纳(编)的《发展中社会之间的对比》，伦敦阿思隆出版社1965年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影响》(为当代史会议撰写的论文)，1967年10月。
- G·比莱恩金：《铁托》，伦敦威廉和诺尔格特书店，1949年出版。
- L·博班：《马切克—茨维特科维奇协议》，萨格勒布，1965年出版。
- O·博布劳斯基：《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巴黎，1956年出版。
- F·博肯诺：《共产国际》，伦敦费伯—费伯书店，1938年出版。
《欧洲共产主义》，费伯—费伯书店，1953年出版。
- H·N·布雷斯福德：《马其顿各民族及其前途》，伦敦梅体因书店，1906年出版。
- R·M·布拉希奇：《南斯拉夫的土地改革与土地占有(1919—1953年)》，自由欧洲书店，纽约，1954年出版。
- Z·K·布尔泽增斯基：《苏联集团：团结与冲突》(修订本)，纽约普雷格书店，1963年出版；伦敦帕尔莫尔书店，1963年出版。
- A·布洛克：《希特勒：对暴政的研究》，纽约哈珀—罗书店，1962年出版；伦敦奥德哈姆斯书店，1963年出版。
- A·伯迈斯特：《共产国际的解散及其后遗证：经验与评论(1937—1947年)》，纽约，1955年出版。
- J·R·M·博特勒(编)：《重要战略》，第五、六卷，女王陛下文书局，伦敦，1956年出版。
- R·伯恩斯(编)：《南斯拉夫》，纽约和伦敦，1957年出版。
- J·O·坎贝尔：《铁托的独立道路：世界政治中的美国和南斯拉夫》，纽约哈珀—罗书店，1967年出版。
- B·H·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年)》，伦敦麦克米伦书店，1939年第一版；1946年第二版。《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

1923年)》，第一至三卷。伦敦麦克米伦书店，1951年、1953年出版。

D·P·卡特尔：《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切特尼克》(盟军司令部手册)，1944年出版。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六卷集)，伦敦卡塞尔书店，1948—1955年出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五卷《紧缩包围圈》和第六卷《胜利与悲剧》。

G·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H·古布森(编)，纽约道布尔戴书店，1946年出版；伦敦海涅曼书店，1947年出版。《日记(1939年)》，A·梅厄译，伦敦梅休因书店，1952年出版。

379 A·西利加：《俄国之谜》，伦敦劳特勒吉和基根·保罗书店，1940年出版。

斯蒂芬·克利索德：《旋风：铁托元帅取得政权过程记》，伦敦克雷塞特出版社，1949年出版。

斯·克利索德主编：《南斯拉夫简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

罗·乔拉科维奇：《赢得自由》，A·布朗译，伦敦林肯·普拉格书店，1962年出版。《关于某一时期的谈话》第一卷，《赢得自由》即由此书译出)萨格勒布，1964年出版；第二卷，萨拉热窝，1968年出版。

R·康克斯特：《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伦敦麦克米伦书店，1968年出版。

F·乔罗维奇：《南斯拉夫史》，萨格勒布，1933年出版。

Z·茨尔尼亚：《克罗地亚文化史》，萨格勒布，1962年出版。

E·克兰克肖：《没有斯大林的俄国：形成中的模式》，伦敦迈克尔·约瑟夫书店，1966年出版。《赫鲁晓夫》，伦敦科林斯书

- 店，1966年出版。《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伦敦龙门书店，1963年出版。
- L·达尔马斯：《与莫斯科分裂后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巴黎，1950年出版。
- 佩罗·达米扬诺维奇：《铁托在帕尔地耶林》，贝尔格莱德，1968年出版。
- B·戴维森：《游击队的写照》，伦敦贝德福德图书公司，1946年出版。
- F·W·迪金：《英国人和南斯拉夫人(1941—1945年)》，刊于《南斯拉夫历史汇编》，第二期，1963年出版。《残暴的友谊》，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公司，1962年出版。《设防的山峰》，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 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生平传略》，贝尔格莱德，1953年出版。《铁托自叙传》（上述书的节译本），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公司，1953年出版。《日记》（三卷本），贝尔格莱德，1945, 1946, 1950年出版。《随铁托度过大战期间(1941—1944年)》（上述《日记》的节译本），伦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书店，1951年出版。《可爱的土地》，伦敦麦吉本—基书店，1961年出版。《到萨拉热窝的道路》，伦敦麦吉本—基书店，1967年出版。《斯大林的最后一战》，伦敦，1969年出版。《南阿关系(1938—1949年)》，贝尔格莱德，1951年出版。
- I·多伊彻：《斯大林》，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出版；企鹅图书公司，1966年出版。
- 密洛瓦·德热拉斯：《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纽约普雷格书店，1957年出版；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书店，1957年出版。《与斯大林的会谈》，伦敦哈特—戴维斯书店，1962年出版。³⁸⁰《没有正义的国度》，伦敦梅休因书店，1958年出版。

- A·迪昂莱吉奇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67年出版。
- J·宗诺维奇：《从远东和北非与德拉扎·米哈伊维奇联系》，载于《Glasnik SIKD 'Njegos'》，芝加哥，1958年7月。
- J·乔治耶维奇：《南斯拉夫的政权》，载于《政府与反对派》第二卷第二期，1967年1月。
- M·德拉奇科维奇和布·拉策奇（编）：《共产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纽约普雷格书店，1966年出版。
- A·德拉尼奇：《铁托的理想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新不伦瑞克，1954年出版。
- V·圣·厄利克：《变迁中的家族：三百个斯拉夫村庄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
- S·费希尔—加拉蒂（编）：《六十年代的东欧》，纽约普雷格书店，1953年出版。
- J·O·费希尔：《南斯拉夫，一个多民族国家》，旧金山香德勒出版社，1966年。
- W·M·费斯克和A·Z·鲁宾斯坦：《南斯拉夫宪法法庭》，载于《东欧》，纽约，1966年。
- O·福蒂奇：《我们打输了的战争：南斯拉夫的悲剧与西方的失败》，纽约瓦伊金书店，1948年出版。
- J·弗兰克特：《共产主义与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载于《东欧事务学报》，第十五卷，1955年4月。
- I·盖尔斯科维奇（编）：《关于发展人民政权的文件》，贝尔格莱德，1948年出版。《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贝尔格莱德，1959年出版。
- E·霍尔珀林：《胜利的异教徒：铁托反抗斯大林的斗争》，伦敦海涅曼书店，1958年出版。

- J·M·霍尔珀林：《塞尔维亚一村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 H·霍奇金森：《铁托的西方和东方》，伦敦高兰克茨书店，1952年出版。
- 乔治·霍夫曼和弗·华·尼尔：《铁托的南斯拉夫》，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
- J·B·霍普特纳：《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 J·霍尔瓦特：《斗争策略》，萨格勒布，1936年出版。
- M·霍华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中海战略》，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公司，1968年出版。
-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战争年表（1941—1945年）》，贝尔格莱德³⁸¹德，1964年出版。
- O·赫利：《回忆录》（两卷本），纽约麦克米伦书店，1948年出版；伦敦霍顿书店，1948年出版。
- G·伊奥内斯库：《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公司，1967年出版。
- G·D·杰克逊：《共产国际与东欧农民（1919—193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
- O·耶拉维奇：《十九世纪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及其与克罗地亚联盟的问题》，载于《巴尔干研究》，第五卷，1962年。
- J·约里：《第二国际》，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公司，1953年出版。
- W·琼斯：《同铁托的游击队员相处的十二个月》，贝德福德图书公司，贝德福德，1946年出版。
- 爱德华·卡德尔：《全集》（1953—1969年），贝尔格莱德，1969年出版。

- R·克纳(编):《南斯拉夫》,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出版。
- P·金斯科特:《巴尔干出海口》,伦敦布莱斯书店,1942年出版。
- V·克里亚科维奇:《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与南斯拉夫政治联盟》,见于《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的意义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萨格勒布,1963年。
- Z·I·克奈热维茨:《同盟国为何抛弃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南斯拉夫部队(附正式备忘录和文件)》,华盛顿,1945年出版。
- E·科弗斯:《马其顿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萨洛尼卡,1959年出版。《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载于《巴尔干研究》,第三卷,1962年。
- I·科利舍夫斯基:《马其顿民族问题》,贝尔格莱德,1959年出版。
- I·科尔贝伊:《铁托的共产主义》,布朗书店,丹佛,1951年出版。
- 《指挥部战时日志公报》,第二卷,法兰克福,1963年出版。
- H·昆里奇:《1939—1945年间的欧洲游击战》,柏林迪亚兹书店,1965年出版。
- O·劳伦斯:《不寻常的冒险》,伦敦费伯书店,1947年出版。
- B·拉日奇:《铁托与南斯拉夫革命》,巴黎,1957年出版。
- I·赖德尔:《巴黎和会上的南斯拉夫》,耶鲁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 P·莱弗库恩:《德国军事情报》,R·H·斯蒂文斯和O·菲茨吉本译,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公司,1954年出版。
- G·A·麦卡特尼:《哈布斯堡帝国(1790—1918年)》,伦敦魏登费尔德和尼科森公司,1969年出版。

- 弗·马切克：《为自由而斗争》，E·加集和S·加集译，纽约斯佩³⁸²勒书店，1957年出版。
- K·E·麦肯齐：《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1928—194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 菲·麦克莱恩：《东方的通道》，伦敦乔纳森·凯普书店，1949年出版。《争夺中的防寨》，伦敦凯普书店，1957年出版。《铁托总统访问记》，载于1964年5月12日《战斗报》。
- O·P·麦克维卡：《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纽约圣马丁斯书店，1957年出版；伦敦麦克米伦书店，1957年出版。
- J·马尔扬诺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史纪要（1919—1941年）》，贝尔格莱德，1956年出版。《塞尔维亚的民族解放战争与复兴（1941年）》，贝尔格莱德，1963年出版。《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冲突特写（1941年）》，载于《二十世纪历史汇编》，第一卷，1969年。
- W·马克特（编）：《南斯拉夫》，科隆—格拉茨，1954年出版。
- R·H·马卡姆：《铁托的帝国共产主义》，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查佩尔希尔，1947年出版。
- B·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汉堡，1922年出版。
- D·马丁：《被出卖的同盟国：未经审查的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之间的故事》，纽约普伦蒂斯—霍尔书店，1946年出版；伦敦W·H·艾伦书店，1946年出版。
- M·马特洛夫：《联合作战的战略计划（1943—1944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59年出版。
- P·E·莫斯利：《世界政治中的克里姆林宫》，纽约文特吉书店，1960年出版。《农民家族：巴尔干各国的“扎德鲁加”（“公社”性质的联合家族）及其近期的演变》，载于O·韦尔（编）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历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40年出版；

- 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出版。
- R·D·墨菲：《勇士中的外交家》，纽约道布尔戴书店，1964年出版。
-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盟军司令部手册），1943年出版。
- F·W·尼尔：《铁托主义在行动中：1848年后南斯拉夫的改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南斯拉夫共产党》，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一〇一卷，1957年3月。
- B·纽曼：《铁托的南斯拉夫》，伦敦黑尔书店，1952年出版。
- A·诺瓦克：《我为铁托服务过》，布拉格，1951年出版。
- V·诺瓦克：《Magnum Krimon》萨格勒布，1948年出版。
-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1941—1945年）》，第二卷，贝尔格莱德，1963、1965年出版。
- 383 P·D·奥斯托维茨：《南斯拉夫真相》，纽约罗伊出版社，1952年出版。
- W·帕德夫：《铁托元帅》，伦敦马勒书店，1944年出版。
- E·帕蒂：《红衣主教阿洛伊亚乌斯·斯特皮纳茨案件》，布鲁斯出版社，密尔沃基，1952年出版。
- I·帕里斯：《卫星国家克罗地亚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1941—1945年）》，芝加哥，无出版年代。
- K·圣帕夫洛维奇：《摄政的组成》，载于《Glasnik, SIKD'Njegos'》，芝加哥，1962年6月。
- 彼得二世（南斯拉夫国王）：《一个国王的继承权》，伦敦卡塞尔书店，1955年出版。
- 莫沙·皮雅杰：《全集》，萨格勒布，1964年出版。《关于南斯拉夫起义全靠苏联帮助的传奇》，伦敦，1950年出版。
- D·普伦察：《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和与苏联人民友好的年月》，贝尔格莱德，1962年出版。

M·波波维奇:《工人自己管理与计划的制度》,贝尔格莱德,1962年出版。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史纲》,贝尔格莱德,1963年出版。

S·普里比谢维奇:《亚力山大国王的独裁》,巴黎,1929年出版。

M·拉杜洛维奇:《铁托的共和国》,冷港出版社,英国罗萨姆,1951年出版。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言论选集》(1941—1945年),贝尔格莱德,1951年出版。

L·伦杜里奇:《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回顾》,海得尔堡,1952年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评论》,A·克里格论共产国际的文章,刊于第六十八期,1967年;K·梅尼非洛—丁契奇论1941—1942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国家的文章,刊于第七十四期,1969年。

D·N·里斯蒂茨:《1941年的南斯拉夫革命》,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66年出版。

W·R·罗伯茨:《铁托、米哈伊洛维奇和同盟国(1941—1945年)》,新泽西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

L·罗杰斯:《游击队外科医生》,伦敦柯林斯书店,1957年出版。

J·鲁塞姆:《没有打响的子弹:驻米哈伊洛维奇处的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记事(1943—1944年)》,伦敦查托和温达斯公司,1946年出版。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事务文件集》,伦敦,1932—1961年出版。《苏南争端》,伦敦,1948年出版。

H·圣·G·桑德斯:《仗已打赢》,载于R·理查兹和桑德斯合著的《皇家空军(1939—1945年)》,第三卷,女王陛下文书局,伦敦,1954年出版。

H·塞顿—沃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1918—1941年)》,

-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45年出版。《东欧的革命》, 伦敦梅休因书店, 1951年出版; 1957年第三版。《共产主义革命的模式》, 伦敦梅休因书店, 1955年出版, 1961年修订版。
- 罗·威·塞顿—沃森:《民族性在巴尔干各国的兴起》, 伦敦康斯特布尔书店, 1917年出版。
- P·S·肖普:《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68年出版。
- H·G·斯基林:《共产主义东欧的行政》, 纽约克劳韦尔书店, 1966年出版。
- J·斯莱塞:《中心的蓝色》, 伦敦卡塞尔书店, 1956年出版。
- T·斯塔诺耶维奇和D·马尔科维奇(编):《铁托的生活与欢乐》, 萨格勒布, 1962年出版。
- E·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 雅尔塔会议》, 伦敦道布尔戴书店, 1949年出版。
- B·斯威特—埃斯科特:《杂乱的面包师大街》, 伦敦梅休因书店, 1965年出版。
- G·斯扎博:《扎果烈山后之乡》, 萨格勒布, 无出版年代。《旧萨格勒布》, 萨格勒布, 无出版年代。
- A·J·P·泰勒:《哈布斯堡君主国》, 伦敦哈密什·汉密尔顿书店, 1948年修订版。《第二次世界大战》, 伦敦哈密什—汉密尔顿书店, 1963年出版。
- H·坦尼森:《铁托拉开了帷幕》, 伦敦赖德书店, 1955年出版。
-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贝尔格莱德, 1948年出版。《工人管理工厂》, 贝尔格莱德, 1950年出版。《言论集》, 第一至十六卷, 萨格勒布, 1959—1969年出版。《演讲和论文选集》(上述书的英译本), 萨格勒布, 1963年出版。《军事著作选集》, 贝尔格莱德, 1966年出版。

-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革命斗争的五十年》(在1969年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共联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贝尔格莱德, 1969年出版。
- P·托马茨(编):《德拉戈留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审判记》, 贝尔格莱德, 1946年出版。
- J·托马塞维奇:《南斯拉夫的农民、政治与经济变化》,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7年出版。
- II·特雷弗—罗珀:《希特勒的末日》, 伦敦麦克米伦书店, 1966年修订版。
- 《德拉戈留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审判记(速记记录和文件)》, 贝尔格莱德, 1946年出版。
- D·特劳顿:《南斯拉夫农民的复兴》, 伦敦劳特勒奇和基根·保罗³⁸⁵出版社, 1952年出版。
- A·B·乌拉姆:《铁托主义与共产国际情报局》,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2年出版。
-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1943年)》, 华盛顿, 1961年出版。
- 维尔科·温特哈特:《约瑟普·布罗兹的一生》, 贝尔格莱德, 1968年出版(见《布罗兹》一书的注释)。
- 《战争百科全书》, 第一至九卷, 贝尔格莱德, 1958—1967年出版。
- W·武锡尼奇(编):《当代南斯拉夫》,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69年出版。
- 亨·梅·威尔逊(第一男爵):《海外八年》, 伦敦哈钦森书店, 1950年出版。
- E·威斯克曼:《独裁者的世纪》, 伦敦, 1960年出版。
- K·齐利亚克斯:《铁托》, 伦敦迈克尔·约瑟夫书店, 1952年出版。

索 引

条目后所附为原文页码，参见正文外切口。

A

- Adriatic islands 亚德里亚海沿海岛屿, 63, 200
- Africa 非洲 305
-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104, 161, 174, 188, 200, 292, 293, 322;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 242, 256; Alanian Partisans, 阿尔巴尼亚游击队, 292
- Alexander, General 亚历山大将军, 280, 286, 287, 340
- Alexander, King (Karajordjević) 亚历山大国王(卡拉乔治维奇), 80, 103—105, 115, 116, 134, 174, 185
- Alexander, king (Obrenović) 亚历山大国王(奥布伦诺维奇), 199
- Allies (First world war) 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 57, 58, 64
- Allies (Second world war) 同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aid and recognition for Tito from 对铁托的援助与承认, 235, 250, possibility of Balkan invasion by 进攻巴尔干的可能性, 252, 259, 269, Allied mission to Tito 派驻铁托总部的代表团, 257, 259, 261—266
- Amery, Leopold 利奥波德·艾默礼, 192, 224
- Antić Vula 武拉·安蒂奇, 209
- Anti-Fascist Council(AVNOJ) 反法西斯会议(AVNOJ), 248, 270, 271, 279, 314
- Anti-Fascist Youth Movement 反法西斯青年运动, 275
- Archangel 阿尔汉格尔, 57, 176
- Ardatov 阿达托夫, 53

①

Argentina 阿根廷, 306
Armstrong, Brigadier 阿姆斯特朗旅长, 259, 262
Asia 亚洲 305
Atherton, Major Terence 特伦斯·艾瑟顿少校, 250-251
Attlee 艾德礼, 182
Augustinčić 奥古斯廷契奇, 201
Austria 奥地利, 23, 31, 32, 47, 60, 63, 64, 104, 139, declares war on Serbia 对塞尔维亚宣战 51, 52; invaded by Hitler 希特勒进攻, 152, 174; as Allied air base 被用为盟军空军基地, 289; Tito's state visit to 铁托对奥地利国事访问, 300
Austro-Hungarian army 奥匈军队, 40, 50, 51, 61, 74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奥匈帝国, 23, 31, 32, 46, 47, 49, 53, 54, 60, 61, 65, 71
AVNOJ 参见反法西斯会议

B

Babović, Oana 卡那、巴波维

奇, 122
Bačka 巴奇卡, 200
Bader, General 巴德尔将军, 217
Bailey, Colonel S. W. 贝利上校, 251, 259
Bakar 巴卡尔, 77, 78
Bakarić, Vladimir 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 144, 171, 314
Bakić, Mitar 米塔尔·巴基奇, 226
Baku 巴库, 57
Balkan Pact 巴尔干条约, 300
Balkans 巴尔干诸国, 31, 32, Churchill's policy for 丘吉尔的巴尔干政策, 261, 281, 286, 287, 300
Banat 巴纳特, 200, 285
Banja castle 斑亚堡, 64
Banjaluka 班亚卢卡, 277
Baranja 巴兰尼亚 200
Bari 巴里 263, 265, 272, 273, 276, 278
BBO 英国广播公司 192, 245
Begović, Vlado 沃拉伊科、贝戈维奇 121
Bela Crkva 贝拉·兹尔克娃 207

- Belgium 比利时 51, 189
-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52, 67, 76, 77, 152;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共产党活动 82, 85, 183; anti-war demonstrations in 反战示威 186; bombed by Germans 遭德国轰炸 194, 195, 201; as "German fortress" "德国堡垒" 200; as Tito's headquarters 铁托总部 201, 207, 209, 210, 212; Soviet and Partisan troops advance on 苏军和游击队向贝尔格莱德挺进 285; as headquarters of Cominform 共产党情报局总部 291
- Belgrade University 贝尔格莱德大学 166, 167, 339
- Belgrade-Zagreb railway 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 43, 206
- Belousova, Pelagea (Polka), See Broz 佩拉吉娅·贝露索娃(波尔卡), 见布罗兹
- Benson, Lieutenant Melvin O. 梅尔文·奥·本森上尉 262
- Berchtesgaden 贝希特斯加登 190
- Berlin 柏林 175, 284; Treaty of 柏林条约 32
- Bernstein, Edward 爱德华·伯恩斯坦 125
-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177
- Bevan, Aneurin 安奈林·比万 341
- Bihać 比哈奇 247, 248, 253, 269
- Bileca 比累恰 185
- Bismark 俾斯麦 31
- Bjelovar 别洛瓦尔 73, 74
- Black Hand 黑手党 51, 199
- Black Sea 黑海 32, 199
- Blagojeva, Stella 斯特拉·布拉哥耶娃 160
- Blagojević Radovan 拉多凡·布拉戈耶维奇 251
- Bležičko, Ana, See Broz 安娜·布拉日奇科, 见布罗兹
- Bled 布莱德 292
- Blum, Leo 利奥·布卢姆 139
- Boguljubojsko 博哥柳博斯克 59
- Bohemia 波希米亚 49
- Böhme, General 伯梅将军 225
- Bolsheviks, Bolshevik revo-

- lution 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革命 54—60, 66—69, 74, 81, 97, 125, 288, 309, 337
- Bosanski, Petrovac 佩特罗瓦茨·博桑斯基 249
- Bosnia 波斯尼亚 51, 106, 107, 200, 208, 229, 235, 236
- Bosnia-Herzegovina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32, 62, 67, 103, 185, 208
- Boughey, Major Peter 彼得·博吉少校 247
- Brajici 布拉伊奇 226, 228
- Brest-Litovsk, Treaty of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57
- Brezhnev 勃列日涅夫 302, 307
- Brezović 勃列佐维奇 109
- Bričelj, Jozip 约瑟普·布里莱伊 113
- Brioni 布里俄尼 303, 305, 329, 341
- Brno 布尔诺 116
- Browder, Earl 埃尔·白劳德 122, 124
- Broz, Ana (née Blažičko) 安娜(布拉日奇科)布罗兹 33
- Broz, Dragutin 德腊古廷·布罗兹 101
- Broz family, origins of 布罗兹家族, 布罗兹家族起源 28—30
- Broz, Franjo 弗兰约·布罗兹 22, 30, 32—34, 40, 60
- Broz, Hluka and Zlatica 赫林卡与兹拉蒂察·布罗兹 73, 74
- Broz, Josip, See Tito 约瑟普·布罗兹, 见铁托
- Broz, Jovanka (née Budisavljević) 约万卡·布罗兹(布迪萨夫列维奇) 339, 340
- Broz, Staff sergeant Jurica 朱里察·布罗兹上士 40, 41
- Broz, Marija (née Javeršek) 玛丽亚·布罗兹(亚韦尔舍克) 22, 33, 34, 60
- Broz, Marti (brother) 马丁·布罗兹(弟兄) 40, 49—50
- Broz, Martin (grandfather) 马丁·布罗兹(祖父) 30, 33
- Broz, Pelega (Polka) 佩拉吉亚(波尔卡)布罗兹 58, 59—60, 65, 73, 74, 76,

101, 120, 339
Broz, Stjepan 斯捷潘·布罗兹 44
Broz, Zarko 扎尔科·布罗兹 73, 76, 101, 157, 280, 340
Brusilov, General 布鲁西洛夫将军 53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296
Budapest 布达佩斯 24, 51, 66
Budva 布德瓦 141
Bukharin 布哈林 107, 126
Bukovina 布科维那 177
Bulganin N. A. 尼·亚·布尔加宁 302
Bulgaria 保加利亚 64, 104, 128, 132, 175; Occupied by German troops 被德军占领 190; Soviet policy for 苏联对保政策 293; Bulgarian Communists, Communist Party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 保加利亚共产党 204, 242, 256, 323; Bulgarian forces, in Yugoslavia 驻南斯拉夫保军 202, 212, 290; Bulgarian Partisans 保加利亚游击队 285, 292
Butorac, Anka 安卡·布托

莱茨 122

C

Čačak 恰恰克 211, 219, 229, 231
Cairo 开罗 260, 279, 306, SOE in, see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见特别行动执行局(特执局)
Campbell, Sir Ronald 罗德·坎贝尔爵士 190
Canada 加拿大 151, 181
Canaris, Admiral 卡那里斯海军上将 195
Carinthia 卡林西亚 27, 104, 300
Carnelluti, Amadeo 阿马德奥·卡内尔卢蒂 188
Carpathians 喀尔巴阡山 52, 74
Caserta 卡塞塔 280
Catholics, Catholicism 天主教徒, 天主教 204, 236, 271
Cavour 加富尔 31
Cesarec, August (Man) 奥古斯特·塞萨列茨(曼) 133, 134
Cesargrad 采萨尔格拉德 28

- Cetinje 策丁耶 208
- Četniks 切特尼克 215—228;
 hostilities with Partisans 与游击队的敌对行动 228—234, 281; British aid to 英国援助 245, 247; Collaboration by 切特尼克的通敌活动 241, 245; routed by Partisans 被游击队击溃 255;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美国派遣代表团 262; members condemned and executed 切特尼克分子被判刑并处决 313
- Chamberlain, 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176
- China 中国 301, 304, 308
- Churchill, Major Randolph 伦道夫·丘吉尔少校 260, 275
-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176, 189, 190, 192, 257, 274, 340; favours aid to Mihailović 赞同援助米哈伊洛维奇 223, 224, 233; seeks contact with Partisans 寻求与游击队接触 253; sends aid to Tito 给铁托送来援助物资 259—260, withdraws support from Mihailović 撤销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 261, 262, 281; meets Tito at Caserta 在卡塞塔与铁托会见 280—283, 320; meets Stalin in Moscow (1944) 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1944) 285—286, 298; on importance of Trieste 论的里雅斯特的重要性 287
- Ciano 齐亚诺 188, 200
- Cikara, Nikola 尼古拉·齐卡拉 101
- Cincar-Marković 青察尔—马尔科维奇 191, 195
- Citrine 西特林 182
- Čolaković, Rodoljub (Rezenko) 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罗尊科) 97, 121, 133, 147, 151, 162
- OMECON 经互会 305, 308
- Cominform 共产党情报局 126, 161, 291, 293—296, 299, 303, 319—321, 329, 332
- Comintern (Third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74, 77, 90, 95, 105, 106, 116, 288, 315; origins of

起源 66, 125, 126; Yugoslavias early disagreements with 南斯拉夫与共产国际最早的分歧 81—87; Tito as official of 铁托在共产国际任职 119—123; Sixth Congress of (1928) 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 127; Basic structure of 基本组成 127, 128; shows disapproval of Yugoslav Communists 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表示不悦 128—136; supports Republican Spain 支持共和西班牙 139; purge of foreigners in 清洗共产国际内的外国人 147—150, 154, 155;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Yugoslav Party 与南共的龃龉 158—160, 162, 173; Tito's radio link with 铁托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 201, 203, 233; orders uprising against Germans 命令对德起义 205—208, 213; Tito's independence from 铁托脱离共产国际而独立 228; abolished by Stalin(1943) 被斯大林取消

(1943) 126, 256, 257, 274, 291

Communi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West (KUNMZ) 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 121, 129, 155

Communist Youth International 青年共产主义国际 121, 158, 165

Communist Youth Organization (SKOJ)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联盟) 162, 164—167, 170, 172

Contić, Mladen 姆拉顿·乔尼奇 156

Čopić, Vladimir (Šenko) 弗拉吉米尔·乔皮奇(申科) 121, 123, 132, 133, 136, 137, 149, 155, 156, 158

Graiova 克拉约瓦 285

Orete 克里特岛 216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32

Cripps, Sir Stafford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191, 231

Croat Peasant Party (HSS or 1920—26 HRSS) 克罗地亚农民党(HSS, 1920—1926

- 年期间为 HRSS) 41, 68, 72, 75, 80—81, 103, 144, 168, 171, 188
- Croatia 克罗地亚 22—41, 60, 104; Peasant revolt (1573) 1573年农民起义 26; Serfdom in 农奴制 28—30, 32, 34; Zadruga (family group) in 扎德鲁加(家族) 29, 30, 33, 34; included in new Yugoslavia 并入新南斯拉夫 60, 61, 62;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社会和经济变革 63, 64, 67, 332—335; peasant rebellions in, after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农民起义 71; extremists in 极端分子 75; demonstrations in (1928) 1928年的示威游行 81;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共产党活动 68, 88, 103, 108, 145, 146, 171, 172, 185; Macéka's plans for 马切克计划 188, 189, 194; becomes Independent State 成为独立国家 200—201, 212; plans for uprising in (1914) 1914年的起义计划 206—208;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宗教迫害 235, 236
- Croatian Franciscans 克罗地亚方济各会教士 201
- Croatian language 克罗地亚语 37
- Croats 克罗地亚人: as minority in Hungary 作为匈牙利少数民族 23—25, 31, 32, 45, 46, 49; in Austro-Hungarian army 奥匈军队中的克罗地亚人 52, 53, 57; and in New Yugoslavia 新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 61, 72; Croat-Serb hostility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间的敌对 186, 187, 220
- Čubrilević, Branko 勃兰科·丘布里罗维奇 224
- Cvotković, Dragisa 德拉吉萨·茨维特科维奇 165, 175, 189, 190, 191
- Cvijić, Đuka 德尤卡·茨维吉奇 133, 156
- Cvijić, Stjepan (Andrej) 斯捷潘·茨维吉奇(安德列依) 132, 133, 137, 156
- Czech lands in Austro-

Hungarian empire 奥匈帝
国内的捷克土地 47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
克 80, 105, 116, 293;
military alliance with
Russia(1934) 1934年的捷
俄联盟 130; invaded by
Russia(1968) 1968年的俄
国入侵 302, 307, 308, 330,
334
Czechs 捷克人 23, 49, 54,
57—8

D

Dakić, Spasoje 斯帕索耶·达
吉奇 251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28, 62,
63, 67, 141, 200, 201;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共
产党活动 82, 85, 108, 116,
172, 185, 204
Dalton, Hugh 休·多尔顿
192, 223, 224
Damianov 达米扬诺夫 160
Darcy 达西 122
Deakin, Major W. F. W.
F·迪金少校 257, 258, 260,
281

Debelk 戴别尔克 148
Dedijer, Vladimir 弗拉迪米
尔·戴迪耶尔 48, 93, 108,
141, 153, 164, 167, 178; on
Gestapo arrests 论盖世太
保逮捕 209, 210; on Ustaši
atrocities 谈乌斯塔沙暴行
236; on wounded Partisans
谈负伤游击队员 254
Delić 杰里奇 69—70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 171
Democratic Trade Unions 民
主工会联合会 108
Derffler 德富勒 194
Diaz, Jose 何塞·迪亚士 122
Dill, General Sir John 约
翰·迪尔将军爵士 193, 224,
225
Dimitrov, Georgi 格奥尔基·
季米特洛夫 122, 132, 136,
142, 150, 153, 154, 156—
160, 178, 179, 205, 206, 297;
communicates with Tito
during civil war 内战期间
与铁托通信联系 238, 241—
248, 254, 255, 257, 269;
meets Tito at Bled 在布莱
德会见铁托 292, 293
Dinaric range 迪纳拉山脉

Diveci 迪弗齐 230
 Djaković, Diuro 久罗·贾科维奇 77, 88, 105, 142
 Djevdjevlje 杰弗杰利亚 180, 181
 Djevas, Milovan 密洛凡·德热拉斯 135, 145, 153, 156, 158, 164, 172; plans uprising in Montenegro 策划门的内哥罗起义 208; as Tito's close associate 与铁托的亲密关系 212; heads mission to Moscow 率代表团赴莫斯科 274, 279, 280; displeases Stalin 惹恼斯大林 291, 292, 294; as member of Politburo 政治局委员 314—317, 322; disgraced 失宠 327
 Djurić, Major Radoslav 拉多斯拉夫·朱里奇少校 229, 231, 232
 Dollfuss 陶尔斐斯 110
 Donja Stubica 下图尔皮察 27
 Donovan, William 威廉·唐诺文 190
 Drašković, Bishop Juraj 尤

拉伊·德拉什科维奇主教 27

Drašković, Milorad 米洛腊德·德拉斯科维奇 71, 97
 Drava river 德拉瓦河 23
 Dresden 德累斯顿 95, 105, 183
 Drvar 德尔瓦尔 265, 273, 275, 277, 280
 Dubrovnik 杜布罗夫尼克 152, 200
 Dudić, Dragojlo 德拉戈伊洛·杜迪奇 221
 Durnitor, Mount 杜尔米杜尔山 242, 244

E

Eberlein 埃伯莱因 126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194, 224, 301
 Egypt 埃及 307
 Eisenhower, General 艾森豪威尔将军 301
 Elizabeth II, Queen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301, 306, 341
 Engels 恩格斯 41
 Erdödy family 埃尔多迪家族 28, 29, 64

Bergach 厄尔加奇 56
d'Esperoy, General Franchet
 弗朗歇·戴斯珀利将军 64
Estonia 爱沙尼亚 177

F

Far East (Second World War)
 远东(第二次世界大战) 284
Farish, Major Linn 里恩·
 法里什少校 262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127,
 139, 177
Filipović, Filip (Bošković,
 Valija) 菲力普·腓力波维
 奇(瓦里亚·波斯科维奇)
 123, 132, 156
Finland 芬兰 56, 177, 181,
 182
Fiume (Rijeka) 阜姆(里耶
 卡) 25, 63, 161, 200, 286
Florin 弗洛林 161
Foča 福查 235, 243, 250,
 251, 258
Fotić 福蒂奇 261
France 法国 32, 51, 80, 104,
 105; forms military alliance
 with Russia (1934) 1934
 年与俄国结成联盟 130;

Popular Front in 人民阵线
139, 140; Yugoslav Party's
attitude to (1940) 1940年
南共对法国的态度 181,
182; invaded by Germany
德国进攻 189; Communism
in 共产主义 299; aid for
Yugoslavia from 给予南斯
拉夫援助 299
Franković 弗兰科夫齐 46,
 81
Franz-Ferdinand, Archduke
 弗兰兹·斐迪南大公 51
Franz-Josep, Emperor 弗兰
 兹·约瑟夫皇帝 23, 31

G

Galicja 加利西亚 52
Galogaža, Stevan 斯提凡·加
 罗加扎 108
Garibaldi 加里波第 31
Gavrilović, Milan 米兰·加
 夫里洛维奇 190
Geneo 热那亚 178
George VI, King 乔治六世
 国王 190
German air force (Luftwaffe)
 德国空军 195, 220, 278

- German army: in Yugoslavia
 驻南斯拉夫德国空军 199,
 202, 204, 212, 259—60;
 Mihailović, collaborates
 with 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军
 勾结 229—234, in Italy
 驻意德军 253; advance on
 Trieste 向的里雅斯特挺进
 287
- German Intelligence Services
 德国情报机构 218
- German, as lingua franca in
 central Europe 德语成为
 中欧通行语言 47, 48
- German properties, in Croatia
 and Slovenia 德国在克罗
 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的财产
 63, 64
- German reprisals, in Serbia
 德国在塞尔维亚的报复行动
 219, 225, 226
- Germans, as rulers in Austria
 德国人成为奥地利的统治者
 23, 24, 46
- Germany 德国 31, 104;
 declares war on France
 and Russia 对法、俄宣战
 51; signs Treaty of Brest-
 Litovsk 签订布罗斯特—立
 托夫斯克条约 57; destru-
 ction of communists in 杀
 害国内共产党人 127; as
 threat to Russia (1934)
 1934 年对俄国的威胁 130,
 131; sends military aid to
 Franco 给予佛朗哥军事援
 助 139; invades Austria
 (1938) 1938 年入侵奥地
 利 152, 174; invades Cze-
 choslovakia 入侵捷克斯洛
 伐克 161; as potential ally
 for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的
 潜在盟友 174, 175; signs
 non-aggression pact with
 USSR 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
 条约 176—7, 178, 181, 182,
 186; invades and occupies
 Yugoslavia 侵入并占领南
 斯拉夫 194—5, 199—201,
 215; invades USSR (Opera-
 tion Barbarossa) 侵略苏
 联 (巴巴罗萨行动) 205,
 206, 220; attempts destru-
 ction of Partisans (Opera-
 tion Weiss) 企图消灭游击队 (魏
 斯行动) 253, 255; retreats
 in Yugoslavia 在南斯拉夫
 退却 211

Gero 杰罗 303
 Gestapo 盖世太保 121, 122, 204, 209, 210, 218
 Gipsies, in Croatia 克罗地亚的吉卜赛人 204
 Glamoc 格拉莫奇 247
 Glan, Beti 贝蒂·格兰 106, 107, 156
 Golubić, Mustafa 慕斯塔法·哥鲁比奇 121, 122
 Gorizia 哥利西亚 300
 Gorkić, Milan 米兰·高尔吉奇 90; as Secretary-General Yugoslav Party (1932) 1932年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 106—7, 111, 114, 116, 123, 128, 129, 133—138, 141, 183; downfall of 垮台 142, 147, 149—150, 156, 160
 Gorshkov, General 戈尔什科夫将军 273
 Gošnjak, Ivan 伊凡·哥什尼亚克 121
 Gottwald, Klement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 122
 Great Britain 不大列颠, 英国 51, 52, 104, 113, 130; British troops in Archangel

英国部队在阿尔汉格爾 57;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英国共产党 107; Yugoslav Party's attitude to 南共对英国的态度 181, 182; Yugoslav gold reserves in 南斯拉夫在英国的黄金储备 189; British agents in Yugoslavia (befor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特务在南斯拉夫 189; British forces in Middle East 中东的英国部队 219; Mihailović's contacts with 米哈伊洛维奇与英国的联系 219, 220, 222—225; aid for Mihailović from 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援助 223—227, 229—230, 233—234; British officers parachuted to Tito 英国军官空降到铁托游击队 243; British officers with Četniks 英国军官与切特尼克分子 251; policy for Yugoslavia 对南政策 252—253, 278; aid for Tito from 给予铁托援助 253, 263—264; RAF training for

Yugoslavs 皇家空军训练南斯拉夫人 264; British Mission to 英国代表团 275, 277; post-war contacts with Tito 战后与铁托的联系 298—301; Tito's visit to 铁托访英 301

Greece 希腊 128, 183, 190, 191, 194, 199, 205, 293, 300

Greek communists 希腊共产党人 242, 256, 300

Gregorić, Mija 伊利亚·格雷戈里奇 26, 27

Gregorić, Dr. Pavle 巴维尔·格里戈里奇医生 76, 97, 142

Grol 格罗尔 310

Grzetić, Anka 安卡·格尔泽提奇 122

Grzetić, Ivan (Fleischer) 伊凡·格尔泽提奇(弗雷斯契尔) 148

Gubio, Martija 马季雅·古贝茨 26—28, 88

Gurevich 古列维奇 124

H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23, 27, 28, 31, 47, 61,

62, 65

Haile Salassie 海尔·塞拉西 341

Hammer and Sickle 锤子和镰刀——苏联国旗 83

Harriman, Averell 艾夫里尔·哈里曼 285, 341

Has, Herta 赫尔塔·哈斯 201, 204, 243, 270, 340

Hobrang, Andrija 安德里亚·赫布朗 207, 295, 297, 314, 319

Hecimović N. N. 赫西莫维奇 105

Héderváry, Count Kuehn 库恩·海代尔沃里伯爵 24

Heeren, Frau von 冯·黑伦夫人 175

Henderson, Sir Neville 内维尔·亨德森爵士 174

Hercigonja, Rudolf (Mironov) 鲁道夫·赫西贡亚(米罗诺夫) 133

Hilferding 希法亭 98

Hitler 希特勒 104, 140, 152, 174—176, 181, 183; Seeks Yugoslav Collaboration 寻求与南斯拉夫合作 190—192; orders bombardment

of Belgrade 命令轰炸贝尔格莱德 194, 195; invades Yugoslavia 入侵南斯拉夫 195, 199; invades Russia 入侵俄国 191, 199, 205; opinion of Serbs 对塞尔维亚人的看法 230
Holland 荷兰 189
Horvat, Vilem 维列姆·霍瓦特 156
Horvatin, Jovanka 若万卡·霍瓦丁 122
Horvatin, Kamilo (Hagen) 卡米罗·霍瓦丁(哈根) 116, 133, 137, 155
Hötendorf, Count Conrad von 冯·孔拉德·霍津多尔夫伯爵 51
HRSS, see Croat Republican Peasant Party 见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
Hudomal, Karlo (Oskar) 卡罗·赫多梅尔(奥斯卡尔) 116, 137, 156
Hudson, Colonel D. H. (Bill) D. H. (比尔) 赫德森上校 223, 224, 227, 229, 232, 233
Hungarian communists 匈牙利共产党人 242

Hungarian forces in Yugoslavia (1941) 1941年在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部队 202, 212
Hungarians, as Russian prisoners of war (1916) 1916年俄国的匈牙利战俘 54
Hungary 匈牙利 23—26, 31, 45, 46, 47, 80, 105, 300, 320; communist revolt in (1919) 1919年共产党起义 60, 64, 67, 69, 71, 120; Croats dissolve union with 克罗地亚人解除对匈联盟 62; Hitler's attitude to 希特勒对匈态度 175; shares German conquests in Yugoslavia 参与德国征服南斯拉夫 200; Soviet plans for 苏联对匈计划 293; communist trials in 审判共产党 322, 323; invaded by USSR (1956) 1956年苏联入侵 302, 303, 304, 307
Huntington, Colonel Ellery C. 埃勒里·C·亨廷顿上校 263

I

IMRO, see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参见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Independent Democratic Party 独立民主党 171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独立工会 74—77, 82, 85, 103

Independert Workers Party 独立工人党 82

India 印度 306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IMRO)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64, 81, 115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 125

Isaj Djaksombayav, Hadji 哈季·伊赛·贾克森巴叶夫 58, 59

Israeli-Arab war (1967) 1967年以阿战争 306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179—180, 219, 222

Istria 伊斯的利亚 63, 281, 282, 286, 281

Italy 意大利 31, 62—64, 67, 80, 104, 127, 130; sends military aid to Franco 给予佛朗哥军事援助 139; invades Albania 侵略阿尔巴尼亚 161, 174, 188; as threat to Yugoslavia 对南斯拉夫的威胁 174, 175; attacks Greece 进攻希腊 183, 190, 191; shares in divided Yugoslavia 参与瓜分南斯拉夫 200; allied invasion of 盟军攻入意大利 250;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by 无条件投降 250, 259, 287; as Allied base 成为盟军基地 263, 278—280, 289; communism in 意大利的共产主义 299

Italian army, in Yugoslavia 意大利军队在南斯拉夫 202, 208, 212, 246

Ivanjica 伊瓦尼察 229

J

Jablanica 亚布拉尼察 225

Jaice 亚伊策 269—270, 275,
277, 314
Janković, General 扬科维奇
将军 195
Japan 日本 130, 191
Jasenovac mountains 亚赛
诺瓦茨山 275
Javeršek, Marija, see Broz
马力加·亚维尔塞克, 见布
罗兹条
Javeršek, Martin 马丁·亚
维尔舍克 40
Jesenice 耶塞尼策 172
Jevtić, Bogoljub 博戈留布·
叶弗季奇 174
Jews, in Croatia 克罗地亚的
犹太人 204
Jones, Major W. W·琼斯
少校 253
Jovanović, Arso 阿尔索·约
瓦诺维奇 280, 297, 319—
320
Jovanović (Četnik) 约瓦诺
维奇(切特尼克) 216
Jovanović, Dr. Dragoljub 德
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博士
103, 171
Jovanović, Janko (Janković)
扬科·约瓦诺维奇(扬科维

奇) 149, 155
Jovanović, Slobodan 斯洛博
丹·约瓦诺维奇 246
Jovanović, Zikica 齐吉察·
约瓦诺维奇 207
Jundja, Dol 云贾多尔 242,
243
Jurak, Josip 约瑟普·朱拉
克 101, 102

K

Kačlerović, krsta 特里察·
卡茨莱罗维奇 85
Kalinovik 卡里诺维克 258
Kamenev 加米涅夫 138
Kamnik 卡姆尼克 49
Karadjardjevo 卡拉卓尔杰沃
333
Karajordjević dynasty 卡拉
乔治维奇王朝 62
Karas 卡拉斯 43—47
Kardelj, Edward (Biro) 爱
德华·卡德尔(贝尔克) 113,
116, 121, 133, 144, 145, 148,
162, 185, 207, 208, 212, 277;
as foreign minister 任外
长 290, 293—295, 314, 316,
322, 329

- Karlovac 卡尔洛瓦茨 31, 109
-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125
- Kazan 喀山 53
- Koitel, Field-Marshal von 冯·凯特尔陆军元帅 225
- Keserović 凯塞罗维奇 215
- Khirgiz nomads 吉尔吉斯牧民 58, 53
- Khrushchov 赫鲁晓夫 301—304, 328, 337
- Kidrić, Boris 博里斯·基德里奇 113, 116—17, 138, 150, 294, 314—317, 322
- Kidrić, Zdenka 兹顿卡·基德里奇 122
- Kiessel, Dr. George 乔治·基泽尔博士 230
- Klugenfurt 克拉根福 110, 140
- Klanjac 克拉涅茨 38
- Knežević, Major 克奈热维茨少校 247
- Knin 克宁 277
- Knjževnik 《作家》 102
- Knorin, G. G. 克诺林 122
- Kolarov, Vasil 瓦西尔·科拉罗夫 122
- Kolchak, Admiral 高尔察克 上将 58
- Kommunist 《共产主义者》 82, 83
- Končar, Rado 拉德·昆查尔 183
- Königgratz 克尼格尔兹 52
- Konjić 孔日奇 255
- Kopinić, Ivan (Valdes) 伊凡·科皮尼奇（瓦尔戴斯） 183
- Kerčula 科尔丘拉岛 250
- Kornov, Lieutenant-General 科尔涅夫中将 272—3, 283
- Korošec, Father 科罗塞克神父 61
- Kosić, Mirko 米尔科·科西奇 193
- Kosmet 科斯梅特 160, 331
- Kosovo-Metehija 科索沃—梅托希亚 104, 185, 200, 256
- Kostov, Traico 特雷科·科斯托夫 122, 323
- Kotor 科托尔 200
- Kovacević, Nikola 尼古拉·科瓦塞维奇 151
- Kragujevac 克拉古耶瓦茨 186, 226

Kraiger, Sergei 谢尔盖·克赖格尔 110, 113, 144
Kralj, Franjo 弗朗约·克拉里 108, 109
Kraljevica 克拉列维察 76, 77
Kraljevo 克拉列沃 211, 219
Kraus Dr. 克劳斯博士 230
Križevci 克里泽沃齐 74, 75
Krlježa, Miroslav 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 146, 172
Krupanj 克鲁潘尼 211
Kuhar, Lovro (Valić) 罗沃洛·库哈尔(瓦里奇) 132
Kuibishov 古比雪夫 53, 134, 246
Kula 古拉 247
Kultura 《文化》 102
Kumrovec 库姆罗维茨 22, 23, 24—28, 33—41, 47, 48, 60, 82, 101, 102, 146, 276
Kun, Bela 贝拉·库恩 60, 67, 120, 122
Kungur 孔古尔 53, 54
KUNMZ, see Communi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 Minorities of the West 见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
Kupa 库帕 43

Kusovac, Labud 拉布德·库索瓦茨 149, 154
Kunsinen, Otto 奥托·库恩西宁 122
Kvaternik, Colonel Slavko 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上校 201

L

Lalatović, Major 莱拉托维奇少校 223, 231
Lalić, Colonel Nicholas 尼古拉·莱里奇上校 262
La Pasionara 拉·帕申纳拉 131
Latvia 拉脱维亚 177
Laval 拉瓦尔 140
Lawrence, Christie 克里斯蒂·劳伦斯 216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104, 131
Le Haurre 勒阿弗尔 161, 178
Lenin 列宁 54, 55, 120, 125, 309
Leningrad 列宁格勒 161, 178
Leninist School 列宁主义学校 88, 121, 129, 155

Lepoglava prison 莱波格拉
瓦监狱 94, 95, 101
Teskošek, Franc 弗兰克·莱
斯科塞克 145
Lika 利卡 23, 104
List, Field-Marshal 利斯特
陆军元帅 217
Literatura 《文学》 102
Lithuania 立陶宛 177
Little Entente (1921) 1921
年的小协约国 80; (1933)
1933年的小协约国 105
Litvinov 利特维诺夫 130
Livno 利夫诺 277
Ljubljana 卢布尔雅那 47,
48, 109, 112, 115, 200, 281;
communist conference in
(1934) 1934年共产党代表
大会 116; Tito speaks at
铁托讲演 287, 291, 292;
Seven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at 第七次党代表
大会 305
London, Luftwaffe raids on
德国空军空袭伦敦 220
London, Treaty of 伦敦条约
62
Ložnica 洛兹尼察 219
Lukanov, Karl 卡尔·卢卡

诺夫 160

Luxembourg, Rosa 罗莎·卢
森堡 98

M

Macedonia 马其顿 32, 62,
67, 68, 72, 85, 103—4, 185,
333, 335; given to Bulgaria
(1941) 1941年划入保加利
亚200;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共产党活动 204; plans
for uprising in 策划起义
207; as part of Greece 作为
希腊一部份 293; Mace-
donian separatism 马其顿
分裂主义 186; see also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见马其顿内部
革命组织

Maček, vladimir 弗拉吉米
尔·马切克 81, 103, 135,
171, 172; negotiates with
Italy 与意大利谈判 188—9,
193—4; supports Indepen-
dent State of Croatia 支持
克罗地亚独立国 201

Macleay, Brigadier Fitzroy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 准将

- 259—261, 264, 265, 281, 340
- Maglić, Mount 马格里奇山
257
- Magyars 马扎儿人 24, 25,
31, 45, 46, 60, 63—65
- Maisky 麦斯基 224, 225
- Malenkov 马林科夫 303
- Malesivić, Branko 布兰科·
马莱希维奇 183
- Malta 马耳他 220, 223
- Mannheim 曼海姆 49
- Mansfield, Captain Walter
沃尔特·曼斯菲尔德上尉
262
- Manuilsky, Dmitri 季米特
里·马努伊尔斯基 107,
122—124, 132, 133, 136,
137, 158, 159, 271
- Mao Tse-tung 毛泽东 301,
304
- Maribor prison 马里博尔监
狱 94, 97, 98
- Marić, Ivo 伊沃·马里奇 128,
132, 149—50, 155
- Marinke, Miko 麦科·马林
克 145
- Marković, Juraj 朱拉伊·马
尔科维奇 39
- Marković, Sima 西马·马科
维奇 67, 84—86, 105, 108,
121, 128
- Marseilles 马赛 115, 141
- Marshal Aid 马歇尔计划 290
- Martinović 马丁诺维奇 128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41, 98, 120, 125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46,
113, 316—319
- Masaryk 马萨利克 142
- Maslaric, Božidar (Andrejev)
波吉达尔·马斯拉里奇(安
德列耶夫) 121, 133, 150
- Mates, Leo 利奥·梅提斯 144
- Matl, Hauptman Josif 约瑟
夫·豪普特曼·马特尔 230
- Mavrak, Anton 安顿·马沃
拉克 156
- Maximilian, Emperor 马克
西米利安皇帝 27
- Mic Dowell, Colonel 麦克多
维尔上校 262
- Mediterranean strategy 地中
海战略 261
- Metal Workers' Union 五金
工会 47, 76, 77, 87
- Mičunović, Veljko 韦利科·
米朱诺维奇 223
- Middle East 中东 219, 225,

- 252, 305
- Mihailović, Colonel Dragoljub (Draza) 德拉戈留布(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 215—222; British aid for 英国援助 222—227; meetings with Tito 会见铁托 222, 226—228; seeks German help against partisans 寻求德国援助反对游击队 229—234; gives Četnik support to Germans and Italians 切特尼克支持德意 232—4, 245, 246, 252; continued Allied aid to 盟军继续给予支持 247, 259, 264, 301; Allied missions to 盟军派来代表团 250, 251, 262; withdrawal of aid from 撤销援助 261, 279, 281; inactive policy of 消极政策 269; dismissed as Minister of War 免除军事大臣职务 279; captured and executed 被捕与处决 312, 313
- Mikoyan 米高扬 303
- Miletić, Petka 彼得卡·米莱蒂奇 150—152, 160, 161
- Miločer 米洛策尔 141
- Milutinović, Ivan 伊凡·米鲁丁诺维奇 145, 313
- Milutinović (priest) 米卢蒂诺维奇(教士) 211
- Minić, Miloš 米洛什·米尼奇 221, 222
- Mirković, Brigadier-General Bora 博拉·米尔科维奇准将 193
- Misić, Alexander 亚历山大·米西奇 222
- Mitrovica 米特罗维察 152
- Mitrović, Djako 贾科·米特罗维奇 135
- Mitrović, Mitra 米特拉·密特洛维奇 209, 210
- Mlada Bosna 姆拉达·波斯纳 106
- Mohacs, Battle of (1526) 1526 年莫哈奇战斗 26
- Molotov 莫洛托夫 284, 289, 290, 292, 304
-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 31, 62, 64, 67, 68, 72, 223;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共产党活动 85, 103, 108, 116, 141, 144, 185, 204; pro-Russian tradition in 亲俄传统 172, 324; given to

Italy (1941) 1941年划入意大利 200; uprising in 起义 207, 208; Partisan withdrawal to 游击队撤入 225

Morava river 摩拉瓦河 200, 211, 219

Morgan Line 摩根分界线 287

Moscow 莫斯科 59, 66; Tito's training in 铁托受训 116—118, 119—137; Yugoslav colony in 南斯拉夫居住区 121, 122; Stalin's purge in 斯大林清洗 137, 150, 151, 154—157, 163; Tito revisits (1939) 1939年铁托重访 178, 179; defence of 保卫莫斯科 214; Allied leaders in (1944)盟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 285, 286

Muk, Adolf (zebnor) 阿道夫·穆克(策纳) 116, 141

Munich 慕尼黑 49; Munich agreement 慕尼黑协定 176

Muslims 穆斯林 32, 235, 236, 271

Mussolini 墨索里尼 104, 115, 127, 140, 161, 274; attacks Greece 攻打希腊

183, 190; ambitions for Yugoslavia 觊觎南斯拉夫 189, 190

Musulin, Lieutenant George 乔治·穆苏林中尉 262

N

Napoleon Bonaparte 波拿帕特·拿破仑 206

Napoleon III, Emperor 拿破仑三世皇帝 31

Narva 纳尔瓦 60

Nasser 纳赛尔 306, 307, 341

National Liberation Committees 民族解放委员会 227, 228, 235, 240, 248, 269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176, 177, 178, 181, 182, 186, 205

Nazis, Nazi regime 纳粹分子, 纳粹政权 104, 110, 121, 122, 127, 130, 131, 139, 152, 166, 177, 178, 182; Nazi military tactics 纳粹战术 187

Nedić, Milan 米兰·奈迪奇 200, 218, 221, 222, 227, 232,

252

Nehru 尼赫鲁 341
Neretva river 奈雷特瓦河
254, 255
Neuilly, Treaty of 纳伊条约
63
Nova river 涅瓦河 56
Ninčić, Momađilo 莫姆契洛·
宁契奇 193
Ninčić, Olga 奥尔加·宁契奇
281
Nixon, President 尼克松总
统 306
Njegoreloje 涅戈列洛伊 119
NKVD 内务人民委员会 124,
137, 150, 151, 154, 156,
161
Normandy landings (Over-
lord) 诺曼底登陆 (“太上
皇”) 269, 272, 281
North Africa 北非 250
Norway 挪威 189
Novaković, Kosta 科斯塔·
诺瓦科维奇 121, 156
Novaković Ljuba 留巴·诺
瓦科维奇 215, 251
Novosti 《消息报》 91
Nuremberg trials 纽伦堡审
讯 226

O

Odessa 敖德萨 179
Odra river 奥得河 43
Ogulin 奥古林 78, 79, 89,
98, 104, 144
Okno 奥克诺 53
Olujčić, Marko 马尔科·奥卢
伊奇 221
Omsk 鄂木斯克 57—59
Orthodox faith,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正教 235, 236, 271
Osijek 奥西耶克 46, 140
Oster, Major-General Hans
汉斯·奥斯特少将 195
Ostojčić 奥斯托伊奇 223

P

Pacific theatre 太平洋战场
272
Palme-Dutt 帕姆—杜德 122
Paris, as headquarters for
central committee 中央委
员会总部所在地, 巴黎 138,
139, 150; Tito's work in 铁
托在巴黎的工作 139—144,
147, 149—154

- Paris, Peace of 巴黎和约 32
- Farović, Blagoje (Smit) 布拉哥耶·帕罗维奇(斯密特) 116, 121, 133, 142
- Partisans 游击队 131, 142, 206; growth and establishment 建立与成长 210—213; rivalry with Četniks 与切特尼克对立 215, 219, 223, 224; as leaders of serbian insurrection(1944) 1944年领导塞尔维亚起义 218, 219; strategic organization 战略组织 225; hostilities with Četniks 与切特尼克的敌对行动 228—234; retreat to mountains 撤入深山 232; increase in number of 队伍壮大 237; Churchill approves official contact with 丘吉尔批准与之正式接触 253; withdrawal before Četniks 在切特尼克进攻面前撤退 254; allied missions to 盟军派来代表团 257, 258, 262—265, 266
- Proletarian Brigades 无产者旅 237, 243; austerity and discipline of 纪律严明 238, 239, 265, 266; in general election(1945) 参加1945年大选 310, 311
- Pasanec, Andrija 安德里亚·帕萨奈茨 28
- Pašić, Nikola 尼古拉·帕西奇 61, 62, 69
- Paul, Prince 保罗亲王 116, 134, 135, 174, 185, 186, 188—193, 261
- Pavelić, Dr. Ante 安特·巴维利奇博士 201, 204, 236, 276
- Pavlović, Lieutenant-colonel Dragoslav 德拉戈斯拉夫·帕沃洛维奇中校 221, 229
- Pecanac, Kosta 科斯塔·佩查纳茨 215, 217, 227
- Peoples Peasant Party 人民农民党 171
- Peoples Liberation Committees 人民解放委员会 239, 248
- Perm 彼尔姆 53, 55, 56
- Peter II, King 彼得二世, 国王 116, 192, 195, 224, 261, 269, 671, 279, 283, 285, 309
- Petrograd 彼得格勒 55, 56,

125
Petrovaradin 彼得罗瓦拉丁
52
Petrović, Drago (Milinković)
德拉哥·彼得罗维奇(米林
科维奇) 133, 134
Philip, Prince 菲利普亲王
306, 341
Piatnitsky, Ossip 奥西普·皮
阿特尼茨基 122
Pieck, Wilhelm 威廉·皮克
120, 122, 131, 150, 153, 157
Pijade, Moša 莫沙·皮雅杰
82, 83, 95—97, 151, 152,
185, 242—244, 314, 315
Pilsen 比尔森 49
Pipan 皮潘 221
Podgorica 波德戈里察 208
Poland 波兰 119, 177, 188,
189, 293, 305; Poles, as
minority in Austria 奥地
利波兰少数民族 23; Polish
Communist Party 波兰共产
党 159
Politika 《政治报》 209
Politt, Harry 哈里·波立特
122, 131
Popović, Koča 科察·波波维
奇 141, 231, 237

Popular Front Policy 人民
阵线政策 108, 113, 127,
130—132, 135, 144, 145,
151, 162, 166, 170—173,
181, 213, 221
Posreda 波斯雷达 34, 36
Potoci 波多齐 277
Požega 波热加 211, 219, 228,
229, 231
Prague 布拉格 136, 151, 215
Pronj, Mount 普伦伊山 255
Prica, Srdjan 斯尔迪安·普
里察 151
Probicević, Svetozar 斯维托
扎尔·普里比谢维奇 103
PROFINTERN 莫斯科国际
共产主义工会组织 116
Proleter 无产者 110, 166
Prozor 普罗佐尔 247
Prussia 普鲁士 31
Ptuj 普图伊 140
Purić, Božidar 博日达尔·普
里奇 279

R

Radek 拉德克 83
Radić, Antun 安顿·拉迪奇
41

- Radić, stjepan 斯捷潘·拉迪奇 41, 72, 75, 80, 81, 89, 103, 171
- Radovanović, Milan (Simonović) 米兰·拉多瓦诺维奇(西蒙诺维奇) 132, 134
- Rajk 拉伊克 323
- Rakosi 拉科西 303
- Ranković, Alexander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 145, 207, 209—212, 221, 240, 295, 305, 310, 312, 314, 315, 316, 322, 329, 330
- Rapallo, Treaty of 拉巴洛条约 63
- Ravna Gora 腊夫纳戈拉 216, 221, 223, 226, 229, 230
- Red Cross Organization (红十字会) 54
- Red Help 红色援助会 98, 105
- Regent, Ivan (Mateo) 伊凡·金特(马提奥) 133
- Reichstag Fire Trial 国会纵火案审讯 122, 132
- Reiter, Jasha 亚沙·雷特尔 211
- Rhinoland 来因兰 174
- Ribar, Dr, Ivan 伊凡·李巴尔博士 164, 171, 243, 248
- Ribar, Ivo Lola 伊沃·洛拉·李巴尔 145, 153, 164—166, 178, 185; as Tito's close associate. 铁托密友 212, 231; death of 逝世 260, 313
- Ribbentrop 李宾特洛甫 194
- Ribnikar, Vladislav 符拉迪斯拉夫·里布尼卡尔 209, 211
- Rijeka, See Fiume 里耶卡, 见阜姆
- Rogers, Dr. Lindsay 林赛·罗杰斯博士 265, 340
- Romania 罗马尼亚 80, 105, 128, 283, 285, 322; Occupied by Germans 德国占领 190, 205; Soviet plans for 苏联对罗计划 293; Romanians in Austro-Hungarian army 奥匈军队中的罗马尼亚人 54
- Rommel 隆美尔 220
- Roosevelt, 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341, 342
- Roosevelt, President 罗斯福总统 260, 261, 274
- Rozman, Bishop 罗兹曼主教

Ruhr 鲁尔 49

Russia (pro-revolutionary) 俄国 (革命前) 31, 32, 37, 41, 57, 58, 66; invades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入侵奥匈帝国 51, 52; Bolsheviks in 俄国布尔什维克 57, 58, 59; revolution in 俄国革命 50, 54—58, 71, 72; South Slav prisoners of war in 俄国的南部斯拉夫人战俘 54, 57, 61, 64, 67, 71

Russia (USSR) 俄国 (苏联) 104, 114—115, 130, 131, 308; Nazi-Soviet Pact 德苏条约 176, 177, 178, 181, 182, 186, 205; favours status quo in Balkans 赞同维持巴尔干现状 190; Hitler plans attack on 希特勒计划进攻苏联 191; Signs pact with Yugoslavia 与南斯拉夫签订条约 194; invades by Germany 遭到德国进攻 205, 213, 214; German advance in 德国进军 233, 234; Tito seeks aid from 铁托寻求苏联援助 226, 227,

235, 240, 244—246, 249, 257; aid for Partisan from 对游击队的援助 263; Soviet Mission in Yugoslavia 苏联代表团在南斯拉夫 272, 273, 275, 278, 282; Red Army in Yugoslavia (1944) 1944年红军在南斯拉夫 131; breaks with Yugoslavia 苏南决裂 288—297; invades Hungary 入侵匈牙利 302; invades Czechoslovakia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302, 307, 330; Red Army 红军 131, 156, 176, 211, 272, 280, 283, 284, 307; Soviet Communist Party (CPSU) 苏联共产党 (苏共) 294, 302; see also Cominform, Comintern, PROFINTERN 见共产党情报局, 共产国际, 莫斯科共产主义国际工联

Ruthenia 卢西 188

S

Šabić, Stevo 斯提沃·萨比奇 74, 98

- Sadowa 萨多瓦 32
- St. Germain, Treaty of 圣日耳曼条约 63
- St. Peterburg 圣彼得堡 54—56, 57, 60
- Salaj, Juraj 朱腊伊·萨拉伊 77, 121
- Salonika 萨洛尼卡 32, 64, 215
- Samobor 萨莫博尔 102, 140, 145
- Sandjak of Novi-Pazar 新帕扎尔的桑贾克 200, 235, 251
- Sarajevo 萨拉热窝 183, 250, 255; assassination (1914) 1914年暗杀案 51, 199
- Satorov, Metodije (Šarlo) 梅托迪耶·沙托罗夫(沙尔洛) 185, 204
- Sava river 萨瓦河 23, 43
- Schuschnigg 许士尼格 138
- Schwerm 施韦尔马 179
- Seitz, Lieutenant-Colonel Albert 艾伯特·塞茨中校 262
- Serbia 塞尔维亚 31—2, 51—2, 61, 333—5;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塞尔维亚的共产党活动 67, 103, 108, 116, 144, 167, 185; divided by German invaders 为德国侵略者所分割 200, 203; Communist incident in 塞尔维亚共产党事件 207; Plans for uprising in 塞尔维亚起义计划 208; as headquarters for Partisans and tetniks 作为游击队和切特尼克总部 215; Mihailović's ambitions for 米哈伊洛维奇的野心 217; 219; German occupation of 德国占领 217—219; insurrection in (1941) 1941年叛乱 218—220, 235, 237; German reprisals in 德国报复 225, 226; German advance in 德国进军 231, 232
- Serbian Peasant Party 塞尔维亚农民党 103
- Serbs 塞尔维亚人 23, 24—5, 31, 46, 57, 61; as masters in new Yugoslavia 成为新南斯拉夫的主人 63, 69, 72; persecuted in Croatia (1941) 1941年在克罗地亚受迫害 204

- Seremet, Akif 阿吉夫·塞列梅特 156
- Sibenik 希贝尼克 259
- Siberia 西伯利亚 57, 134
- Siberian railway line 西伯利亚铁路 54, 58
- Signal 《信号报》 102
- Sikorski, General 西科尔斯基将军 274
- Simović, General Dušan 杜尚·西莫维奇将军 192, 193, 195, 223—235
- Sisak 锡萨克 33, 41, 43—6, 135
- Škoda arms factories 斯科达兵工厂 49
- SKOJ see Communist Youth Organization 见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Slavonic languages 斯拉夫语 37
- Slavonic peoples 斯拉夫民族 31—2, 45—6
- Slavs, as minority race 斯拉夫人, 作为少数民族 23, 29, 45, 46; South Slavs 南部斯拉夫人 see Yugoslavs, 见南斯拉夫人
- Slessor, Sir John 约翰·斯莱塞爵士 265, 278
- Slobodna Reč (Free world) 《自由言论报》 46
- Slovakia 斯洛伐克 188;
- Slovaks 斯洛伐克人 23
- Slovene language 斯洛文尼亚语 37
- Slovenes 斯洛文尼亚人 23, 31, 46, 49, 57, 61, 72, 220
-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25, 26, 33, 34, 36, 37, 47, 48, 62, 65, 333—335;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共产党活动 68, 82, 103, 104, 108, 112, 113, 144, 171, 185, 204; divided by Germans 为德国所分割 200; plans for uprising in 起义计划 207, 208
- Smederevska Palanka 斯梅德雷—沃帕兰卡 76
- Sochi 索契 303
- Social Democrat Party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 72, 88, 89
-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Austria) 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 46
- Sofia 索非亚 215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
内战 137, 138—142, 143,
149—150, 156, 161, 207, 213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特别行动执行局
192, 219, 220, 223, 250, 252,
253, 258
Split 斯普利特 144, 152, 178,
183, 200, 259
Spoloto, Duke of 斯波莱托
公爵 200
Sremska Mitrovica 斯雷姆—
米特罗维察 95, 97, 150
Stalac 斯达莱克 211
Stalin 斯大林 86, 111, 120,
122, 186, 304; purgo by 大
清洗 94, 119, 137, 138, 143,
147—150, 154—157, 158,
162, 163, 179, 344; Comin-
tern dominated by 控制共
产国际 128; at Seventh
Comintern Congress 在共
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130—132; calls for quer-
rilla activities in Yugos-
lavia 号召南斯拉夫进行游
击队活动 205, 206; under-
estimates Tito 低估铁托
214; attitude to aid for

Tito 对援助铁托的态度
244; at Uchcran 在德黑兰
260, 261; reaction to Jajce
decisions 对亚伊策决定的
反应 271, 272; advises
Tito's mission on compro-
mise 劝告铁托代表团让步
274, 279; Churchill on
丘吉尔谈到斯大林 282;
meetings with Tito 与铁
托会见 284, 290, 312; Sees
Allied leaders in Moscow
在莫斯科会见盟国领导人
285, 286, 298; breaks with
Tito 与铁托决裂 288—297,
319—323, 324, 329, 332,
337; death of 逝世 301,
328; de-Stalinization 非斯
大林化 303
Stambolić, Petar 佩塔尔·
斯塔姆波里奇 231
Stanišić, Colonel 斯塔尼希
奇上校 253
Steed, Wickham 威克海姆·
斯蒂德 61
Stefanović, Obrad 奥布拉
德·斯蒂凡诺维奇 222
Stopinac, Archbishop 斯特
皮纳茨大主教 236

Stottin 什切青 60
Stipanici 什蒂潘尼奇 254
Stojadinović, Milan 米兰·
斯托亚季诺维奇 76, 135,
174, 175
Stolice 斯托利采 225
Struganik 斯特鲁加尼克 222
Struggle (Borba) 《战斗报》
83
Stuart, Major William 威
廉·斯图尔特少校 257, 258
Subasić, Dr Ivan 伊凡·舒
巴希奇博士 274, 278, 279,
310
Suha 苏哈 257
Šumadija hills 舒马迪亚山
215
Sušak 苏沙克 161
Susjedgrad 苏亚埃德堡 27
Šutej 舒特伊 310
Sutjeska river 苏捷斯卡河
257
Sutla river 苏特拉河 23, 27,
33, 102
Sverdlovsk 斯维尔德洛夫斯
克 134
Sviashsk 斯维亚希斯克 53
Switzerland 瑞士 139, 140,
161

Syria 叙利亚 306

T

Tabi, Franjo 弗兰约·塔希
26—7
Tehoran Conference 德黑兰
会议 260—262, 269, 270,
271
Thorez, Maurice 莫里斯·多
列士 122
Times, The 《泰晤士报》 61
Tito, President (Josip Broz)
铁托总统(约瑟普·布罗兹)
21—36; in Slovenia with
grandparents 在斯洛文尼
亚外祖父母处 36, 37;
attitude to religion 对宗
教态度 38; at school 入学
38, 39; leaves home 离家
乡; joins Metal Workers
Union 参加五金业工会 47;
military service 服兵役
50, 51; taken prisoner on
Carpathian front 在喀尔巴
阡战线被俘 53, 54; joins
International Red Guard
参加国际赤卫军 57; returns
to Yugoslavia 回到南斯拉

夫 60; becomes communist 成为共产主义者 74, 75; elected secretary Zagreb Communist Party 当选为萨格勒布共产党书记 87; aliases used by 所用化名 87, 111, 114, 116, 122, 152, 161, 179—180, 201; imprisoned for communist activities 因共产党活动入狱 21, 77, 78, 88—98; released 获释 101, 108; leaves Yugoslavia for Vienna 离南斯拉夫去维也纳 115; to Moscow for training 去莫斯科受训 116, 118, 119—137; joins Central Committee in Vienna 参加维也纳中央委员会 134, 137, 138; moves to Paris 前往巴黎 139; denounces Anschluss 谴责对奥地利的吞并 152; leaves Paris for Moscow 离巴黎去莫斯科 154; becomes General Secretary Yugoslav Party 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 158; attitude to women 对妇女态度 167,

168; visits Moscow (1939) 1939年访问莫斯科 178, 179; Organizes Fifth Party Congress 组织第五次党代会 183—186; shows talent 表现出领导才能 202; leaves Zagreb 离开萨格勒布 204; leaves Belgrad for Serbia (1941) 1941年离贝尔格莱德去塞尔维亚 211; Impression of Mihailović 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印象 216; meetings with Mihailović 与米哈伊洛维奇会晤 222, 226—228; attitude to British 对英国人的态度 234, 251, 283, 285, 256; withdraws to Bihać 撤回比哈奇 247—249; effect of dissolution of Comintern on 共产国际解散对他的影响 257; relations with Allied missions 与盟军代表团关系 264, 265; Polioy for post-war Yugoslavia 对战后南斯拉夫的政策 269; sends military mission to Moscow 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 273, 274; signs

- Tito-Subasić Agreement
 签署铁托—舒巴希奇协定
 279; meets Churchill at
 Caserta 在卡塞塔与丘吉尔
 会晤 280—283, 320; visits
 Stalin 访问斯大林 284, 285,
 290, 312; enters Belgrade
 in triumph 凯旋进入贝尔
 格莱德 211, 285; breaks
 with Stalin 与斯大林决裂
 288—297, 319—323; state
 visits abroad 到国外进行国
 事访问 301, 302; non-
 alignment 不结盟政策 305,
 306
- Togliatti, Palmiro (Ercoli)
 帕尔米罗(埃尔科利)·陶里
 亚蒂 95, 105, 122, 129, 132
- Topalović, Živko 日夫科·
 托帕洛维奇 67, 151
- Trade Unions 工会 47, 48,
 71, 74—77, 86, 87, 116, 117,
 172, see also Independent
 Trade Union 见独立工会
- Trbovlje 特尔博夫列 114,
 172
- Trianon, Treaty of 特里亚
 农条约 63
-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47, 48,
 63, 281, 286, 287, 289, 291,
 300
- Tripartite Pact 三国公约
 190—194
- Trotsky 托洛茨基 57, 125,
 295
- Trotskyists 托洛茨基分子
 151, 155, 160, 179
- Truman, President 杜鲁门总
 统 287
- Turkey 土耳其 25, 26, 31,
 32, 220, 300; Turkish
 occupation 土耳其占领 62,
 203
- Turner, Brigade-Führer Dr
 Harold 哈罗德·特纳旅长
 博士 218, 230

U

- Ukraine 乌克兰 181, 293
- Ulbricht, Walter 沃尔特·乌
 布利希 122
- Ulenburg 乌连堡 56
- Unac river 乌纳茨河 276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301,
 306; UNRRA 联合国善后
 救济总署 273, 274, 316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

利坚合众国 32, 62, 104, 130, 151, 189, 220; Suspicions of British policy in Balkans 对英国的巴尔干政策的怀疑 261; missions to Yugoslavia 派遣代表团去南斯拉夫 262, 263, 275; strategy for Pacific 太平洋战略 272; strained relations with Yugoslavia 与南斯拉夫关系紧张 289, 290; aids Yugoslavia 援助南斯拉夫 299;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Tito 与铁托改善关系 301, 308

Ural mountains 乌拉尔山 53, 120

Ustāsi 乌斯塔沙 115, 187, 201, 204, 236, 255

Užice 乌日策 219, 223, 228, 229, 231, 234, 240, 247

V

Valdes-Kopinić 瓦尔戴斯—科比尼奇 203

Valjevo 瓦列沃 186, 211, 230

Vanga 万加岛 341

Vasić, Dragiša 德拉吉察·瓦西奇 221, 222, 226, 230

Vauhnik, Colonel Vladimir 弗拉迪米尔·瓦乌赫尼克上校 191, 194—5

Vešbit, Dr Vladimir 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博士 180, 182, 260, 279

Veliko Trojstvo 大特洛伊斯特沃 74, 98

Venetia, Giulia 威尼斯·朱利亚 286

Victor Emmanuel III King 伊曼纽尔·维克托三世国王 200

Vidovdan Constitution 维多夫丹宪法 70, 80, 164, 186

Vienna 维也纳 24, 47, 48, 49, 50, 60, 66, 83, 85, 151; as headquarters for Central Committee 中央委员会所在地 105, 106, 109, 110, 113—116, 117, 123, 129, 134—138

Vietnam 越南 308

Vimpulšek, Stjepan 斯捷潘·文普尔舍克 39

Vis 维斯岛 263, 274, 277, 278, 280, 283

Vlahović, Veljko 韦利科·弗拉霍维奇 158, 271
Vojvodina 伏伊伏丁那 67, 85, 183, 185, 331
Volga river 伏尔加河 53
Vrsac 弗尔沙茨 285
Vujović, Djuro 德尤罗·武约维奇 258
Vujović, Grga 格尔加·武约维奇 121, 156
Vujović, Radomir (Liht) 拉多米尔(里赫特)·武约维奇 121, 133, 156
Vujović, Voja 沃亚·武约维奇 156
Vukmanović, Sevetozar(Tom po) 斯维托扎尔(泰波)·伏克曼诺维奇 166, 167, 208, 294, 314
Vukovar 武科伐尔 66
Vyshinsky 维辛斯基 231

W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 304
Weichs, Field-Marshal von 冯·韦克兹陆军元帅 195, 205
Wisshaupt, Captain 维斯豪

普特上尉 218

White Russia 白俄罗斯 181, 293
Wilson, General Sir Henry Maitland 亨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爵士 194, 258, 280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62
Wimmer, von 冯·维默尔 175
Working Peoples' Party 劳动人民党 135
Working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协会 125

Y

Yekaterinburg 叶卡特林堡 57
Yezhov 耶兹霍夫 131
Young Communist 青年共产党人 83
Yugoslav air force 南斯拉夫空军 192
Yugoslav(South Slav)alliance 南斯拉夫(南部斯拉夫)联盟 46
South Slavs 南部斯拉夫

人 31, 45, 54, 60, 71

Yugoslav army 南斯拉夫陆

军 186, 187, 195, 202, 215;

Domobrani 多莫布拉尼

215, 250—51, see also

Četniks, Partisans 见切特尼克, 游击队

Yugoslav Communist Party

南斯拉夫共产党 59, 66—

72, 74—76, 80—88; banned

by King Alexander 遭亚历山大国王禁止 103;

Fourth Congress (1928)

1928年第四次代表大会

105; New policies for 对南共新政策

107—108; Tito's reports on (1934)

铁托在1934年的报告 111;

Liubljana Conference (1934)

1934年的卢布尔雅那党代会

116, 117; Opposes Comintern

反对共产国际 133, 136;

Tito's rebuilding of (1937)

1937年铁托重建共产党

143—6; affected by Stalinist purge

斯大林大清洗的影响 147, 148;

Tito's bid to become leader of

铁托争取成为党的领袖

149—157; Tito as general

secretary of 铁托任总书记

158; membership of 党员

总数 162; as patriarchal

society 家长式社团 163;

appeal to women 向妇女

呼吁 167, 168; attitude to

Nazi and Fascist aggression

对纳粹与法西斯侵略的态度

175—177, 181—183; Fifth

Congress (1940) 1940年

第五次代表大会 183—185;

attitude to coup d'état 对政

变态度 201—203; reaction

to German invasion of USSR

对德国进攻苏联的反应

205; to consider

cooperation with Četniks

考虑与切特尼克合作 221,

222; effect of dissolution

of Comintern on 共产国际

解散的影响 257; Tito's pride

in 铁托对南共的自豪 284;

break with USSR 与苏联

决裂 288, 293—297, 319;

Fifth Congress 第五次代表

大会 321; Seventh Congress

第七次代表大会 305, 328;

policy making by 制定政

策 312—316;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communism 发展独自の共产主义 324—328; renamed League of Communists 改名共产主义者联盟 328—330, 332, 335; Ninth Congress 第九次代表大会 331

Yugoslav royalist government in exile 流亡中的南斯拉夫王国政府 219, 220, 223—225, 233, 235, 242, 245—247, 251—253, 261, 269—271, 278, 279, 289, 310

Yugoslav volunteers, for Republican Spain 南斯拉夫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志愿人员 138—143, 150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59—60, 61—64; elections (1920) 1920年选举 67—69, 72; Obznana 诏书 68—73, 82—83; rightists and leftists in 右派与左派 84; effects of depression on 经济肖条的影响 103, 104; general election (1935) 1935年的普选 134, 135; British intelligence agents in 英

国情报人员在南斯拉夫 189, 192; Pact with Russia 与俄国签订条约 194; invaded and occupied by Germany (1941) 1941年德国侵略与占领 187, 188, 194, 195, 199, 202, 215, 217, 218; Suitability for guerrilla warfare 适合游击战 208; Radio Free Yugoslavia 自由南斯拉夫电台 242, 271; German retreat from 德国撤退 211; general election (1945) 1945年普选 310, 311; Five-Year plan in 五年计划 317—319; failure of cooperatives in 合作社的失败 322, 324;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工业发展 325, 326, 334, 335, 336

Z

Žabljak, mountain 扎勃利亚克山 183, 242, 243

Zadar (Zara) 扎达尔(萨拉) 63, 200, 286

Zagorje 扎果烈 23, 25, 27,

- 28, 32, 34, 37—41, 64, 94, 111
- Zagreb 萨格勒布 23—25, 27, 33, 41, 46—48, 62, 63, 64, 65, 72, 73, 75—79, 102, 103, 342; elections in (1920) 1920年选举 67, 68; communist activities in 共产党活动 82; 86—88, 108, 109, 111, 115, 144; riots in (1928) 1928年叛乱 89; Fifth Party Conference in 第五次党员大会 183—186; anti-war demonstrations in 反战示威游行 186; Tito's radio link with Comintern in 铁托与共产国际无线电联系 201, 203, 204;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学生示威游行 333
- Zahariades 扎哈里阿迪斯 122
- Zelengora 泽伦戈拉 258
- Zemun 泽蒙 186
- Ziberlj, Boris (Comrade Rudi) 鲍利斯·齐赫尔利 (鲁迪同志) 109, 116, 144
- Zinoviev 季诺维也夫 138
- Zlatibor range 兹拉蒂波尔山脉 232
- Zujović, Sretan (Orni) 斯雷滕(茨尔尼)·茹约维奇 147, 151, 162, 226, 228, 280, 295, 320

